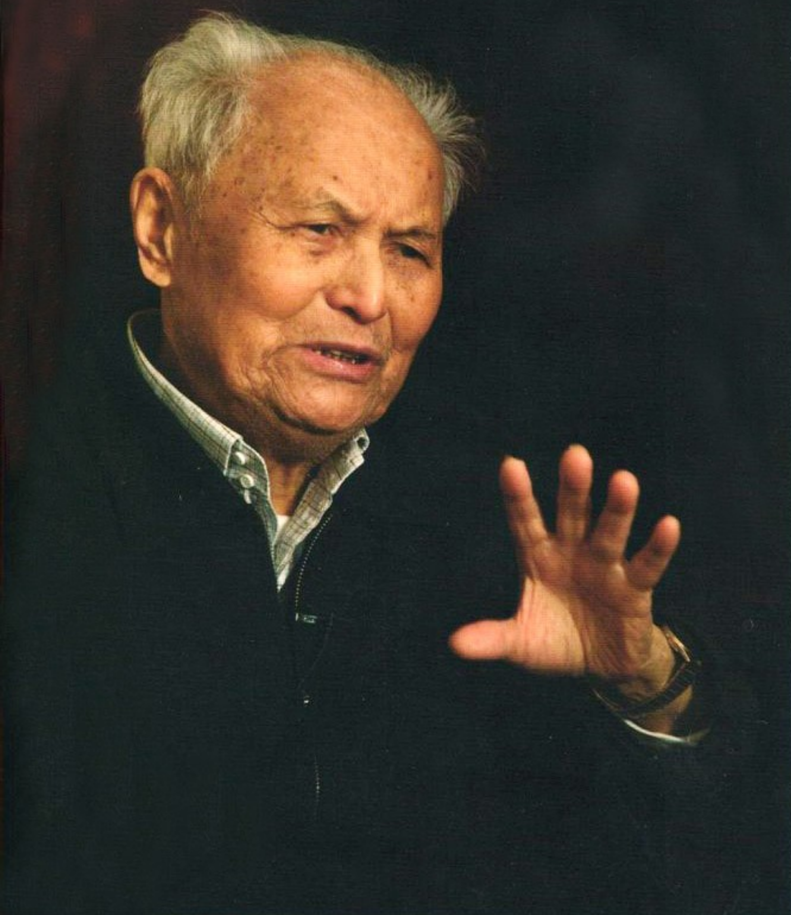
人物傳記系列

丁東：策劃、採錄
李南央：整理、編輯



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他這個人權術是比較厲害的，一生最愛看的書就是《資治通鑒》，讀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術。

周恩來確實是中國歷朝歷代最難當的一個宰相，他只能做到那個樣子。

胡喬木這個人非常複雜，我同他的關係很深，不是一兩句就能說清楚的。

我當過高崗的政治秘書，當過陳雲的政治秘書，當過毛澤東的兼職秘書，他們都各有各的本事，尤其是毛澤東。但是他們跟趙紫陽、胡耀邦沒法比。

然後江澤民就提倡「悶聲發大財」。現在貪污腐敗搞得這麼嚴重，都跟他後來的統治有直接關係。

李銳口述往事

九十六叟自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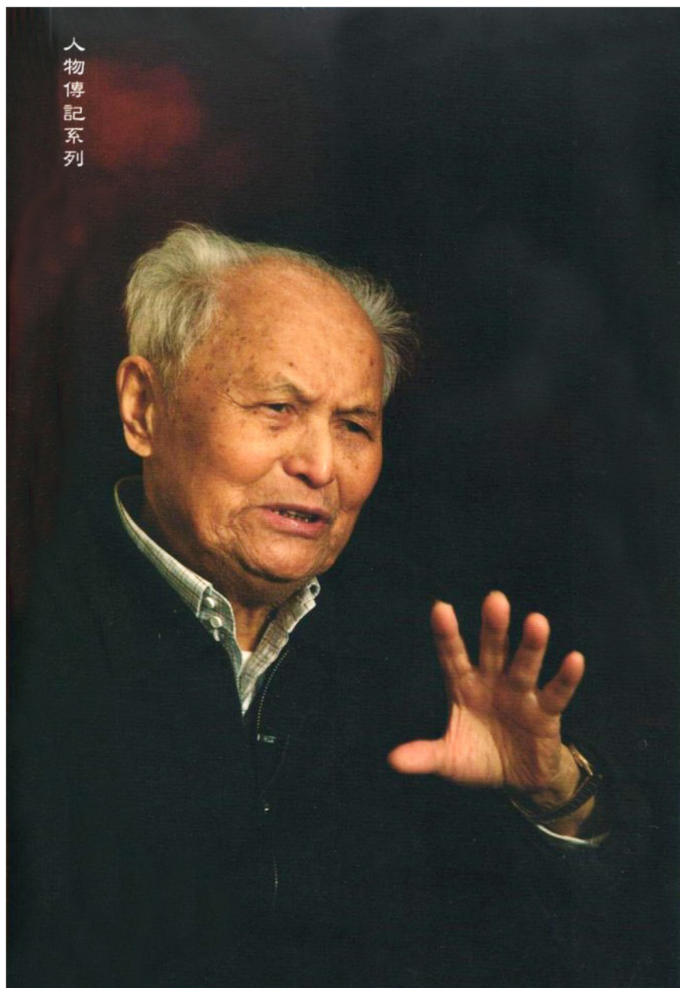


大山文化出版社
GREAT MOUNTAIN CULTUR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人物傳記系列



丁東：策劃、採錄
李南央：整理、編輯

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他這個人權術是比較厲害的，一生最愛看的書就是《資治通鑒》，讀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術。

周恩來確實是中國歷朝歷代最難當的一個宰相，他只能做到那個樣子。

胡喬木這個人非常複雜，我同他的關係很深，不是一兩句就能說清楚的。

我當過高崗的政治秘書，當過陳雲的政治秘書，當過毛澤東的兼職秘書，他們都各有各的本事，尤其是毛澤東。但是他們跟趙紫陽、胡耀邦沒法比。

然後江澤民就提倡「悶聲發大財」。現在貪污腐敗搞得這麼嚴重，都跟他後來的統治有直接關係。

李銳口述往事

九十六叟自題



大山文化出版社
GREAT MOUNTAIN CULTURE

目录

封面
照片
《李锐口述往事》序一
《李锐口述往事》序二
编者说明
家庭的影响
　　我的家庭
　　我所知道的父亲
　　父亲的朋友
　　　　黄兴
　　　　宋教仁
　　　　谭延闿
　　　　方维夏和李六如
　　　　父亲其他的朋友

　　亲戚
　　大姐
　　母亲的教育

读小学
　　湖南开明的教育环境
　　楚怡小学
　　学校的活动
　　教师的地位

中学时代
　　从楚怡到岳云
　　岳云中学的老师
　　家中的生活
　　写小说
　　办墙报
　　朋友们
　　考大学

在武汉大学的日子
　　武大第一年，结识新友
　　武大九人临时代表团及武汉学联
　　武汉学生的“一二·九”示威游行

成立武大学生救国会，领导罢课
办《救中国》
成立校内的秘密组织——武大青年救国团
武大学生救国会的活动
在市秘密学联的工作
寻找共产党

成为职业革命者
离开北平
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
莫测命运
徐州突围
滞留淮阴
重聚武汉
长沙遇故人
《观察日报》
离开湖南，去延安

我的延安经历
延安的生活和工作
到达延安
被胡乔木留在中央青委
调入《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改版和它的历史作用
在《解放日报》写的文章
在延安结识的朋友
延安的物质生活
延安的夫妻生活

整风和抢救运动
整风运动的由来
全党整风
整风运动转入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开始的著名案件
抢救运动的外部原因
抢救运动迅速扩大
我在保安处的经历
抢救运动几例
抢救运动的收场
延安以外的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的关键人物康生
半个世纪后的余哀

对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要有个正确认识

不总结教训的恶果
否定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利大于弊
整风、抢救运动的最后成果
整风、抢救运动遗祸至今
王实味冤案的教训
应该对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有个历史决议
整风、抢救运动的四大总结

热河办报
准备离开延安
走出延安，北上承德
热河的地位变了
困难重重的《冀热辽日报》
报纸与分局的关系
北平、承德，留去之间
勉力办好报纸
热河办报小结

东北一年半——给高岗、陈云当秘书
给高岗当秘书
当陈云的政治秘书
不再干秘书

南下——创办《新湖南报》
确定“归队”
南下
进长沙
在省委内的人际关系
创办《新湖南报》
报纸的新旧交替
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
从《新湖南报》出来的人才
离开报社
附录——“傅斯信”摘录

我和水电
开创水电事业
离开湖南，转业进京
接了一个没法干事的摊子
上任伊始的当头棒
进入角色
开创水电事业
搞建设需要知识分子
抓住龙头

- 宣传开路
- 访问苏联
- 学以致用
- 访问苏联的附带收获
- 三门峡的教训
- 为水电争投资
- 可以放手干了

三峡工程
- 三峡工程的第一次论争
- 记下水电的历史
- 同水利部的根本分歧
-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 三峡是怎样上马的
- 我的最后努力
- 我为什么反对三峡到底
- 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 最后一次去三峡

抱憾终身
- 恢复机构、收拾人心
- 出访巴西、美国——重新反思
- 现在乱了套

大跃进、庐山之后
- 跟着中央转
- 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
- 共产党这样的错误，人类历史没有过
- 妻子离婚，流放磨子潭
- 最后平反，安子文再次帮我
- 附录一——李锐在北大荒给范元甄的一封信
- 附录二——李锐在北大荒给安子文的一封信

吏部文章
- 重返世间
- 选拔第三梯队

臧否人物
- 毛泽东
- 周恩来、朱德
- 高岗
- 陈云
- 胡乔木

陆定一
薄一波
余秋里
赵紫阳（兼评胡耀邦）
钱正英
李鹏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三任中组部部长

李锐大事年表

记得一九九七年我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北京的一些朋友，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在文采阁搞了一次聚会，开始我讲了几句话，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八十岁可以分四个段落，第一个二十年是读书，参加革命；第二个二十年是为革命做工作；第三个二十年是倒霉，当贱民、坐牢；第四个二十年是又工作，离休之后还是继续工作。大概这一辈子要划分的话就这四个段落。

——李锐



李锐近照
韩磊摄影



九十一岁的李锐伏案写字
韩磊摄影



九十三岁的李锐在杂乱书房内修改文稿
韩磊摄影



李锐九十一岁生日在北京医院病房阅读《炎黄春秋》
韩磊摄影





二〇〇九年李南央与韩磊在李锐家的合影



二〇〇五年十月李锐与女儿南央在家中讨论书稿



一九九六年朱正、丁东与李锐在他的书房合影

《李锐口述往事》序一

朱正

李锐先生是我的老师。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那时李锐是报社的社长，他来给我们学员讲过课。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及门弟子了。新干班结业，我到报社工作了。只是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不会有很多和他接近的机会。不过他的风度和才气留给我的印象是深的。当年我叫他李社长，后来他和我都不在报社了，我就叫他老社长了。

1950年他调离报社，先是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到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主管水力发电的建设。从此几乎有整整三十年没有再见到他了。在这三十年里，他有十一年是被流放于北大荒和安徽大别山，八年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有二十二年是当右派分子，劳教五年，劳改三年，反正都是九死一生。并不是只他和我两个人遭到了灾祸，是我们这个民族遭到了灾祸。我有机会再见到他，是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去的时候。1979年，一次他路过长沙，和一些原来报社劫后余生的旧部见面，他给我们谈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以及对这些事的思考。到今天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说的一些话我仍旧记得很清楚。他说：“同志们啊，说得难听一点，这些年，我们是被农民专政了。”谈到毛泽东，他说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个字的评语。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我去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就到了北京。闲空时间，我常常去看望老社长。他知道我一个人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到了节假日，就常常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吃饭，“改善生活”。后来我借调的任务完成，回到长沙，以后有什么事到北京去，好几回都是借住在他家，交往也就深了。和他平常的交谈中，使我受益不少。我的一些肆无忌惮的谈吐，他也能听得下去。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一些人和一些事，他和我的看法是相同或者相近吧。

我以编辑为业。老社长很看重这一点。他的大著《庐山会议实录》初次出版的时候，他向出版社提出，要我担任责任编辑。他主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辑工作，也要我去参加过一回讨论，我问：要我去干什么？他说：你编辑的知识和经验有用。这样我就到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住了几天，看了一部分书稿，提了几点建议。

反右派斗争是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题目。后来下决心把它写一本书。在

写作过程中，我拿了一部分书稿向老社长请教。他看了。对于一些他以为不恰当的说法提出了修改意见。书稿写成之后，几年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最后是他推荐给河南人民出版社，才得以出版的。出书之后，民营的席殊书屋评当年好书，把这本书评为非文学类的十本好书之一。老社长去参加了他们宣布评定结果的会，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同老社长越接近，也就越了解他，对他的道德文章就越敬佩。一年他寿诞，我跟几个朋友给他送了一副寿联，我们是这样写的：

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
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这就是我对老社长的看法。我以为这副寿联是只能送给他的。够得上古人提出的这两项标准的人，是并没有很多的。

像他这样一位人物，生平经历如此丰富，起伏如此之大，波澜如此之多，又曾经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可说是传记文学极好的典型。他这几十年的遭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这一段，而他的立身行事又足为后世楷模。这是能够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记的。最早是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女士写了一本，香港版书名是《党内有个李锐》，内地版的书名是《李锐其人》，她在写作过程中跑了许多地方，找了好些人，调查访问，收集材料，我也是她询问过的一人。她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得到一些好评。

也有好几位朋友知道我和老社长有多年的接近，相知较深，希望我为老社长写一部传记。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想法。我想，这就和我写作鲁迅的传记、浦熙修的传记不同，不是仅仅凭借文献资料，而是对传主有直接的了解，自然也很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只是手边七七八八的琐碎事情总是打发不完，这一件想到要做的事情也就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丁东先生和南央师妹合作费时数年的《李锐口述往事》完成了，我很觉得高兴。这真是一本极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它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使人们对当年的历史能够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我以为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传主在自述往事的时候，常常谈到他的思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怎样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国家的思考。这些都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下面摘录两段做例。传主在谈到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话：

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呢？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的人说什么也没有用。（第293页）

谈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老社长说出了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思考：

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党的问题。党政要绝对分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政党是政党。现在党的官员的权力高于一切，高于政府，高于法律，政府与法律都是附属于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现在搞出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更明显了。（第340页）

就从这两个小例，读者也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内容的精彩了。太史公说：他的《史记》是一部“述往事，思来者”的书，我看这一本《李锐口述往事》，不仅仅是在述往事，也是在思来者。他在请比他年轻的读者和他一同来思考这许多问题。南央师妹嘱我作序，就给了我通读全稿的机会。我读了。当然乐于写此短序向读者推荐这一本好书。我相信别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感谢她和丁东先生所做的这一件工作。

2013年3月8日于长沙

《李锐口述往事》序二

丁东

这本书的动议始于二〇〇二年。年初某天，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建议做李锐先生的口述历史。她知道，我在此前和李普先生合编过李锐米寿文集《大哉李锐》，为李锐先生其他著作的出版也起过某些推动作用，同时，我正参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

从口述史学的角度讲，李锐先生当然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他是廿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是许多历史转折期高层博弈的亲历者。连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重要政治家，都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选择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如果愿意接受采访，将为中国当代史册增添凝重的一页。

我和李锐先生电话联系，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和崔卫平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李老家中，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是摄影专家。他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这样的采访，大约有十次左右。其间三峡工程总公司邀请李锐先生前往三峡工地考察，我和王绥琛还曾随行，边采访，边拍摄，从宜昌一路到重庆。

后来，崔卫平可能是工作较忙，也可能是觉得李老口述的进程比她预想要漫长得多，于是和王绥琛退出了这项计划。我不擅长摄像，于是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二〇〇二年夏天，李老夫妇到位于北京怀柔的宽沟招待所避暑，我和他一同前往，每天谈半天，谈了半个多月，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段时间录制的。

同时，我请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本来，我想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老定稿，然后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丛刊上连载。但登了一篇就没有继续下去。一是因为李锐先生太忙，登门访问的客人川流不息。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出一篇，就再也没有时间修改了。二是因为关于延安整风的内容敏感，出版社也觉得公开发表有困难。于是，陆续发表的计划搁置下来。

口述采访进行到李老一九八二年调中组部选拔第三梯队就戛然而止。当时有一家出版机构想出版李老的日记，希望他先为日记定稿。我就不便让李老分神继续口述。所以，李老的晚年生活就没有继续采访。好在别的朋友有采访计划，约我一起参加，请他专题回顾了和一些政坛要人的交

往。

直到二〇〇九年，由于李锐长女李南央的努力，这项口述历史工程才重新启动。当时李南央已经完成李锐数本日记的整理出版，决定投入精力，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当时清点了一下，李锐先生二〇〇二年口述的绝大部分录音初稿都在，只有少数段落由于中断时间太久，找不到了。我向李南央表示，你如果愿意整理，再好不过。一来熟悉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交往，二来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三来你和父亲沟通比外人近便得多。但我也同时告诉她，完成这项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最终如何请李老抽出时间校订文稿。我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搁浅的。

李老生于一九一七年，这时已经年逾九旬，家中仍然宾客盈门，来访不断。他写了一辈子文章，又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了香港《争鸣》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有力的推动，终于让李老在将近四年的光景里，不断挤出时间，陆续校订了李南央整理的文稿。

我深知李南央整理文稿要付出多少心血。依我的经验，整理一篇口述所花费的精力，甚至多于撰写同样篇幅的文章。在忠实于口述者本意的前提下，如何让文章条理清楚、文字流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核对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更需要知识积累和考证功夫。李南央的本职工作是高能加速器的磁铁工程师。为了做好这件事，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

如今，李锐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让人欣慰的是，李老终于在头脑清楚、思维活跃的时候，使这项文化工程得以收关。

参与这项口述史学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大学念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当时在课堂上获得的真知实在不多，接受的大多是权力锻造的历史假象。穿越遮蔽，寻找真相的历程，是在毕业之后若干年才逐步开始的。有幸聆听李锐先生详细地自述生平，并且和他从容地探讨切磋，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脉搏的跳动，从中获得的启示是书本上难以得到的。

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他的父辈是中国追求民主宪政的先驱，他在晚年又成为中国执政党内追求民主宪政的代表性人物。我想，浓缩了他心路历程的这本《李锐口述往事》，会得到读者的喜爱。执着追求民主宪政的中国人，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关注当代中国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国内外朋友，也会得到珍贵的信息。

编者说明

这本《李锐口述往事》录音采访的主要部分是丁东先生在二〇〇二年三月至八月进行的。丁东先生根据录音整理出了《中学时代》一部分，经我父亲审核、校改后，二〇〇三年九月在他担任主编之一的《口述历史》第一辑上刊登了。之后，丁东又整理出部分章节，但都积压在父亲那里审改不出来，这个工作就搁浅了。

二〇〇九年初，我完成了《父母昨日书》、《云天孤雁待春还》及三册《李锐日记》（1946-1979年）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征得父亲和丁东先生的同意，从丁东那里接过二〇〇二年口述的所有原始录音记录，着手父亲口述的整理。上手之后方才知道，口述的整理难度，比起书信和日记不是倍数而是指数关系。最多的，一个主题就有十几个、分好几次采录的文件，时间的先后颠来倒去，叙事和感想穿插交错，有的事儿反复地讲了多次，但每次的内容又不是完全的重复，不但事情发生的先后有出入，很多人名和叙述是根据录音输入的，大概打字人听不大懂我父亲的湖南口音，又不了解那段历史，输入的文字在很多地方对不上碴儿。真要感谢计算机的检索功能，加上多年来父亲对我反反复复讲述过他的往事，近年来我又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信件和日记，对他讲的事情和涉及到的人物不算陌生，否则光是根据输录文字将事情理清，就是个天大的功夫。

需要说明的是，在父亲口述的文字整理过程中，我加入了二〇〇二年采访时没有说到，但是我曾听父亲多次讲到的细节。比如：延安保安处一个窑洞里关的人太多，半夜缺氧，大家起来拼命向通风口扇风，才没有憋死，等等之类。另外补充了原采录中没有，或简略带过的父亲一生的两个小阶段："武汉大学"和"成为职业革命者"。这两章，是参考了宋晓梦的《李锐其人》；《大哉李锐》中李普的文章"谈李锐——楚狂本色总依然"，潘基踬的文章"李锐在武汉大学"；以及父亲在《往事杂忆》和《我心中的人物》两本著作中的"一二Ÿ九前后的武汉学生运动"、"投笔从戎的三天"、"想念你啊文立徵"、"回忆郭子化"、"回忆吴觉"、"回忆谢文耀"、"回忆黎澍"等文章，以及父亲多年来对我反反复复讲述过的那个时期的经历综合而成的。本书最后一章"臧否人物"中有关江泽、胡锦涛、曾庆红和习近平等人的小节，是丁东（和鲁利玲）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廿三日补充采访的，赵紫阳一节是丁东（和姚监复等人）二〇一二年四月二日补充采访的。其余人物的小节，或是从丁东采录的口述中摘出的，或者是父亲单独对我讲过的。

我开始整理"口述"时，父亲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他执拗地坚持所有的整理稿要经他审阅后方可使用。为了避免像以前一样搁浅，丁东先生建议

找一家期刊分章节连载，这样有了时间的限制，父亲就必须在交稿期限之内完成他的审核和校对工作。真要感谢香港《争鸣》杂志社编辑的理解和支持，否则不知道这本书何时才能完成。

父亲在我整理出的稿子上做了大量的修正和增补，我基本都照录不误。但是需要“坦白交代”的是，有两、三处，我没有采纳父亲的修改文字，而是保留了他以前的叙述。譬如，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父亲趁被党派回武汉的工作之余，回了趟长沙探望母亲。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李锐其人》一书中，宋晓梦根据父亲那时对她的讲述，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母亲本是深明大义之人，……但半年前儿子的不辞而别使她的‘家长’尊严受到严重损害，以至见到儿子仍然怒火冲天，盛怒之下，竟把儿子关了起来。李厚生以绝食抗议。”（见宋晓梦著《李锐其人》177页）可是父亲在二〇一二年七月审看这段稿子时，将“仍然怒火冲天……”之后的叙述全部划去，改成“虽然有气，但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对我也有赞赏之意”。这一修改我没有采用。

朱正先生说过：“二十世纪过去十年了，已经成为史家的研究对象”。这本书就算作中国二十世纪百年历史的一叶吧，希望对史家们有所帮助，对后人有所警醒。

李南央

2013年1月4日

家庭的影响



明治卅九年（一九〇六年）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毕业纪念（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及川淳子提供。照片中圈出之人为李锐父亲李积芳）



李积芳在北京任国会议员时的照片



及川淳子教授提供的日本政法大学网站上清国留学生的档案照片



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先生題辭
衆議院議長湯化龍先生題辭
北京寫眞通信社 佐藤三郎編輯

民國之精華 第壹輯

BIOGRAPHIES OF MEMBER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HOUSES IN CHINA.

FIRST EDITION

Edited by Peking Photo Agency

北京寫眞通信社刊行

《民国之精华》扉页和李积芬介绍页（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及川淳子提供的日本国会图书馆数据库存资料）



平江长寿街李锐故居，早已捐给当地政府建成学校



李六如旧照



李锐母亲一九三〇年初旧照



李积芳在日本



李积芳（右）送七弟李积芸去法国留学前合影（一九一八年在北京）



一九一六年李锐的父亲李积芳与母亲李张淑在北京的合影



一九三六年李锐与哲姑的两个儿子方鹏君（左）和方南君



一九四九年李锐进长沙后与大姐李婉华和表弟方南君的合影

我的家庭

我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出生的，两个姐姐也是在北京出生的。我的家庭是这样子的：主要是父亲和母亲，两个姐姐。大姐比我大三岁，二姐比我大两岁。我原来还有一个妹妹，但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夭折了。

我的祖籍是湖南平江，老家在平江长寿街，是湘、鄂、赣三省的交界

点，算是平江有名的镇。我祖父的那一代是兄弟三个，祖父是老大，老二抽鸦片，没有出息，老三很好，作生意。祖父是个木匠，打风车出身的，后来积攒了一些家业，买了地。家里雇了长工，祖父对他们很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是老婆、孩子不能上桌，就是说，对长工是非常尊敬的。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的父亲排行第三。祖父的小弟弟结婚以后没有儿子，就将我的父亲过继给他做了儿子，因此父亲的这个叔父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亲祖父了，因为父亲过继给他了嘛。后来亲祖父娶了姨太太，生了两个儿子，老六、老七（祖父的大弟弟有一个儿子，是老五。父亲去世后，就是五叔带我去上海见的谭延闿），还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方南君的妈妈，我叫她哲姑。父亲那一辈的名字都是草字头，我父亲叫李积芳，老四叫李积芬，老六叫李积荃，老七叫李积芸。老七后来去法国留学，在那儿还娶了个法国人当老婆（没有跟着回中国），七叔后来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了。

平江那时出三样东西：茶叶、大布、白术（中药）。亲祖父是个茶商，经常来往于平江、汉口之间。那时汉口有个平江会馆，是座三层楼房，很漂亮，我叔叔带我去过。由此可见那时平江同外面的通商状况。我父亲是读书人，在家乡没有考中秀才，亲祖父就送他去了武汉读书，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两个人自由恋爱，父亲就与乡间由老人包办的妻子离了婚。那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是当时所谓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我父亲一九〇五年去日本读书，就是考取了张之洞的官费留学名额。那一次湖北、湖南共有好几十个人，平江有四人。

我所知道的父亲

父亲是一九二二年去世的，他去世时我还不满五岁。我继承了他的书桌。这张书桌的抽屉和小柜中的许多书籍，还有几张照片成为父亲给我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遗产。我印象深的除了《饮冰室文集》、《玉溪生（李商隐）诗集》（三种颜色字体线装本）外，就是黄兴、宋教仁、秋瑾的《荣哀录》；一张较大的黄兴照片，父亲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我父亲很喜欢写字，字写得不错。还有一本很厚的大型精装本《民国之精华》（一九一六年由日本北京写真通信社出版，日人佐藤三郎编），内收民国初年参众两院四百四十三位国会议员的小传，每人占一页，中日英三种文字，有照片；书的最前面有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照片、传略，以及日文中华民国议会史。父亲的小传也列于其中，约三百字。开篇是评语：李积芳（父名）“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荩言。”后半是简历：“前清时，以湖北仕学馆学员，由张文襄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经纬学校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应学部试，授法政科举人。辛亥武昌起义，回湘任法制局参事，筹办地方自治，旋组织湖湘法政学校，兼充公立法政各校教员。二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当年参议院议员代表地区，每省选十名；众议院代表人

口，八十万人口中选一名（湖南二十七人当选）。

关于父亲去日本留学的情况，一九八〇年出版的《黄兴年谱》援引《湖南文史资料》第十辑刊登的“凌容众日记”，有较详细记载：一九〇五年一月间，平江四人同长沙一批人，“于武汉会齐，九十三人去日本。十六日乘轮离汉度过阴历除夕，四日抵神户，五日抵东京。”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一日记有除辮事：“早起改装剪辮，小溪（父亲号筱溪）继之。”“未初，偕小溪赴富士见楼，因开会欢迎孙逸仙也，不期而会者千余人。警察原限准三百人，继许九百人。楼中只能容千人，踵门而退者殆又数百人。……日本之白浪滔天演说云：吾倾家以谋中国之革命，不成，无以为生，为优人以求食。所以不忍饿死者，欲留一命以见支那之革命也。”当年除辮是一件大事，在留日学生中也只有少数人做到，这表示革命精神，同清廷的决裂。凌容众和先父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到日本，还没有上学，就先除辮明志，这说明他们在国内时就已接受了黄兴、陈天华等的反清革命思想。同年八月同盟会成立，他们立即加入，成为第一批会员（头两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八百六十三人中，湖南籍最多，有一百五十七人）。这些人的生年都差不太多：黄兴、凌容众一八七四年（卅一岁），陈天华一八七五年（卅岁），父亲李积芳和宋教仁同年，一八八二年（廿三岁）。父亲在日本安心读书七、八年，一生重视教育。当年留日学生万余人中，多入速成科的学校，进大学而毕业的为数较少。

一九〇五年冬，日本政府循清廷之请，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陈天华蹈海自杀，以绝命唤醒国人（陈是一九〇三年从湖南到日本留学的，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革命白话文小册子，影响较大）。一批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其中湖南来的有凌容众、秋瑾（她的丈夫是湖南人）等十多人。随后不久，大批留学生都回国了。一九〇六年凌回到家乡，宣传革命，毁家兴学，创办启明女校，第一班八个女生中，有我的母亲和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钟桓英。父亲从官费中省出钱来寄回国，帮助我母亲上学。我母亲可说是辛亥革命前受过现代教育、有思想的女性。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常向我们姊弟三人谈起父亲的为人处事和他所交往的朋友，尤其是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友情。告诉我们父亲在国会解散后，曾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非常国会，一九二〇年回到长沙闲居，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委父亲以重任，但是因为赵同吴佩孚勾结，父亲坚辞不就，过年过节赵送的巨款也退回去。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父亲也不要平江老家的田租，母亲说，父亲在长沙闲居的那两年，还要维持场面，全靠母亲变卖父亲在北京当国会议员时积蓄的一些首饰。父亲那时常同母亲谈寄希望于广东出兵北伐。

父亲在广东的那两年，母亲带着我们在平江老家居住，那时父母之间有很多通信。父亲去世后，母亲将父亲的信件贴在牛皮纸上，订成厚厚的一本，珍藏起来。我小的时候看见过，有一二十封。父亲信上称呼母亲是“存真吾爱”，这在旧社会是很少的。信的内容，还记得多是有关三个孩

子的教育问题。大姐脾气犟一点，二姐乖一点，母亲对大姐大概打骂多一些，父亲就加以分析，并予劝导，不要用体罚手段，等等。

父亲的朋友

黄兴

辛亥革命，黄兴居功至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直到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多次起义的直接领导者，黄花岗之役负过伤。当年孙中山、黄兴是并列齐名的。讨袁（世凯）失败之后，孙黄之间曾有意见不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强迫入党的人按手印，服从他的领导，黄兴因此拒绝加入，以致国民党当政时，曾长期“扬孙抑黄”，不宣传黄兴的革命事迹。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开黄兴纪念会时（大概是因湖南黄兴故居修建开放而召开的），我将这个情况谈了。父亲加入同盟会后，同黄兴、宋教仁等成为好朋友。母亲同我谈过，黄兴一九一六年去世时，父亲悲恸不已，后来同黄的大儿子黄一欧常有来往。一九四九年我回到长沙后，去看望过一欧兄。我进米龄（八十八岁）时发表过“仰怀黄公”绝句两首：

壮志未酬公不言，遗容常伴书案间。
儿时岁岁麓山顶，好友相携谒墓前。
民主先驱世仰瞻，恨无实践替公传。
我心一事差堪慰，两代知交过百年。

黄兴的遗腹子黄乃（原名黄一寰）跟我是终生的好朋友。我们是小学同班，大革命时俩人同是学校童子团活动的头头。黄兴的墓在长沙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上，我同黄乃年年必到那里拜谒。延安抢救运动中，我被关进保安处，博古并不同意逮捕我，问过黄乃对我的看法，黄认为我绝对没有问题。在那样高压的形势下，为我作这样的保证，不是真正知心的朋友，真正的好人，是做不到的。黄乃会写文章，精通日语和世界语，还会吹口琴，是延安跳舞伴奏乐队的成员。他在延安就高度近视，一九四九年后失明了。后来一直负责盲人福利会的工作，专心研究并创造新的盲文。晚年我们同住一栋楼，他的客厅中悬挂着他父亲写的两个大字：“笃实”。一九八八年他七十岁生日时，我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少小同为童子团，毗邻共度古稀年。
六秋相饮延河水，廿载睽违冻雨天。
依旧镜心观世界，革新盲字吐叽篇。
常叹大器才难展，却有精神海内传。

黄乃的大儿子伟强是油画家，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他画了当年近

百人物的头像，从加拿大回国，同百位将军写的字幅一起，参加纪念辛亥百年的书画展览。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书画展在世纪坛开幕，请我参加并讲话。我讲了父亲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关系，他们都是追求民主和宪政的先辈，我唸了为《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写的那首七律，最后高呼："辛亥革命一百年，宪政施行依旧难。"

宋教仁

父亲同宋教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同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同班，宋是法律科。一九八七年宋教仁诞生一百0五周年时，他的家乡湖南桃源县政协出纪念专辑，让我写篇纪念文章。我在文章中谈到，一九〇〇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一百余人。黄兴、宋教仁遂创建了华兴会，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到同盟会。一九〇三年宋教仁在武昌读书时，即致力于组织革命团体。宋教仁学识渊博，尤长于写作。间岛问题发生时，立即出版了《间岛问题》一书，为清廷交涉取胜起了作用。他精心研究日本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专门著作。他深知舆论的重要，在日本时，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归国后在上海办《民立报》。辛亥革命前，他是黄兴在国内多次起义的助手，辛亥革命后，成为推行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的热烈鼓吹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醉心于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他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以争取国会议席的多数，成立责任内阁。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力量太弱，迫于形势，让位给袁世凯。宋教仁作为追求"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这一理想的代表，想利用宪法和议会去约束"独夫当国"的袁世凯，实现中国破天荒的民主政治。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他奔走各省，协调南北，联络政党，全力进行竞选活动，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主张省议会有立法权，省长民选。宋教仁又擅长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国会选举结果，参政两院的国民党员占议席多数，组成国民党一党内阁，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几乎成为举国定论。宋可说是主张民国并努力实现民主宪政的第一人。武昌起义后，《民立报》社论即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章太炎公开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南京政府刚成立时，由于宋同立宪派张謇、汤化龙、熊希龄有来往，深受同盟会中人的攻击。他的"调和南北，只希望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的思想，不为同盟会中一部分人所认可。一九一三年初，他在汉口演说时有这样的一段长话："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拿出铁血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当时即有谣传，袁世凯要对宋下毒手。他对朋友说：暗杀之事，防不胜防，只有处之泰然，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励同志们的奋斗。同年三月初，国会开会前夕，袁世凯急电邀宋教仁入京，"共商要政"。三月十二日深夜，宋从上海动身，在车站被人暗杀。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在身边。宋教仁之死，全国哗然，这一事件缩短了袁世凯的政治生命。我在纪念文章结尾写了一首七绝：

独夫子弹震神州，恸哭人才第一流。

谁道英雄长寂寞，民权社会共千秋。

宋教仁被害之后，父亲怀着深切的悲恸，到北京出席国会，在国会中为宋教仁的思想积极活动，在北京生活了六、七年，所以我们三姊弟都出生在北京。母亲同我讲过当年在北京国会开会时，议员们意见不同，争论激烈时，甚至摔起墨盒，后来墨盒就被钉死在桌子上了。国会旧址就在现在的新华社总社院子内，但是已经没有人关注这些议会旧事了。

谭延闿

辛亥革命前，谭延闿属立宪派，在湖南任推行宪政的咨议局局长时同父亲就有交往。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后，父亲同谭延闿（以及孙洪伊、周震麟、谭振等）过从更密了。谭延闿在广东送我父亲四幅字条，上书苏轼《张先词跋》“张子野诗笔老妙”这一大段话，一直挂在家中，儿时是能背诵的。父亲去世时，谭正闲居在上海，我的五叔父特带我到上海见过谭，行鞠躬礼后，谭摸着我的头，问候我的母亲，并赠送二百元奠仪。一九九九年四月，我到南京参加“五四”八十周年会议时，我和老伴曾特到谭延闿墓前行礼。

关于谭延闿当年的情况，我还知道这样一件往事。毛泽东和蔡和森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款，住在北京杨昌济家时，杨让他们去找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写了封介绍信（称蔡、毛为“天下奇才”）。章就将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谭延闿汇来的二万元汇单，交给了毛泽东。

方维夏和李六如

当年同父亲关系最密切的平江同乡除凌容众外，还有方维夏和李六如，他们是父亲最要好的同乡朋友。方比父亲大三岁，参加过华兴会，也是一九〇五年到日本的，入东京农业大学，并立即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一九一一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任第一师范学监，是毛泽东的教师。一九二五年到广东，由李六如介绍入党。一九三一年从苏联回国后，被派到苏区工作，一九三六年在湘赣边牺牲。母亲同我讲过，父亲去世后，灵柩运回平江，那时湘江和汨罗江是通航的，从长沙可一直通到长寿街。父亲的灵柩在湘江上船的时候，方维夏赶来，伏棺痛哭。母亲后来同方一家母女四人常有来往。方的女儿叫方陶，曾在苏联学习，与蔡畅同班。一九四九年我回长沙时，曾见到他们。方维夏是一九三六年在湘赣边牺牲的，没有让他参加长征，没有参加长征的都是被讨厌的。现在平江县长寿街办有维夏中学，我题写的校名，校园内立有方的铜像。

李六如比父亲小五岁，一九〇七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结识了凌容众，从凌那里知悉陈天华蹈海事件，并看到《民报》、《游学译编》、《嘉定

屠城纪略》等反清报刊和书籍，从此，投笔从戎。一九〇八年到武昌参加新军，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刘复基（武昌起义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组织文学社，为负责人之一，从事士兵运动。武昌首义时，他被黎元洪委为第四镇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参加了阳夏之战。由于不满意标统职位，又觉得自己年轻，想出洋深造，几经请求，黎元洪终于同意，赠他三千元出洋费，每月另拨官费八十元，还补了一个“陆军少将”头衔。李六如将那笔钱留在湖南乡下家里，买了些地，自己去日本读书。到了日本后，李六如热心议会政治，进了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一心读社会科学书，如《社会问题十讲》、《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很深。一九一九年十月毕业回国后，曾有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从事过这方面的活动。一九二〇年到长沙教书，倡导平民教育运动，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给他许多帮助。他编辑了四本通俗的《平民读本》，于一九二二年出版，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曾风行一时，一连印了四版，几万册。一九二一年李六如先入团，后入党，还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赴广州，为党办的湘江学校募款，从而结识谭延闿、邵力子、覃振等人。他在谭延闿任军长的第二军军校中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北伐时，任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的中将党代表，方维夏为第五师（谭道源师长）的党代表，军党代表是李富春。

一九三〇年李六如到中央苏区，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李六如同何叔衡一样，由于出身问题，被左翼路线讨厌，没让跟着主力红军长征。他留下来打游击，随部队在赣南山林间转移，后来生了病，经常掉队。一九三五年在一次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他被认为再拖下去，会白白送死当俘虏，于是项英命令他和他的夫人王美兰离开苏区，给了一笔路费。这笔钱在过赣江时，几乎全部被白军搜走，后流落到吉安被捕。由于白区报纸刊有他的照片，被捕后受过种种酷刑，他守口如瓶，终被判处极刑。他于是向当年老友、时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求援，覃振立即给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写信，熊就把李六如给放了。因此，他一九三七年八月就到了延安，曾担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目睹江青专横跋扈、反复无常，服务人员十分为难，敢怒而不敢言。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他将大家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对江青的意见，向毛作了一次汇报，正当他同毛谈话之际，江青走了进来，有些话被她听见，当即大哭大闹。此后他就离开了这个职位。

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钟桓英，同母亲是好朋友。母亲常常对我们谈起父亲同李六如的亲密交往，以及举家关切之情。母亲同我讲过，毛泽东一九二〇年前后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常到李家，毛不讲卫生，钟桓英常给毛洗长褂子。我到延安后，立即去看望六如老伯。突然见到这个外貌酷似乃父的故人之子，六如老伯自然十分惊讶和意外高兴。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和满口乡音：“呵呀，呵呀，想不到，想不到，你的姆妈好吗？”在延安六年中，我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一、二次。延安生活清苦，每去

必留餐，“打牙祭”。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一九四二年要写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特地去找他谈过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对他的一生才有了较多的了解。六如伯是我们党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及其曲折的经历，在清末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典型的，难怪他后来非写出一部《六十年的变迁》不可。他幼年丧父，母子靠借贷维持家计，虽然饱读经书，获得应县考的资格，但两个弟弟只能当学徒。后来这两个弟弟和儿子，都被国民党杀害了。

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时，除了黄乃为我作证外，六如伯也为我做了证明。保安处曾派人来向他调查我老家的情况，问我的父亲是不是红军杀掉的。我是在长沙读的小学和中学，老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六如伯比我熟悉得多；老家的亲属中，有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也有些妇孺死于共产党的过“左”政策，有他的证明，这类谣传一下澄清。其实，我到延安时写的《自传》，老家的重要人事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奇怪的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我受批斗时，康生仍在造谣，说我这个人“有杀父之仇”。后来知道，六如伯向调查者再一次辟过这个谣，并对我父亲作了评价：是当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人士，如果活下来，也会赞成共产党革命的。对于“抢救”中的过“左”做法，他向组织提过书面意见。

解放后，六如伯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书记。一九五二年初，他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家乡。当时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我母亲自己做菜，举行家宴，请六如伯吃饭。当年平江人老红军陈再励（省民政厅长）、曹瑛（长沙市委书记）、陈长簇老伯和六如伯的原配夫人都参加了。其时我正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搜集资料，他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后，谈到他在延安整风时，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发现自己一生同中国革命历程竟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写了《自传》之后，就将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认识，写了许多札记，这个包包在离开延安后，一直随身带着。这次到湖南来，也附带收集有关资料。这就为我写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四本《平民读本》也是他那次借给我的。五十年代在北京，我整天忙于事务，看望六如伯反不如在延安的次数多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出版之后，他在扉页题签，送了一本给我，至今保存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六如伯。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北京，去看望黄克诚，才知道这十年中，加上六如伯，我们三个人归“专案一办”同一个人管。八十年代初，听说他的夫人王美兰仍住在北池子故居，于是去看望她。二十多年睽违，彼此还能认得出来。我们谈了大半个上午，才知道六如伯去世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天从报纸或广播中得知江青又发表讲话时，六如伯总向老伴叮嘱，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应付最坏情况的发生。一九六七年康生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时说：“李六如是叛徒、反党分子。”还补了一句，“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的那个李六如”。“反党分子”的罪名是由于六如伯参加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被推为主编，这当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至于“叛徒”的问题，自是指一九三五年江西被捕之事。这件事，过去六如伯没有详细同我谈过，只提到是由

覃振营救出狱的。一九七〇年，八十三岁的六如伯和他的老伴，被流放到桂林，过着软禁的生活。林彪摔死后，一九七二年返京，长期生病得不到正常的医疗，终于日渐恶化，只好回家待毙。最后病危时，夫人到附近借一辆平板车，将老人拉到医院。咽气时，六如伯拉着四十年共患难的老伴的手，用发硬的舌头，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的名字……神情极其凄苦，最后，流下两行泪水而停止呼吸。时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

父亲其他的朋友

父亲还有一个好朋友酆菊亭，是平江的大地主，他的夫人也是母亲启明女校的同班。他的家在长沙郊区（现在是市区），长沙大火没有烧掉，一座盖得很好的洋房。他非常重视教育。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去他家时，酆伯伯总要对我加以鼓励，有时还送我一些文具。他很支持慈善事业。那时长沙有家孤儿院，我为什么记住了菊亭这个名字呢？因为那时社会上对菊花比较感兴趣，有一年孤儿院开纪念会，用菊花搞了一个亭子，菊亭。酆菊亭给孤儿院捐了很多钱。我们家经济一发生困难，就向他家借钱。

我母亲跟我父亲的朋友都有这种借债关系，唐炳初家、酆菊亭家，有的相好的老邻居，也有这种借债关系。借钱多半是为了交学费。母亲很会理财，借钱后周转周转，当然是有借有还了。

还有一个有债务关系的人物，是平江人方克刚，他也是父亲的朋友。那时长沙有一个私立妙高峰中学，位于第一中学隔壁的小山上，就是方克刚办的。我的一个姑姑（哲姑，亲祖父的女儿）嫁给了方克刚的弟弟。哲姑也是启明女校毕业的，和她的丈夫大在革命时期都是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自动脱党了。哲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抗战初期，女儿七、八岁，小儿子南君只有六、七岁，新安旅行团从武汉撤退到长沙，党的关系由我联系，扩大招收小团员，我介绍了七八个男女孩，哲姑的女儿和小儿子都由我推荐进去。

亲戚

我在长沙的小家庭和平江的老家，亲属关系错综复杂，这些对小孩都有影响。我有一个表哥方国华，是大革命时期长寿街的支部书记，我们叫他汉哥，对我小时候影响很大。汉哥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杀掉了。

大革命失败后，平江红白斗争非常激烈。我还记得一个亲戚被共产党征去当兵，后来又跑出来了。到长沙我家里时，他就谈共产党苏区的生活，他对共产党一点坏感都没有。他谈到在苏区里结婚的时候要唱一首歌：“柑子树上开白花，情姐爱我我爱她。”他给我们唱这首歌，还唱《国

际歌》给我们听。

大姐

我大姐很了不起，是我和二姐的后勤部长，我俩离家参加革命，母亲就交给她了。没有大姐管母亲，我们没有办法，总不能丢下母亲不管。母亲整个战争时期都是跟大姐住在一起，但母亲自己做饭吃，不跟大姐在一起吃。她认为：我是独立的，我不靠女儿生活。她就是这么一个人。那时她们借住在民房里，我大姐住楼下，她一个人住楼上，这是大姐后来跟我讲的。有时候她脾气一发，一个人就要走，要回平江去，搞得大姐非常紧张，有时甚至还挨打。我大姐在学校教书很有名，解放后在湖南省体委工作。

大姐、二姐功课都好，大姐的字写得非常好，作文也写得好，但视力不行。那时候也不懂得去看眼科。大姐一读书就头痛，但她在周南女中上学时打篮球校队。湖南私立周南女中是非常有名的，校长朱剑凡，是湖南早年思想进步人士，同徐特立、毛泽东都有过来往，英年早逝。他女儿就是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我大姐有个要好的同学杨仁，是湖南有名的体育健将，一九三二年从上海两江体专毕业回来，在母校当体育教员。我一九三四年高中毕业，母亲考虑到我升大学后，学费有困难，于是让大姐到两江体专插班，一年后毕业，回来当教员挣钱，可以负担我的大学费用。大姐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就教书，正好帮助我读大学，作我的后盾，实现了母亲的计划。

抗战期间，长沙很多中学都搬到湘乡桥头河去了。在那里大姐与李淑一一起工作，都是省立二中教员。李淑一的儿子柳晓昂，长得有点像我，母亲和李淑一的关系很好，非常喜欢柳晓昂，每礼拜都要邀去吃饭。解放后我们与李淑一也有往来。柳晓昂最近去世了，以前也常到我家来。他的父亲是柳直荀，早年跟毛泽东在一起，湘鄂西肃反时，被夏曦杀掉了。

解放后，李淑一跟我大姐谈到，她与杨开慧是同班，在福湘女中，那是个教会学校。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湖南有名的国文教员，杨昌济的好朋友。有一次李淑一对大姐说，毛主席曾写过一首怀念杨开慧的诗，她还记得，她想问问毛主席还记不记得，就跟我大姐商量。大姐说这好办，你写封信给他就行了嘛。李淑一就给毛主席写了信。以后便有了《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词。

我大姐在战争年代教书，照顾母亲，她还全力支持我和二姐和二姐夫两口子的地下党活动。二姐夫妇遇到麻烦，总是回到她那里暂时躲避。我去延安之前，她为我做了新的被子，送我走了一天。一直到日本投降，三十岁时她才结婚。大姐人缘好，才貌双全，学生都喜欢她，追她的人很多。但是同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她坚决拒绝。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后

来的姐夫唐家桢，也是平江人，外科医生，早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抗战时同平江一些老党员有来往，解放后入党，是湖南省政协委员，已去世。她几个儿女都挺好，一个女儿在海南出版社工作，两个女儿是医生，儿子当过火车司炉，把耳朵搞坏了。

母亲的教育

我母亲有名片，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事。母亲娘家姓张，别号存真，名片上印李张淑。说到我母亲教育子女，父亲当年信中的规劝，没有起什么作用。母亲有男人的气质，自己从来不做鞋，针线活儿从来不沾边，这在旧社会妇女里也是少有的。母亲对大姐讲过，如果我是男人，可以当厅长。当年省政府的什么厅长她都可以看不起。

父亲去世时，母亲只有三十二岁。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母亲把头发剪掉，发誓守寡，继承夫志，将三个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大伯父寄来两百块钱，写了一封信，让母亲把父亲的棺材送回长寿街，同时把孩子带回老家生活。虽然生活困难，但是母亲坚决不回老家吃租谷，让儿女成为游手好闲的子弟。对平江老家母亲是深恶痛绝的。我二伯父的儿子死于抽鸦片，父亲为了让他戒毒，把他带到日本去都不行，没用。他从日本回来后，在北洋军阀的陆军测量学校工作，后来在上海去世，才二十几岁。我有一个侄子，是二伯父的孙子，满口金牙，是地方上的小混混，什么事也不干。这些人在红军打进平江长寿街时，都跑到长沙来了，整天游手好闲没有事干。所以，母亲把钱退回去，坚决不回平江定居，假如她回平江的话，就没有我们三姐弟的今天了。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在周围是有名的。父亲有个同乡年轻朋友唐炳初，也在日本留过学。他当年是何健的部下。何健是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的省主席，唐炳初同何健有关系，当省税务局长之类的官，是个肥缺。他住的房子在长沙万福街，是以前省商钱局的房产，商钱局垮了，就将房子出租了。房子很大，好几间，有正房、偏房，后面还有小花园，住了十多家。唐家住的是前面正厅的房子。由于有姨太太，儿女很多，教育不好，就一定要请我母亲到他那里住。他让出一间偏房来，让我们一家住在那里，来影响他的儿女教育。我家搬去有三、四年，是我上小学到初中的那一段。他二儿子与我小学同班，功课不好，希望我来影响。后来他大儿子到日本留学，学的是军事，在日本统治湖南时当过长沙市市长。解放长沙时，我还见到过唐柄初，他后来到香港去了。

一九三〇年，红军第二次打长沙，那时谣传红军见了平江人不客气，我们家也躲到岳麓山去了。当时红军没打下来。一九三一年，彭德怀打进平江，我老家长寿街镇里的男人都跑掉了，只剩下我的两个祖母、一个嫂嫂、还有一个婶母和一个堂姐。那时红军实行“消灭”地主的政策，老家中的这些老太婆、小孩、妇女一起从长寿街无目的地往江西迁移。在山区的

路上，我的两个祖母走不动，被推到山崖下摔死了。其他人一路要饭，碾转经过九江，流亡到武汉，最后来到长沙我家。我们一直住在长沙，同老家的这些人没有来往，没有感情上的联系，但是总归还是至亲家族，母亲将他们收留在自己家中。因为那些亲戚有传染病，母亲把我放到邻居父亲的朋友家暂时居住。后来一个婶母、一个嫂嫂、还有五六个小孩都先后死了。剩下个小孩儿，我堂兄后来带回去了。经过这样严重的事，母亲从来没有同我们议论过共产党不好。我母亲在这些问题上非常明智，对共产党一直有她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因为这么多家人死去，且在经济上带来极大困难，而对共产党有过半句责言。

儿时母亲对我们讲的父亲的往事，常向我们提及的那本《民国之精华》对父亲的评价："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荩言。"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谈做大丈夫的古训：立言、立功、立德和不淫、不移、不屈。虽然因为年幼，那时尚不能完全领会，但是在母亲的教导下对父亲的品德多有继承，一生受益颇多，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每当遇到大事，我不会突破良知的底线。尽管一生处于做人与当党员的冲突中，我宁可受罪受苦，也不违心地去做不正当之事，伤害他人。我的体会，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思想的形成，家庭环境很重要，父亲、母亲、家庭环境，还有兄弟姐妹，当然学校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应该讲，我一生的开始是幸运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李锐和黄乃在长沙的合影（李锐从武大回到长沙，黄乃从日本回到长沙）



一九九七年李锐八十大寿在家中与黄乃合影

读小学

湖南开明的教育环境

谈到我读小学的情况，这就关系到我们这一代湖南人生长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我没有系统地研究，但是有一些感触。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作新政。翌年冬，湘绅蒋德钧、熊希龄、王先谦、黃自元、张祖同、陳程初几个人一起创办了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蒋德钧同时提出“嫌其迹近谋利，乃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光緒二十三年一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与六位宝善成公司紳董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汤聘珍、蒋德钧、熊希龄共同具名，正式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立案，两江总督刘坤一拨盐厘加价银七千两为经费，正式创建了时务学堂，由熊希龄负总责。同年八月，熊希龄发布了《湖南时务学堂缘起》，阐明时务学堂培养维新人才的宗旨。接着，陈宝箴又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并正式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九月正式开学。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被革职，时务学堂被迫停办，接任的巡抚俞廉三改时务学堂为求实书院，之后更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寅恪是陈三立的三子，这种关系，你就可以看出陈宝箴这个人的厉害和对湖南教育的巨大影响。清末民初的时候，也就是自一九〇〇年起，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中，湖南的人数总是排在前面。

所以我们这一些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读小学，三十年代读中学的湖南人，受的影响离不开湖南开明进步的教育大环境。清末民初湖南出了一批反清共和的有名人物，像黄兴、宋教仁、凌容众，后来湖南形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革命的中心地区，革命运动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这都跟湖南开教育风气之先不无关系。湖南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没什么出名的人物，一直到明末清初出了王船山（曾国藩在金陵刻印了大批《船山遗书》，谭嗣同、毛泽东都受王船山的影响很深）；再后来到太平天国，就出了曾国藩，是全国性的影响，这个人的正面作用是不应该否认的。大概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都称赞过曾国藩。八十年代初我在中组部主持培养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

曾经设想过由中央发一个关于干部子弟的文件，由我来起草完成，但是很多人反对，文件没能形成：“为什么对干部子弟另外看待？”“为什么要针对干部子弟做什么特别的规定？”我记得我是赞成这件事的，就是受了曾国藩家教的影响。我读过曾国藩的家书，怎么治家，对子女怎么教育，都是非常好的。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玄孙还曾经跟我小学同过班。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是我国第一位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理科学士学位的女子，抗战的时候在湖南办艺芳女校，校址就是曾国藩旧宅池塘前的房子。曾宝荪终身没有出嫁，一九五〇年去了台湾。所以湖南这个背景从王船山、曾国藩起，到时务学堂，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靠拢。湖南的教育当年在全国是比较在最前面的，可能是江苏第一，北京也有很多著名的中学，还有广东。

楚怡小学

我就读的小学叫楚怡，校长陈润霖就是湖南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校学习，一九〇三年毕业回国，一九〇六年创办了楚怡小学堂。他的儿子跟我在中学的时候同过班，前些年出了一本书纪念陈润霖的纪念册，他们还让我写了一篇序言。陈润霖后来又办了楚怡工业学校，有土木科，矿冶科，还有机械科，一共三个科。他接着又办了楚怡幼儿园，上个世纪廿年代初办了楚怡中学，这个人真是个很好的教育家。湖南当年那一批好教育家都是赞成孙中山、赞成教育救国、反对军阀的。长沙大火之后，学校毁了，陈润霖就把学校搬到了乡下。他是新化人，出身很贫苦，一九四六年去世的。

我是一九二三年进的楚怡小学，一九二八年毕业，只读了五年，跳了两班（半年为一班）。文革中在秦城坐牢，没有事就回忆过去的事情，关于楚怡小学写了三首诗。

第一首是：

激励孩童向上心，红星高挂最为亲；
手工劳动“好习惯”，办学当年属革新。

红星，是每个学期班级之间进行评比，就像我们现在评劳模评、评先进差不多吧。评比有好些内容，学习成绩，体育、音乐什么的都在里面。功课里面数学有一种心算，多少加多少，多少乘多少，不许用笔。一个班如果分数考在前面，或者什么项目比在前面，学校就会奖励一个红星挂在班上，是极为光荣的。手工劳动，是我们的手工劳动课有很多内容，包括种菜，还有劳动课；好习惯，总有二三十条规定，包括学习，生活，礼貌，同学之间互助帮助等等。一个学期一、两次，班主任在全班对每个同学评议，一条一条通过，我印象很深。到了高小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第二首是：

日临麻姑贴，悬手锥沙功；
每写春联字，人夸似鲁公。

就是小学五年，每天早晨都要将一张写好的大字放在桌子上，由老师收走，老师在课堂上点评。我的字在小学班上是数一数二的，学校要写对联什么的，我们班就是我写。

第三首是：

心灵小小慕英雄，四曲悲歌赞古风；
苏武牧羊易水别，木兰织布满江红。

这个属于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育，那时候教孩子们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诗词在学校里面很普遍。五四运动以后，日本人逼中国很厉害。在长沙，湘江里有个水陆洲，跟长沙城隔江而望。我们可以在河岸上看见江中的日本兵舰和舰上的日本太阳旗，还有英国的兵舰，大概不止这两个国家的，但是这两国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些水兵很无理，我们要去水陆洲郊游的时候，必须划船经过湘江，因此印象很深。大革命的时候，湖南有个很有名的“六一惨案”，就是日本水兵上岸，打死过一个小孩儿。五月份纪念活动很多，记得学校好像在“五七”同“五九”这两天都有纪念活动，就是袁世凯答应日本人提出的廿一条，是国耻日。五月还有一个济南“五三”惨案，日本人在济南杀了北伐军的人，五月十一日更是在济南城大屠杀。学校开大会，教育学生。学生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这些活动都给了我们很深的影响，一个是面对当时的帝国主义，教育我们爱国；另一个就是面对中国的落后，政治上不现代化，让我们懂得要争取民主，国家才能富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最明显。大革命的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是学校童子团的头头，黄乃是学生会主席，我们一天到晚老游行，晚上提着灯游行。长沙城北的新河三角洲是浏阳河的入湘江口，记得那里有个天桥，火车从天桥上过。小孩子冒失得很，我们在天桥火车轨道的空档处走，火车来了也不怕。

学校的活动

小学的活动里还有教小孩儿演戏，开文艺晚会，大概每一个学期有一、两次。记得我演过匡衡凿壁偷光，西汉的时候一个小孩家里没有灯，墙上打一个洞，把人家的灯光借来读书。好像还演过黄兴，清军要抓他，他化妆成一个卖馄饨的，挑了个馄炖担子跑掉了。

小学的同学之间关系也很好，有的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像黄兴的儿子黄乃，上面说的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杰。他的姐姐是谁呢？曾宪植，叶剑

英原来的夫人阿曾，后来离婚了，是他的亲姐姐。曾宪杰是香港有名的国画家，八十年代后我们一直有来往。

小学时，我在学校图画是第一名，还曾经想过学美术。我很喜欢画图画，那时主要是素描写生，水彩写生。后来在中学、大学给同学们画头像，在武大还办过展览会，几十个同学的头像，都是小学的功夫。那时候的小学教育我觉得非常好，让我们全面发展，而且用鼓励的办法。学校还组织郊游活动，学生们自己带干粮。我们学校富家子弟比较多，但是同学之间感觉不到什么很大的贫富差别，大概家长对孩子的家教都是严格的，富家子弟并不显摆，一般人家的孩子也并不是对富家子弟就很羡慕。有的富家子弟学习不好，同学们照样瞧不起，老师照样逼得很厉害。

教师的地位

楚怡小学的老师我现在回想，教我们自然科学的应该是共产党的党员，还不止一个。长沙解放以后，我还去看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韩竹筠，她的先生叫陈奎生，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我母亲跟他们是朋友。陈奎生后来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员，当年同毛泽东他们关系很深，后来跟周世钊一起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我小的时候湖南的体育就比较好，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最近看到全运会，湖南大概排在第七、第八名。我能有今天的身体，恐怕同小孩子时候有关系。好玩，喜欢活动，学校也鼓励。我姐姐一直是中学体育教员，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薪水可以供我上大学，还照顾母亲和一应家用。我的二姐失掉组织关系的时候，曾经回到大姐那里，大姐还帮忙找到职位让她教书，维持生活。其实周围的人都知道二姐夫妇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接纳他们，大姐的家庭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可以想见那个时候体育教员的社会地位。从国民党的统治来讲，控制得并不是那样严，还是有空间的，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社会习惯也还是延续的。

丁东：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的教育，还是民国时期搞得比较好。

李：对，学日本，学西方，日本也是学西方、主要是学德国。

丁东：后来到了五十年代，一学苏联就走了弯路了。

李：解放初期取消英文，中学、大学都取消英文，只学俄文，我最不满意。语言是一种工具嘛，美国的新科技比其他国家都多，但是没有办法。想到殖民地有它好处的一面，印度的科学很发达，得一个方便，英语好。上海到现在还比中国其他地方发展得好，各个方面发展得都快，一百年的殖民地呵！

中学时代



畢業證書

學生李厚生係湖南省平江縣人現年十七歲在本校高中第十一班修業期滿成績及格准予畢業此證

湖南私立嶽雲中學校校長何炳麟

中華民國二十 年 月 日

李锐岳云中学毕业证书



李锐与中学好友文立徵毕业时的合影



李锐保留的中学同学李震勋（林格）解放初期的照片



一九五〇年李锐与中学、大学同学汤钦训在北京的合影



李锐保留的中学好友秦本立（右）送给他的照片：一九三五年在北京颐和园与张之毅（清华社会学毕业，与费孝通关系很深）的合影



从楚怡到岳云

一九二八年我从楚怡小学毕业后，进了楚怡中学。因为老师鼓励我：你在前几名，不要考，直接升入中学就行。但在这个中学，我只读了一年。

这一年中，现在脑子里印象深的是地理教员。记得有一次上课，他给每个同学一张分省地图，让你自己去填地名。我得到的是安徽省，对照地图集，填写了大半天。这种方法加深学生的印象，看地图，很多东西都学会了。巧得很，我后来跟安徽很有缘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次被下放到那里劳动，共七年时间。

一年级还有生理卫生课，讲性常识，那个老师也很好，叫黎升洲。但是国文老师不好。国文老师的名字我记得，叫黎升岫，黎升洲的堂弟。黎升岫是上海群治大学毕业的，平时穿西装，那时长沙穿西装的人不多，显得很特别。他的房子我们进去过，一张戴四方帽的相片，挂在墙上。群治大学可能是当年上海可以买文凭的所谓“野鸡大学”。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教杜甫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歌》，讲着讲着不对头，解释错了。我就当场站起来，指出他哪个地方讲错了，不是那个意思。他脸红脖子粗，只好不吱声。那时，我得了一种皮肤病，手上长了很多黄疱疮，拿东西都不方便。过了一两天，在课外，他看见了我手上的黄疱疮，就对我说：你怎么长了杨梅疮？那时我才十一二岁，不知道什么叫杨梅疮，回到家里我就跟母亲讲了。母亲一听到“杨梅疮”三个字，立即大发脾气，到学校投诉。那时学校刚开学不久，已经交了学费，过了些时候，母亲听说这个国文教员仍在位，学校并没有处理他，就带着我到学校，立即退学。这样我临时又

考了岳云中学。

在楚怡中学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我有几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期中考试都考得很好，四、五个人就在一起喝酒，大概喝了两种不同的酒，一下都醉了，学校挂牌处分我们，给我们记了过。

那时长沙的省立中学有一中、二中。一中是男校，二中是女校，另外省立的还有第一师范。当时在长沙有两个私立中学最有名，一个是岳云，一个是明德，岳云尤其以数学好著称。还有一个有名的私立女中——周南女中。有名的学校很难考，而且我是插班考二年级。记得好几十个人报名，只取了七个人，我算考上了，数理化大概考得很好。岳云的老校长何炳麟，清末留学日本，一九〇八年回国就创办了岳云中学。他是衡山人，学校教员也多衡山人，学生多湘南人，因此，这个中学也被称为南麓的中学。学生基本上都寄宿，记得班上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是走读生。何校长当时提出了“三好”办学目标：“招收好学生，请好老师，办成好学校”。

私立学校经费都比较困难，岳云的校舍是由一位姓陈的人捐助建设的，进学校大门的花坛中，立有一座他的纪念碑。学校在长沙大火之后搬到衡山去了。由于校舍全部被烧毁，就再也没有搬回到长沙。当时岳云中学在长沙城的北部，主要的建筑有办公室和教学楼，两层，还有学生宿舍，建筑是比较好的。房子前面有一个操场，几个篮球场，场外面就是街道。街道和操场之间用木板隔着，不是正式的围墙。二十年代初，杨开慧、丁玲都在岳云中学读过书，有名的校友还有贺绿汀。我进校前，岳云就已经不招女生了。

岳云中学的老师

学校最重要的是教员。岳云中学非常重视数学，岳云的数学在全省出名，学生成绩好。我记得两个数学教员：代数教员文亚文，是湖南当年非常有名的数学教员，还兼过副校长。几何教员谭创余，教得非常好，也是湖南一流的。

我对初中的国文教员胡云翼印象特深，他大概是中央大学或复旦大学毕业，研究词学的。解放以后在上海，可惜我没有机会去看望他，在一次上海文化节活动中看到过他的名字。胡云翼教国文用的是《开明活页文选》，不是一本书，是散页的，你可以去买活页，很便宜。他就从活页文选里挑出一些文章来教我们，有古文，也有白话文，还教《孟子》。他是提倡白话文的，所以我们在初中用白话文作文，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他出的作文题目非常活，随便你写多少都可以，有时还让学生自己出题目。记得有一次作文自己出题目，我写了半本。他的批语或改动都很好。那个时候我就对作文最感兴趣。

高中时的国文教员蔡渔春，是前清举人，老资格，老第一师范的教员。高中他教我们国文，用《古文辞类纂》，清朝桐城派姚鼐编的。他一定要写文言文，不准写白话文。有一次我硬写出一篇白话文，他拿我也没有办法。但他教课非常认真，教得好，有一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即《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作为也。”这一段话，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蔡老师讲解这篇文章，特别是这一段时，那声调和摇头晃脑的神情。

岳云中学非常重视体育，体育教员有地位，学生球技和田径在长沙都是一流水平。我在学校里好玩儿，篮球、排球都喜欢打，从初中起，在班上就是班队的，代表班里参加比赛。到高中，我是排球队和足球队的。排球当时是九人制，我打三排中，足球我还守过大门。

在岳云中学高中，我曾经一度对生物学发生兴趣，因为老师课上得有意思。老师教解剖，布置学生捉青蛙，上课时让我们自己解剖。青蛙的皮很好剥，剥掉了之后，心脏还跳动，我现在还记得，在印制好的作业纸上，把整个青蛙内脏画出来，并依原形着色。那张作业纸母亲一直珍藏着。（母亲保存的我学生时代的全部物件，文革时都被抄走毁掉了！）

高等代数那时叫“大代数“，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年级用的课本，西方有名的柯尔与乃特著的英文原本。湖南大学有个印刷所，把原版书用石印的方式翻印，我们的原版书就是那么来的。我记得，中学的物理、化学、数学，全部是英文原版书，作业也是英文。只有国文是用中文。

化学教员我印象特别深，他兼训教主任，叫张敬之（张德粹），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在欧洲留过学，去过丹麦，是很有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有个《东方杂志》，他写的文章和波尔的照片在《东方杂志》上刊出过。这个人非常厉害，严格得很，一天没有笑容，就住在学校大堂中的一间房子，没有结婚。他在学生中有个绰号，叫“张牛肉”，大家都怕他。他书教得好，为人正直，后来去了台湾，是一个学校的负责人，早去世了。当时他有个弟弟跟我们同班，叫张德光，后来也从中央大学毕业，解放后一直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入了党。他到北京还到我家里来过，也去世了。

我中学时的英语不好，这可能和教员有关系。英语教员不行，教课不能引人入胜，所以我对英语始终没有兴趣。但英文教学课本是英文的，英语课还布置有作业，加上数理化讲课虽然用中文，但是课本也是英文的，因此我的英文阅读能力还可以，阅读好像还得过什么奖。不过，数理化的英文简单，特别是数学，里面没有多少词汇。在国民党时期，据说湖南人不能当外交官，因为湖南人的英语发音不好，江浙人、北方人英语口语好。

家中的生活

从一九二二年父亲去世，到一九三四年我高中毕业离开家，十来年中我家搬了十次左右。搬家的原因，主要是离学校的远近，另外就是选择邻居，我母亲对邻居非常注意。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排场很大，还有抬轿子的轿夫，父亲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带我到北京，从国会领到两千多块钱的抚恤费。五叔又带我去上海见到谭延闿，谭也给了两百元钱。这些钱如果留着慢慢用，本来是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可是母亲送父亲棺材回老家时，给父亲作道场，全部花光，她就是要做给老家的人看，我不用你们来管我，我自己能撑起这个家。然后就跟祖母分家，大概吵得很厉害，最后分得三分之二的租谷，祖母三分之一。还有两个店铺，我们分得一间，祖母一间。但是谷子不值钱，有时遭天灾，收得很少，也就一二百元钱。收租卖谷的事，都是平江老家的人代办。红军闹得厉害的时候，收不到租，因此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我记得家里原来有一个父亲打麻将的紫檀木桌子，卖掉了，还有就是卖字画。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家里能雇得起女工的时间很短。母亲对钱算得非常细，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能超过二十块钱，房租不能超过八块钱。那时是光洋，币值非常稳定。光洋、钞票换铜板，这是我的任务。街面上有小钱庄，用钞票去换铜板。钞票比光洋少两个铜板，一块钱换五吊多钱，一吊钱大概是五十个铜板，我们的生活花销都是用的铜板。当年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有井，饮用水都是买河水。湘江的河水是饮用水，有人挑着在街上卖，也有的人家是由挑水人固定按时送上门。

家务事母亲也是有分工的，母亲管做饭，姐姐有时候回家也帮忙。我的任务是和煤。煤是散的，要加上黄泥，那是小小的体力劳动。买菜是我的任务，每天早晨出去，豆腐脑一个铜板一大碗，最贵的菜两个铜板一斤，是那种十六两的旧秤。我记得很长时间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

那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尽管十分拮据，母亲要保持旧社会“名人之后”的身份，还要维持那个场面，房子不能住得太坏，穿衣也不能太邋遢。母亲租房，一般都租那种前后两间房，中间是公用客厅的。湖南那时都是木板房，楼房也是木板房，房间由木板从中间隔开，很少有砖结构，即使有，也只是外墙是砖垒的。我母亲把父亲的画像挂在厅中间，把谭延闿送我父亲的四幅字屏挂到客厅里靠我们住房的墙上。一间房大概十五平米吧。前房里放一张床，我跟着母亲睡，后房一张床，两个姐姐睡。上厕所用木头马桶，大小便都在马桶里，男孩儿也这样。当然有的房子有厕所，在楼下。厨房一般都在房屋的后面。

岳云中学一个学期的学费大概得要十来块钱，加上学杂费等各种费用得二、三十块钱。所以我们姐弟三个每年交的那两次学费，对于我母亲来

说是一大笔开支。两个姐姐上的都是省立中学，省立中学便宜，但离家远。只有我又要读好学校，又要离家近。第一师范母亲是不让读的，要读能够升大学的。我考上了岳云中学后，母亲把家也搬到岳云中学附近。

所以，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维持我们姊弟三人从小学读到中学，真是非常不容易，真是为难得很。母亲曾经想到政府去当职员，有点收入，找了一些父亲的朋友关系，没能成功。

写小说

母亲对我们的学业管束非常严格，最重要的就是成绩单。我的成绩呢，从小学起，平常的功课是中等，最好的中上等，劣等、下等没有（楚怡小学的成绩分超、上、中、下、劣五等）。考试成绩比平时成绩好，总是超等或上等。我的成绩单母亲一直保存着，教育我外甥时拿出来给他看：看看你舅舅那时成绩多好哇，你念书念得不好。

我从小不是个死读书的人，喜欢看课外书。小学五、六年级时，读过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和《鸭绿江边》。进中学读创造社的书，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达夫日记》等都读过。那时长沙书店聚集的街叫南阳街，有个泰东图书社，专卖创造社的书，也有鲁迅的书。我喜欢读《呐喊》、《彷徨》等，也爱读丁玲的小说，还记得《小说月报》上刊登的《田家冲》，对我影响很大。我还买过一本闻一多的《死水》，封面是黄黑色的，书名嵌在一个黑框框中。也读外国小说，如《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另外还有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政治性不强，但是宣传爱国主义，使人关心社会生活。还有林语堂的《论语》月刊，林语堂的杂文，也有一点讽刺性。我与好朋友喜欢在一起谈论这些课外读物。有一期《论语》，第二页是图片，底子整个背景是黑颜色，一个人躺在那里抽鸦片，标题是《今日中国之财政》，讽刺得很厉害。我还喜欢看画报，上海有个左翼画报叫《大众》，内容进步。

上高中时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省教育厅也开过会，让各校学生到教育厅去参加过活动，那是政府领导的抗议“九·一八”事变。学校里也开过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校老师还向我们讲解过一本《田中奏折》小册子，里面描述了日本人准备如何吞并中国的计划，以激发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学校还把好的电影片子拿来放。有个片子《人道》，主角金焰，写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情况，引起学生关心国是。那时学生喜欢崇拜明星，对金焰的印象很好，他是国民党时期的电影皇帝，影后是胡蝶。胡蝶的电影我不爱看。我上高中时，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上海有个联华电影公司，大概内部有党的活动，受到党的直接影响，拍了很多进步电影。王人美主演的描写渔民生活的《渔光曲》，影响很大。还有《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都是进步电影。我们几个同学有时旷课，偷偷去看电影。

到高中二年级时，我写了一篇小说，现在被选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的《李锐自选诗文集》里。这篇小说可以说代表了我高中时代的思想状况。小说篇名《走》。当时我们家住在一条大街上，有一次在门口看到一个小孩，十岁左右，挑了一担黄泥进城来卖（一担黄泥才几个铜板）。他卖掉了黄泥后，坐在大门口哭，我回去将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出来问他哭什么，他说，卖黄泥的钱丢了，回不去了，回去了要挨打。我母亲问他丢了多少钱，然后把钱给了他。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就以这件事为题材，编出一个故事：小说中的小孩的父亲是个人力车夫。长沙的人力车和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人力车是跑着走的，而长沙的人力车是木头轮外面包一层皮，不能跑，而且长沙的街道是麻石街，只能人拉着车慢慢走。小说就是写人力车夫的生活。大革命时期，人力车夫是长沙城里最活跃的队伍，组织过工会，我看见过他们上街游行的队伍，印象很深。这个人力车夫生活不下去了，就去投奔了红军。那时报纸上对红军的宣传，头条、二条都是朱毛打败仗了。后来我关在秦城时，写过一首诗回忆这件事：

箕筐小小卖黄泥，卖泥钱丢不敢归。
阿母见怜钱施与，念此苦儿以教儿。
儿时回忆生遐想，正当左翼小说迷。
人力车夫寻常见，当年北伐打红旗。
跟卖泥孩配父子，虚构成篇托梦思。
生平惟一小创作，二八少年浪漫时。
珞珈文艺曾压卷，何期自况走为题。
因文会友谢耀文，推心相恨定交迟。

“九·一八”事件，国民党的腐败，那时候长沙有民办晚报，把国民党的乌七八糟的事暴露不少，这些是影响我的思想状况最主要的方面；加上左翼的书刊，鲁迅的书，还有联华的电影等等，导致我写了那么一篇小说。

武汉大学有个《珞珈月刊》，是学生和教授共同办的。我在武大上一年级的时候，《珞珈月刊》出文艺专号，我就把这篇小说寄去了，没有什么文字改动，用的是笔名。结果文章被登在那期专号的第一篇。谢文耀等进步同学认识我，就是从这篇小说开始的，这是后话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写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代表了我在高中时期的思想，对国民党是彻底失望的。

办墙报

当年岳云中学校风是很好的，教员教书，学生读书都非常认真。而且学校是关心国事的，每年的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这两天国耻日放假，学校有时候还开纪念会，对于国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要亡我中华，是铭刻于

心的。

学校提倡学生搞课外活动，我们班上有许多同学热衷于写文章，于是大家酝酿办墙报，这是高中二年级时的事。墙报贴在学校公共场所的墙上，大家都积极为墙报写文章，有一位姓罗的同学病故，还为他出过一个专辑。我在初中是二十一、二班（两班合并了），高中是十一班，我们墙报的名字是《斯一》，取“十一”的谐音，英文是Keeptogether。办墙报我是积极分子，是编委，报头是我设计的，大概是两周一期，办了半年。我自己主持办过这么一期，我画了很多世界和中国名人的头像，用毛笔，把校长的头像也画在了上面，大约三十个人左右，然后让大家猜，猜中了的奖励一年的商务印书馆的英文周刊。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创举。那些人物当然有鲁迅，好像连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有，是不是有斯大林？可能也有，记不大清楚了。我的个性好动，从写文章到画画，讲得难听点，就是喜欢出一点风头吧。这画画恐怕有一点政治性在里面，关心时事。这次人物特辑，被一个同学猜中了。

类似办墙报的事，还有一件可以记述。高中三年级临毕业之前，由我建议并由我主编了高中十一班毕业同学录，即纪念册。班上三十多个人，一人一个头像，一个小传，大概几百字，没有老师的照片，只有我们同学的照片。开本不大，每个人出一块钱，都去照相馆照了相。我的小传是好朋友秦本立帮我写的。秦本立和文立徵的小传都是我写的。这件事情，从编辑到印刷，完全是我经手的。

朋友们

我在高中时有三个最要好的朋友：文立徵、秦本立和赵焕南。我们四个人的友谊是从高中二年级办墙报开始的，我们很谈得来。

文立徵比我大六岁，与我思想完全一致，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多一些，有时候旷课出去看电影，看联华的进步电影，两个人互相交流。他后来是我介绍入党的。抗战时他是鲁南军区的副政委，兼铁道游击队队长，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李正就是他名字的谐音，以他的事迹为素材的。一九四五年初，文立徵在临城游击区活动时，因内奸告密，被敌伪军杀害了，才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他父亲文九德，在大革命时期是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的总教官，抗战初期在广西部队中任师长，后来回家务农，推广先进农业。解放初期土改时被镇压了。湖南有名的民主人士程星龄曾经同我谈起此事，说他本来应当受保护的。文立徵的亲弟弟文立徽，比我们低两班，抗战初期考取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在滇缅战场有战功。打金门的时候，他是澎湖的司令员，中将，后来是蒋介石的侍从武官。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把金门打下来？他把总结战争经验的一本书寄给了我。宋美龄在美国庆祝百岁寿辰的时候，他们夫妇曾到美国祝寿。后来他寄过一本刊物给我，是宋美龄百岁生日的纪念刊，那里面有他们的照片。现在两

口子都去世了。文立徽还保留了文立徵一二Ÿ九前后给他写的信，大概同给我的信的内容差不多。一九七九年我刚刚平反回到北京，文立徵的表弟陈铁如来找我，他是解放战争入党的，但是山东省认为文立徵是伪军，亲戚一直被另眼看待。文革后陈铁如查文立徵的历史，查到跟我的关系，是我介绍入党的，就来找我，向我了解文立徵的情况。由于我出面证明，惊动了民政部长程子华，民政部下命令给湖南，湖南才发信到山东，证明文立徵是烈士。文立徵牺牲后埋在鲁南，现在迁到临沂，有个纪念亭。墓志铭是弟弟文立徽题的。

第二个朋友秦本立，后来在北大教育系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在北京教师进修学校教书，文革中自杀了。

第三个朋友赵焕南，我们四个人中他的功课最好，是班里的第一名。他后来从天津大学毕业，抗战初期在国民党空军中做地勤工作，在一次作业中不幸牺牲了。

国民党时期有会考，全省的高中毕业考试统一出题，分甲、乙、丙三等，甲等各科平均分得在八十分以上，在报纸上公布。上面说了，我平常功课不是最好，小学时还算可以，到中学以后，好活动了，成绩就不像小学时那么好了。一到考试就拼命用几天功，开夜车，所以考试成绩还是不错的，会考时我列在甲等。

高十一班还有三个后来的共产党员，也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是李震勋，毕业后进了长沙湘雅医学院，一九三六年暑假，在长沙进行救亡活动时，受过我的影响，一九三七年底去了延安，改名林格，在柳树店卫生学校教书。解放后曾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文革中去世。二是李升震，后来跟我在武汉大学机械系同系，他战争年代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抗战初期在国民党一个机械师工作，是党派进去的。解放后曾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前几年去世。三是汤钦训，一九三四年同我一起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一二·九”运动时我们一起活动，同李升震我们三人，都是武大秘密团体青年救国团的成员和领导人。汤是一九三八年初到延安的，在延安一直担任农机具厂即兵工厂的厂长。解放后当过哈尔滨一二〇厂（飞机发动机厂）的厂长。大概六十年代调到北京，曾任航空工业部技术负责人。

高中三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事，全班学生同教务主任发生了冲突。教务主任名宋焕达，湘潭人，人比较古板，政治上倾向不好，靠着国民党。解放后我回湖南一打听，这个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表现很不好，参加过伪政权。我们这个班很厉害，全班同学从学校搬出来住到旅馆，以示抗议。

谈到朋友，还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同学。小学时我喜欢跟人打群架，跳高、跳远不是有个沙窝窝吗，我们常在操场的沙窝中打闹。有个同学毕业时是第六名，叫赵炳烺，他跟我的关系不错，两家同在一所房子里住过。他的父亲当时是省政府的通讯社社长。有一次我们打群架，把他的手都打

折了。这个人后来进了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那个学校是培养国民党的各类人才的，抗战期间从事新闻工作。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到延安，当时因抢救运动，我被关在保安处，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有他的名字，他是以《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来的。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说：这个人来延安，我和黄乃可以对他做点工作。后来就把我提早放出来了。他来到延安后，我跟黄乃请他吃过一顿饭。一九九三年在美国访问时，遇见陆铿闲谈起来，才知道赵炳烺后来到了美国，没有结婚，已经去世了。

考大学

中学毕业会考之后，离考大学还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打球，认识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个解放后在北京还有来往。就由我的关系介绍，我们四个好朋友住到了岳麓山，就是湘江对面湖南大学的学生宿舍。我们在湖南大学住了半个月，休息的时候就爬爬山。岳麓山对年轻人尤其学生来说，影响很大，因为上面有黄兴和蔡锷的墓。我们向往北京的自由生活，想考北京的大学，绝对不能留在湖南，看不起省立的湖南大学，主要目标是清华和北大。

后来，我们四个人一同去了北京。很有意思，我们四个人化装成国民党的军官，坐火车打的半票。那时候高中有军训，军训时穿的衣服是灰色的，同国民党军队的军服差不多。秦本立有个亲戚，是国民党军官，他通过那个人买了四根皮带，还搞了四个尉官符号，我们还穿着这套行头一起照过一张相。就这样我们一直从长沙乘火车到北京考大学。

到了北京，就没有住在一起了。我住在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叶筱松（名：叶瑞棻，号筱松）家，他跟父亲一起在日本留过学，叶家的后代现在同我还有来往。叶也是平江人，家境较富裕，在北京有房子。秦本立有个叔叔在北京，他就住在叔叔家。文立徵和赵焕南住在公寓。四个人中只有秦本立偏于文科，我们三个都考理工科。我那时喜欢文学，也喜欢画画，但是觉得学文没有出息，觉得工科在社会上被重视，但也不是什么工业救国思想，而是名声好。我的数学比较好，就报名考机械系，赵焕南也考的机械系，文立徵考理科，只有秦本立一个考文科。我只报考了清华，秦本立只报考了北大，文立徵和赵焕南报了清华，同时还报了北洋（现在的天津大学）。当年考大学尤其是名牌国立大学，很难考上，因为有好几千人报名，名额不过百十人，几十人取一个（我在武大时，全校学生只有五百多人）。最难考的是交大，第二流的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稍微次一点，再下边就是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那时协和医院的女护士很俏，她们找对象有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结果一发榜，赵焕南考取清华，也考取北洋，北洋大学和南洋大学（上海交大）在全国是齐名的，特别是工科好，它的机械系比清华机械系的声望还高，赵

就进了北洋。秦本立被北大录取了。我和文立徵都没有考上。

这时家里来了电报，要我马上考武汉大学，因为武汉大学在北京也招考。我马上报考武汉大学。家里后来打电报告诉我被录取了。那时被大学录取的都登报，家里人是从报上看到的。我大概数学和物理、化学较好，英文不大好，国文还可以。还记得考清华的作文题是“夏日的昆虫”，武大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试申其说”。后来文立徵考上了辅仁大学化学系，他家经济条件比较好，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费用高。

四个人来到北京，他们三个人都留在了北京，只有我南下。我是一心一意想留在北京，不想回南方的，北京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多么自由的天地。那时有个倾向，就是要到一个比较自由的天地，在湖南很受约束，湖南的环境不好。湖南省主席何健，是有名的复古派，提倡读经，他本人是秀才出身。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是讲点道德，讲点生活习惯什么的，全国号召，实际不起作用。我们都看不起，很厌恶这些东西。

在武汉大学的日子

國立武漢大學學生入學志願書 No.

姓名	李厚生	年齡	十七	籍貫	湖南省平江縣
永久通信處	長沙枸木廠松明道院街				
經歷	湖南私立嶽雲中學校畢業				
家長姓名及職業	李淑，[illegible]				
保結人	袁浚	聯保人	湯欽訓.晶定		
志願事項	志願遵守校中一切規則命令以及應繳各費倘違規除名自應聽受處分及遵令賠還應繳費用				
中華民國廿三年九月十八日		簽名蓋章	[illegible]		

李锐武汉大学入学表格

國立武漢大學學生入學履歷表

No 1393

姓名	李厚生	年齡	十七	籍貫 湖南省平江縣		性別	男	已未婚	未婚
永久通信處	湖南省平江縣 街 [illegible] 巷 [illegible] 門牌								
暫時通信處	湖南省長沙縣枸木廠街 巷松明道院街 門牌								
經歷	湖南私立嶽雲中學校畢業								
證書轉學證或結單									
現入學院系級別	工學院 機械系 一年級 一學期								
家長姓名	李淑(母)			擔負肄業時經費人	李淑				
入校時期	廿三年九月十五日			寄宿或通學	寄宿 [illegible]齋 第九[illegible]號；通學住 街 巷 門牌				
曾否加入國民黨	否			註冊時期	廿三年九月十八日				
備註									

李锐入武汉大学时填写的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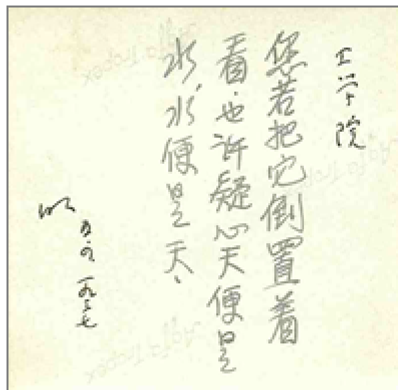
國立武漢大學學生聯保保結

聯保人姓名	湯鈞訓	聯保人姓名	鄒雯
性　別	男	性　別	男
現在學系及年級	機械系　一　年級	現在學系及年級	化学　系　一　年級
所保學生	李学生		
與該生關係	同鄉		
聯保事項	願聯保 李学生 確無共產嫌疑如有軌外行動自應隨時報告否則願甘連坐		
聯保人簽名蓋章	（印）	聯保人簽名蓋章	（印）
中華民國 廿三 年 九 月 十八 日			
備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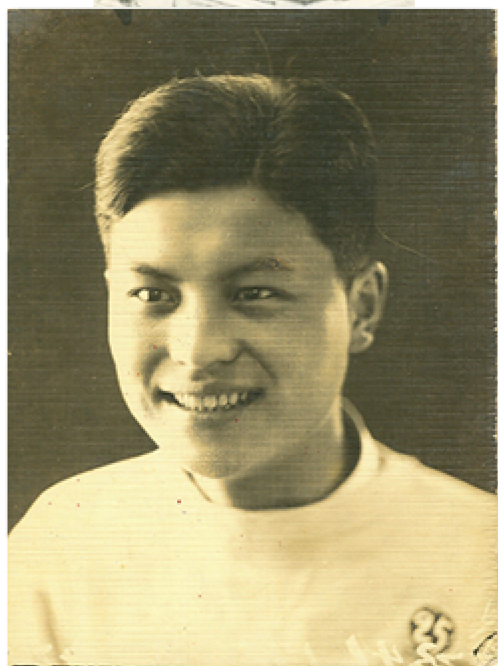
李锐武汉大学入学联保保结“确无共党嫌疑如有轨外行动自应随时报告否则愿甘连坐”



李锐珍藏的一九三七年武汉大学工学院照片（明：李锐小名“明伢子”）











一九三五年李锐在武汉东湖



一九三五年李锐在武大校园





李锐珍藏的老照片：武昌图书馆



李锐珍藏的老照片：武大校园外的农村

我是一九三四年秋进的武汉大学，一九三七年五月离开。说实话，在大学的那两三年，我没有好好读书，净闹革命了。我曾经写了一首诗，回忆在武大的生活，很能说明自己那时的思想状况。

二九年华一首诗，此时岂是读书时！
南窗剪烛忧天下，北土扬尘走虏骑。
万籁无声何可忍，匹夫有责不宜迟。
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

武大第一年，结识新友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武昌高师，一九二八年秋改为国立武汉大学，三十年代初从城内东厂口（屠杀共产党员的刑场）的旧校址，迁入风景秀丽的东湖珞珈山。新校舍是美国建筑师凯尔士仿照承德的外八庙格局设计的，宫殿式建筑，布局堂皇；在教育、师资，环境等各方面，当时属于全国第一流的学校。蒋介石当政之后，学校班底主要就是《独立评论》派的一些人物，首任校长王世杰，他后来当了教育部长，由王星拱接任校长。

丁东：那时的学费是多少呢？

李：武大是公立学校，记得学费是十元，吃饭六元，一个学期花销大概八十块左右。

丁东：您大姐的工资是多少呢？

李：一个月八十元。

丁东：也就是说，她每个月拿出六分之一的工资供您上大学。

李：大姐出来工作后家里的经济情况就好了。我母亲的决策：让我大姐上体育学校，然后工作、养家，供妹妹和弟弟上学。

三十年代初的武汉，在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下，十里洋场，一片荒漠。武汉大学内有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动力社。复兴社是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大概就在这一年，武大文法学院的学生中就有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动力社以读书、会友相标榜，那些复兴社分子有的可能有“活动费”，穿衣服都跟一般同学不同，通常是一身西装，还忙着找爱人。其中个别人功课不错，在同学中有一定声望，但多数是为了毕业后能在政府中混个一官半职的中下流货色。在我进校之前，武汉大学有几个思想左倾的学生，以“单干户”为多，只能偷偷读书，赋诗言志。后来他们在校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成员都是一九二九年考入预科的，当时自称“闭门读禁书”。其中一个头头叫陈宽（陈家康，解放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比我高三级，读经济系；还有谢文耀，另一个人的名字忘记了。成员中有叶君健（外交系，比我高两届，后来成为有名的翻译家、作家，他的夫人最近送了我一套刚刚出版的“叶君健全集”）、吴月缸、刘佛年（哲学教育系）、杨克穆（即杨作材，法律系，延安的杨家岭大礼堂就是他主持修建的），黄美健等。陈家康、吴月缸因思想激进，受到复兴社分子的威胁，于一九三三年先后被迫离校，到上海去了，留下来的只好作“隐士”，也不敢在人前谈心了。一九三六叶君健毕业，也走了。还记得有一个人叫熊彪，一九三五年毕业的，毕业后去了北平，跟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人士有联系，在一起活动，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以前，他就被国民党当局抓起来坐牢了。那时张学良已经在活动，找关系接触共产党，在北平也有找共产党的外围关系的举动。出于张学良的影响力，国民党把熊彪给放了。张学良就找熊彪谈，熊说他不是共产党员，到北平来也是找党的，还没有找到。后来熊彪回到武汉大学，同我们讲过他被捕又被放的经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张学良有进步倾向。熊彪在抗战时期没有同共产党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解放以后，他曾经找过我，后来就不太清楚他的下落了。

前边讲过了，中学毕业后，我和同班的好朋友文立徵、秦本立和赵焕南，一行四人北上北平考大学，他们分别考取了辅仁、北大和北洋，留在了北方，只有我一人清华落榜后另考武汉大学，被录取后只身南归，很有些落寂。进入武汉大学后，碰到了一批湖南籍的同学，其中汤钦训是我岳云中学同班的好朋友，又同在机械系，这样心情也就好多了。我和新结识的几个湖南同学，晚饭后常散步湖边，议论人生，感慨时局，各种主张都有。当时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因为那时没有公开发行的共产党的东西，毛泽东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抗战初期读到《论持久战》以前，不知道毛泽东会写文章。

武汉大学的作息时间是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下午是一点上课，晚上十点半熄灯。我们一批湖南同学喜欢在统一熄灯后点上洋蜡聊天，议论时局。特别是我、魏泽同、王前、周纪发还有汤钦训跟庄惠霖（庄湘）几个人，对国民党不满，这样就成了朋友。王前订阅了《独立评论》，他的思想与北大胡适那批人比较接近。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他们办了《现代评论》，之后办了《独立评论》，那里面有些好文章。王前从武大毕业后一直教书，后来到长沙第一师范任教。长沙解放的时候，周世钊是校长，他是教务主任。周纪发后来由我介绍入了党，但是身体一直不好，大概是一九四〇年就生病死了。汤钦训、魏泽同后来都去了延安，在抢救运动中魏泽同被逼供，就承认自己是特务，把我们几个武大的同学供了出来，说我是他的领导。汤钦训被吊起来打，庄惠霖那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挨整得要死，就自杀了。从延安出来，魏泽同去了哪里我就不大清楚了，解放以后来往也不多，只听说五十年代初，谢觉哉在民政部当部长时，大概因为他父亲跟谢老的旧关系，他在民政部任办公厅主任，后来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我们见过面，他为了延安抢救运动的事向我道了歉。

那时还有一个湖南同学，潘基踬，读土木系，一二·九运动时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把他吸引到党里来，毕业后他一直干本行。长沙解放时碰到他，我就向闫子祥市长作了介绍。他曾任建设局长，后来当过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现在早就退下来了，我们有通信来往。政治系的许升阶（许任飞）也是湖南人，他是魏泽同和王前的中学同学，这个人对我后来的政治生命影响极大，我在挨整写交代材料时，他的事情写得最多。我进武大时，许升阶已经念三年级了，读政治系，功课非常好，特别是文章写得好，有件事情当时在学校很轰动。那时有个刊物叫《外交评论》，是很有名的大刊物，南京出的。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一二·九运动之前，《外交评论》在全国征文，题目与国家时局有关，许升阶的文章得了第一名，奖金四百光洋，那时在同学们眼中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名声大噪。我当然对他有好感，他对我也有好感，送给我一本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是五四时代的人物，跟毛泽东也认识的，当时在武汉

大学史学系任教，这本书是他的讲义，上海太平洋出版社出的。这本书从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写到三十年代初，历史事实写得非常清楚，对共产党也进行了分析，有好话也有不好的话，读了以后印象非常深。我后来对历史发生兴趣，这本书起了很大作用。这本书我一直带到延安，又从延安带到承德，在承德被当时的市长史立德借走了，就没还给我。他是晋察冀的干部，中国大学的，同任仲夷他们在一起的，原来也住在我这个二十二号楼。他去世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医院里碰见了，他向我道歉：你那本书我一直没有还你。另外还有左舜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本一套《中国近百年史料》，里面有很多清末的东西。比如写八国联军，写到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前的一次御前会议，大臣们都跪在那里，三个站起来反对慈禧太后的方针，反对义和团，记得有一个人被杀掉了。这些东西给我印象很深。我后来为什么不是完全的服服贴贴，同读了这些历史书有很大关系。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敢讲真话，不怕杀头的官员，像海瑞，还有御史制度。许升阶是一九三六年毕业的，抗战时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任过总编辑。解放后，他在华北军政大学受训后回到长沙，我那时在新湖南报社当社长，急需用人，还办了一个新闻培训班，他找到我，我就把他安排在《新湖南报》资料室工作。后来他在肃反中被捕、判刑。三反运动中，因为使用了许，我挨了批评："用人不当"，"阶级立场不稳"。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出了事情之后，"用许升阶"就更成了我的大问题，跟"阶级异己分子"联系到一起了。

除了这些湖南同学外，我还结识了一些来自其他省的同学，其中同班同学郭佩珊，年龄比我大好几岁，他原来是北洋大学的，大概在一九三三年入过党。九·一八北洋大学闹学生运动的时候，他被学校开除了，一九三五年又考进武汉大学，插班到机械系。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在一起活动，他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理学院中有潘乃斌，解放后叫潘琪，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新四军，解放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还有钱祝华，他中间有一段时间脱党，一直在南京。数学系二年级有两个头面人物：李汝俊（理如军）和周继颐，他俩是山西人，年龄都比我大。周继颐现在叫周颐，战争年代在晋西北，是李井泉的秘书长（李井泉这个人在四川名声不太好），现在还在成都；李汝俊解放后曾是四川工会的头头。

我进武大时，华北形势已渐危急，"塘沽协定"（一九三三年五月）签订之后，蒋介石连"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也不唱了，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使冀察两省门户洞开。我结交的朋友们思想上都比较一致，要抗日，要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是后来在一二·九运动中，大家团结、战斗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大学第一年，我的主要精力就这样放在了跟同学们的思想交往上，不光是武大校内的，还与北平、天津的那些中学好朋友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大家都是怀着满腔忧国之情关心时局。所以我第一年的功课就是应付，学习成绩不好，但是还没有到留级的程度。

武大九人临时代表团及武汉学联

因为学校中活跃的是右派学生，而不是左派，为了打破学校沉闷、死水一潭的状况，入学第一年的冬天，我与魏泽同、王前等几个湖南同学作过一次失败的尝试：成立学生会。那时武大没有一个统一的学生组织，只有一些大大小小松散的同乡会，其中以湖南同乡会的人数最多。我们联络了几十人贴出大字报，主张以同乡会为基础，成立全校学生会。因为我们是Freshman（新生），办这类事还得仰仗高年级有“威信”的人。学校的男生宿舍共有十六斋，以天地玄黄等为斋名，每个斋都有管理学生生活的斋代表，我们就请他们以斋代表会的名义召开全体同学开会。湖南同乡会的负责人是许升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复兴社分子，就积极鼓动，选出了许升阶等七个人为学生会执行委员。那时学生中除了复兴社社员外，还有CC分子、国家主义派等，结果许升阶遭到这些人的反对。不过反对最激烈的是许的同班同学谢远达（抗战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知道许的复兴社身份。反对者联名贴出大字报，说斋代表会的选举不合法，要成立学生会得先起草章程，产生班代表，由班代表会选举学生会的负责人。由于临近寒假，我们贴出海报回应说：此事明年再议。结果学生会没有成立起来，我与魏泽同等人，反而被进步同学怀疑为跟许升阶是一伙的。

一九三五年新学期开始后，学校形势有了变化，同学们中间广泛流传着进步书刊，如《新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杂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青年自学丛书》等小册子也很多，天津《益世报》常有较好的社论。国难当头，思想进步的同学们苦闷之至，除开读进步书刊，常在一起漫谈国事。正是“外敌休除除内敌，正书不读谈邪书”；“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而我自己最有兴趣的一件事便是跟在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书的文立徵通信，大体每周一信，无所不谈，最常议论的当然是华北局势。

那年底，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大，同学们议论纷纷，但报纸上的报导很简单。过了几天，我收到文立徵的长信，他参加了一二·九那天的游行，向我详细描述了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奋战的情景。当夜，我将立徵的来信抄写在一张大纸上，第二天一早贴在文学院门口；还找来一把旧菜刀置于墙沿，另纸书明：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学校当局的办公室也是设在文学院楼内的，因此文学院楼前来往之人十分多。这封信就如同给一锅热水加了一把猛火，水立即沸腾了。看过立徵信的同学们情绪激昂，商谈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

武大所在的珞珈山远在武昌城外，同武汉三镇的其他学校素无联系，校内又没有统一的学生组织，这时，只能是各班内部和班级之间的熟人相互串联。我们工学院机械、土木二系（一九三六年才有电机系）的同学成分比较单纯，没有复兴社等类分子。两个系五六十个同学一起开会，商议如何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一致行动，同时与山下三镇的各校学生取得联

系。参加会的有我、石秀夫（刘清）、郭佩珊、鲍光华、汤钦训、李升震等，我跟石、汤和李都是学校排、篮和足球队的，平常就很合得来。会后我们联络了魏泽同、周纪发、王前、彭秉朴、刘锡尧（刘西尧）、张仲翥等一批湖南同学和潘乃斌（潘琪）、钱祝华等一批江、浙同学，在文、法、理学院同时活动。这样各系的爱国同学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在饭厅议论时，张仲翥感情激动，号啕大哭。

为了争取教授和学校当局的同情和支持，我以“工学院民二七级（一九三八级）全体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书”（这份油印件是王前刻的蜡版，他一直保存着，解放后送给我了，十年浩劫中又得以幸存）。信中谈到当时北平、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等对时局的表态和同情学生的言论，特别引用了女教授陈衡哲[1]的痛语：“横在我们眼前的路有四条：第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舐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这两条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食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话路。”信中接着说：“可是事实已明显摆在面前，吴越的故事已成史迹，别人早已做好了铁枷，使你再也不能做那‘生聚教训’的美梦。敌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当然，我们那时的认识是很幼稚的，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主力是人民大众，竟这样夸大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现在唯有大学中的人们才是唤醒全国民众的泉源。‘五四’的力量永远光荣地留在历史上。”这封信是起了作用的，使许多教授包括校长王星拱都同情我们学生的行动。王星拱是比较尊重蔡元培办学精神的人（校长办公室挂着蔡的大幅照片），哲学教育系教授范寿康讲辩证唯物论，最受进步同学欢迎；文学院长陈源（陈西滢）、法学院长杨端六、教务长皮宗石等则思想比较守旧。

此时，武大之外，以武昌省立高级中学、华中大学等校为首的进步学生，已经开始了串联。武汉公私立中学约六十多所，其中四十多所集中在武昌。当时各校都没有共产党员，但有一批爱国学生和少数进步教师。华大的爱国学生同基督教信徒间经过争论后（华大是教会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发表了救国宣言。武昌省高学生何功伟（何斌）、姚树森等特别活跃，他们分头到汉口的几所女中串联，酝酿游行示威。十二月十二日，在华中大学召开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的会议，有省高、省女师、武昌艺长、博文、省二女中、汉口市一男中、市一女中等四十余校参加，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决议成立武汉学联，责成华大学生自治会函催各校尽快成立学生会。第二天，华大的代表来到武大，三镇的学校都将国立的武汉大学看作大家的“当然领袖”，希望武大推出代表来领导武汉的学生运动，而武大此时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学生组织。于是我们立即召开斋代表会，推选了候选人，然后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从这些候选

人中选举出一个九人临时代表团来领导全校行动并参加全市学生组织的领导。大会选举的结果，九人中有：王前和石秀夫（二年级的进步学生只推选了他俩，其他都是三四年级的），许升阶等三个复兴社分子，两位女同学，其中的张咏平是张难先（湖北有名的爱国士绅）的女儿，李均平（李毅）是基督教团契的领袖，原武昌博文中学（教会学校）的学生，在武昌基督教徒中很有影响，是一个有浓厚爱国思想的重要分子（他抗战后到了延安）。九人团推选许升阶和李均平两人代表武大参加武汉学联的领导小组。

十二月十七日，武汉三镇五十三所学校、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开会，正式成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宗旨是“唤起同胞，共挽存亡”。代表会推举许升阶为学联主席、行动总指挥，武大、华大、省高、女师、二女中、市一女中、市一男中，博文等十五所学校的代表为干事，省高的何功伟、市一女中的万国瑞（杨纯）、女师的王义等为常务干事。参加会议的各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般是品学兼优的高班学生，内多进步分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关系到以后救亡运动的开展。会议正式决定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还通过了一条纪律：各代表必须严守学联决议秘密，不得向外人泄露。十八日，学联在武大召开第二次干事会，讨论学联章程和游行示威等具体事项，决定二十日在三镇同时游行。

武汉学生的“一二·九”示威游行

九人团是名义上的领导，武大游行的各种具体准备工作实际上是由我们一批进步同学在做。十九日晚，我们有十多个人忙了一通宵：油印传单，书写标语，撕了许多床单为第二天参加游行的同学制作袖章。我们估计第二天政府必然封江，停止轮渡。鉴于江对岸汉口镇女子中学多，又没有一所专科学校，我们有些担心那里学生的独立能力，自认为是大学生，有责任确保汉口的学生按计划行动，决定由魏泽同、李升震等二十人，两人一组，先夜渡江到汉口与那里的各校取得联络；作为第二梯队，我、王前、周纪发、汤钦训、张仲翥、潘基踬等二十多个同学（内多身强力壮球队队员）第二天过江支援。第二天凌晨赶到江边，轮渡果然停了，我们就雇了一条小木船过了江。登上江汉关，立即打开“国立武汉大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面大横幅，高高举起，阔步前进。我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多年郁积之气此时喷发出来，禁不住泪水满眶。走过江汉路，即与先期到达的魏泽同他们组织起来的游行大队汇合了。中华大学等校也过来了一部分学生，为了口号同我们发生了争执。中华大学是湖北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一所私立大学，他们不愿意呼喊激进口号，只同意“拥护政府对日交涉”、“反对殷汝耕”以及“反对华北自治”等，而我们坚持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还要呼喊“反对卖国外交”等口号。汉口的中

学生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跟着我们一起高呼这些口号，两旁围观市民大为震动。由于听说日租界早有戒备，我们的队伍没有向日租界前进，沿着长长的中山大道游行之后，到孙中山铜像前广场开了大会，大会之后，各校队伍便分头散去。

下午四点钟后我们回到武昌，才知道这边发生了大冲突。武昌有上万学生，是三镇学生的主力，由于当局封锁了轮渡，武大的队伍在九人团成员李均平、张咏平和李汝俊、郭佩珊、刘锡尧、彭秉朴等进步同学的率领下（总指挥许升阶，以及华大的两个代表临阵脱逃），同中学同学一起砸了轮渡码头，并围住了主管轮渡的建设厅，厅长吓得越后墙逃跑。我们这些从汉口返回来的同学，在省府大门前找了到武大的队伍，大家在那里坚持到天黑才返回珞珈山。但是广大的中学生队伍不肯走，在何功伟等人的率领下，准备坚持斗争，露宿街头，不达渡江目的，决不休止。少数武大的人因此也留了下来。

面对如此形势，各校的代表聚集在黄鹤楼下街口一侧，记得是在一个茶馆里，研究对策，杨克穆、汤钦训和我都参加了。讨论的结果：一致决定坚持露宿。我于是赶回学校，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动员了石秀夫、李升震、鲍光华等，总有几十个人去了汉阳门码头，加入进武昌露宿学生的队伍。这天晚上，整个长街和汉阳门一带的人行道上，都挤满了学生，救亡歌声此伏彼起，隆冬的阵阵江风，并没有使他们疲倦而饥饿的身躯感到寒冷。此情此景感动了许多商家和市民，也包括学生们的家长，他们抬来大批饼干、糕点和热茶，慰劳露宿的学生。

二十一日早晨，武大同学的大队人马由李均平、张咏平等率领下山，与露宿街头的学生汇合，步行到省政府门前请愿。全体学生的要求很简单：要过江到汉口游行。教育厅长在省政府里召集各校校长开会，商议动员学生回校之策。眼见无望，只好将学生代表何功伟等请进省府谈判。请愿代表们坚持：不恢复轮渡，不让过江，同学们就决不回校。双方一直僵持到下午没有结果，外面几千学生等急了，以为代表被扣留，一齐冲向省府大门。守门的卫兵急忙退进门里，关上大门，学生们就扛来大木柱朝大门撞。面对此种局面，湖北省政府的代主席只好同意第二天开江，但是为了分散学生力量，要求学生只能分两天过江到汉口游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其实这不仅仅因为那些厅长、市长、校长们慑于群众压力，答应了学生的过江要求，这其中还有省府当局自己内部的争斗因素。当时湖北国民党当局的省主席张群刚刚离任，新主席杨永泰尚未到任（他是十二月底才到的），杨是蒋介石的亲信，政学系亲日派。那时湖北政界派系很多，地方势力、复兴社与CC派之间都有矛盾，CC派办的《武汉日报》发表学生运动的新闻，想利用学生“闹事”与地方势力何成濬勾结，给杨一点颜色看。据许升阶解放后跟我谈，关于这次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给过他们那些复兴社分子什么明确的授意或指示。

二十二日，武昌两千多学生过江到汉口游行，武大全体同学都参加了。怕学生们冲日租界，这天警察局长蔡孟坚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行动让我们始料不及，非常恼火。我们少数人曾想将队伍头尾掉换，甩掉这帮家伙，未能办到。二十三日，武昌过江的学生更多，游行的规模更大，市长吴国桢，教育厅长程其保等也参加了游行，也是走在队伍的前头。那天，游行队伍中有一少部分学生最后冲进了日租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天的游行武大没有参加。

成立武大学生救国会，领导罢课

持续三天的游行示威结束之后，鉴于身为武汉学联主席、武大九人临时代表团头头的许升阶临阵逃脱，武大临时九人团宣布“总辞职”，随即选举成立武大正式的统一学生组织：“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代表武大参加全市学联。武大在市学联的代表改由李汝俊担任，市学联主席改由华大的陈述元担任，何功伟、姚树森、万国瑞等原来的中学代表仍继续担任学联的常务干事。接受九人团的教训，我们二年级的同学这一回当仁不让出来担任领导了，我与李汝俊、王前等十七人当选为常务干事，王前负责总务股，李汝俊负责交际股，我管宣传股。

武大救国会成立之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罢课决定。同学们中间对此有过争论，最后是少数服从多数，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宣布罢课。为防止有人不服从决定，纠察股组织了一批同学，带上红布“纠察”袖章，在文、法、理、工四个学院门口布了岗哨，制止同学入内，教授们也被阻。为防止城内便衣特务、歹徒到学校捣乱，纠察队员还通宵在汽车站站岗，同校警也取得密切联系。学校的校警一直支持我们，每次发现来了便衣特务，都及时通知我们。有一天午饭后，学生的阅报室内（宿舍顶层平台的亭子）发现一个可疑的外来人，大家一起上去逼问，他只好出示了他的“武汉行营”的特务证，在一阵“打坏蛋”的喊声中，这个家伙慌忙从图书馆后门跑了。

罢课当然引起学校当局极大震动。学校当局内有湖南、安徽两派，教务长皮宗石是湖南人，校长王星拱是安徽人，两派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不全一致，王因而辞职，下山住到汉口德明饭店去了。学生救国会就争取王星拱同情学运，组织了一部分同学去汉口对他表示慰问、挽留。皮宗石在这个寒假被迫离校。救国会还在教授中做工作，我曾代表学生救国会到范寿康教授家，请他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表示同情学生，也谈到学校内部情况的复杂。教授们虽然没能全部动员起来，但是学校的一部分助教和职工二十四日开了一个会，会后以“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的名义致电南京，要求“中央严令各地军警当局，不得摧残学生爱国运动”。

这时，北平学联为推动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派了清华学生刘毓珩（陈其五）和燕京学生朱南华来到武汉。他们到武大后，由我负责接待，

请他们作了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示威情况和此次学生运动意义的报告。我还陪他们到省高、省一中、汉口市一女中和汉阳训女中学等五六个学校作了报告。这对武汉学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罢课之后，学生救国会组织同学早晨上军操，组织宣传队到附近乡下宣传，工学院有的同学还学开汽车。为推行战时教育，还组织了战时经济、战时国际法规、国防化学、国防文学、救亡教育、中日问题、军事工程、军事无线电学等各种研究会，聘请教授分别担任指导。面对此种形势，一月上旬，学校当局宣布提前放假，这样大部分同学散去，留校的少部分同学继续坚持，作了许多活动。

寒假结束开学之后，为了表明罢课是正义行动，学生救国会还领导了反对补考的斗争，学校当局只得宣布取消。

办《救中国》

既然让我负责校救国会的宣传股，我就决心办一个刊物，取名《救中国》。一共出了两期。不久前，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找到了第一期。重睹旧物，面对少作，也并无赧颜之感。有了原始材料，不妨再介绍得详细点，以重现当年我们这些初生之犊的思想状况。

《救中国》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十六开本，二十八页，约三万字，共有长、短文章十五篇，都是进步同学的作品。许多页的补白处摘刊着《大众生活》等进步报刊言论。我写的发刊词以“团结、抗斗、救中国”（这句话是套用孙中山弥留时语：“和平、奋斗、救中国”）为题，指出国民党政府“投入东京怀抱的屈让外交已临到山穷水尽。”“政府应痛切觉悟，外力是无可持的，只有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挽救自己的危亡；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手是不会有一刻一秒休息的，只有立刻发动民族解放斗争同强敌作殊死的肉搏。”文中特别批判了“中国没有能力同日本抗战，非先十年生聚不可”的悲观谬论，“日本得寸进尺的亡我政策，告诉我们没有慢慢生聚的机会”。“我们的民族再不能麻痹下去了，再深沉的麻痹就是死亡。医治深沉麻木的唯一良剂是继续不断的最急剧最猛烈的激刺；宇宙间最急剧最猛烈的激刺是什么？是流血，是飞机，是大炮，换言之，是长期的战争。”“我们认为只有立刻对日抗斗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全国一致团结起来立刻对日抗斗才能拯救危亡的中国。”现在看来，我们当年虽然很幼稚，但已认识到最根本之点：即必须坚决抗战，而且认识到将是一场长期战争。这一期较长篇的评论有：《我们到底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生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论东亚门罗主义》等。有两篇论述罢课的文章，其中一篇《良心话》，大概是工学院一位同学写的。文中说，“我曾经反对罢课”，“也曾怀疑发起罢课的人动机不纯洁”，“可是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教育？恐非局外人所能尽知……工学院水利课学的是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的修滘法；自家年年闹水患的黄河

应当如何治理是不管的。生物学系学的尽是些自然现象记载之学，稍切实用的遗传学，细菌学等可是没有，纯谈理论的纯粹自然科学，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全部应用技术都是纯粹自然科学的产物。发明新理论应用于实际，这是千百年的大计；危在旦夕的中国如何能够等得到呢？退一万步说，在大学里，每系课程应当理论与实用同时顾到，才是妥当的。试问我们现在转瞬就有做亡国奴危险的时候，谁能够安心坐在教室里读纯粹理论科学呢？所以我们请教育部早将我们的课程改定。”“以后的教育，一定要改革，不然我们应当长此罢课。”这期还刊登了清华、燕京南下两代表的讲演。《北平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刘毓珩写的，《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是我整理的：“编者曾陪他们往三镇各校，听的次数不下五六遍，遗漏很少”。那期的“编辑后记”中说：“在创刊号的酝酿中，种种不忍言说的困难与阻力就在四周爆发了。困难与阻力是预想得到的，但想不到会爆发得如此迅速，本刊之迟迟诞生，原因即在于此。”除开来自学校当局的压力，以及合用的稿件少之外，印刷与经费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救中国》第一期的出版，消除了其他进步同学跟我及魏泽同等之间的隔阂与怀疑。这期的内容，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观点，我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我和魏泽同的两篇文章引起大家特别的注目。我写的一篇是《胡论学生运动》，魏泽同写的是《多此一举》。

模糊记得胡适的文章是登在《独立评论》或《大公报》上的。他认为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游行示威之前，应当先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居然还说，“军警那天上午的手忙脚乱是可以原谅的”。他厚颜“天真”地谈到自己的经历：“凡大规模的游行，都应该在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可以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我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看见纽约市‘妇女参政’的五十万人示威大游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看见纽约市‘蓝鹰运动’五十万人大游行均未发生纷扰”。我在文章中说：“我很怀疑胡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是否感觉心与言矛盾的难过？”“将这两次游行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那末，‘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胡适认为此等学生运动“有抗议的功用，而不是实际救国的方法。”我说，“请问：五四和五卅的光荣的民族解放斗争，其效果在历史上难道仅止于‘抗议’？这一次比五四、五卅意义更伟大，情景更壮的空前的北平学生运动，被人轻描淡写地归并于这样的两句话，我们全国青年只有同声一哭了。”“整个民族的灭亡就在眉睫，这一次的全国一致的学生运动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清楚了事实，我们下了最大的决心，我们不再为花言巧语所动！”“我们的政府不是一声‘抗议’，一回请愿可以觉悟的。过去的事实已经使我们太绝望了。敌人的侵略不是坐在课堂里读几句死书可以抵御的，我们决不愿坐在课堂里让我们的国家灭亡。在民族这样危险万状的时候，知识须同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在实际行动和实践中才有真知识可以求得。”我在文章最后说：“胡先生是爱护青年的人，并且说过‘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我们现在诚恳地希望胡先生不要再唱‘埋头读书’的高调了，这些话无论怎样好听终于成了废话。我们现在

要想知道的是同民族解放斗争实际联系的知识，救亡工作实践的方法。”

魏泽同的文章是挖苦讽刺蒋介石的所谓“晋京聆训”。面对全国学生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蒋介石着了慌，企图加以软化。十二月十八日报纸刊登了蒋介石将有“晋京聆训”——“召集学生代表晋京会见”之举的消息：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蒋介石将在南京会见全国各大学学生代表（资格是“平素学行优良”）“聆悉政府方针，贯通各方意见”。一方面“听取青年的意见”，同时“对于国事情况能更深明了”。魏泽同文章的开头写道：“四年前（按：指九·一八事变），政府受了严重的责难，想要解释，便有‘国难会议’的召集……当时政府看得起的人，只有名流学者；所以被聘去开会的，也只是名流学者。在政府诸公的心中，没有学生，更没有民众，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百姓’。‘国难会议’散了，国难却没有散。四年来大家都笼罩在‘古风’，‘新生’之下，期望着困难的解除，直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现在看得起学生了。”“四年前游行被解散，请愿被绑票的，现在却恐怕他们对国事不能‘更深明了’，而想对他们‘掬诚宣告’了。”“交通便利的时代，青年人的意见是顶容易听到的，报纸不准发表，他们就打了电报，发了宣言，如果以为这些东西不足以‘掬诚’地代表青年的意见，那么两三位‘平素学行优良’的学生所说的，难道可以代表全体了？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足以‘明白地传达青年意见’，那么两三位‘平素学行优良’的学生所说的，也就很难详细传达了。”

我们得知武大校方将选派“聆训”代表后，十二月三十日召开了紧急的全体学生大会，决议不准派代表去南京“聆训”，以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蔑视。学校出了布告让学生投票选举“聆训”代表时，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参加，少数参加者，有的在选票上填了“宋美龄”，有的填“胡蝶”，选举自然没有结果。“聆训”代表后来是由学校当局偷偷选派的。不久前见到研究黄河问题的专家方宗岱，谈起往事，才知道他曾是学校当局选派出的代表之一，但是他拒绝了（他当时是武大第一个研究生）。学校派去了三个“学行优良”的学生，其中倒没有一个复兴社分子，有两个还是理学院的。当我们确切知道这三个人到南京去了之后，便以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名义，在天津《大公报》登了如下一个启事（刊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十八日第二级广告栏）：“查本校同学吴兢云、毛景能、杨志鹏三人违反本会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冒充本校学生代表入京聆训。兹经二月九日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将该三人驱逐出校，特此公告。”抗日战争初期，有次同蒋南翔同志谈起一二·九运动时武汉的情况，他提到这个启事当时对平津同学也是个鼓舞。

这三个人从南京回校之后，进步同学对他们采取了很激烈的措施：将他们的行李从宿舍抛出，并且不准他们在食堂就餐。当年伙食由学生自办，他们只好去吃商人的包伙。历史竟是如此无情：解放后回到长沙，听说“聆训”代表为首的吴兢云（生物系学生，岳阳人），在抗战时期当过岳阳的汉奸县长。

成立校内的秘密组织——武大青年救国团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们与校内进步同学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沟通了，某些曾经存在过的不信任也消除了。暑假前不久，由李汝俊、郭佩珊、彭秉朴、魏泽同和我等一部分同学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九一八"公社，李、郭为负责人。

暑假的头一周，我没有回湖南，待在学校。一天，一个不相识的同学——谢文耀来找我。他非常随和，湖北口音，瘦小的个子，留着长发，不修边幅，带副近视眼镜。他休学一年，这时刚从上海回校。一二·九运动后学校的情况，他已知大概，来找我是因文会友。前面说过了，我的第一篇、也是一生仅有的那篇小说《走》刊登在一九三四年冬的《珞珈月刊》的首卷，我用的是笔名，爱好文艺的同学都知道这是一个工学院的Freshman写的。谢文耀休学离校去上海，住在暨南大学当文学教授的哥哥谢文炳家里，原来是想当"兄弟作家"。理想为无情的现实破灭，又因一二·九运动后的形势影响，才又决心回到学校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这个"同好"。我们在一起谈了整整一个礼拜，真是"推心只恨定交迟"。他给我看了他写的反映农村问题的中篇小说《万民伞》，决心将稿本收藏，再不做"作家梦"，而投身到实际斗争中。暑假的第二个星期，我回到湖南，在长沙与魏泽同、彭秉朴（他已毕业）等一起参加了长沙的救亡活动，我们跟另外一些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进步学生和长沙本地的进步小学教师廖申之（廖意林）、唐荣前、邓克生一起办了个四开型《湘流》三日刊。这个刊物出版三个多月后，被国民党查封了。

暑假结束回到学校，万国瑞、朱九思、姚树森、陈尚文、李行夫、王采铭、鲍光宗等一大批进步的中学生都考入武大，我们便积极活动成立一个全校统一的秘密组织。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在化学系二楼的大实验室秘密召开了成立会，组织取名为"武大青年救国团"。用"青年"而不是"学生"二字，是因为有两位理工学院的助教也参加了，开成立会的实验室就是其中的一位姓胡的化学系助教安排的。参加这天会议记得名字的有：李汝俊、谢文耀、林守正、郭佩珊、鲍光华、鲍光宗、周继颐、史恒镜、石秀夫、魏泽同、王前、周纪发、李升震、汤钦训、李行夫、刘锡尧、潘乃斌、钱祝华、张是我、姚树森、陈尚文、王采铭、庄惠霖、李厚生（我的原名）、万国瑞、韦远裕、曹诚一、胡蜀芳、王晓云（最后五位是女同学）。会上推选了谢文耀、郭佩珊、魏泽同担任负责人，并通过了组织章程。除少数人外，参加这天成立大会的大多数人，在抗战爆发后即参加了共产党和革命工作。

从此，武大公开的学生救国会的一切活动，实际完全由我们这个秘密组织所掌握。因为救国会的日常工作由干事会负责，干事会成员由各班选出的两名代表组成，而我们这批人中有不少人是班代表，在干事会中占了多数，救国会选出的执委我们自然也占多数，复兴社、CC分子总占少数。

李汝俊、谢文耀、魏泽同、郭佩珊、潘乃斌、刘锡尧等都先后担任过武大学生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

武大学生救国会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初，利用春假，武汉市学联曾经组织了一次有成百学生参加的葛店（离武昌九十里）宣传。同学们在葛店召开了镇民大会，演出抗日救亡文艺节目。当时武汉的进步中学生中有一部分人思想较左，不大懂得斗争策略，在这次宣传活动中提出了反对政府的过激口号，散发了“拥护苏维埃政府”等油印传单。此时亲日派的省主席杨永泰上台已有数月，他严密监视学生的活动，学联发动葛店宣传时，国民党派了许多便衣特务跟随，这一类油印传单，正好成为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借口。参加这次宣传的学联主席陈述元，被华大校方以“外出三宿”不遵守校规为由开除学籍。四月八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和省教育厅召集武汉各校校长和学联代表开会，指责学联“受共产党操纵，反对本党主义”，宣布解散学联。因为武大是国立大学，不受湖北省管辖，这次会我们无人参加，事后才知道这一情况。在这种形势之下，经过何功伟、姚树森、万国瑞、余梅青等人的努力，将市学联活动转入秘密状态，改称为“武汉秘密学联”，李汝俊和武大另一位同学参加了秘密学联的成立大会。最初，秘密学联的机关设在姚树森的家中，六月间，姚被捕，以后就没有固定的机关了。何功伟为了免于被捕，出走上海，找到同乡革命前辈钱亦石，被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我同何功伟在武汉时没有直接来往过，他参加全国学联工作后，我们曾经常通信。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从湖南到重庆南方局开会，才在红岩嘴的招待所遇见他，俩人畅谈过几次。这是初会，也是永别。他当时是从鄂南到南方局接党的关系，随即被党派到鄂西工作，一九四一年由于叛徒告密，在恩施被捕，十一月英勇就义，时任鄂西特委书记，年仅二十六岁。被杀害前，当时国民党的湖北省主席陈诚曾跟他谈话，许以“领导”省青年的全权，功伟不为所动。当局又将他年老的父亲找来，意图“软化”这个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功伟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亦不可移。”“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老人所能做的，带出了儿子的两封遗书：一封是向他心灵所寄托的队伍告别，一封是给他刚刚分娩的妻子，他惦记着她。一九四二年六月，为抗议国民党杀害抗日青年，延安为何斌等同志开过追悼会，追悼会上我凭记忆画了一张很大的何的头像挂在会场，还写了一篇纪念何斌的文章，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但是我们武汉大学的学生救国会仍然合法存在，活动主要是在校内。武大学生救国会坚持得比较好的群众活动是歌咏队，每星期五晚上练唱，理学院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总有六七十人（内有十多个女同学）参加。

当时全校学生不过六百人左右。机械系同班曾昭正和李行夫两人爱好音乐，一个会教唱，一个有理论知识，唱的都是流行的救亡歌曲。抗战初期在武汉出版销行极广的《大家唱》，就是由他们两人主编的。曾昭正不是我们秘密团体的成员，但他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汉口有名的饮食馆“老通成”，是他家开的，他父亲还经营大智旅馆。我们进城活动或有什么秘密接头，都利用过旅馆中他父亲的“经理室”，这是最保险、不会受到查问的可靠地点。最经常的工作还有“壁报”，三天一次，以时事报道评述为主，贴于饭厅外墙，此事主要由我负责。

校内活动中，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有一个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转学的新生张公甫，言行颇为嚣张，还传说他带有手枪，引起进步同学很大反感。有一次在合作社的门口，鲍光华、汤钦训、潘基踬等几个人跟他发生了口角，鲍的脾气比较暴躁，将张痛打了一顿。于是复兴社分子联名贴大字报，要求学校惩办打人者。学校当局被迫开除了鲍的学籍。我们曾组织一批同学向学校当局说情，没能挽回。这件事脱离群众，确实输了理。此后不久，校长王星拱找了我与魏泽同等七个人去谈话，说得到省公安局的通知，如果我们的活动过于“越轨”，他无法负责我们的安全。王虽然态度严厉，但措词较委婉。对于这种善意警告，我们一笑置之。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我们的秘密团体“武大青年救国团”借助武大学生救国会组织了全校性的追悼大会。因为校方不让用礼堂，追悼会是晚上在饭厅开的。我们用长条饭桌并起来当讲台，由于事先出了海报，有节目，同学们到得很涌跃，挤满了饭厅。悼念仪式有讲话，有合唱和女同学的独唱，还放映了从进步画刊上剪辑、制作的幻灯片，鲁迅的大幅画像和幻灯片都是我的“创作”。鲁迅逝世后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骂苏雪林，她那时是文学院的讲师，胡适的门徒。鲁迅去世后，她在《人世间》发表了一篇诋毁鲁迅的文章，引起进步同学的愤怒，大家在讲堂上质问她（抗战爆发后，苏雪林曾捐献大批金饰支援抗战，不失为一个爱国者）。二是举办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展览会先在上海办的，后转来武汉，但是市政府不支持，无法在武汉展出。在汉口《大光报》（这个报纸有张学良的背景，张曾任武汉行营主任，编辑中有东北人）工作的孔罗荪找到我，让我帮忙。我们就以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名义在文学院展览，我们把鲁迅的木刻像挂在大教室的正面墙上的正中间。那是一个星期天，许多教授也都来观看，文学院长陈源也兴致勃勃地来了。他走进教室，一抬头看见鲁迅的像，赶紧慌忙退出。我们觉得很好笑。附带一说，武大从东厂口时期起，学校的图书馆就将鲁迅的全部著作封存，不让出借，可见现代评论派的人对鲁迅成见之深。

这年的十二月，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学校当局不许进行纪念活动，学生救国会仍然在校园内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学生救国会的主席是个活跃分子，但不是我们秘密团体的成员，因为纪念会是跟校方“对着干”的，他不敢出面主持，就由魏泽同担任临时主席。在纪念会上，学生救国会负

责人作了半年工作总结报告，有许多人讲了话。有一个复兴社分子大讲“读书救国”，立即受到批驳。事后，学校当局以“擅自开礼堂门”为由，勒令魏泽同跟另一个同学休学一年，由于学生救国会的抗议，校方后来又让他们复学了。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我们从英文报纸上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在学校的“壁报”上公布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六条要求。复兴、CC分子对此只有干瞪眼。我们十几个同学，还到合作社聚餐、喝酒，表示庆祝。后来蒋介石被释放，我们很不理解，见到塔斯社发的消息也不同意张、杨的行动，更不理解。释蒋当夜，有一个经济系一年级的复兴社分子企图找人签名，张贴庆祝海报，姚树森等立即组织反签名，使之未能得逞。其他复兴、CC分子有的也只敢偷偷丢出几挂鞭炮，便连忙将房门掩上，怕公开露面。当时在武大校内，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

在市秘密学联的工作

那时，我自己的活动主要不在校内，而是在武汉市秘密学联。姚树森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就不再参加学联活动。李汝俊在九月间就离校了，经过上海、北平，找到党的联系，回到老家太原去了，没有再返校。作为原武大在市学联的正式代表，他将武大在市秘密学联内的领导工作交给我和万国瑞负责。万国瑞升入武大前，在中学时就是秘密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家住在汉口，下山活动很方便。以前讲过，秘密学联是由公开学联演变而成的，其中骨干多是一二·九运动时最积极的分子，各校的公开代表，经过半年多的实际斗争考验，相互间有了一定了解，比较信得过。参加秘密学联的只有二十多个学校，各校成员人数不一，少则几个人，多则十几二十人，包括我们武大青年救国团的成员，总共约二百多人。现在记得起来的有：省一中的陈约珥（王熙真），省高的何功楷（何功伟的弟弟）、密家藩（密加凡，跟赵紫阳同班）、孙士祥，育杰中学的林贤复、胡韦德，二女中的李齐凰（林轩），懿训女中的范元甄（我的前妻）、梁丽琳、郑速燕，武汉女中的许立人（林浩），以及陈传亨姐妹等。我们名义叫“学联”，实质如北平的民先队或我们武大的青救团，完全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各中学的校内活动，主要是组织读书会，传阅秘密性的书刊等。各校有代表一或二人组成学联的领导机构，常务干事不到十个人，分别领导武昌、汉口、汉阳三区，每学期开一两次常务干事会，临时有急事也开会。开会利用假日，地点多是武昌或汉口的教堂，也在东湖游船开过会。李均平于一九三六年夏毕业后，跟原来的同班同学刘相尧（刘克）在武昌建设厅工作，仍然常常帮助我们。他同教堂的主持神父关系甚好，常由他出面借教堂聚会，神父把我们当作基督教团契的成员，招待我们。抗战爆发后，李均平和刘相尧（抗美援朝时，他当过铁道兵的司令员）即去了延安。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全国学联）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上海成立的，华中大学的代表陈述元被学校开除后，到上海代表武汉学联正式参加了全国学联。全国学联开成立大会时，通知武汉派代表参加，是武大的杨克穆去的，原因是他能筹到路费，到上海可找到陈家康，有住的地方。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全国学联也派代表到武汉来过，都由我接待。

武汉的救亡团体同上海救亡团体之间的正式联系人是何伟。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南京被捕之前，经常来往于武汉与上海之间。何伟原名霍恒德，一九三四年从华中大学毕业后，在汉口圣罗以女中教国文。他有两个同班好友；黄心学和成庆生，黄在懿训女中教国文，成任华大附中的校长（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是神父）。他们在教书时，就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宣传抗日主张，乃至讲共产党的道理。范元甄、梁丽琳、郑速燕、陈传亨姐妹等，都是他们的学生，受到他们的启蒙教育而积极参加了革命。他大概是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上海（或天津）入党后，参加了全国救国会的领导工作，随后即以“全救”领导成员的身份同秘密学联联系。他有一个好朋友转学到武大，因此他一回来我们就认识了。全国解放以后才知道，他那时是受党派遣，回到湖北，任中共武汉临时工委负责人，湖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汝俊走后，我在年底代表武大参加市秘密学联的工作后，俩人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在何伟的主持下，秘密成立了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武汉各救），由学生、妇女、文化、职业各界的组织联合组成，发过油印的宣言。其实真正有些群众基础的还是秘密学联，妇女救国会是由学联中的女同学组成的，文化界只有黄心学等几个中学教师和《大光报》以及生活书店等处十来个人，职业界救国会由邮务工会、救火会和英美烟草公司内的一些进步职员组成。这个武汉各救的成立会，是在英美烟草公司一个姓孔的职员家中开的，他请了一桌饭。鲁迅逝世后，在邮务工会开过一次追悼会，武汉各救的上述各界的成员都参加了。

汉口生活书店是武汉各救的联络机关。书店经理顾一凡，思想进步，一二·九运动以前，何伟、黄心学以及其他几个进步中学教师，同顾一起组织过读书会，后来孔罗荪等也加入了，他们从常来买书的顾客中，结识了一批进步朋友。上面谈到的邮务工会、救火会内一些进步的职业青年，都是由于买书而逐渐同顾熟识的，秘密学联的主要成员也都同书店有密切来往。书店也是学联分发秘密书刊、通知和代转信件的地方。上海“全救”出版的《救亡情报》等秘密报刊运到书店后，即由我们取来分发给学联成员。书店设在汉口的书铺街——交通路上，我们去书店都是从后门进出，自以为是很“秘密”的。其实书店的活动早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一，顾一凡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份人名单，还在书店搜出成包的学联油印文件。我们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通知了所有学联以及其他同书店有来往的人员，再没有出其他事故。当时的《扫荡报》还发表过一则“顾一凡谋刺杨主席（杨永

泰）”的消息，大概是国民党为杜绝营救而造的谣言。直到抗战爆发，顾一凡才被放了出来。

武昌还有一个新生命书店，出售进步书刊，书店一位姓吴的经理也是进步青年，同我们有联系，给过我们一些帮助，但起的作用不如生活书店大。

寻找共产党

自从投入市秘密学联的工作后，常要下山，我几乎很少上课了。这时在校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就是谢文耀。我设法一人单独住一间房子，他则占用了一间外文系的公用房间，这两间房子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工作机关”，自己人敲门需用暗号。我们俩加上万国瑞，三人一起为市秘密学联办了一个油印刊物《武汉学联》。从写文章，刻蜡版，到印刷装订，都是我们三个人干，没有外人参加。每月出一次，出过好几期，常常为此熬夜，颇有点“自我过瘾”的味道，觉得这才像做革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深感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这个三人小组不过是一只无舵的航船，只能在大海中漂荡，迫切感到需要立即找到党的关系。从我个人来说，为什么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立即成为学校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随后又急于要找党呢？这同以前谈过的家庭背景和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我不仅一直爱读左翼小说，而且对共产党怀着一种模糊的英雄的憧憬。记得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收到一份从美国转寄给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是用一种很薄的打字纸打印的（现在记不清楚这份宣言当时如何利用的，好像翻印过，从房门缝塞到一些同学的寝室内）。读过从上海传来的，斯诺写的《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的节译本）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寻找共产党的决心了。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在华大附中成庆生处，看到了一期铅印的《长城》，这是当时共产党北方局的刊物，他说是邮局寄来给何伟的。华大附中是教会学校，这个地址当然比较可靠。我当即断定何伟一定找到了党的关系，再见到何伟时，就正式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但是他不置可否。后来知道，他自己也是在上海找到关系，刚刚入党的，组织上还没有交给他在武汉建党的任务。抗战爆发后，何伟才介绍了武汉的一批人入党。我在跟何功伟的通信中也暗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同样没有结果。

这时，谢文耀结识了一位刚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湖北人甘禹民。大革命时期，他到莫斯科学习过，我们到他家去，见到有俄文书刊，就觉得特别亲切，以为他是个老革命，跟他商谈入党的想法。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从反省院出来的人是需要详细了解的。甘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自发支部，一边自己建党，一边找党的正式关系。我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在秘密学联中物色对象，同我们认为最可靠的陈约珥、林贤复谈了自发成立共产党支部的事，他们都赞成。陈约珥又介绍了在张楚中学

教书的习东光跟我们认识，甘禹民则找到另外一位从反省院出来的人，一起参加讨论。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天，我们八个人在谢文耀的家里（武昌贡院街三十号）集会，正式成立了自己的自发党组织，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大家一一举手宣誓。誓词和入党表都是甘禹民拟定的。会上选举甘、谢、习三人为支部负责人。后来，我到了延安才知道，陈约珥与习东光跟何伟一样，当时都有正式的党的关系，算是党派他们“打入”我们这个自发支部的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接上党的正式关系。去上海，还是去北平找党？因为万国瑞同北平的进步同学有联系，最后决定去北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办学生军训，一年级学生于五月初提前放暑假，于是万国瑞先于五月初去了北平，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党的关系。五月中旬，我也决心离校北上，这其中有个人的原因。武汉大学电机系的教授赵师梅，认识我父亲的好朋友田秋明（长沙私立秋明医院的院长），他将我在学校的活动写信告诉了田，说我在学校的活动被校方找去谈了话，情况很危险。田秋明得信之后，立即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就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来到武汉，在珞珈山武大校舍旁租了一间房住下，经常到我的宿舍来，监视我的行动。我是独子，母亲劝我：你父亲在世也会赞成共产党的，可是“膝头拗不过大腿”，共产党虽好，杀头太可怕了。加之我那时几乎根本不上课了，无法应付考试，所以下决心不读书了。我怕母亲追到北平，就给家里写信说自己到山西去了，因为我的四叔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阎锡山同班，我让大姐到武汉将母亲接回长沙。我的突然出走令母亲几乎疯了。为此，家人和亲戚朋友都谴责我的行为，不原谅我。我是带着自发支部所有人的入党表去的北平，北平市委派人同我接了头（记得是孙传女，即陆平）。除甘禹民跟另外一个从反省院出来的人外，自发临时支部的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我离开武汉之后，临时支部又发展了密家藩、李齐凰等几个人为党员。

接上组织关系后，我和万国瑞决定暂时不返校（这时我与万国瑞确定了恋人关系），六月间将谢文耀叫到北平，让他把大家的组织关系带回去。到北平后，我与文立徵也取得了联系，他正式办了退学手续，跟我们三个人一起住在西城的翊教寺。立徵在我这里看到了许多党的刊物，自认为已像我一样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但是那时我没有来得及介绍他正式入党。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事情发生在六月六日，警察到我们的住处查户口，因为完全没有地下工作经验，平时看的一些进步刊物就放在桌子上，被警察看到，将我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关了一个星期。根据我那时了解的被捕知识（不暴露身份、不出卖别人），在警察局受审时，我说自己是从长沙来北平考大学的学生（报了一个化名张训之），那些书刊是一个已回老家的同学放在这里的。如果他们不赶快放我出去，误了考期，家里会因此断绝我的经济供给。警察就让写了个今后“不交不良之友，不读不良之书”一些话的“保证书”，把我放了。可是警察局在《华北日报》登出了他们自拟的所谓张训之的紧要启事：“训之因交友不慎，误结识共产党人，

因收读共产党分子交来之共党文件《火星》等，被官方查获训诫，现已觉悟，此后专心向学，决不参加任何反动组织。特此声明。”这件事在延安写自传时，我都据实交待了。结果在随后的延安抢救运动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我均因此事被作为“叛徒”问题——“对敌屈服”、“登报悔过”、“欺骗组织”，等等罪名进行审查，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洗清。

出狱之后，我照样积极工作。正当北方局的同志与我们研究如何在武汉正式建立党的组织的时候，七月七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形势大变。谢文耀立即带了临时支部成员的组织关系，先期匆匆单独返回武汉。九、十月间，湖北省工委成立，武大的支部是陶铸同志去建立的。李声簧（平津借读学生）、谢文耀、郭佩珊等为支部的第一任负责人。在延安时，钱（瑛）大姐和陶铸同志都跟我谈过，党后来承认了我们的自发支部，认为这个组织对抗战前后武汉的救亡运动和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为抗战初期武汉三镇有名的进步青年团体——武汉青年救国团的建立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据当时留在武汉的朱九思同志后来告诉我，由于抗战已经开始，省工委已经建立，共产党在武汉公开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到了武汉，上海的许多文化界人士和大批平津流亡学生也来到武汉，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武汉总的形势非常好。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害怕进步的学生运动，以致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不得不选择在武昌华中大学大操场举行，会前也不能声张。那天下午，各校学生化整为零进入会场，旗帜也都是在将要开会时才打开的。尽管如此，与会学生非常踊跃，气氛也非常热烈。开会过程中，军警终于包围了会场，关闭了校门，散会时不让出去，怕学生们游行。当时大家向军警反复宣传，僵持了个把小时，才算解决。原来也没有打算游行，由于气愤，汉口各校的学生集体渡江以后，却自动游起行来。队伍行进到孙中山铜像附近，时已黄昏，国民党特务从阴暗处开了一枪，当场打死汉光中学的一位同学。历史终究是不可逆转的。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来到了武汉，一九三八年春，武汉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那一年，我还去武汉参加过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但是已经不是以武汉大学学生的身份了。

1.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祖籍湖南衡山。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1914年考取清华学堂留学班。先后获美国沙瓦女子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0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大、川大、东南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年去世。
2. 殷汝耕（1885-1947），号亦（侠）农。浙江省苍南金乡镇人。两度赴日留学，号称“日本通”。曾加入同盟会，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表蒋介石同日本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口，殷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11月殷任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之后第二个汉奸

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后，殷被国民政府收押。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翌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殷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均被驳回，同年12月1日由高等法院检查处执行枪决。

成为职业革命者



李锐、范元甄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赴延安过成都时拍的结婚照



一九四〇年留在湖南的李锐母亲和大姐李琬华（右）、二姐李英华（左）及二姐夫王铁铮和二姐的长子李力康的合影

觀察 月十六日

觀察日報

大江兩岸戰況緊急

信陽我攻守西北郊





国民政府第五战区长官部旧址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五日武汉沦陷，日军进入武汉



七七事变北京宛平国军紧急奔赴卢沟桥



长沙“文夕大火”前的天心阁，李锐和范元甄在此相遇

离开北平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谢文耀按北方局指示，带着武汉临时支部的组织关系立即返回武汉大学。他走后不久，我、文立徵和万国瑞三人，随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同学到天津，从那里坐船到烟台，最后转到济南，参加了三路军韩复渠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一九三〇年，蒋介石任命韩复渠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赴济南，同年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这个训练班是培训在敌后工作的民运训导员的，学员受训后，派赴山东各县，组织民众开展对日游击战争。训练班的管理沿用了军阀部队的方式，男女学员分开，训练之余男女生之间不能随便交往。这种规定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当然无法遵守。一天，我因事到女生宿舍去找万国瑞，被女队教官撞见，发生口角。这个教官就去报告了训练班的头头（一个老军官），头头立即将全体学员召集到广场，把我押到广场的台上，当众廷杖。鲜血染红了裤子，我一声不吭，台下很多女生哽咽。事后，平津同学会的同志将我送到医院治疗，伤口愈合可以行走后，我便离开了训练班，到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不过因为我的事情，这个训练班的领导被撤换，改由余心清[1]主持，齐燕铭[2]等人来担任教官了。文立徵和万国瑞仍然留在那里，训练班结束时，日本人已逼近济南，形势十分危急。文立徵被分配到山东城武县当民训员，万国瑞所在的女生队未分配，转移至济宁继续接受训练，我所在的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随中共山东省委撤退到泰安。此后，我跟万国瑞断了音讯，直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才在北京再次见面，她那时在接管上海的班子里。方知她抗战期间一直在山东、苏北一带工作，改名杨纯，与张爱萍将军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后来与张彦结婚。她后来曾任华东局纺织管理局副局长，张彦是华东局的副秘书长。我后来跟张彦还碰过面，新安江水电站组织班子的时候，问华东局要干部，谭震林接见我的时候，张彦也在场。一九五五年杨纯调到北京，担任过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离休前是卫生部副部长。晚年是我隔壁楼的邻居，我们常来往，已经去世。

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

由于我原来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和省民先队部委托我到武汉去募一笔钱和买一批书回山东，准备上山打游击。到武汉后，见到了谢文耀。离校才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武汉成为平津沦陷后流亡学生和进步文化人的聚集地，成立了公开的武汉青年救国团，其基础就是原来的秘密学联，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影响很大。我在武汉拜见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沙千里、许宝驹、罗隆基等各界名人，募捐到一笔钱，买了一些书籍。工作之余，我回长沙看望过一次母亲，才知道我的二姐李英华也已离家参加了抗战工作。母亲对我半年前的不辞而别仍然有气，见我回来，立即将我关了起来，不许出门。我后悔莫及，以绝食抗议。在大姐的百般劝说下，母亲最终放了我。我赶紧回到武汉，这时泰安已经失守，省青委书记杨学诚让我先到徐州。杨学诚是在清华上学时入的党，原来是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负责人，我们就是跟他一起到的济南。九月初，他离开济南到了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以后湖北省委成立，又兼任省青委书记。因此，杨学诚的意见实际就是长江局的指示，他让我率领滞留在山东、苏北一带的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同学，在徐州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到了徐州，党的组织关系只带了杨学诚给王文彬的介绍信。杨学诚告诉我，王和他在北平时，同是北平学联中党组织的负责人，王文彬是江苏丰县人，卢沟桥事变后就从北平回到家乡，在那里开展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杨告诉我，找到王就可以找到徐州地方党的关系。谁知在徐州见到王文彬后，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组织关系尚未转来。好在他同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已经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也认识在徐州市委负责的郭影秋。王文彬就带我去见郭子化，我向郭汇报了去武汉前后的情况以及长江局青委交给我的任务，并将募到的款子和书籍交给了他，请他转到山东，并告诉他我自己还是想去山东打游击。他让我先留在徐州工作，去山东的事待机再说。

当时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在坚持抗战及国共关系上比较开明，已经成立了一个半官方半群众性的五战区抗战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兼任主任委员，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主要负责人都是比较开明的，郭影秋任组织部总干事，掌握组织大权。在徐州同从泰安撤到此地的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同学取得联系后，我就同王文彬和大家一起商量，决定仿照武汉青年救国团的组织形式，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这个想法得到了苏鲁特委的支持，加上郭影秋任总动委会组织总干事的行事方便，这个组织很快就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动委会的大礼堂召开的。我担任了这个战区青年救国团的总负责人，后来以这个组织总负责人的名义，参加过李宗仁主持的抗日团体的工作会议。有了这样一个公开合法的青年组织，又得到动委会给的经费补助，对地方群众抗战工作的开展自有很大便利。当时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是准备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很快，我们就在苏鲁二十多个有

党组织的县里成立了分团。

徐州地处津浦、陇海铁路交叉点，又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总部所在地，留驻的群众救亡组织和来往的战时团体很多，流动的青年学生也很多。台儿庄战役前后，许多民主人士也来此，青救团一时成为活动的中心。各大报的记者来徐州采访青救团、动委会举行的宣传周，演剧、歌咏、民众大会等，有过一段高潮。国民党的特务虽加破坏，也没能起什么作用。我自己正是少年气盛，满腔热血。记得范长江、陆诒两位《大公报》、《新华日报》记者到徐州时，还向我作过采访，事后报导了徐州的群众抗日活动和鲁南正在开展的游击战争情况。我们还办了一个团刊《救国青年》（四开周刊），由我主编。那年的三月刊上，我写了一篇介绍战区青年工作特点的文章，署名李锐，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名字。蒋南翔主编、在武汉出版的《战时青年》上还转载了。

莫测命运

这时，我接到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为了解决正式的组织关系，王文彬从丰县来到徐州同我商量，决定由我代表五战区青救团等青年组织去参加大会，同时在武汉与长江局接上关系。于是三月间我再次去了武汉，恰巧这时文立徵从鲁北前线辗转到后方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介绍他入了党。开完全国学联大会，长江局组织部负责人刘顺元开了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还让我带了文立徵、郑琳、乔彬和武汉的十多个同志及他们的关系信（多数是党员，有几个是从陕北公学出来的）一同到徐州去，由特委分配工作。三月下旬回到徐州，我即到牙税局，向在那里工作的特区书记郭子化作了此行的报告，并交上长江局的组织介绍信。那时的关系介绍信都是密写的，郭将信交给秘书丛林显示出原迹。有了正式的组织关系，王文彬即参加特委的工作，我仍暂留在青救团，但是并没有放弃回山东的想法。这有一个重要的个人原因：因为万国瑞在山东，我希望两个人能在一起。立徵和从武汉同来的十几个青年，被特委派到鲁南开辟工作，我和立徵就此分手，再无音讯相通。一九四九年南下途中，遇到当年山东的老同志，我才得知立徵已于一九四五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了。

这时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等东北军部队正在五战区作战，东北军中有党的组织，负责人项乃光（后被捕叛变）原是北平西城区区委书记，同王文彬有过组织关系。我到徐州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王介绍我也认识了项，并且同解沛然（于学忠部上校联络官）发生组织联系。于学忠的部队这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他们进入山东敌后。项找到王文彬和我，要求我们组织一支三四十人、决心留在敌后的进步青年队伍，以战地工作团的形式加入到于的部队做政治工作。此事由我负责，物色人选。这正符合了

自己想回到山东的想法。当时特委的工作重心在淮北苏鲁边敌后游击战争，我同王文彬相处很好，他很愿意我留下来一起工作下去，但是知道我非常想去山东，不便强留，就要求东北军内的组织派一懂军事的干部跟我作交换，帮助他们开展游击战争。于是项乃光就给了张如到苏鲁特委做军事工作，我则带着一批同学进了五十一军。回想起来，真是安危相易，生死为邻，不能不是一种“命运”。在一九三九年苏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中，王文彬和张如都惨遭杀害。一九四一年二月，我在延安看到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中所列死难烈士的名单，第一名是王文彬，第二名是张如，当时他们分别任湖西区党委的统战部长、军事部长。如果张如没有被党从五十一军中调出跟我交换，名单中的第二人就是我了。

一九八八年我在青岛消夏，恰恰同郭子化同志当年的秘书丛林在一个小食堂吃饭。过去五十年了，相互还认得。在话旧中，当然谈到郭子化老人，才得知他后来遇到的种种不幸和不公平待遇。从丛林交给我的材料中，我才知道郭子化是七大代表，他到延安后为湖西冤案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才产生了中央的那个决定。我在延安抢救运动被审查时，对于在徐州一段的工作以及同王文彬的关系，组织上从来没有问过，想必同郭子化就在延安有关。丛林同志一直保留着他当年从我手中接收的那批长江局从武汉派到徐州工作的同志的组织关系名单，其中有陕北公学的樊步霄、白坚、卢石流、于公等，他们都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杀害。这些人可能都是那次同我一起坐铁罐车，从武汉到徐州向特委转关系的同志。他们从安全的后方武汉去到战争的前沿徐州，去与那里的来犯日军拼死血战，他们怎么会想到，对准他们的不是日寇的枪口，却是自己人的“锄奸”！六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同志，痛心不已！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对自己过去所犯的这些血的错误有过痛彻的反省。

郭子化同志是死于文革之中。他是徐州地区邳县人，二十年代初徐州学生运动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以行医、开药铺作掩护，一直在苏鲁豫边一带坚持党的地下活动。一九三七年初他到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白区工作会议和党的七大后，回到徐州，以延安回到地方抗战的共产党员身份，通过地方的上层关系，同李宗仁交谈过一次，从而为党在苏鲁豫边区领导的抗日组织取得合法身份，为党争取到半公开活动的方便。郭子化留有胡子，穿长袍，言谈温和，给我的印象颇像个中产商人。我同郭子化同志以后再没见过面。但他的“中产商人”的模样，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何等紧张的战斗年月，大家都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愿意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谁曾想到，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自己竟然会因为抗战中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那些关系，而饱受怀疑，不被信任，直至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被摧残致死。

徐州突围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我带着五战区青年救国会的三、四十人进入了于忠学的部队，组建战地工作团。自四月中旬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徐州已变成了前线，日本人的飞机轮番轰炸，白天在城里不能呆，在一次最大的轰炸中，我差点被炸死。于忠学的部队本来应该是受命往北挺进山东敌后的，我们到后不久，蒋介石却突然命令五十一军不进入山东，同国民党各部一起向西突围。这与我进入五十一军的初衷完全不同了，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按令行事。准备撤退的这天，我领着青救团的三十多人来到于部的一个旅，旅长（李杜将军的弟弟）和副旅长贾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每人发了军服，还请我们会餐。我们这一行人，匆匆组织了党的支部，分成两个队，我负责带一个队，原来在东北军工作的王学明、王西萍、徐锐林等人带另一队。但是行军路线、宿营地等等，都没有向我们交代清楚。

当天晚上开始突围，我们随着于部的那个旅摸黑行军。各种番号的部队乱糟糟地挤在同一条公路上，谁也不让谁，一个通夜也没有走多少路。在一个村子停歇时，我这个队的人还没有全走散，但同王、徐他们带的另一个队已经联系不上了，同我在一起的支部成员只有张震寰，于学忠的部队也找不到了，周围都是些说不上番号的杂七杂八的国民党军队。我们发现有些士兵跟老百姓换衣服，准备开小差。为了应付意外，我们跟这些开小差的士兵要武器，他们乐得将包袱甩给我们这些自找麻烦的学生。这样，我们这伙人每人弄到一支步枪，还背上一串子弹带，心里踏实多了。半夜搞到一些红薯，胡乱煮了充饥。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准备出发，西面不远的村庄后面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炮轰鸣，听声音似乎是朝西射的。这时，呈散行纵队，正通过平原田野向前行进的各种番号、成千上万的士兵，如山崩般掉头回跑，没有人阻拦，没有军官出来指挥。见此情景，我领着我们这十几个人的小队伍，大声呼喊：不要往回跑，向前面冲过去！我们的行为如同螳臂挡车，非但没能阻止住任何人的脚步，自己也被疯狂逃奔的潮流裹挟着向回涌去。中午在一个村子休息时，我们这十来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是随国民党军队继续向西突围，还是离开大队朝东进入山东敌后。大多数人主张去敌后，尤其是几位山东籍的同志态度最为坚决，认为不愿意去敌后是胆小、贪生怕死。我虽然也很想去山东，但负有带队的责任，并考虑到是党派我们到五十一军工作的，主张仍随部队突围，去找于学忠部。但是我没能说服大家，只好领着我们的小队离开向西突围的大军，朝相反方向的敌后走去。又走了一个通夜，第二天一大早，来到徐州东南，江苏与安徽交界的双沟镇。由于过度疲劳，又怕遇见敌人，大家分散在荒野的苇塘中休息。地上泥湿，无法躺下，只能坐着抱枪打瞌睡。大概我们这一小队人的行动早就被附近的村民发现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国民党军开小差的散兵游勇。当地的农民饱经连年的军阀混战，很有些“作战方法”，我们刚刚停下来休息不一会儿，他们就悄悄地进入苇塘，将我们分头围住，缴了械。我赶紧向围住我的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我们是准备到山东参加游击

队打日本鬼子的。站在我身边的几个农民说：附近有日本军队，你这身行头太危险，硬脱下我的军服，为我换上当地农民的衣服，告诉我往东到皂河镇一带，那里没有敌人。

走出苇塘时，怎么也找不到张震寰他们了，只剩下我一人。我在徐州时知道，苏北两淮地区还驻有东北军常恩多师，常师中有跟我横向联系的党员关系，国民党的省政府在淮阴，那里也有一些我新结识的朋友，此时只好决定先到苏北再说。走到半路，碰到了另一队的几个本地青年和东北军的同志，可是在继续行走时，终于被全部打散。

以上这段经历，就是抗战初期我投笔从戎三天的故事。以后，直到日本投降从延安出来，过封锁线，我再也没有到过前线。

滞留淮阴

这样，我只身走到淮阴，找到淮阴抗日组织的负责人吴觉[4]。此时，淮阴因日寇飞机的骚扰，常有警报，吴觉以城郊农村他岳母家为活动场所，我就同他们住在一起。

吴觉是淮阴本地人，我和他是在徐州认识的。七七事变前，他被关在苏州反省院，事变之后，通过亲友中的国民党上层关系，他被从苏州反省院保释出来。出狱后，他即同谢冰岩[5]代表苏北的抗日青年，从淮阴到徐州找党的关系。同时为了取得在淮阴、淮安、涟水、泗县一带成立地方群众组织，公开开展抗日活动的权力，还带了地方上层人士的介绍信到总动委会联系。因为当时我正在负责组织成立公开合法的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工作，郭影秋就安排他们来找我谈。从他们介绍的情况中知道，苏北有一批刚从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中出来的人，还有很多从沦陷区流亡回到家乡的进步青年，急于找到党的关系。结果不知为什么，特委并没有跟他们建立组织联系（也许是对从反省院出来的人不信任吧），他们只得到总动委会的认可。吴觉被任命为淮阴动委会的指导员，被授权组织县动委会，他们已成立的抗日群众团体也得到动委会的承认。

国民党在那年的三月份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关于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对日本人作战的策略都有了积极的变化。我到淮阴时，正遇上国民党的淮阴县长要请吴觉等人吃饭，商谈对统一战线的看法问题，“以求得意见一致”，有韩德勤八十九军的政治部主任李歧鸣等人陪坐。在这之前，江苏省的保安司令（二十四集团军的副司令李守维兼）和韩德勤本人，都各自请吴觉、谢冰岩谈过话、吃过饭，表示愿意听取进步青年的意见。这些国民党人士对统一战线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就是

所谓“化学性质”的统一战线，所有党派都要融为一体，由国民党领导，奉蒋介石为“民族领袖”。这次吴觉一定要拉我一同去赴宴，还要我做主要发言，想借重我这个“不速之客”，以张他们的声势：一是显示他们并非地方性质的力量，二是表明他们与外面已取得一定联络。参加这次宴会的，记得还有宋振鼎，谢冰岩。这次宴会后，吴觉等人很想留我在淮阴工作，但是我还是想先和党取得联系。一方面当初是受了党的委托带队进于学忠部工作的，突围中队伍被打散了，应该有个交代；另外也想请示一下组织：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否同意我留在淮阴工作。

吴觉告诉我，他曾经介绍过一批当地进步青年到驻扎在涟水的东北军常恩多部办的学生队，知道常部内建有党的支部，我于是决定去常部找组织关系。到了常部，见到师长常恩多，长谈过一次。由于国民党的政训处对这支西安事变中捉过蒋介石的东北军监视甚严，常恩多很谨慎。他告诉我，他看进步书刊都要在晚上躲入蚊帐里偷看。我在那里没有找到党的关系，又不便在该部留下，只好在旅长唐君尧处住了几天（唐是西安事变时捉蒋介石的指挥官，跟我谈了当时的详情）后离开。

为了继续寻找党的关系，我决定回武汉。临别时，吴觉特为我介绍了泰县的熟人关系和一路情况，那是一个真空地带，长江的港口同上海有轮船来往，还帮我换了服装，化了装。我从苏北乘船到上海，在那里碰到一位武大的同学，他给了我一些钱，我就又从上海绕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广州，最后回到武汉。

重聚武汉

我是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回到武汉的，同谢文耀又聚首了。那时，他正准备到鄂北去打游击，我则要回到长沙作地下工作。见面那天，我们俩人在武昌汉阳门码头江岸上漫步，这里正是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露宿之处。两年半前在寒冷的阵阵江风中坚持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此起彼伏的救亡歌声，还在耳边回响。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兴奋地畅怀交谈了很久、很久……。甚至谈到胜利之日，俩人一定要到这里重聚，心中充满了一种得意的情怀。谁能料到这一次的相见竟是我同文耀的最后诀别！我回到长沙后，与文耀曾有过几次通信，以后就断了联系。一九四七年我在热河时，意外地从新华总社广播的新闻中，听到他写的刘邓大军“如蛟龙入海驰骋江淮河汉之间”的报导，曾兴奋得彻夜失眠。一九四八年二月，我调到东北局工作，一天早晨，突然在《东北日报》上看到一条新华社的电讯，说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的负责人谢文耀在中原汝南区敌后工作中牺牲。这在我真如晴天霹雳，震惊、悲痛，多少天也排遣不了。文革十年浩劫，八年单监枯坐无聊时，默念故人和往事，做了些怀旧的诗，有一首是纪念文耀的，写下了当年得到噩耗时的心情：

故人又似笑来前，

喜读“蛟龙入海”篇。
正待中原席卷日，
何期万里哭南天。

长沙遇故人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长江局设在武汉，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博古任副书记。我在武汉接上组织关系后，长江局就派我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我随即回到长沙。省委第一个跟我接头的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帅孟奇——帅大姐。那时省委书记是高文华，他原来是北方局书记，我就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高文华还曾经希望我跟他的大女儿谈恋爱，后来这个女儿跟艾青结婚了）。我在省委的工作是半地下的，公开发表文章用李锐这个笔名，对外交往仍然用我的原名李厚生。这期间，我经常出差到湖南各地了解当地青年组织的活动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类出差，组织上多少都给些出差经费。我知道组织上得到这些经费非常不容易，尽量节省，能够步行就步行，能够搭过往的军车、货车，就搭车，只有不得已时才乘人力轿，或者投宿旅店，省下的经费都如数交还给负责财务的帅大姐。这大概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二年我到组织部工作，又与帅大姐共事，她对我非常之好。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五日，武汉沦陷。武汉沦陷前夕，大批进步人士和团体纷纷撤到长沙，我的工作极为繁忙，整日负责接待和安排他们的生活。很快，日军向长沙逼近，国民党当局预施所谓“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十一月十二日午夜，长沙全城戒严，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一百多个纵火小分队带着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点火位置，预订计划是省主席张治中在次日凌晨四点检查为焚烧长沙所做的准备，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已经把燃料泼在了房屋上。等待之中，突然传来“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新河”的消息。其实，日军到达的是距长沙尚有二百五十里的新墙河，不是仅有十二里的新河，是译电员译漏了一个“墙”字。而这一字之漏，在纵火队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埋怨政府隐瞒消息，担心留在城内的家属会遭到与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命运，立即擅自引燃燃料。在此之前，为了确保焚烧计划的有效实施，长沙城内所有消防车的水都被放掉，换成了汽油。待到发现误放了火时，已经无法扑救，大火一直烧了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史称“长沙大火”。又因为那封误译的电报代码是“文”，起火是在凌晨黑夜时，又称“文夕大火”。长沙城内有三千多人在大火中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大火之后，党组织全力投入了向社会募捐，救助灾民的工作。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到长沙，领导善后工作，郭沫若等也到了长沙，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了“善后工作突击队”。二十二日，湖南省政府也成立了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十一月廿日，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作为大火的罪犯，由国民政府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枪

决（据网上资料，此三人被埋在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新宁县庄姜村和桃江县的黄土仑村，坟墓上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编者注）。

长沙大火后的一天傍晚，我在大街上巧遇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敌演剧九队，到长沙参加大火善后工作的范元甄，她是九队的党支部书记。故人相逢，又是在那样惨烈的情况下，俩人都十分激动。第二天我请她吃饭，心中充满了温暖。后来她随九队迁往桂林，后又被派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我则随省委迁到邵阳。分手后，我们之间开始了热烈的通信，终于明确了恋爱关系。

在长沙工作时，我曾与平江的一位同乡涂正坤有过工作联系。涂是嘉义人，离我老家平江长寿街只有三十多里路。他比我年长很多，没有参加长征，一直是平江县的县委书记，抗战开始后，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驻平江办事处主任。长沙那时差不每天都有警报，我们曾一起在一个仓库的防空壕内躲过警报。涂的个子很高，我们弯腰坐在洞口，常常一直谈到警报结束。一九三九年的六月十二日，他在国民党制造的平江惨案中牺牲。

《观察日报》

武汉沦陷后，湖南一度成为政治军事重心，先后来湘短暂停留活动过的团体成员和文化人超过一千五百多，其中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闻一多、朱自清、曹禺、阳翰笙、邹韬奋、郁达夫、徐悲鸿、冯友兰等外地名人，还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张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谢冰莹、蒋牧良等湘籍名人。这些人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抗战文化大军，湖南的抗日报刊图书出版发行曾一度空前繁荣。

湖南的《观察日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同年五月改为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杨隆裕（杨庚）任社长，潘开茨任代理社长，总经理是邓克生（一九三六年暑假从武大回到长沙，曾与我们一起办过《湘流》三日刊），总编辑是黎澍，他们四人都是地下党员。在长沙时，我就住在报社的办公处（即杨的家中），我们几个人常常一起聊天，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黎澍成了好朋友。李普也曾经到过《观察日报》，他还记得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时我的高谈阔论：“现在领导学生运动，如果要闹次把学潮，那是绝对有把握，毫无问题的。”

文夕大火后，《观察日报》随同省委转移至邵阳，发行量大减，不到二千份，加之报社迁移费用，三个月后即难以维持。邓克生将自己的家产全部用来支持报社运行。在邵阳时，《观察日报》曾用整版的篇幅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还刊载过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这样，就在国民党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国民党借口登记手续不合，强迫《观察日报》停刊。前不久，邓克生的儿子邓伍文找到

了一篇我当年刊登在《观察日报》上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现在读来，内容很是空洞。但是为了让现在的人体恤到当年的抗日氛围，了解当年共产党是如何作青年工作、宣传工作的，还是将全文照录不误：

《观察日报》与青年

——为《观察日报》周年纪念而作

中国的青年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始终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各阶层的青年以最英勇的姿态投入战争的洪流，站在抗战的前面，担负着先锋的任务，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不论是军事方面，战争方面，文化宣传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广大青年群众的英勇活跃和积极作用。

《观察日报》的创办正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卢沟桥的炮声，上海的烽火，使得几年来为抗日救亡受尽艰苦磨炼的平津京沪的十几万青年们，踊跃地坚决地如浪潮一样涌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有的从军，有的参加战地工作，有的直接加入华北的游击队，有的到各种抗战学校军事政治的训练班去受短期训练，更有很多返归当时后方的故乡作民众启蒙的艰苦的文化工作，他们都各自站上了自己适当的岗位。

毫无疑问的，这一群优秀的青年男女，正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蓬勃的新朝气，生长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观察日报》的诞生，正是当时由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回到长沙的几个青年学生，联合一些地方热心救亡的青年共同努力的结果，起初他们办《火线下》，后来办《大众报》，又办《民族呼声》，《联合旬刊》，最后团结发展的结晶品——便是今天拥有湖南广大群众的《观察日报》！

青年是热情坦白的，勇敢向上的，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要求文化教育，要求合理的幸福生活，要求思想的向真理发展。今天中国的青年要自由，要幸福，只有向日本帝国主义要！因此中国青年的命运是如此地与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同样的，《观察日报》的命运和青年的命运也是如此血肉相关！

一年来，《观察日报》的呼号，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呼号，也代表了中国青年，尤其是湖南青年的呼号！

一年来的《观察日报》，无时无刻不在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为青年服务！

《观察日报》对湖南青年的民训工作，南岳学生集训，纺纱厂青年工

人的停工事件，湖南学生的参战运动，民先等三团体被解散后的号召全国青年统一运动等与抗战有关的青年行动，无不积极地提出正确的意见来；关于全国各地青年活跃的动态，游击区的，战地服务的，后方生产工作的，……无不最忠实地反映出来；在长沙和各青年团体，各男女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文抗会，职抗会，学抗会等，以及各外来的青年团体如新安旅行团，政治部的演剧队，宣传队，三民主义青年团等都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在湖南的或到过湖南的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少有不知道《观察日报》的；对整个的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观察日报》起着如此热烈的桥梁作用和推动作用！

《观察日报》是抗战的，青年的，向上的，活泼的，实践的，与青年血肉相关的！

这种精神和作用，《观察日报》搬到邵阳以后是更发扬了与坚持着，这只要稍为留心这一个月以来邵阳各民众团体，青年团体的行动和工作与《观察日报》的联系，便会深刻领会，今天跑到观察日报馆去参观一下：从社长到工人，从编辑室到排字房，无处不表现着“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工作作风，歌咏队，话剧团，国术，球术，座谈会，救亡室，生活壁报，这一切象征了什么？青年的朝气，青年的生命！

然而在今天抗战的新形势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还远赶不上抗战的需要，我们的进步仍太缓慢，青年运动仍旧是发展不平衡，停滞与沉默，广大的青年仍旧没有组织起来，湖南青年学生仍在受着与抗战无关的教育，无数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仍在过着无知无识的愚昧生活，这是极其严重的现象，我们的政府当然应更进步地努力来改正这些现象，从事抗战的各工作部门工作团体也应该更积极地紧张工作起来，克服这些困难，今后的《观察日报》，“爱之更深，望之更切”，他的责任当更重大，他应该接受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更一天比一天进步！过去一年与青年关系如此密切，今后应更发扬更巩固这光荣的传统精神，使湖南青年的参战运动更广大地开展，推动整个青年统一运动到更高的阶段！

《观察日报》永远是年青的，永远是年青的！

“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中国永远是年青的，向上的！

（《观察日报》1939年1月25日第六版）

离开湖南，去延安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我去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九月十三日晚上，我和范元甄请一些朋友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是结婚了。由于范

元甄是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身份是“红”的（公开的党员身份），两人结婚之后，我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自然再难以维持，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照顾我们的具体情况，决定将我们调离大后方，一起到延安去(一九三九年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迫害、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大后方的党组织开始紧缩)。会后，我跟要去湖南视察工作的胡乔木同路回到湖南，一个多月后，又一起返回重庆、并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延安。

知道这次离开湖南将是长期的，不知哪一年才能返回家乡，十月二十六日，我启程去看望住在安化桥头河的大姐和母亲，大姐工作的学校长沙大火后搬到了那里。直走到十一月一日才到了大姐的学校。我将结婚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母亲和大姐，将要与范元甄同去延安也跟大姐说了，但是没有告诉母亲。敏感的母亲预感到我这次回来不仅仅是探望她，告诉她结婚的事。母亲下厨房亲手为我做饭菜，谈起话来就哭泣，希望能挽留住我。我只好哄她说，我还要继续上学，完成学业才好找个固定的职业，这才勉强说服了母亲，同意我再次离家。住到六日，我必须走了，母亲塞给我六十元钱，嘱咐我好好念书。大姐送我走出六十里地，直到蓝田才停住脚步。

我在蓝田又滞留了一个星期，见了一些朋友才回到邵阳，又做了些物质准备，交代了工作之后，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邵阳再次踏上去重庆的路程。这次是乘火车，经桂林，因为战时火车的行驶极不正常，一路走走停停，颠簸劳顿，大概是在十二月十日才到了重庆。五、六天后，我跟范元甄同胡乔木等一批人一起，离开重庆去延安。路过西安时，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逗留了几天，之后乘挂着八路军牌子的大卡车直奔延安，记得我穿的军服上有上尉符章。同车的还有吕振羽、周立波，何思敬[6]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何思敬已在延安，女儿何理良后来同黄华结婚）。

我们这一行人于一九三九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卅一日到达延安。范元甄在她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短短的一行字：

（1939）12月22日宝鸡赴西安火车中

匆匆决定，匆匆地准备。十三号知道十五号可以走。十五号的清晨就离开重庆了。

我的大女儿李南央整理并自费印刷了我和范元甄自一九三八年相恋，至一九六〇年离婚期间保留下来的所有信件和零星日记，其中一九四九年前的信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保留了自费印刷时的书名——《父母昨日书》。那些信件里记述了我在湖南省青委的工作以及往返于湖南——重庆路上的情景，其中有不少关于胡乔木、叶剑英、李克农等一些

大人物的记录。人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特别是自己现在年纪老了，当年的很多情况现在回忆起来，不可能十分准确了。而两个人写下的那些的私人通信，是最可靠、翔实的历史记录。因此湖南地下党的那一段生活和工作，这里就不再多啰嗦了。有兴趣研究那个时期历史的人，可以将“昨日书”找来看看。

1. 余心清：（1898—1966）安徽合肥人。先后毕业于南京神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归国后曾任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冯玉祥的秘书长。抗战初期任第三集团军政训处长。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是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四届中常委。
2. 齐燕铭（1907—1978）蒙古族，北京人。毕业于中国大学，1938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并在鲁迅艺术学院兼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职。
3. 牙税局：牙税最早出现在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出现了专门为买卖双方从中说合的中间人，被称为牙侩、牙郎或牙人，他们从买卖的交易额中抽取一定的费用。其用做经营的场所叫做“牙行”，官方对牙行征收的税叫做“牙税”，也就是如今营业税的雏形。牙税局，就是当时政府收取商业营业税的收税机构。
4. 吴觉：（1912—1984）江苏淮阴人。1930年加入青年团，1932年转为党员，一直在淮阴地区工作。曾任淮阴抗日义勇军总指挥、八路军115师陇海南进支队大队长，淮海地委书记兼专员、军分区政委、华东战区北线后勤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常州军管会主任兼地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国务院淮委会常委副书记、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等职。文革后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5. 谢冰岩：（1909—2006）江苏淮阴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皖东日报》、《江淮日报》、新四军《无线电讯》编辑，《新华报》编辑、编辑主任，新华通讯社苏中分社社长兼《苏中报》编委，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副社长兼中原大学新闻系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社秘书长、国务院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6. 何思敬：（1896—1968）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哲学家，法学家。1916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学和哲学。1927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学院副院长。1938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延安新哲学会负责人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任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刘炼在《风雨伴君行 - - 我与何干之的二十年》（广西教育

出版社：南宁，1998年第234页）回忆：“1968年4月，何思敬教授在洗脸房里被‘批斗’。当时他72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在推搡殴打中脚步不稳，一下撞在水泥池边沿上，当时眼镜撞碎，眼珠突出眼眶，血流不止，不久即因脑溢血去世了”。

我的延安经历



一九四四年李锐与黄乃在延安王家坪的合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外国记者团的合影

延安的生活和工作

到达延安

记得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我同范元甄到党校大礼堂观看话剧《日出》预演，在大门口遇见小学同班好友黄乃，真是喜出望外。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日，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我们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被胡乔木留在中央青委

由于在重庆开中央青委南方会议同胡乔木有过接触，会后又同他一起到湖南转了一个多月，所以一到延安，我就被他留在了中央青委，搞青年运动史。以后，一直到离开延安也没有进学校的机会，一直是工作。范元甄则进了马列学院。

青委驻扎在大砭沟山坡上，那里盖了一排很小的木头平房，房子就靠着山坡，再往里伸进去就是窑洞，床就挖在窑洞里面。另外，还有几孔真正的窑洞。

同事中有在重庆开青委南方会议时碰见过的许立群，因此跟他关系比较深。我们叫他杨二，有时也叫羊耳（杨大是杨述，后来是韦君宜的丈夫，他们三人都是清华的，也都是胡乔木的部下）。另外还有武衡、于光远、李昌等人。我那时同他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兼职的，副书记是冯文彬，胡乔木也是青委的实际领导，秘书长是韩天石。青委设有宣传部、组织部，还有一个干部部。李昌是组织部长，黄华负责干部部，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宣传部下面有两个科：宣传科和编辑科，我来后当宣传科长，编辑科负责人是杜绍西（后来在吉林大学当校长，关山复曾写文章纪念他）。编辑科负责编《中国青年》，编辑有许立群、杨述、韦君宜，还有陈企霞（后来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陈启霞）等。我这个科里有杨永直（后来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适五（陈企霞的弟弟，后来是新华社的副社长，李慎之的上司，他是搞英文的）、童大林，还有另外两个人，记不起名字了。中央青委这批人，特别是胡乔木、冯文彬，我同他们关系很深。胡乔木当年我是比较佩服的，他文笔确实不错，修改文章的功夫也很强。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发表的几篇文章，他修改得很好，锦上添花。冯文彬住的窑洞比我们多一个，书很多，我在他那里看到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书。一九四九年初南下的时候，我们从东北进关，那时黄克诚和王首道在天津组织湖南省委班子，我也由中央组织部派往湖南。冯文彬就逼着王首道，让我到湖南当青委书记。我当然坚决不干了。一九八四年我从中央组织部退下来，冯文彬又来找我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我问他：你这个事情属于谁管？如果是胡乔木管，我就不干。因为那时胡乔木兼管着全国的省志、县志。他说这事是耀邦管的，跟乔木没有关系。我说那我可以参加。之后，实际上就是我管了，他让我一个人挂帅，自己就退下来了。从这两件事情看，冯文彬对我是十分信任的。

在中央青委时，我曾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替韦君

宜写的，用的真名李锐。那个时候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干部对妇女是老封建，边区的妇女没有地位。韦君宜收集了很多材料，想写一篇有关文章。她认为由她写不好，想找个男同志来写。我就说那你把材料给我，我来写吧。文章就是谈如何正确对待妇女。王明那时是中央妇委的书记，看了这篇文章后很赞赏，还约我和范元甄谈过一次话。当时王明在大家的印象中还是正常的，他在女大讲马列主义的课，我去听过一次，人挤得满满一堂。这个人口才很好。

我在《中国青年》写过的文章还有：《大后方的大学生活》、《国立师范学院的情况》（那个学校就是钱锺书写《围城》的背景）。那个时候延安有好几所学校，还有一些部队的干部训练班，我记得青委组织了好几次，让我到几个学校报告大后方青年、主要是大学生的情况。

我还写了一篇《綦江惨案》，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綦江在重庆附近，很大的一个镇子，国民党在那儿办了战干训练团，像我们办抗大一样。他们在里面发现了共产党的活动，杀了很多人。这个惨案在重庆引起很大震动。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天翻看我女儿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发现她写了她母亲范元甄在延安宪政辩论会上获胜的事情。那个辩论会在延安是个很大的事儿，国民党当时公布的宪法共产党也是拥护的，延安就搞了个宪政讨论，一方代表共产党，一方代表国民党进行辩论。那次辩论会我没有去听，范元甄后来给我写信说她那天极其成功，辩论完了，得到王明、董老、吴玉章三个人的夸奖。南央写的文章说是她妈妈代表国民党[1]。

调入《解放日报》

一九四一年二月，胡乔木被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蒋南翔接任了青委宣传部长。不久，延安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精简机构，中央青委缩小，黄华调任朱德政治秘书，冯文彬到米脂县当县委书记，李昌到晋西北的兴县当县委书记，我则在秋天被博古要到《解放日报》。中央青委最后也就剩下五、六个人了。应该讲，当时的精减对于延安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发给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十六万军费没有了。过去这个经费都是由延安花的，养活的人很多。陕北地方穷，只能靠征粮，出产一些井盐卖出去。

丁东：听说还种鸦片？

李：是种过鸦片，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是李鼎铭[2]建议的，井岳

秀军阀统治时代，靠种鸦片维持。精减机构之后，抗大搬走了，女大取消了，马列学院也取消了，陕北公学早取消了，学校都精减下来了。机关像青委、妇委，原来好几十人的就都只剩下几个人了。

博古原来就认识我。一九三九年六中全会后，博古到过湖南邵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文件。会议之前，湖南省委叫省工作委员会，会议后就正式成立省委。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又兼青委书记，会议是我做事务主管的，我们在一起呆了十多天。在重庆开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博古向会议作过报告，并看过我写的工作汇报，对我有了解。青委精简，他就把我调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正式开办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是九月份被调去的，记得已经不能穿短袖衣，有点秋天的味道了。

博古是社长，他比我大十岁，一九〇七年生。当时另一负责人是从《救国时报》过来的。《救国时报》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一份中文报纸。总编是杨松，他大概是一九〇六年生的。现在人们不知道杨松这个人了，湖北人，从莫斯科回来的。杨松负责主编一版，兼管社论。副总编余光生，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一九二八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铁路、公路建设硕士，一九三二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来也到《救国时报》去了，三九年回国，解放后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丁关根作过他的秘书）。二版是国际版，主编曹若茗，广东人，年纪和博古、杨松差不多，曾经在《救国时报》工作过。以上这几个人都是国外回来的，三十几岁，算是报社年龄最大的，其余我们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国际版编辑我记得的有四个人：吴文涛，北大英语系毕业，到延安比较早，原来《解放》周刊的编辑，后来新华社开放对外广播，他就调到那里主持日常事务了，解放以后在外文局当过局长，听说被打过右派，比我大四、五岁，是个有思想的人，现在还写书。王揖，后来当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还有吴冷西和邓小平的弟弟邓垦。我是在三版——国内版当编辑，主编吴敏（后来用原名杨放之），当过国务院专家局局长。他原来在《新华日报》工作，那时从重庆《新华日报》调回延安的人很少，可能与他的人事关系处理得不好有关。编辑中老的有张映吾，四川人，四川大学毕业，现在有时候还会碰见他，一直编《世界知识》，是主编或是副主编。还有叶岚，这个人后来离开了边区，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下落了。再有就是余宗彦，浙江诸暨人，解放后在总工会当过宣传部长。他原来是《解放》的编辑，曾经在南京监狱当过管理人员，替我们党和坐牢的人通风报信。这是个好人，没有太高的学历，但是很有头脑，笔头子也好。国内版主要就我们这四个编辑。四版上半部是陕甘宁边区版，记得似乎是邓有惺负责，他的姐姐和姐夫就是办《新民晚报》的邓季惺、陈铭德。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来延安参观，离开时，他跟记者团中《新民晚报》的主笔赵超构到重庆去了。后来调来了赵守一，胡耀邦时代赵守一当过劳动部部长，耀邦在陕西工作挨整的时候，赵是他的副书记。现在在中央妇联工作的赵地，是他的女儿。赵守一是从西北局调到《解放日报》学习，为将来

回边区去办报纸的。下半部文艺副刊是丁玲负责，编辑有陈企霞、黎辛、周立波，立波调来的晚一些；丁玲离开后，由舒群负责。《解放日报》所有的编辑加起来就这么十来个人。资料室的人和记者比较多，现在记得的有后来从重庆来的田方、莫艾。田方建国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当过习仲勋的秘书，跟我观点一致，是反对建三峡的。莫艾报导吴满有出的名，毛找他谈过话，后来成为新华社的大记者。还有一个有名的记者，海燕，他是原来《新中华报》的，曾是《解放日报》采访边区最有名的记者。整风前夕，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挨整了，就跑掉了，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主要是政治生活不习惯。这个人出去后没有进国民党，在外面也还是同党有一定的联系。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时，他还到长沙来过一次，我们见过面，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报社驻在清凉山（有个小龙门石窑，变成排字房），办公室是三孔大石窑洞，南北向的，山梁底下，正面三个门，比较宽，中间窑洞有个过道与两侧的打通。资料室占了另外一个大窑洞。记者们占了半个窑洞，文艺、边区半个窑洞，国际、国内一个窑洞。一个窑洞里六张对面坐的桌子，坐十二个人。石窑洞地面铺的是石头，冬天从外面烧地炕。我们的住处在另一个山头的窑洞里。编辑部的三个大石窑洞旁边，靠山坡内通的两个土窑洞是博古的住宅。下山的山坡上盖了两个小房子，是博古的厨房，单独一个厨子给他做饭吃，那时候中央领导人吃小灶。

我在第三版国内版主要负责写“辟栏”文章，就是占住版面左边一个栏目，三千字左右，就算是长文章了。有件事值得一提，在《轻骑队》上我还就此写过一篇杂文，事关我刚才讲过的国内版主编吴敏。他对下属压得很紧，不发挥你的积极性，一切都得照他说的办。我是国内版四人中最后一个调进去的，去了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篇辟栏文，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吁》。那时候教授的生活非常困难，自己在街上摆摊卖东西。写好后，他不说用，也不说写得不好，反正就是压着不发，压了很久。我就越过他，把文章给了博古。博古一看，说：马上发。在国内版的四个人中间，我跟余宗彦意见相投，跟吴常常顶撞，对他不客气。另外两个人中，张映吾最顺从，叶岚模棱两可。后来，整风之前，博古把吴调到党校学习去了。他走了之后，余光生兼任国内版主编。

《解放日报》改版和它的历史作用

《解放日报》创办之前，延安是没有日报的，有过一个《今日新闻》，就是把收到的外电照录下来，给大家看看，连标题都没有。再有就是《解放》、《新中华报》，还有《军政月刊》、《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杂志，精简机构时都取消了。党的内部有电台，但是党的政策、方针对外的及时传播，对人民和全党的教育，党的政策、指示、领导精神的贯彻，确需要有一张自己的日报，有一

个自己的宣传阵地。所以在一九四一年的五月，党中央决定创办《解放日报》。恰在几天之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

《解放日报》的前身是《解放》和《新中华报》。《新中华报》是四开三日刊，《解放》是每周一期。机构精简时就把这两个报刊取消，变成一张《解放日报》。在制度的操作上是精简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解放日报》开初是对开两版，后来很快就扩成四版了。我的印象是，《解放》和《新中华报》的影响远不如后来的《解放日报》，因为《解放日报》还带着成立了新华社，新华社可以对外发电稿，收录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日本同盟社、德国海通社这些大国新闻机构的电讯。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可以每天发布自己的新闻了，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新华社还有口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范元甄的朋友徐瑞彰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个播音员，播音名叫麦风。共产党对外的宣传和对内的教育，办《解放日报》应当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有某种战略意义。通过这张报纸，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为，以及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解放区所从事的从军事到政权的建设，使得共产党成为同国民党平起平坐的政党。《解放日报》的地位和作用跟重庆的《新华日报》还有所不同，《解放日报》不但代表了共产党，还代表了中国的小半边天，这种局面和这种心态在过去是缺乏的。王明主持的统一战线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抗战初期是以国民党为主的。王明有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把共产党放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日报》开办的初期，也还是沿袭了王明的传统，以宣传他人为主。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闻，几乎全部是苏德战争消息；第二版国际版更不用说了，还是外国的事情，实际上是西方各个通讯社的传声筒，照登原电，第三版国内版以国民党区为主；维持中国城市报纸的传统，天天有社论。有一份资料叫《延安＜解放日报＞史》，那里面有一个详细的统计：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七个半月的时间，发表了二百一十七篇社论，而这之中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外关系、各国动态的加在一起，共一百三十九篇，占了64%；有关解放区以外国民党区的抗战形势的三十八篇，占17%；自己根据地的、解放区的三十六篇，占16%；属于共产党本身的社论，包括发刊词、党的活动，只有四篇，就那么一点点。

丁东：那时候的社论一般都是谁写呀？

李：主要的社论开始是杨松写，后来有个社论委员会，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也写，但是写的比较少。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边区版有一些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下半部是文艺副刊。版面的安排就是这样，从创刊到四一年年底，报纸就是这么个报纸。严格地讲，不是共产党自己的报纸，只是一张反映国际、国内动态的城市报纸，偶尔有点共产党的事情，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次要的地位。

当然，外面的消息需要反映进来，但是不能把自己放到如此次要的地

位，好像对国家和战争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同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的雄心壮志，培养共产党人的意气、志向，以及革命策略来讲都不协调，《解放日报》的改版势在必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直接促成了改版。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毛泽东为党校开学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解放日报》只在三版下角发了一个三栏的小消息；紧接着三月份，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解放日报》还是登在三版的角上，一个很小的标题，这个我印象很深。将毛泽东这么重要的两个将整风推向全党的报告登在三版，使得他非常生气，认为《解放日报》非立即改版不可了。

改版座谈会是三月三十一日开的，朱老总、贺龙、王震、罗迈（李维汉）等，大概有二、三十人参加，文艺界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萧军、舒群等人也都去了，《解放日报》去了六、七个人，我在其内，还有边区的人。座谈会上，贺老总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震也大讲批评的话，但还没有谈到王实味的问题。博古作了检讨。座谈会后期，康生作结论，提出了托派问题，弄得人们十分紧张。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反对平均主义，我曾经在文章里谈到过我那次对毛的不满。他是怎么讲的呢？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穿的是外面进来的机织布做的衣服，吊口袋，就是解放以后中山装那个式样的。一般干部穿的衣服是用边区的直纹土布做的，很粗糙，染的颜色也很差，口袋不是吊着的，就是一块布贴在上面。王实味在他的文章里面写了这种服装上的等级差别，丁玲的文章也批评了老同志搞特殊化。所以毛在讲话中一开口就这样说："我晚上看书是点两根洋蜡（延安一般干部是用灯芯点的小油灯），我就穿斜纹布，吊口袋。"两只大拇指往上一翘，那个神气，反正我受不了，心里想：你们这些人辛辛苦苦长征，年纪比我们大，吃过那么多苦，生活应当好点，谁也没有意见。我们办《轻骑队》，丁玲写《三八节有感》，绝对不是对那些生活小事有意见，谁也不是要同你们来平起平坐，主要就是不满意那个时候不民主的等级制度。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很自大，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隔阂。所以开完会我就跟胡乔木谈，对毛的讲话很有意见，你在这个地方讲这套话干嘛么，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同你们比这些东西，认为毛这样讲很幼稚，他把大家的意思搞错了。乔木当时听进去了，说以后同我谈。但是接下来因为各忙各的，他也没有找我再谈过。

改版之后，给人们的感觉是《解放日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康生传达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大标题登在头版头条；过去只能放在边区版的劳动模范事迹，放到头版头条了。富农吴满有，还有工人劳动模范赵占奎的事迹，文章都是在头版发的。这就是报纸以我为主，以解决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后来改称"解放区"）的问题为主，即以我共产党天下为主，其他都是次要的了。同时，这对干部作风的改变也起了"实事求是"的作用。通过报纸的宣传，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在《解放日报》写的文章

调到《解放日报》工作，特别是写文章，对于我可说是驾轻就熟。在高中，我在班上办过墙报，是主编；一二·九运动时，我负责办过两期《救中国》校刊；一九三六年暑假回到长沙，又和魏泽同几个人办《湘流》三日刊；抗战初期在山东、徐州，我编过救亡刊物；在中央青委时也写过几篇文章，刊在《中国青年》上。譬如前边提到的那篇受到王明称赞的《对待妇女应有正确态度》。因此进《解放日报》之前，我的文字能力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也有些办刊物、报纸的经验。

我一九四一年九月份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了一年半，四三年四月初被抓进保安处，四四年六月放出来回到报社，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离开延安。因此实际算起来，我在《解放日报》也就工作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四十篇。我写文章的特点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收集到的情况、资料，认为极有意义和有必要报导宣传的，题目由自己出，不等上级指示。这四十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反映国民党区的情况，主要是学校、青年、教育的情况，写国民党如何反动、迫害青年，揭它的短；一类写敌后区各种残酷的情况；一类是宣传解放区，这是主要的，宣传解放区本身的建设、军事、经济、政治形势。特别是到了四四年，偏重于军事，写过几篇很重要的战局分析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还没有失守以前，我就写了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谈到香港的地位和作用。王家坪总参的人还问过博古：你们从哪里找的一个军事评论员，写这么厉害的好文章？不夸口地说，那个时候我写的文章，每一篇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小则给读者提供情况和信息，大则甚至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都产生过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介绍劳动模范吴满有的那篇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推动了整个解放区开展生产运动。还有一篇《农民在解放中》，写整个解放区的阶级关系、阶级情况的变动，农民得到土地，地主阶层缩小了。

我刚从保安处放出来，就大写纪念抗战七周年的文章。报社决定系统地介绍各个解放区，我负责写晋察冀和山东（记得由丁玲写晋冀鲁豫，张映吾写晋西北，周立波写新四军）。晋察冀的那篇，题目是《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山东的题目《新山东的成长》，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发表的。写晋察冀边区时，我查看了很多有关的资料（当时资料室有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等），还访问过聂荣臻。那时候有个《晋察冀画报》，一打开封面，就是聂荣臻的大照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彭真的，大概因此在延安引起议论，对聂有些不好的影响。我到党校去采访彭真时，他的夫人出来说他有事情，不能见我。最近看到韦君宜的《思痛录》，才知道有原因。韦君宜夫妇是从绥德回来的，在绥德他们被抢救过，回到党校以后，彭真就把俩人安排住下来，他们就跟彭真讲：抢救也不能乱抢救嘛，彭真说：至少我们党校揭发中总还发现个别是对头的，比如有个李锐。原来党校搞抢救的时候，正在那里学习的我的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魏泽同咬了我，

魏在成都当过市委书记；当时四川的地下党被认为是“红旗党”，省委书记周凤平自杀了。彭真认为我是真有问题的人。我去采访彭真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从保安处放出来以后，他可能怕我对他有所质问，所以不想见我。写山东的文章时，我访问过朱瑞。朱瑞原来是山东的书记，刘少奇去后批评了他，让他作了检讨，由罗荣桓接替担任山东书记。朱瑞后来在辽沈战役中牺牲了，是炮兵司令。朱瑞这个人非常好，他跟我谈他在山东的缺点、他的检讨，还跟我谈到一个人，叫葉可泽，被当作托派分子杀掉了。山东杀托派杀得很多，他讲那个托派是不应当杀的。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徐州工作时，这个人在我领导下工作过，不是党员。从他那里我搞清楚了自己被抓进保安处，被抢救的问题之一，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托派咬我，说我也是托派。我们从这里谈起，不止一次地谈到新山东的成长，山东的胜利，山东的军事实力等。由此，我还写过两篇有关山东的社论《山东捷报》、《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

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为我出过一本书《窑洞杂述》，封面上的四个字是黎澍题的。这本书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汇总。全书二十二万字，除了一篇解放战争时期写的《热河土地关系概况》，及建国初期在湖南写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题目现在看来不恰当）、《蒋介石为什么参加抗战》、《记邯郸战役》三篇外，其余全部是在延安，又主要是为《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有纪实、通讯、报导、文学，还有社论等多种形式。可惜还没有收全，遗漏了几篇。大概只有发在《中国青年》上写妇女问题的那篇和一篇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后写湖南地形、物产概述的文章，署的是李锐，其余都是用的笔名。我在延安有六个笔名。

丁东：当时别人也用笔名吗？

李：丁玲、黄钢那些文艺界的人在延安是不用笔名的，许立群好像也不用笔名。我那时为什么要用笔名呢？一是为了保护家人，因为国民党有人在延安，怕传到后方，我的家人受影响。我的原名叫李厚生，李锐是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但是在湖南做地下工作时就开始用了。二是自己在《解放日报》工作，近水楼台，一个人发表那么多的东西不像话，所以就用了六个笔名。

收入《窑洞杂述》一书中其他几篇我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是：《晋察冀边区的政治攻势》、《晋察冀的民兵》、《加强对伪军的工作》、《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攻势》、《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解放区的水利事业》、《迎接新局面》等。发表《水利事业》这篇社论时，第二版整版是我收集的有关统计资料，还有一篇《防旱与水利》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毛泽东写七大报告都有过影响。《迎接新局面》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召开前写的，那时《解放日报》重要社论的标题字号大，一般社论的标题字号小，而《迎接新局面》的标题用的是特大号字，《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也是。《迎接新局面》中有这样的

话："目前，解放区战场的整个形势有什么新的特点或重要标志呢？首先，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我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下，敌人终于敌不过我军民长期的围困、破坏和不断的攻击，而开始被迫自许多中小城市撤退了。对较为次要的交通线如白晋铁路，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治安状况极为不良'，而忍痛拆除了沁县至长治一段。……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点，即各大战略解放区内都被分割的局面在逐渐改变。……开辟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地区。"

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特别是一些统计资料，像《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完全是我自己收集的资料。另外还有一篇，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这篇社论很长，是我写的初稿，经陆定一修改完成的。因为他增加了不少内容，我不便收入自己的书中，但是现在的《陆定一文集》也没有收入此文，十分可惜。这篇社论论述了整个形势，在当时是很厉害的。我记得最前面的一段话是陆定一改的，我给你们唸一下："三年半前被蒋介石以所谓破坏军力、军气、民意宣布为叛军的新四军，不仅一直坚持着华中的抗战，而且最近半年来屡次出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新四军的节节胜利，对于半年来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口口声声强调的失败主义，有利于日寇不利于我方的军力、军纪，这是一个严重的揭露，适时的讽刺，对中国人民提高胜利的信心，对盟国击败日寇的战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即日本的侵略者和中国的蒋介石。日本人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而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的命运》（他发的小册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血洗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干出自动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侵略者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十年来没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这手做得好。"我记得这段是陆定一改的，我没有这么大的气魄。

我在《解放日报》还写了三篇辛亥革命重要人士访问记。一是张曙时，辛亥革命江苏的有名人士，博古熟悉他，当时正好在延安，博古就让我去访问他。二是林老林伯渠，是我自己想访问的。三是李六如，这篇没有收入《窑洞杂述》。还有两篇，编书时觉得味道不大，也没有收入，现在想想，还是应该留存一套完整的资料为好。我在《解放日报》上没有写过什么杂文，杂文都是贴在《轻骑队》墙报上的，有些很有影响。如萧平（当时是《中国青年》编辑）一篇批评延安不民主的生活，我有一篇是批评萧三的。萧三见过列宁，回到延安后，言必称苏联，谈高尔基。他的诗人名气很大，常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可我们看不起他的诗。题目我还记得，是《想当年》。许立群写了一篇批评萧军的。那期《轻骑队》影响很大。我在路上碰到李富春，他说："李锐呀，你好尖锐呀，批评萧三啊！"那个时候《轻骑队》墙报有一条：必须署真名，不准用笔名，我都是用真名写的。

这些文章总起来讲，我当时注重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空话、套话；现在再来看，也只有个别的文字需要修改。我觉得自己当年在《解放日报》写的文章确实是可以传下去的。这四十几篇文章可以说明我这一生在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阶段表现是不错的，在报社起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正因为如此，日本投降以后，党中央最早决定将中央机关搬到冀热辽，联系东北与华北，李富春去打前站，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去了以后首先就要办报纸，富春向博古要人，报社那么大，那么多人，博古点了我，让我去。

丁东：是博古推荐，还是李富春点名要你去？

李：我估计是博古和陆定一推荐的，因为我从保安处出来以后，博古找我谈了一次，讲了对我的基本看法，向我表示，他们当时是不赞成把我抓走的，但是没有可能顶住。

在延安结识的朋友

我同胡乔木的关系就不用说了。我和韦君宜是在延安青委时共事的，关系一直很好，她去世前，我去医院看望，已经不能说话了。许立群原负责编《中国青年》，机关精简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抢救运动”时，被邓力群抢救过，解放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晚年有神经错乱症，他一直被邓力群利用，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在中央青委宣传科负责时，科内的三个人：杨永直、陈适五、童大林，杨后来也调到《解放日报》当编辑，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受过迫害，已去世。陈是陈启霞的弟弟，英文好，调到新华社当翻译，解放后任新华总社副社长，已去世。童大林当时管《轻骑队》，思想很解放，后来在宣传部工作。

我到了《解放日报》后，同田家英的交往比较多了起来，由于负责“辟栏”文章，管评论、管国内，田家英写了文章就交我。这时也结识了丁玲（后来还有陈明，我们现在还有往来），她同我详谈过被捕的情况，和到延安的经过，在南京金陵大学教书的方令儒帮过忙。丁玲比较听毛泽东的话，当然有独立思考的一面，但是也被打成了右派，还是很大的右派。丁玲最后平反作结论时，有很大的阻力。关于为丁玲彻底平反，张凤珠写过一篇详细的文章《为丁玲“洗冤”》（刊《大哉李锐》一书）。我那时在中组部工作，习仲勋、宋任穷、胡耀邦，我们几个人商谈，都认为应彻底平反，不留任何尾巴。所以丁玲去世以前对陈明讲：“我可以成佛了。”她去世前我到医院去看望过她。

刘祖春也是在《解放日报》认识的，文革期间，陶铸当中宣部长，他当副部长，后来调到北京市当宣传部长、副书记，已经去世了。刘祖春是北大的，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与沈从文同乡——湖南凤凰人，跟沈关系很好。他在北大时就写小说，后来湖南将他抗战前写的小说编了一个集子，出版之后，送了一本给我。还有余宗彦（他的爱人就是陈四益的姑

姑），同我思想一致，是好朋友。一九四二年整风前，杨松去世（登在一版社论地位的《杨松同志传略》是我写的）。陆定一到《解放日报》当总编辑，我们的关系十分深，到了晚年见面，可说无话不谈。二〇〇六年《炎黄春秋》上，曾发表我的一篇《陆定一党是国是访谈录》长文。他是赞成多党制的，反对一党专政，从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些都是我在《解放日报》结识的朋友，这些朋友应该说都还是比较有头脑的。

我在延安还有一个朋友：黄钢，湖北人，是写报告文学出名的。他也被关过保安处、被抢救过，后来跟我一起到热河报社当副总编，他的家庭成员中很多人都是党员。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北京后，黄钢还同他爱人一起，积极给我介绍老伴。

我在保安处蹲监狱的那一年多，也结识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周建南，我们俩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现在住在我楼上的金树望两口子也是保安处的朋友，金老后来跟我一起编组织史资料，他是二九年的党员，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监狱里还有一个朋友，很早就去世了，是作家魏伯，他跟胡采很熟（胡采后来是陕西省文联主任）。胡采在国民党庐山训练团呆过，那时凡是从国民党嫡系出来跑到延安的人都抓，他是由于同胡采的关系被抓的。在保安处这类人是上铐的。魏伯就是戴了脚镣、手铐的。我没有戴过脚镣，只戴过手铐。

我同这些延安时期结交的朋友保持了一生的友谊，我觉得很不容易。

延安的物质生活

我和范元甄刚到延安没有分配单位前，住的是招待所。那是一个很大的窑洞，我们俩睡在窑洞最里面的一张床上，外面还住着另一个人。

离开湖南时，我的大姐为我做了床很好的大被子，我带着去了延安。同车的胡乔木对我们很照顾，经过西安的时候，从八路军办事处那里为我要了一件棉大衣，所以在延安的冬天里，我还有一件棉大衣穿。记得我还有套西装。因此刚到延安时，衣服、鞋都没有问题。

饭是小米，非常粗糙，不是我们现在买的这种小米。菜呢？一年四季主要就是吃豆角，豆角都变黑了，还有土豆，基本上就是这两样东西煮成汤，上面漂着一点油。有时一个礼拜吃到一次馒头，一、两次肉。延安盐是足够的，因为边区产井盐，这就比江西苏区时代要好得多，那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盐吃。开饭的时候，有“小鬼”，就是农村出来的十来岁的孩子给我们打饭，盛饭的钵子是用四方形的装煤油——那时叫洋油的那种白铁桶割成两半做的，一头盛小米，一头盛菜汤。

一年发一套单衣，没有衬衣衬裤，光一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裤；没有鞋，自己的鞋穿破了，就打草鞋。牙膏更没有了，可以买到牙

粉。那些老延安穿什么呢？中央青委原住的地方对面就是女大，记得到延安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女大合唱团表演《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指挥，他就穿一件光板的羊皮大衣，那算是比较好的。延安的老红军们都经历过极其艰苦生活的锻炼，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然没有经历过那种锻炼。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虽然比较困难，但还是丰衣足食，吃白米饭长大的。延安没有洗澡设备，洗澡很难。范元甄对这种生活很不习惯，第一次吵架，就是因为我对她的娇气很生气。我们到延安第一要过的就是生活关，要习惯延安的衣食住行。确实有些青年人吃不了苦跑掉了，范元甄的一个中学同学朋友就是这样离开的。当然她还是坚持下来了。范元甄在《新华日报》工作时，周恩来、邓颖超都很关心她。我们离开重庆时，周恩来不在，回来后听说我们去延安了，很有意见。后来，周恩来给她写过信，邓颖超也问要什么东西，我们就要了一个搪瓷缸子。为什么呢？因为搪瓷缸子既可以喝水、漱口，冬天还可以热菜、热饭，我们就要了这个东西，邓颖超托回延安的人带给了我们。解放以后，范元甄还用万全的笔名，以这个搪瓷茶缸为题写了一篇散文《搪瓷茶缸》，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被收入到《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中。那个搪瓷缸子在延安确实是件很实用、很珍贵的东西。

那时延安当地就产小米、土豆，产量也低，外面进来的东西很少，经济十分落后，一下子涌进了好几万人，物资更加匮乏。当时，我们一个月发一块钱津贴。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我们过去都没怎么劳动过，这倒是个锻炼。开荒整天都在山上，那个山头是乱挖的，不像南方修梯田。小米种子撒开，一亩地十几斤种子，只能收四五十斤，产量很低，完全靠天吃饭。纸张也非常缺。《解放日报》用的是马兰草纸——一种当地产的、用马兰草做的纸，黄颜色，字印不太清楚。完全没有稿纸，一个月发一点油光纸。信封是自己用马兰草纸糊的，收到信后，我们一定把信封拆开，翻个面糊起来，再用一次。钢笔、墨水、铅笔也很少。那时延安内部通讯有自己的交换站，对外就是国民党的邮政局。

在延安住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点碳火，延安有木炭、有煤，这个不成问题。我到现在的生活习惯受延安的影响很大，比如对生活用品包括纸张的使用都非常节约。用水也是如此，洗脸、洗澡水都存起来，冲涮马桶。抢救运动中我被抓进保安处，一年零两个月的监牢生活，更是经历了生活锻炼。延安那时的监狱也是窑洞，铺着草睡在地上，被子是自己带的，其它一切都是公家的。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全穿上黑衣服，还剃成光头。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洗大衣。在牢里关着，没事干，穿的大衣很脏了，一天下大雨，窑洞前坑坑洼洼，积水很多，我就用杯子把水舀到脸盆里（自己的脸盆，延安那时盛菜、洗脸、洗衣服，都是用的黑瓦盆），把大衣面子拆掉，洗干净，晾干后又缝上。延安六年，监狱生活一年多，养成了比较节约的习惯。

延安的夫妻生活

在延安拥有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呢？记得是一九四〇年的上半年，范元甄怀孕，后来早产了。接生的护士来晚了，婴儿被胞衣闷死，我和杨永直一起把小孩用布包起来，到窑洞山上挖了个坑，埋了起来。延安是不赞成生育的，确实养不起孩子，而且被拖累得很厉害。高层的人有服务员给带，高级干部的孩子大了可以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生的孩子很难进保育院了。我们这些吃大灶的人，本身生活就比较艰苦，有了孩子就更困难，所以一般都不想要孩子。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那时延安有个中央医院，在陕北公学与中央保育院之间的李家瓜村旁一个山沟口，离我们工作地方有十多里，柳树店还有一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更在三十里外，条件很简陋，有个苏联医生。反正在延安生孩子、养孩子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记得我们在清凉山上也有少数几个人带孩子，很艰难。范元甄后来又打过两次胎，影响了她的工作、身体、生活等等，使我觉得很对不起她，在我们夫妻生活中，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总觉得有点亏心吧，所以凡事总是迁就她，自己一直处在一个“有愧”的地位。

延安时期，我和范元甄两个人一直不在一起工作，过的是礼拜六的生活。礼拜六晚上一方回来，礼拜天晚上或礼拜一一大早再离开。范元甄开始在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成立了党中央政治研究室，她就调到了那里。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任弼时，副主任是陈伯达。邓力群、廖盖隆、田家英、周太和、成全、王里夫妇，我家楼上的刘明夫两口子等，也都在那里工作。研究室有国内、国际两个组，范元甄是国际组的。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思想上就有过交锋。整风开始后，研究室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整天学习，开批判会，专门搞整风。《解放日报》不像他们和别的机关，可以什么事都不干，整天整风、开会，我们要照常天天出报，工作很忙。整风的时候俩人不在一起，范元甄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她的观点左一些，开始整风后，我们有短信往来，这在她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我被抓到保安处后，检查的人把信一本本地订起来，她的信写得比我多，我的信比较短。现在回想起来，生活中的分歧，除衣食住行、怀孕引发的矛盾外，主要是延安整风以后思想上的分歧。不过那时俩人的关系还不能算坏。我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写了一幅字，就是鲁迅的那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记得范元甄还挂在她住的窑洞的墙上（我和范元甄延安时的通信，大女儿南央都收进《父母昨日书》中）。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从保安处放出来，出来之前博古对范元甄讲：你和邓力群之间发生的事情，绝不能跟李锐说，这件事党有责任，把李锐抓了起来，搞得两口子分开了，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李锐受了冤枉，刚刚出来，不能再出问题。我记得我出来后的第一个礼拜六，范元甄没有回来，让我到她那里去。那天晚上没有睡觉，范元甄对我谈了她和邓力群的关系，说他们两个人感情如何好。我马上起身说：那好，我同意你们，我们两个分手。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记得回来后，还给李富春写过一封信，

告诉组织上，我同意与范元甄离婚，请党不要干涉。李富春还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分手了。

那时正是“七七”事变七周年。为了纪念抗战七周年，我赶写了几篇大块文章，工作非常紧张，也非常累，加上范元甄的事情——俩人如此离了婚，心情当然不好。突然发高烧，四十度以上，被送到中央医院。诊断说属于伤寒类的病，四十天没有退烧，确实非常危险。住院期间，医生不允许探视，范元甄去过一次，医生不准她进去，她探头看了一眼。后来是用输血的方法退的烧，《解放日报》好几个同志为我输了血，记得有丁济昌（后来是《人民日报》副社长），还有范元甄的朋友夏英喆（高扬文原来的夫人，后来担任过北京市统战部副部长）。这是我在延安一次最大的生命危险。

后来我跟范元甄复婚，主要是夏英喆起的作用，她一直跟范元甄住在一个窑洞，她劝我与范元甄和好。范元甄自己说，蔡畅也作了她很多工作。一九四五年的下半年，经过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个月的批判大会，范元甄和邓力群的问题做了组织结论，范元甄将杨尚昆做的那个结论，用工整的毛笔字抄了一份给我，表示她对这件事情彻底地认识了，接受党的决定。那个决定只是附带地批评了她几句，主要是批判邓力群，讲得很厉害。我们俩人复婚后，博古就把她调到了《解放日报》，这样我们两个人才生活、工作在一起。对于这次复婚，黄乃和刘祖春都是不同意的。

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无论对自己能力的培养，文字的也好，尽职尽责也好，还是生活经验、为人处世，都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特别是保安处的那一年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没有那一段经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在秦城监狱呆的那个八年，不会那样理智、头脑健全地熬过来。

整风和抢救运动

整风运动的由来

整风运动是怎么来的呢？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因为要准备开七大了，陆陆续续从各根据地、解放区、白区回到延安很多人，这样就从上层开始整风，实际是要清算王明的问题，为七大的人事安排作准备。从上半年到十月份为止，主要在中央一层，参加的人数很少。由于进行整风运动，七大的会期就一直拖后。

那时，在我们这些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毛泽东很好，顶呱呱。到延安之前我们都读过他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到延安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等，因此对他是十分崇拜的。他对整个抗日战争前途的分析，对过去共产党内、特别是军事方面作的总结，还有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对国民党的意见和中国的前途，等等，都是站得住的。除开毛泽东以外，在中央领导中，一般人对王明也还是有好感的。王明这个人是有些庸俗作风，我听说过开六中全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照片放大了很多，给那些头头脑脑送去，有些老红军也搞不清楚，收到照片还很高兴。他口才好，做报告不唸稿子，很容易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接受。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时，我听过他做形势的长报告（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王明当女大校长，讲马列主义，听的人很多，没有座位，都是站着听。我去听过一次，那是四〇年的事情。不过我更喜欢听的还是陈云的课，他在马列学院讲党的建设。王明的威信高，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那个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在延安印的，散发很广，很有影响。王明认为那是他的经典著作，反对立三路线，是对党的贡献。所以那时我们对王明虽然有一点点问号，但总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坏印象。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他的历史情况不清楚；对遵义会议的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错误，包括博古、洛甫，还有凯丰的问题，只知道他们那些人是从苏联回来的，觉得洛甫书生气多了一点，思想上并没有很大的障碍。到四〇年为止，毛泽东的威信虽然很高，王明的也不低。

书记处在整风之前就是毛泽东、王明、洛甫（张闻天）、康生、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朱老总是挂在后面的，大概主要的就是这几个人，从苏联回来的人占优势，周恩来过去是跟着他们的。李维汉（罗迈）那时是直接执行王明路线的，虽然已经不吃香了，但是还管边区，掌握着实权，后来才到中央研究院去了。毛泽东周围真正拥护他的有些什么人呢？只有次等人物胡乔木、张如心、陈伯达这样一批人。党的高层人物中，刘少奇在白区，朱老总刚回延安，他过去同毛有过斗争，也有矛盾，毛对他也不大看得起。王稼祥在，他对毛比较好一些。

丁东：任弼时在不在？

李：任弼时在，不过他过去也不同意毛打AB团，同王明他们那一伙有区别。因此，毛的威望虽然很高，但是在组织上、实权上，他并没有完全真正掌握，需要通过整风清理上层的问题，尤其是王明和周恩来的问题，从而树立自己在党内一贯是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使自己和周围拥护自己的人真正掌握起中央的领导权力。所以开始就是搞上层，我们这些中下层的人是谈不上的，没有我们什么事。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一样，就是号召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当时提出的整风，是所谓的整顿三风：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前两条主义是对着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的，对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反对党八股还沾得上边。

为了整王明（和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正确路线和领袖地位，毛泽东早就让胡乔木编

辑《六大以来》的文件，其中主要是左倾路线错误的文件，毛的正确路线的文章，还编有一本《六大以来文件选编》（范元甄当过校对），供高层领导阅读。

前几年我知道一件事，整风之前，毛泽东让邱会作到新四军交给刘少奇一封信，要刘回延安帮助他整王明和周恩来的问题，信让邱背下来，然后当面烧掉。刘是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回延安的。刘少奇有一篇批判党的左倾路线的长文，在他回延安之前，就由毛交《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关于上层整风，我还知道一件事。当时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他的秘书郇肇基是山东人，同金明在山东同坐过牢。日本投降后，他们俩人见面了，郇告诉金：他是康生派去监视博古的动静的。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时，金明是省委副书记，这是金特意告诉我的。

批判教条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博古，还有洛甫。洛甫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批判他讲课的一套办法是照搬马列，教条的东西为多，对书本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博古也是，讲话、写文章总是从马克思、列宁的书里引经据典。那个时候洛甫在党内的地位比较高，比如，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刚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提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后来全文刊登在当时名《中国文化》的刊物上，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出书时才改成《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个会上，洛甫也作了报告，他特别强调的是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其它的都谈不上。他的报告也登在《中国文化》上。

上层整风，在清算、批判王明历史上的错误路线时，王明不服气，反戈一击，提出他在国外的表现不错，并强调他写的《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的提出，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至于苏区的工作没做好，与他无关，那是博古、洛甫、米夫他们的责任。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这一段的路线错误问题，王明认为，四中全会博古、洛甫是非法的，他们当时并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领导人，他还嘱咐过他们：将来进到中央苏区以后，你们不能够独霸天下……如何如何。这样一来就搞得非常复杂，毛泽东和任弼时找王明谈过很厉害的话以后，王就病倒了，那是十月份，大概是真病了。王于是表态：从此以后服从毛泽东。这就没办法继续批斗了，只好把上层的清算历史问题停下来，将整风推向下层，搞全党整风。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随后在三月，又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那个报告我是亲耳听了的，讲得很厉害，把教条主义者形容得比杀猪的都不如，说猪会叫、还跑，但是他还可以把猪杀掉，教条主义者赶不上杀猪人；说读书是个很容易的事情，杀猪是个很难的事，讲得非常挖苦。当年是公开发表的，后来出《毛泽东选集》时，把这些话都删掉了。这样，两个报告发表之后，正式转为全党整风。

全党整风

全党整风在延安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层：高层中央、中层中级干部、基层一般干部，特别是老红军里面文化低的人。那时延安有两个人最被毛泽东欣赏，一个彭真，一个高岗，这两个人在抢救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厉害。彭真是一九四一年从北方局回到延安的，除了担任实际负责的党校副校长，还接替陈云兼组织部长，红极一时。可能是由于对整风不太积极，陈云的组织部长那时被撤了（调西北财经管委会任贺龙的副职）。党校共约两千多人，这时变为五部。一部：省军级干部，有一、二百人吧，都集中到党校住起来；二部：边区干部；三部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界的人；还有四部、五部，是些文化程度更低一点的，主要是集中学习，便于整风。

整风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总学委：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个人，毛泽东担任正职，康生副职，下分五个学委：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李富春和康生负责，学校系统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军委系统由王稼祥和陈云负责。一直到抢救运动，都如此。现在很多人的文章把康生和毛分开，就像把文革中的四人帮同毛分开一样，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康生既是给毛出主意的人，也是毛的想法的直接执行者。康生的资格并不太老，是上海大学的，四中全会后的第二年进入中央，比王明稍晚些去了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王明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他是副团长。康生在莫斯科捧王明捧得很厉害，在共产国际把很多老党员当托派杀掉。但是回国后发现王明不行了，就很快彻底地倒向毛一边，狠批王明，得到了毛的信任。毛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都是他的一把刀子。

全党整风开始批判教条主义就很过分，《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很有代表性，即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胡乔木写的《教条与裤子》。我记得发表这篇社论的当天，博古的神色有点紧张，觉得这篇社论是公开对着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犯有左倾路线错误的人讲的，特别针对的是王明和他。社论中有这样的话："教条主义一种是不按条件照搬，把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作风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运用，另外一种把特殊条件不适用的、一般条件的东西搬到特殊条件下来适用，城市革命搬到中国来。……他们安于做留声机，他们正是害怕改造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害怕承认自己的病症的缘故。要学游泳，大家要学游泳，但是他们不肯下水，不肯到水里面去，不到水里面去不能游泳呀。问题就是他们不肯脱掉裤子。裤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文章写得真是挖苦，乔木大概是根据毛跟他的谈话写的，写好后交毛改的。那时由毛授意，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很多，这篇文章大概是毛最得意的。文章还说："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一定要割下来，大叫一通尾巴，就讲尾巴了，完事。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因为里面藏了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而且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总之未必是很舒

服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难道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吗？他们现在真的是已经觉悟，已经转变，查有实据了吗？延安有许多机关不能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作风，已经开始消灭了吗？延安的党内与党外的关系，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各种干部、各种部门之间的关系，个人对组织、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的关系，这些关系里的缺点，已经开始认真纠正了吗？延安的文艺界、科学界、医药界历来存在不少不应有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难道说是正确地解决了吗？党八股式的文章难道已经绝迹，充实生动的作品难道已经取而代之了吗？如果这些问题不曾实际解决或者说解决，那么毛泽东同志再报告他十天十夜，《解放日报》再继续写它一百篇社论，各个支部小组再开它一千次会来传达讨论，这不都是白费？还不都成了教条？有些好心的同志裤子是要脱，但是正在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动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但是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判者吗？共产党之所以区别于其它非群众性的党派，所以得到胜利的发展，难道不是群众的监督和审查的结果吗？”

这篇文章当时的影响之大啊！它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公开挑明了上层整风的重点就是王明、张闻天和博古等这些人，并且普遍性地扩展到各个机关的领导和它们的工作人员。那时延安有一个翻译集团，翻译马恩、列宁、斯大林全集，就是解放以后中央编译局的班底，主要是俄文，还有英文。延安还有个外国语学校。反教条主义时，把几个有名的翻译家都说成是洋教条的祖宗，像柯柏年、王思华这些人，王实味也属于翻译家。所有这些中性的人、中性的工作都被轻视，直到解放以后，翻译工作才比较正常。

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没有入党的，还不是“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在中下层起初是以学习为主，学习的任务是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的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认为《联共党史》是百科全书。大家从过去讨论一些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即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有一篇文章叫做作《反对自由主义》，那篇文章是源于张国焘的问题。因为斗争张国焘的时候，很多和他有老关系的人不肯出来反对，清算王明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就给这些人安了个名字叫做自由主义。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是针对各单位领导提意见。由于各单位的工作性质不同，也不是一律都搞得那么厉害。我所在的《解放日报》跟中央研究院、党校情况就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整天要出报纸，工作很紧张，没有时间多开会，给领导提意见。中央研究院那边的领导里面，洛甫下乡到晋西北搞调查去了，由李维汉主要负责。大家对范文澜没有意见，李维汉的作风有些霸道，意见就很多，也给陈伯达提意见。然后就在十一月底出了大墙报，王实味在上面发表了三篇文章，影响很大，研究院95%的人拥护王实味，提出整风的领导机构要由群众大会选举，不能由上面来指派。闹得很厉害。萧军不是党员，也顶得特别厉害。那个时候延安90%

以上都是新党员，青年知识分子占大多数，都不大知道天高地厚。

《轻骑队》这个墙报，应该说不完全是自发的，还是有所控制、有所领导的，胡乔木的《白求恩》一文就是在《轻骑队》上登出来的。那个墙报办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沟，中央机关在杨家岭，边区政府在城南，离那里都较远，可是人们都来看墙报。有一天晚上，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提着马灯去看那期《轻骑队》，也没说有什么不好。所以，四一年底，还没有人把王实味当作一个敌对问题提出来。到了第二年——四二年三月底《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时，也只认为是个思想问题。但是高层中的一些人，特别是从前线回来的老同志，像贺龙、王震这些人，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反感得很。于是改版座谈会后就开始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平均主义，批判人性论，批得很厉害。

丁东：彭德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这个时候吗？

李：毛在庐山会议上还批过彭德怀：你搞自由、平等、博爱。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彭德怀在太行根据地给营、县级以上干部做了一次报告，就如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谈了七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谈到在敌后推行“三三制”政权（即成员中中共党员、进步群众、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当年党中央的决定）必须贯彻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彭德怀谈民主教育”的专访长文。看到这篇长文后，六月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批评，彭没有回信。延安《解放日报》六月十四日纪念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中，出现了一大段这样的话：“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主要的应是为着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为着反封建。”“你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我在《庐山会议实录》内，关于此事记录了毛泽东对彭的批评。

整风运动转入抢救运动

这种批评性的提意见的整风运动持续到四二年年底，十二月份召开了边区高干会，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问题，清算陕北的错误路线，就是郭洪涛和朱理治整刘志丹和高岗的历史事件。高干会一直开到四三年一月，康生在会上提出了肃反问题，作了个报告。当年的整风文件中，有《联共党史》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这就是“抢救运动”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报告，首次公开讲到了有内奸，讲到特务之多不足为怪，还谈了一条心、半条心、两条心的问题：半条心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没有入党；两条心是一定要解决的，要把坏人清除出去。说现在至少发现了两个人：吴奚如，王实味，他们就是敌对阶级派进来的。毛问：延安还有没有第三个王实味、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吴奚如？他还做了一个百分比的分析：在边区的党员

里面，40%是好的，50%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10%是坏蛋。他以这种比例来分析人事，历来如此。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成立了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任委员，刘少奇任主任。整风运动由此开始转向，逐渐演变成审干、抢救运动了。李富春有个讲话：我们要清洗内奸、清洗坏分子，把国民党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务分子清洗出来；清洗出来以后重新说服他们，教育他们，争取他们。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抢救方针。

当时轰动延安的王实味问题，是怎么回事呢？王实味四一年向中央组织部写过报告，谈他在上海时同托派的关系，没有隐瞒。上海托派确实是有过一个中央，人不多，工人里面也有一些，上层就是王凡西、刘仁静、王独清他们，王独清是原来创作室的。后来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和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离开了，郑超麟等人继续搞了下去。王实味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在北大时和王凡西同学，都是三〇、三一年的党员，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很好，自己也比较赞同托派的观点。中央研究院大斗王实味，把他的朋友潘方、宗铮夫妇（潘大概是美国回来的），王里、成全夫妇搞了出来。一九四二年中央机关精简时，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副主任陈伯达。一批文化高的知识分子都被调入，如许立群、周太和、邓力群等，王、成也在内。王里就是王汝琪，成全就是陈传纲，后来当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陈四益写过一篇关于陈的文章《传纲之死》，收在《臆说前辈》一书中）。他们都是三八年的党员，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康生很鬼，搞了阴谋手段。开始是斗王实味，拉潘方和他的夫人宗铮，不斗他们俩，让他们来揭发王实味，说在王实味的问题上，你们还是好的。使用这个手法。中央研究院的人不是向陈伯达提意见吗？就发动王里、成全给陈伯达提意见，我的前妻范元甄那时给我讲过这个情况。中央研究院为陈伯达开过五、六次会，这个人的作风不好，有很多弱点，大家讨厌他，意见很多，批得很厉害，范元甄也提了意见，王里、成全当然更厉害，把陈伯达贬得很低，后来就提出让陈伯达离开政治研究室。康生对陈说："你别管，你让他们去提。"提到最后，让这些人都暴露后，康生就说：好，你们同王实味是一伙。康生就搞这种阴谋。这样，这五个人就变成个反党集团，成了个很大的案子。我在组织部任职时看到过有关材料，这些确实同康生有关。这个案子到了八四年才作结论。当时王里的问题之一是她的堂兄王昆仑，那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所以康生说她是被王昆仑派进来的特务。王昆仑一九八五年去世时公布了他的真实身份，一九三三年就是中共秘密党员了。这是多荒唐的事情！一九九〇年九、十月间，我与王汝琪同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病房看她，她告诉我，从悼词中才知道堂兄是老党员，可他们的案子一九八二年才平反。王于十月五日去世。王实味后来坦白的真情是：他翻译过《托洛斯基传》中的两章，还翻译过《列宁遗嘱》；在延安，在朋友、同事们中间，他都谈过斯大林脾气不好，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这几个与列宁同一代的人，对

斯大林很不满意。这些话那个时候都被认为是托派言论。托派这个问题，当年完全接受了苏联的提法和政策，而且认为托派和汉奸是一回事。鲁迅不是有篇谈托洛茨斯的文章吗，鲁迅那时也是上了当的。那个时候托派是最坏的，前面讲过，山东就有过杀“托派”的“湖西事件”，一九三八年同我一起在徐州工作的王文彬被打成“托派”头目。如果我留在山东，也一定被杀掉了。这个所谓中国的托派问题，安子文跟我谈过，根本没有什么名堂。中国托派创建人刘仁静（按：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青的一个，当时仅十九岁）跟他谈过，数量上顶多也就是百多人，有一些上海工人，上层没有几个人，都是反斯大林的，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一九五二、五三年，把郑超麟那些托派全部抓了起来，也就是几十个人。西安事变帮助张学良的黎天才等人，都被当托派关起来，一直关死。

抢救运动开始的著名案件

张克勤事件推动了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父母是甘肃党的老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大概变节了。甘肃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负责，半公开。领导过甘肃党的人有杨静仁（回族），还有湖南的张杰，当过书记。一九三八年张克勤作为年青人被派到延安西北公学受训，这是社会部训练情报工作人员的机构。写小说的柯蓝也在西北公学呆过。碰巧延安发现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刊物上公布了一个名单，其中也有一个叫张克勤的，这时又有人坦白揭发他一些什么，让康生发现了，就逼供、刑审。当时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后来写的回忆录《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中，记述了对张克勤的审问。审问的第一天，一个蜡烛点完了，毫无结果。汪东兴认为，按他在根据地保卫工作的经验，应该继续搞下去。第二天就又接着审，追问他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的父亲同国民党的关系。张克勤仍然比较镇静，但也渐渐有些应付不了了。几个审讯人员就分成两班，吴德和汪东兴一班，李逸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班，不让张克勤睡觉，他们轮流审讯，轮流休息。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时候，蜡烛用完了，张克勤还是没有交待，他们就给李克农打电话，说最好休息一下，再继续审。李克农说：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你们怎么能休息呢？洋蜡没了，我叫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洋蜡去。就这样接着审下去，到了凌晨五点，张克勤逼得编出坦白交待他的父亲是中医，给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看病，经这个大官的介绍不但参加了国民党，还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自己也加入了特务组织，说他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收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承认甘肃地下党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一下交待出十几个人，交待完，哭了一场。张克勤那时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娃娃。康生知道了欣喜若狂，就照他的口供搞出个甘肃红旗党来，还跑到西北公学做了个报告，教训说：你们说延安不会有特务，麻木不仁，张克勤证明了确实有特务。还说，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有了。还说：有的人认为运动应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还要继续深入下去，没有审查的干部都要审查，人人要接受审

查，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报告后来印成文件发到各个单位，发到各个根据地，把张克勤当成一个典型，给他戴红花，骑大马，让他到处去作报告。他就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又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说自己如何上当受骗，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愿意重新做人。后来让他到绥德师范去讲，结果那个学校二百多十三、四岁的娃娃学生都上台乱坦白，什么乱七八遭的事情都有，说自己是特务，80%的学生都成了特务。七月份的《延河日报》登了这事，大概延安县里面也开坦白大会，边区的农民党员只有两千多人，一个县一坦白就是一、两千人。《解放日报》的情况我不清楚，据说人人都挨斗，一斗就坦白，机关里搞出百分之八、九十的特务。杨家岭开斗争、坦白大会，把柯庆施斗了，柯庆施那时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斗了他一个通宵没结果，又把他放了，可是他的老婆被逼得自杀了。后来很多人就学张克勤的样子，一开会就坦白，坦白了就能吃一顿好饭，庸俗到那个程度。曾任甘肃党的书记的孙作宾大概是一九三九调到延安的，被作为甘肃红旗党抓起来，一九四三年后在保安处，我曾和他关在一个窑洞。他最近出了一本《孙作宾传记》，送了我一本。

中央党校则出了个吴奚如问题。吴奚如是一九二四、二五年时期的中共党员，很老的同志，担任过黄埔军校一个特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吴奚如能写小说、写文章，参加过左联的初期活动，后来一直在潘汉年的系统里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这种党在国民党里的工作，是由周恩来单线指挥的。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吴奚如是新四军的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事变之后，历尽艰难，千辛万苦地跑了出来。有很多人都是那样，项英也是乱时跑出来的，那完全可能，单个的都跑出来了。吴奚如跑到离重庆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的时候，已经很狼狈了，恰巧碰到了黄埔时期的一个同事或者一个学生，那个人当时是国民党的少将，思想可能比较中立，而且对国民党刚刚发动的皖南事变并不满意，就请吴吃饭，还给了些钱。这种事在旧社会合乎常情，人性都是念旧的。吴奚如随后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可能还是七大代表，当年在党校一部的基本都是七大代表）。他把这些事情写成一个半小说、半回忆录的两万字文章《一个艰苦的旅程》，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其实这本身就说明他没有问题，假如他已经叛变了的话，怎么可能干这种蠢事呢？中央研究院搞出王实味的事件后，康生就把吴奚如抓了起来，刑讯、逼供，认为他在皖南事变中被捕过，是叛变后被国民党派进延安来当特务的。结果吴奚如案件引起党校一部大搞抢救，扯出了四川党的问题。那时，不管是被迫、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凡是曾经离开过党、脱离了党，或者是与国民党有过什么接触的老同志，通通受到怀疑。周凤平是四川党的省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过，受刑打断过肋骨，也被怀疑了。他的老婆很糟糕，反过来咬了他，他就自杀了。周凤平自杀以后就抢救张宣。

张宣是四一年到延安的，在西北党校当文化教员，解放后当过西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年纪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现在还在西安。因为他也在

四川地下党担任过县、地委一级的工作，周凤平死了，就从他那里继续搞四川党的问题。那是四二年的四月初，公开抢救的，派了中央党校一个支部的负责人张平化、孙志远去抢救，在窑洞前面的空场召开全校大会。张平化一开口石破天惊：“今天大会要揭露一个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张宣。”接着孙志远讲话，介绍张宣十几年的特务历史和罪恶，其实他那时才二十七岁。简直是晴天霹雳。张宣住的窑洞被彻底搜查了，东西都被搜走了，他走到哪儿都有带枪的便衣跟着。晚上被带到旁边的一个窑洞，张平化说，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即使是国民党特务也在挽救之列，你白天在大会上不坦白，现在组成个突击队来帮助你，你不坦白我们绝不罢休。他们同他谈了三天三夜，张宣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就又开大会批斗，一直不让他睡觉。不管怎么斗，张宣就是不承认。到了第六天还是第七天，高岗来了，开大会时，高岗把脚往凳子上一踩，拿着帽子直煽：“张宣，你不但是特务，还是军事特务！”反正骂得很厉害。张宣就说：“我交待。”交待一件什么事呢，有一次他带了一封介绍党的关系的介绍信，把信放在裤头的小口袋里，外面还有长裤，结果到公共厕所去解手时，一不小心，把介绍信掉到茅坑里冲走了。这事其实以前他在党的生活会上已经反反复复地讲过了。“啊！”高岗听了一拍桌子说：“胡说，你不要欺负我们陕北土包子，我高岗也去过许多大城市，西安也去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短裤里面还有什么口袋。你这个特务骗得了谁？”当场有几百人，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浙江口音：“报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贴身短裤是有口袋的。”高岗转过头来问：“你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就说：“我叫朱X忠，十五班的学员，我穿过有口袋的短裤。”把高岗顶得没话说。结果这个同志当晚也被抓了起来。大会斗到第八天，张宣实在没有办法，就照他们讲的口供承认了。晚上给他送小灶伙食，有炒肉丝、大米饭、鸡蛋汤。过了几天，他一想不对头，又写了一封信翻案，说我那个交待是不对的，共产党在党内不能够这么干。最后就把他抓到保安处关了起来，大概比我早几个月。张宣解放后被汪锋整得很厉害，汪锋在新疆当过书记，记得一九四二年三月《解放日报》刊登了张宣的一封很有影响的读者来信，谈到民主和当时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当时博古也很欣赏。张宣最近写了一本很好的书。

曾志后来被抢救也是四川党的问题。康生抢救的红旗党，包括南方局全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以及甘肃、陕西，没有哪一个省没有被牵连到，都认为是国民党管的红旗党。党校一部就新开了几个窑洞，在山沟沟的里边，将七十几个“红旗党的特务”关在里面，外面有卫兵把守。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红旗党”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抢救运动的外部原因

除了内部搞出的这些事情，整风演变成抢救运动也还有外部的原因。那时国民党的戴笠在关中办了个什么青年干部训练班，是训练搞情报工作的。四二年底、四三年初从延安和国民党交界的地方打进来大概四十六、

七人，有一个人进了鲁艺，有三个进了军委第二局，就是总参搞情报的部门，还带了一部电台进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自首，这批人很快就被我们抓住了，抓住后这些人就坦白了。在这之前，胡宗南也曾派过一些人打进边区，同戴笠的人不同，不是秘密打入共产党的机关内部，而是用的公开的名义。那时候延安县还有个空头的国民党县政府，还有国民党办的政府的邮政局，胡宗南派到延安的人进的是这些地方，根本开展不了什么活动，不久就都回去了，所以戴笠才又派了他训练的年青人进来。这个案子，康生向毛泽东一报告，使毛产生了一个什么不好的想法呢？就是这批人都是年青人，有文化、有知识，而延安已有人员中的90%也都是来自大后方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就紧张了。再加上四三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可能要派一个人来，姓郭，是二一年的党员，后来脱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国民党常常派一些跟我们党有过关系的人到延安来做统战工作。因为已经搞出了王实味的五人集团，还有什么红旗党，怕这个姓郭的来了会跟边区的特务联系。所以这些外部因素与前面所说的内部因素凑在一起，让康生一煽唬，毛泽东就决定将整风运动转成抢救运动，认为必须审查干部，而审查干部的重点是那些外来的青年。认为在各个系统、各个部门这类人很多，已经进入到党的内层来了，康生的理论就是整风必须审干，审干就必须肃反，再往后，就变成特务如麻这么一种概念了。

抢救运动迅速扩大

当时师哲在延安保安处工作，逮捕人的事由保安处管，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开始的，他是在那天收到的逮捕名单。王实味五人集团的所有成员都是四月一日晚上抓的，我也是四月一日晚上被抓的，那一晚共抓了二百多人，陕北公学、西北公学、延安女大、鲁艺，是几个大重点。被抓的人分关在两个地方：保安处和枣园。枣园就是康生的中央社会部管的西北公学。保安处关的人多一点。

丁东：保安处和社会部的分工是什么呢？

李：社会部是党的社会部，保安处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保安处归社会部管，就像现在的公安局一样，党政不分的。抓人由社会部领导。

我被抓是怎么回事呢？我武汉大学的同学魏泽同进延安前是成都市委书记，当时在党校一部由于四川党问题被抓了起来。逼供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咬了我，说我是他的上级。这是四二年年底发生的事，当时博古和陆定一、余光生三人找我谈了一个通夜，也就没事了，我还是照样工作，照样当我的编辑部支部书记，这很可能是博古过去对我有认识，即使有些怀疑，也没有到了不得的程度。可是抢救运动一来，就顶不住了。

抢救运动后来迅速扩大到那样的程度，还有一个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即四三年的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共产国际解散，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毛

泽东来说是件好事情，毛从此就解放了，从思想到组织都解放了，没有什么能约束他的了。但是国民党利用了这个信息搞反共高潮，在西安搞了几个公开的座谈会，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像共产国际一样自动取消，等等，在国民党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丁东：这是抓人之后的事吧？

李：是抓人之后的事情。而且这时据我们情报部门讲，胡宗南从山西调了些部队过河，已经到了边区边境，把边区包围起来了。所以延安很紧张。这样，在六月份，康生作了抢救运动的大报告，抢救运动迅速扩大，开始大搞逼供信。

我在保安处的经历

丁东：当时把您关到保安处之后，生活待遇怎么样呢？

李：谈谈保安处吧。吃饭还是同在外面的人一样，小米饭吃得饱，菜也是一样的，没问题，但是别的方面就不行了，不如秦城。秦城一个人一个监房，有木板床，发衣服、被子，还有卫生间。保安处没有床，在地上铺些草，人就睡在地上，衣服、被子是自己从机关拿去的。一个瓦罐桶放在墙角，大家都在里面尿尿。每天放一次风出去大便，活动几分钟。关在同一窑洞里面的人互相之间只有号码，即使是认识的，也只能叫号码不能叫名字，不能告诉别人自己的姓名。文化大革命关在秦城的时候，也是只有号码，没有名字，我的号码是67126（67是一九六七年，1是专案一办，26大概是这年关进来的第二十六个人）。保安处提审的时候，窑洞里的人都要把脑袋蒙住，因为不能让我们从窑洞门的通风口看见别的窑洞关的是什么人。不过窑洞里面的思想是相当活跃的，可以自由交换意见。

丁东：延安地方不大，互相都认识吧？

李：是，认识的人居多。

丁东：当时你们几个人关一个窑洞？

李：最开始进去时，第一、二个晚上就我一个人，以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一个小窑洞睡七、八个人，一般是五、六个人。窑洞没有窗户，只有窑洞门上一个通风口，一次因为人住得太多，半夜觉得喘不过气来，大家赶紧爬起来，拼命向通风口扇风，让空气流通起来，才保住了性命。

曾跟我关在同一个窑洞的熟人里面有：吴波，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孙作宾，担任过甘肃和青海的省委书记；闫子祥，担任过建设部副部长，二九年的党员；林里夫，进延安前是上海地下党武委会的党组书记，上海地下党中央被破坏后，他没有被捕，因此一进延安就被康生怀疑，立即抓了起来，是个老号，关了七年，手被手铐铐烂了；常流，当过水电总局副局长；黄大明，中央大学毕业的，后在浙江工作；等等。有名人物还有钱

维仁，学工的，一进延安就当公路局长，被怀疑抓了起来；蔡子伟，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原来西北的老人，是高岗他们搞的托派张慕陶一案关进去的，北方党的关系，非常复杂。那时候内部有个刊物《共产党人》，已经刊登枪毙钱维仁和蔡子伟了。还有后来新华社的方实，我们没有关过一个窑洞，他原来在边区交际处工作，整风开始他是组长，很被信任，突然有一天交际处处长金城（金城是金树望的哥哥，早已去世）交给他一份电报，说要把他调到晋西北去，须立即住到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方实就背上行李去了，走到半路，陪行的人说马要喂料，把他骗到保安处关了起来。到了那里，保安处的人对他说："你有严重的问题要交待。"方哈哈大笑："我有什么严重问题？"在保安处窑洞里他和一个老头住在一起，这个老头讲他是东北来的，原来在共产国际搞刑法工作，三八年就被关进来了。这个老头让他做长期准备，告诉他：审训的时候，屁股坐到地下不准你动，屁股会坐烂的，你要在棉裤屁股那个地方多塞一点棉花。跟我同窑洞关的还有蒋齐生，后来是新华社有名的摄影记者，他告诉我他是由于同名，国民党里面有个什么人也叫蒋齐生，三九年就把他抓了起来。蒋齐生和他的夫人是一九三八年到的延安，夫人怀了孕，他就让夫人回成都家里生孩子。孩子出生后他夫人就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组织上这时告诉他的夫人：蒋齐生淹死了。这样她在重庆办事处经人介绍，和一个打仗失去一条腿的老干部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孩子，四四年一起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军委。蒋齐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以后被放出来的，出来后到了新华社。一天他到新市场去买东西，一眼看见了他夫人，二人相认，才说清楚是怎么回事，非常痛苦，要求复婚。但是军委不同意，蒋齐生的夫人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求复婚。后来叶剑英给她做工作，也不行。这样两个人复了婚，那个老干部就离开了。蒋齐生是个非常内向的人，这件事是后来方实告诉我的。

还有两个窑洞是关押最厉害的特号的，周建南住过特号，那里每顿饭只给平平的一碗小米饭，饿得肚子咕咕叫，饿了一个多月，才放出来住进我们的一般窑洞。

对犯人的审问，一般用各种刑法逼供，有的还长期带脚镣、手铐。有个日本留学生金浪白，东北人，我记得他被审问的时间最长，有十五天十五夜，不让睡觉。康生是从苏联回来的，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是他从那儿学来的，不让你休息，让你神经错乱，这样就会坦白、讲真话。那个时候谭力夫的父亲谭政文也在保安处工作，他是从江西出来的，还写了一本相当唯心主义的书《审训学》，我们当然没有看到，是社会部系统内部的东西。毛在江西肃反也是刑审搞逼供信。苏联杀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一批一批地杀人，多少还走个法律手续的过场，你在法庭上承认后，把你杀掉。希特勒审判季米特洛夫也有法庭，季米特洛夫没有承认，希特勒也并没有搞逼供信让他承认，还是把季米特洛夫放了。我们就是搞逼供信，越认为是要案要犯，就越是厉害，时间越长。

到了四三年的七月份，外面开始搞群众运动大抢救，保安处内部也改成开大会的形式，把窑洞门都打开，开大会抢救，动员上台坦白。我看到何群波、武衡他们，这才知道他们也进来了。

有个女孩子原来是武汉的中学生，上台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说李锐也是特务。她知道我是武汉秘密学联的头头，就咬了我，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于是就立刻把我也弄到台上去，搞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说："好，好，我有问题，我有问题。"我在保安处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有问题。"那时只要你表了态就让你下来，搞得那么荒唐、荒谬。

丁东：是不是因为边区被国民党包围，有一种恐惧心理，特别容易导致一种互相残杀？

李：不，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产物，绝对忠诚，服从党，党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当然有一些人是投机取巧，自己承认后积极斗争别人，后来毛泽东搞的运动中这种人越来越多。那时居然还出现一种叫做分析特务的称号，就是你做的事情，客观地分析出来，就是特务行为，到这个程度。于是有的人在个别审问时，他没有承认，搞大抢救的时候，他似乎一下子觉悟起来，就坦白了，承认自己也是特务。

在保安处审问我的人叫王鞴，是保安处的一个科长。他在文革初期是江苏省委的负责人，管公检法系统的，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有意见，自杀了。他的夫人是我二姐的同班同学，在延安我们都见过。因为我一直什么都不承认，搞得他发脾气打了我一耳光。总的来说，也许因为他夫人的关系，对我的刑罚还比较简单，一个是站，立正站着，不许动；还有就是坐矮板凳，时间稍长腿就肿了。审问的时候，陪审人员持枪昼夜轮班监视，不许动，眼睛也不许眨。审了我五天五夜，什么东西也没有承认就放过去了。有个叫陈新的和我关在一个窑洞，是所谓河南党的问题。我五天五夜回来以后，他跟我说，把他绑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还坐老虎凳、戴脚镣，比我厉害多了。

帅大姐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刑，也被灌过辣椒水，牙齿被打光，什么也不说。就是因为她的坚贞不屈，国民党从此对共产党囚犯改为搞反省院这一套了。而我们在苏维埃内战时期，对自己人搞"肃反"，从打AB团起就用刑，一用刑，就被迫招供、承认，一承认，就杀头。内战时期种种"肃反"，共杀了十万人！毛泽东总结了苏区"肃反"的教训，延安抢救运动时十条方针，其中之一是：一个不杀，所以死人不多。西方当然也有刑法，但是中国恐怕是登峰造极，自古以来就有，帝王、皇家的统治有，农民运动也有，都用刑。

四月一日和我一起被抓的有一对夫妇——高梅、马彬；还有一个叫陈楚平的女同志，一九三八年刚到延安时就受诬陷，被边区保安处关押审查，一九四二年无罪释放，这时又被关了起来。她后来担任过邓颖超的秘

书，八十年代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组的组长。她的外甥女陈双璧在中央组织部，是帅大姐在世时的秘书，陈四益是她的弟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国民党的学校里呆过。国民党那时在南京办了个中央政治学校，专门培养党务干部，高中毕业才能考进去，但是不用交费，进这个学校的学生一般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差。马彬和陈楚平都在那里学习过，由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了。在国民党呆过，当然不被信任，要受到怀疑。

周建南也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是他在交大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或是外围的什么组织活动，他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的，来了以后就对他怀疑，不被信任。一九三九年八月他被派到重庆做统战工作，后来又再度进延安，碰到抢救，就把他关起来了。进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凡是同国民党沾过边的都不行，都要被怀疑。

那个时候连张学良都反对蒋介石，要求参加共产党。张学良何许人也？是大军阀的儿子，是在军阀队伍里成长起来的，掌握了很大的兵权。这么顶尖的人物，拿枪打过我们的，他都过来，为什么对在国民党学校、机构里呆过的自己人那么怀疑？

丁东：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本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他自己不是还当过国民党的部长吗？

李：确实很奇怪。

抢救运动几例

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志袁学之写了一本回忆录。他是安源工人，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的红军，打仗时曾被国民党俘虏了，继续当兵，后来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面组织了几条枪，打仗时，带领一个班跑回红军队伍来。抗战初期地下党时，他在湖南工作过，以后到了延安，还当了七大代表。抢救运动中也被抓了起来，被关在枣园。从他和曾志两人写的回忆录看，枣园和保安处的情况很不一样，比搞我们厉害多了。在保安处，有正式的审问人员审问我们，而枣园那里没有，让关在那里的七十几个人互相斗。比如四个人关在一起，让其中的三个人逼一个人，说：你就是特务，你坦白，把你的真实历史讲出来。厉害的有把别人的耳朵咬掉，甚至把肉咬得一块吃掉，就这么干。曾志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审问，最长一次搞了两个礼拜。是什么原因呢？她在福建、苏区边沿上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离开过党，还被捕过一次。但是她什么也没有承认，绝对没有承认。现在住在我楼上的邻居金树望（在延安名王闻远）、王遵笈夫妇，都是一九三八年关进去的“老号”。金是一九二九年的党员，只是一个同姓名的嫌疑者，关错了，

不愿改错而关下去。王是王克敏的侄女，在天津读书时参加过民先

队，三八年一月刚到延安就关起来了，但是什么证据也没有，就威胁她，放两条蛇在窑洞里。

另外有一个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危拱之，她是叶（剑英）帅在苏区时候的夫人，长征时离婚了。因为抗战初期当过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就说她是河南红旗党，抓起来。危拱之一被逼，就精神错乱，乱讲起来了。日本投降以后，我在热河工作时，她在热河一个地委当过副书记，解放以后神经一直没有恢复正常，文革初期去世了。危拱之是湖南人，大革命时就入党了，很老的党员，连这样经历过长征的老党员也一样挨抢救，一样不被信任。

我的一个老朋友杨第甫，在延安时虽然没有被打成特务，但是也挨了斗。那个咬我的魏泽同是关在枣园的七十个人里面的，把杨第甫也咬了。他为什么咬杨第甫呢？杨第甫和他是坐一个车进延安的，到延安后在党校一部一起学习。他后来对杨第甫说：我们一起进延安的，都一样，你没有事，好好地在那里学习，我他妈的在这里受罪。于是就咬了杨一下。

还有武竞天，解放以后当过铁道部副部长。延安国民党的邮政局长是他的老同学，帮他寄过信，转过什么邮包，就被康生怀疑成特务抓起来。因为他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外国人学过外语，就怀疑他是意大利特务，如此荒唐。武竞天那个时候是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啊！

武衡那时在自然科学院教书，院长是徐（特立)老，李鹏他们那批小孩那时都在自然科学院办的小学念书，于光远也在里面教过书。自然科学院的抢救运动由陈伯村管，陈文革后在电力部当过副部长，原来就住在我的楼上，跟我的关系满好，两口子都已经去世了。他那时在西北局组织部负责，被派到自然科学院去抢救，把武衡弄到保安处关起来。武衡还算好，大概也就搞了两天两夜，什么也没有承认。我的武大同学莊湘，也在科学院教书，抢救时自杀了。

徐向前当时是绥德抗大的校长，那时抗大可能有上千人。徐向前肃反的时候在鄂豫皖，同张国焘一起。他的夫人及其一家兄弟姐妹五个人参加了革命，二九年在鄂豫皖的一次大肃反中，他的夫人被张国焘杀掉了，徐向前因此对抢救不积极。陈毅的夫人也是被杀掉了的，那是江西打AB团时，毛泽东肃反方针的直接执行者李韶九干的，此人没有长征。抗战初期黄克诚见到陈毅，就问李韶九怎样了？陈说：我把他杀掉了。四三年，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负责人黄志勇是个搞逼供信的专家（在热河时我认识），他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大抓“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大会报告，集体坦白，示范坦白，个别谈话，五分钟劝说，集体劝说，那个集体劝说动手的也有。还有所谓“抓水萝卜”，因为水萝卜皮是红的，瓤是白的，就像伪装的特务。花样很多，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一批一批人叫到台上站好，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

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这样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级以上学员总数的57.2%。干部队伍共有496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373人，占75%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前些日子，原来电力部时的电力总局副局长何群勃来找我，他是九级干部，一直管火电的，东北人，东北大学学电机、机械出身，自己能动手操作，很聪明的一个人。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青训班第一期到了延安，四二年就关进保安处了。延安那时有个自然科学研究会，关进去前何群勃管那个会。我问他是怎么被关进去的？他说有人咬了他，被当成重大案件，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抓进去后，他属最重的案情，同时还有一个边区政府的工程处长赵一峰也是重案犯，都戴脚镣手铐，大概在四三年大抢救之前，何被假枪毙过一次。以前审问他时，审案人员曾经警告过他："不坦白就枪毙你！"那天把他拉出去，他以为这次是要枪毙他了，就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被拉到一个地方，左右两边各站八个人，拿着枪，拿着刀，前面一个桌子，桌子上放着酒菜，康生坐在旁边，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审问，让他最后交待。正在审问的过程中，有个人骑着马送来张条子，传达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此前在边区政府开会，高岗宣布过要杀人。大概那个条子保住了何群勃的命，不过也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他。乱搞到这个程度！我问他被审了多长时间，他告诉我是五天五夜，和我一样。他说到了第五夜时已经不行了，他们要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乱七八糟讲了些东西。后来让睡觉，休息过来，他就把供词翻掉了。这样一来就再审问，审问人员打他的耳光，他没有再乱讲过一句话。

再比如吴波，为什么关呢？是由于南汉宸的关系。南汉宸一直被党派在杨虎城那里，是杨的高级参谋。吴波跟随南汉宸工作。国民党有一次派人去西藏，吴波也跟去过西藏。南汉宸那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吴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秘书主任，他原来在第十八集团野战军政治部统战部工作，后奉调到延安。整吴波其实是为了整南汉宸，想从吴波那里突破，搞到南汉宸的材料。解放后还有潘汉年的案子，潘汉年虽然没有在国民党直接做过高官，但是是搞重要情报的。就是因为他见过汪精卫，汪精卫的一个搞情报的头头李士群原来是共产党叛变了的，后来又当了日本特务，和潘汉年有关系。那个时候如此地怀疑一切，在党内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据当年在马列学院当支部书记的王世英回忆，他那时负责审查干部，需要填履历表。一九四〇年六月，马列学院有二百九十一名抗战后入党的党员，个人履历前后表册填写一致的只有一百零三人，占总数的33%，其他的三分之二经过了无数次的教育、解释，才补写了自己的真实历史履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党内的成份论，那时中国社会非常复杂，国民党、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所谓干干净净，从未沾过共产党以外边的人。只要沾了一点国民党的边就被怀疑，谁敢如实地填写？这是一

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国民党区来的新党员。于是就形成了越是害怕、越会隐瞒，越是隐瞒、越说不清楚的现象。就是资格很老的同志，也不免会犯过这样、那样的所谓错误，或者丢失过组织关系，过去没有讲，现在讲了怕引起党对自己的怀疑，首鼠两端。

那时就连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央秘书处，也整出了十几个特务。康生所在的社会部也整出不少特务，那可是最机密的单位啊！当时的说法是：共产党员是铁的纪律，搞情报工作的社会部是钢的纪律。那些搞情报工作的人在延安平时比别人都高一等，结果也不能幸免。搞成这样，草木皆兵，真是不可思议。

抢救运动的收场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八月，抢救运动实在没法再搞下去。最开始有意见的是王首道、帅大姐，他们一批大概十来个人向毛主席写信。那时耀邦是总政组织部的部长，跟我谈过，他是自己在反AB团的时候有过大教训，几乎被杀掉，是冯文彬救了他，刻骨铭心。他找了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轻人，一逼供，就都坦白是特务了。于是他就找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大概师哲也有反映，还有各方面的反映，毛开始对自认为的“特务如麻”有所认识，特务总是有，但不是那么多了。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回来了，把“红旗党”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不再被关在窑洞里，让搞些生产活儿，纺线之类，还可以比赛，这就舒服多了。跟我现在住的这个楼并排的二十四号楼里有个原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廖季立，已经去世了，他那时线纺得最好，是第一。我大概也在前几名。

大约在四四年初，停止了审问，开始甄别。保安处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只有那么多，就把一些虽然没有做结论，但认为基本上没有问题的人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帮助做在押“犯人”的甄别工作。工作人员除我之外，记得有周建南、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黄先河（浙江人，地下党时同叶飞在一起的），以及住在我楼上的金树望。

丁东：这时恢复了行动自由了吗？

李：在保安处内部有了自由，可以离开关押的窑洞，去办公室办公，住的窑洞的门也打开了。当时，重庆的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要来延安参观，从报纸上的名单中我看到小学同班好友赵炳烺的名字，就向中央写信，说我可以对这个人做点统战工作。周恩来知道我这个人，见到这封信，到了六月份就把我放了。那个工作组一直存在着，保安处最后一批人是日本投降以后才放出来的，很多人并没有做结论，作家黄钢就是没有做结论的。

大规模的抢救运动结束于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十五日，这天中央发了个什么决定呢？《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这个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

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又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这点，就不足以采取正确的方法、方针。“决定”指出，这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的分子都交保安机关处理的方针，而是采取首长负责制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说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制定的。当然到最后加了一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原来并没有“一个不杀”，大概是后来毛发现他们要求杀人了，加上了这一句。由此，各个机关建立了反审机构，反审与保卫、社会部三个机关共同将审干工作搞完。幸亏毛泽东总结了过去打AB团的教训。他做报告时说：韭菜是可以割的，割了还会长起来，人的脑袋割掉了以后长不起来。所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做到“一个不杀”，只是杀人不是很多就是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王实味是被杀了，另外还杀了几个外国人。那几个外国人同我在一个窑洞关过，是哈尔滨的白俄，经过晋察冀过来的，可能是要到国民党区去经过延安，就被抓关起来了。

丁东：当时有统计数字吗，一共抓了多少人？

李：几百人吧，我估计保安处顶多有四五百人，窑洞一共只有那么多啊。枣园可能还没有这么多人，那边的窑洞没有保安处多。从曾志写的回忆录看，党校一部将一部分窑洞变成监狱，大概各个机关都有这个情况，划出一部分窑洞关人。

丁东：现在研究当时的情况能不能算出一个比例，就是挨整的人占到一个什么比例？

李：后来搞抢救，坦白问题的有百分之八、九十，《解放日报》编辑部大概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解放日报》把延安各单位，边区各个县里被抢救的，抓出的特务登出来过。前面提到的高梅是个有心人，她多年来记录了一份保安处被关押者的名单，共205人，实际关押的几倍于此数。名单中我认识的、包括曾同我关过一个窑洞的有（括弧中为解放后任职）：袁血卒（民政部副部长，是争取到国民党二十六军董振堂那个起义的一个人，二七年的党员，很老的同志，就住在我们这个楼，还没有去世）、魏伯（作家、文联副秘书长）、胡采（陕西省文联主席）、余明（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黄先河（浙江省统战部副部长）、陈雪莹（黄妻，一九四三年被假枪毙后神经失常四十余年，已去世）、李予昂（山东省副省长）、金浪白（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长）、梁寒光（作曲家、深圳市文联副主席）、闫子祥（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局长）、李正光（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史泊夫（当过沈阳美术学院院长，油画家，高梅要是不写，我都忘了，跟我在一个窑洞里面关过，不爱讲话，鲁艺的，抢救运动被关起来，老婆、孩子在外面死了，葬在一起，他受不了）、陈新（建材部地质局局长，文革中被害死）、何定华（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廖季立（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又然（作家）、陈铁耕（木刻家，曾是鲁迅的学生）、高敏

夫（陕北作家、诗人）、黄操良（在《人民日报》副总编任上被划为右派，1958年4月11日自杀）、王怀安（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就住我这个二十二号楼）、于平（这人是武大毕业的）、袁静夫妇，袁静是《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还有带着小孩被关在里头的。还有四位“白俄”（即十月革命后逃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后来同王实味一起被杀）。

从师哲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这方面的考虑。一九四四年四月，毛泽东曾经找他和李克农、周兴谈话，师哲那时是周兴的副处长，李克农是康生的副部长。李克农我是很熟的，范元甄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解放》三日刊工作，曾经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建国不久就去世了。毛对他们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他们讲还有三、四十份。毛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师哲讲，他对这些一无所知，摸不出头脑，不像李克农、周兴是过来人。毛讲他自己的经验，还举了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都要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的人正在搞逼供，我才知道AB团是怎么来的。逼供出的口供是不可靠的。

延安以外的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后来不单在延安搞，中央的文件和指示都同时发到敌后根据地。任仲夷跟我谈过太行山的情况，同延安一样厉害，他也被关了起来，逼供、抢救，直接打手是杨献珍。杨献珍当然后来觉悟了，没有跟着毛泽东乱来。

新四军的情况比较特殊，黄克诚接受江西教训，没有执行。他跟我谈过，他们那里开始抢救运动时，曾希圣的夫人被怀疑，是黄克诚帮助解的围。黄克诚在三师也是胡耀邦那个办法，先找几个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人来整一整看，结果一逼、一审，就坦白。黄克诚就坚决顶住了。黄克诚在江西肃反、打AB团的时候，差点被杀头，是彭德怀救的他，所以对这种瞎来他是刻骨铭心的。

丁东：延安搞抢救没有外界干扰，在敌后那些地方搞抢救，是在战争状态。

李：确实很危险的。

抢救运动的关键人物康生

抢救运动的关键人物我认为是康生。当然发起人，总领导是毛泽东，但是具体执行的还是康生。从这里，我想到毛同康生的关系。一九三七年以前，他们没有见过面，根本就不认识。康生是三七年底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在莫斯科，康生是王明的副手。王明和毛泽东为什么都这

样器重康生？到了延安，观察形势后，康生就倒到毛一边，而且是服服贴贴地倒过去，从此以后总是捧毛，毛就需要这样的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始终是毛的左右手，其实就是毛的打手。康生的很多特性恐怕和毛都差不多，只不过毛是土生土长的，他那一套是中国农民领袖的本色，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要当皇帝。康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苏共、斯大林是杀人的，托洛斯基就是斯大林派人到墨西哥去杀掉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些人也是在莫斯科被杀的，大概洛甫是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他对毛就不是完全服气的，他有他的想法和看法。博古虽然服从了毛，但服从的性质与康生不同，他是从心里承认了错误。记得在《解放日报》时我去博古的窑洞谈事情，看到墙上挂着毛泽东的照片，那不是摆样子的。但是毛不喜欢博古，他就喜欢康生，从来没有叫他做过检讨。康生的作用就是一直给毛帮忙，凡到搞要害问题都是康生出来。康生的随意胡作非为，可举一件事。赵建民写过，有一次康生对他说："我看你就像个特务嘛。"一句话，就定了他的特务，就是这样子干的。毛就允许康生这样乱来。我认为毛泽东始终把康生当成他的一把刀子。

丁东：康生也一度被冷落过吧？

李：冷落那是解放战争时期，他被安置在山东赋闲。延安他不做检讨啊，中上层干部中厌恶他的人很多，毛也没办法。另外，还有一个抢救运动中康生使用的保安处负责人，叫郑什么，后来叛变了，还登了报，是很有名的一件事。解放初期，康生在抢救运动时十分器重的一个叫布鲁什么的人，保安处下面是科，这个人是科长，专门负责审问的，不知怎么回事，一九五〇年被怀疑了，在广东关了起来，大概一直就关死了。这两件事让康生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有把握。据说解放初期夫妇俩都神经错乱，可能实际上是装疯，不工作了。但是毛泽东还是给康生一个位置那里，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吧。到了一九五八、五九年，他又上来了，在庐山会议上就很凶了，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刀下冤魂无数，党里面吃过他的亏的人是无法数清的，我是亲身经历了啊。在延安抢救时，他就造谣，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幸亏李六如在，证明我父亲是一九二二年去世的。庐山会议时，他又继续造这个谣："李锐对抢救不服气，他的父亲是被红军杀头的。"

半个世纪后的余哀

李逸民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那个时候在延安负责搞情报工作的王诤，就是后来当了四机部部长的，参加过长征，是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创建人。一九四四年元旦，带了一批被抢救过的人去找毛泽东，整整齐齐地站成一队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出来一看就明白了，讲了一番话，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高锰酸钾）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抢救运动的最后，毛泽东几次在大的场合赔礼道歉：你们不原谅我，我手就不

放下来。周兴也开过大会，也向大家敬礼，说搞错了。最后就那样地不了了之。但是很多被抓起来的人其实并没有就此恢复自由，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很久，中央撤离延安才从保安处放出来。一些人虽然被放出来，却一直没有结论，或者只做了部分结论，留着尾巴。除了王实味，我知道还有一个杨乐如的惨案。

杨乐如是湖南岳阳做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一直当教员，曾经把他的一、两个学生送到陕北，自己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到的延安，进了马列学院。四二年审干，被当特务抓了起来，一下子神经错乱。康生就认为这个人总是有问题，社会部的科长凌云（建国后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认为不一定。一九四四年王震南下时，凌云就拜托王到湖南了解杨乐如的情况。王震到了湖南平江，又南下广东，回来后讲这个人没问题，康生仍不理。一直到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边区，中央撤离延安，在撤退的路上把杨乐如杀掉了。凌云一直记着这件事，杨乐如的那两个学生也健在，为他证明，但是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一九八〇年中央才正式行文通知湖南，对杨乐如作了公开平反的结论。

张克勤是一直到毛泽东去世，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做了结论。问题拖得如此之久，一个人的多半辈子没有了！

王实味的问题，幸亏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都活着，为他申诉，直到一九八二年中央组织部才在《毛泽东文选》的注释里面宣布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但是托派的尾巴还留着。后来王凡西在香港写了文章，回忆当年所谓托派的问题，又经过当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参与过王实味案子的温济泽的不断努力，这样到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王实味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人已经死了四十四年，儿子五十五岁了！

对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要有个正确认识

不总结教训的恶果

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对于一九二九年苏区开始的“肃反”（肃清“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反革命，共杀了十万人）的错误没有总结，整风抢救运动中只接受了两条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其实还是杀了人，还有在运动中自杀的人，也应该算的。李逸民的回忆录就讲到西北公学有两个人自杀，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学生，每整一次，他就写一段鲁迅语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不坦白，后来他跳崖死了。他那个班的同志故意把他埋在负责西北公学抢救运动的吴德仕的窑洞对面，表示抗议。过去肃反是专搞逼供信，这次规模更大，并且发展为群众运动，只是没有立即杀人，但用刑仍然用得非常厉害，长期戴脚镣、戴手铐、各种殴打、长期挨饿、假枪毙，等等。窑洞里小群众运动，窑洞外大群众运

动，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抢救，坦白自己是特务成了很光荣的事情，戴红花，当天吃小灶。回忆起来，真是荒唐之极。据李逸民的回忆录说，没有搞起运动来的单位的首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一个单位没有一个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领导人回来吃不好，睡不好，半夜三更吹紧急集合哨训话：别的单位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地惩罚你们。结果当晚就有几十个人交待了问题。当年的抢救运动，在延安地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其中没有一个是真的。现在看来像是个笑话，而在当时确实是如此。有一个刚刚新婚不久的人，一天工作到很晚，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他的爱人还在灯下等着他，他就怀疑他的爱人有问题，硬揪着到李克农那里去坦白。现在看起来，群众运动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形式，容易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副作用太多。这个教训一直没有汲取，到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完全失控，天下大乱，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达到崩溃的边沿。

否定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利大于弊

共产党的历史最大的问题是“左”，是整人、整死成千成万人毫不在乎，从成立开始即如此：农民造反，杀人放火，延安的抢救运动达到了一个高峰。时至今日，“要正面地评价整风运动”这个说法，仍占据着干部思想，甚至学术界、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许多老同志对过去的历史看不清楚，总受“伟光正”的影响。例如陶铸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曾对黄克诚讲，对毛主席要从一而终。我同陶铸闲谈，他也跟我讲过：“我就是只左不右的”。他在文革中被整死时，可能也没搞清楚这是一个什么运动。一九八〇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方毅在小组会发言说毛泽东是一个暴君，黄克诚就接受不了，马上反驳，发表文章。老将里面萧克、张爱萍等比较清醒。周恩来对毛这个人是有看法的，但他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当丫头。大概对毛认识得比较透，作点反抗的还是洛甫。特别是苏联问题出来以后，可能参照。我认为对延安的整风、特别是抢救运动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对共产党本身来讲是利大于弊。正面的作用也好，反面的作用也好，把共产党这样一个关键的、很大的历史事件继续盖着，不让搞清楚是不对的。

完全搞清楚抢救运动也许还要等到将来，十年、二十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像苏联那样档案全部公开，由后代来清算共产党的那段历史；或者共产党如果到那时还存在的话，由自己来清算。为什么会对自己人、对自己的老同志那么怀疑？像把危拱之，一位经历了长征考验的女同志逼疯；像吴奚如，皖南事变后历经千难万险回到自己人中间，却把人家抓起来；潘汉年就更不要说了，他对党是有大功劳的，劳改时死在湖南。

对中国旧社会如何看待，我想起父亲的朋友李六如，他跟我谈过：因为自己在白区的那些事情，认为“历史不清白”，不能当七大代表，非常难

受。

丁东：就是因为被抓过？

李：哎，被抓过。凡是被捕过的人，只要活着出来，都没有好下场，怎么样也不行的。我以前谈到过，李六如在文革中死得多惨！

对中国旧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到底如何看待，共产党从苏区到延安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否定延安整风，有利于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对旧中国的认识，改变那一套僵死的所谓“革命的”思维模式，包括怎样认识国民党，甚至怎样认识蒋介石，都要允许自由的思考和研究，要允许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旧社会不是铁板一块，蒋介石也不是简单的黑脸。打共产党“安内攘外”那是蒋介石的根本错误政策，但对他的集团内部应该如何认识？蒋介石信任的朋友张治中是武人，又是文人，基本上是个文人；蒋介石结识了傅作义；还有对国民党的其他很多高级将领如何看待，譬如程潜、陈明仁，陈是黄埔系的，是蒋介石的死党，行政院长翁文灏也过来了，可我们让他坐冷板凳。过去毛泽东最讨厌的那批人里面还有些什么人呢？胡适、傅斯年等大学者，毛认为都是帮蒋介石忙的。其实胡适同蒋介石是有矛盾的，蒋介石并不完全信任胡适，胡适的一个秘书后来写自传，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派去监视胡适的。

看人的出身成份，一直是我们党里面的大问题，毛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把成份看得很重。《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认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把中国社会分得那么截然：红的、白的，没有中间色，要么黑，要么白，直到把整个知识阶层变为黑的“臭老九”，连知识也不要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其实中国这个社会，中间色是最普遍的，国民党的内部也有中间，甚至于一个人也有他的中间。我给我外甥李力康《湘江往事》那本书写的序言就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书“写到当年国民党统治区有关的人和事。例如，记叙了鲁立刚、李相琼夫妇对湖南教育事业的贡献，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为教育献身的爱国精神。其中还有值得注意的复杂的历史情况，即作为一个国民党上层人士的鲁立刚，以及当时湖南省立一中的广大教职员，乃至国民党的沅陵县县长夫妇等，对我们家中的共产党背景等都是一清二楚的。每逢生活困难或失去组织联系，二姐夫妇（都是地下党的重要干部）还要回到大姐家中，乃至谋求教书职业。战争时期十多年中，他们两个地下党干部却一直是安全的。这应当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道义在起作用。”

抗战初期和抗战前入党的人，大部分人的家庭出身都不是工人、农民，本人也不是工农分子。庐山下来以后我听说：凡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司局级以上的干部，都要重新审查立场问题。这个阶级成份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党里面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可是最高层的人没有成份好的，特别是康

生，毛本人的父亲是个富农，是放高利贷的。我不晓得苏联党后来怎么样，是不是也很讲成份。苏联还有工人阶级，旧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工人阶级，共产党不过是借着这个招牌办事而已。

所以否定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也有助于彻底认识党自成立以来错误的“阶级路线”。当然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所谓高干子弟的问题。

整风、抢救运动的最后成果

现在回忆延安的这一段，我觉得延安整风取得的最后成果就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七大的召开。这比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政治局决定的五一劳动节召开七大，整整推迟了四年。七大结束时，毛泽东提出的走团结与民主的道路成为七大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当年正是因为共产党批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要自由、要民主的宣传，使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向往它，投奔了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那么多人受了那么多委屈，党的七大提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口号，又让我们仍然热爱它、相信它，继续跟着它走。

五月十一日李富春在七大的发言非常有代表性。首先，他的发言承认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战争策略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战争策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李富春对自己入党二十几年做了反省，着重检讨了在苏维埃时期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认为自己不懂得中国的广大农村，不懂得农民，今后要采取老实的态度，奉行毛主席讲的：不吹、不装、不偷。甚至说到这个程度：“我这个人在思想上真正取得中国的国籍，还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帮助下。”他的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臣服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五年的斗争中，从一九二一年到四五年，产生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领袖就是力量，领袖就是胜利的保障，过去二十五年革命之所以总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产生一个领袖，革命胜利的力量就要靠有一个领袖。我们的责任就是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把七大的路线，毛主席的路线贯彻到实际中去，胜利就可以变为现实。”富春同志大概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彻底觉悟起来，他是“二月逆流”的头头。

七大选举出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名次是这样排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高岗后面是彭真，然后才是董必武，林伯渠，最后是两个犯有错误的：张闻天，彭德怀。

丁东：彭德怀当时就算是有错误的？

李：有错误的，经验主义错误，百团大战不该打，等等。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书记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至此，毛泽东不仅是共产党军事上的第一把手，党的领导权也牢牢掌握在他的手里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个最重大的关节。七大以后，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这对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应当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延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战争策略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在七大得到确立，非如此，共产党不可能夺取全国政权。

整风、抢救运动遗祸至今

但也正是从七大开始，共产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个人崇拜的道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的自我意识也渐渐成为：领导党、治理国家，非我不行；后来发展到竟然称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才准确。党呢？共产党则逐步蜕变成一个控制全体人民思想的党，一个绝对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存在的党，一个彻底地反对人性、反对自由的党。必须承认，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遗祸至今、至今难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发表的报告里面说文艺界有特务，要在文化界里面肃清特务，现在编进《毛选》里面的文章把这个删掉了。那时候对萧军还算客气，没有把他打成特务。毛泽东认为文化界这批人最难办，要把他们变过来，因此在整风、抢救运动中对延安的文化人尤其整得厉害。这样做得到的一个不应忽略的结果是，在文艺界培养出了一批像刘白羽、林默涵那样，以为自己真正在思想上纯洁了，绝对服从、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的人物。刘白羽在回忆文章中说：“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一个人要真正成为真正的人，必须严格解剖自己，才能批判现实。正因为如此，延安整风成为我整个人生的一个彻底的大转折。”他后来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确确实实是彻底转变了。周杨的结论是：延安整风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他大概有同样的问题。刘白羽后来倒还承认了些错误，林默函则不承认自己犯过什么了不起的错误。而在理论界，培养了一批像邓力群、胡乔木这样所谓思想改造得最好的典型。李普的文章《两个相反的典型》，写延安整风中我的前妻范元甄是改造得最好的典型，我是根本没有改造的典型。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高层的领导人，思想改造好了，这是毛泽东从整风和抢救运动中获得的大收获，这以后在文艺界、思想理论界就有了一批无条件地忠实于他的人。这些人从延安一路出来，成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之后推行“左”的那一套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整风、抢救时整人的那一套很熟悉，从心里接受了个人的行动、思想都要绝对服从毛泽东。没有这批人，毛的意愿不会那样畅通无阻的。这些人到死都服从于毛泽东所说的话、所作的事，一切都是从“保护毛”出发，是真正的“凡是派”。而一直呆在白区，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党的干部，一九四九年后受到了很大的冷落，多半不被重用。这些人对延安整风、抢救中

发生的很多事情不要说不熟悉，有些根本是闻所未闻。比如延安的填小广播表，那是四〇年年底正式提出来的。广播表是印好了的，你自己讲过什么反党的话，别人给你讲过什么反党话，都要填在表上。这比苏区时代厉害了，控制人的思想发展了。李普看了我写的关于延安的文章大吃一惊，他在外面，根本不知道延安是那样改造思想的，人人要填小广播表。我的好朋友黎澍也没有到过延安，对延安出来的那些干部服从毛泽东的做法非常不习惯。我认为这是毛泽东治党、治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丁东：他这一套弄下来，确实加强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战斗力。

李：很强。

丁东：比国民党厉害。

李：厉害，这个比斯大林还厉害，斯大林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只解决了组织问题，异己分子不对头就杀，他没有搞思想改造。毛泽东对苏联的肃反基本是肯定的，而且把列宁和斯大林看作是“两把刀子”，但是他后来并不像斯大林那样杀很多人，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意见的人，反右派时他也是不要死人，说人还要留下来。他接受苏联的教训就是这一条，不要死人。但是人，尤其知识分子是很讨厌的东西，喜欢胡思乱想，多嘴多舌，所以一定要整，这一点毛比列宁、斯大林更厉害。

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已经有很多人写了书，事实揭示得比较充分了，但是迄今我所看到的书：师哲的、温济泽的，对问题的剖析和认识都还不够彻底。得到中央肯定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的李维汉的回忆录也没有谈清楚，他对整风运动基本还是肯定的，认为教育了两代人：教育了青年一代，也教育了中年一代，包括他自己。那时最先被抓的张克勤是十七、八岁，我是二十二、三岁，我们算他说的青年一代。延安有五老，徐特立老年岁最大六十八岁，吴玉章六十七岁，谢觉哉五十九岁，林伯渠和董必武老五十七岁。整风的时候，朱老总五十四岁，毛四十九岁；从年龄来讲，他们似乎不在受教育之列。我个人认为，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根本不是什么教育人的问题，用朱正的话说，实际是一场极大的“精神污染”运动，人长着脑袋，不能自己想问题，只能跟着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去思维，只要是党叫你干的事，怎样胡来都可以，把人的头脑、思想品德完全搞昏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这个副作用在“建立新中国”以后逐渐暴露无遗。从整胡风开始，后来包括胡适、梁漱溟、马寅初这些大学者，直到反右运动，把党内绝对服从的一套，先是推向文化界，后来进一步推向全体人民，牢牢地巩固了共产党一党的专政，实际就是毛泽东一人的专政。一九五〇年的五一节发布的节日口号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后面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那是他本人加的。这是朱老总的秘书陈友群在一九八〇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讲出来的。这份《简报》我保留了，这是最重要

的历史资料 。到了文化大革命，荒谬到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文明和文化都一概否定，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学生都不读书，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完全离开了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离开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普世规律，丧失了理智、人性和一切正常思维和秩序，发展到那种登峰造极的“造反”程度。

丁东：文化大革命与延安整风的模式很像。

李：对，一脉相承，王若水就是这样谈的。

丁东：王若水的观点大的方面和您是一致的。

李：对，是一样的。从延安整风起形成的一个人的思想意志统治全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发展为可以由一个人随心所欲、任性胡来；全党、全体人民、整个国家被一个人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浪漫也好、任性也好，疯狂地搞到文化大革命，把社会和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追根寻源，这种彻底地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也忘记《共产党宣言》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根本宗旨的做法，始于延安整风。共产党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它所追求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应该是物质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而延安整风恰恰就是要整肃人们头脑中自由的思维，直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依旧没有变动。

我认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有他本人主观上的问题，客观上，那些抬轿子的人也起了很坏的作用。林彪最后吹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人类几千年才出现的天才”，什么“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毛泽东之后，轿子不可能那样抬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承袭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一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江泽民当政后，经济发展取得代价很大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如旧，因此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全国上下左右一派腐败的局面。面对如此的危机，还是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党还是永远的“伟光正”，党还是必须领导一切，还是要将全党、全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说法之下，还搞这种名堂，没有任何长进。如果我们不从观念上根本改变延安整风后形成的：党总是绝对的正确，党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永远光荣、伟大的这个荒唐的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无从谈起。

当然，共产党能够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有它的原因和基础。从共产党自身来说，它是革命党起家，不可能有法律观念，因为讲法律，就不能闹革命，讲法律，造反就没理了。可是得了天下以后还这样干，完全忘记了古训：“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自古以来，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老百姓当奴隶当惯了，少数人愿当奴

才。三个代表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代表不了。

王实味冤案的教训

关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前面已经简略谈过，这件事还可以细谈一下。因为一九六二年毛泽东还将此案定性为“反革命”。没有李维汉的认真负责和温济泽努力清查到底，王实味案还是难以彻底平反的。我为《王实味冤案始末》写过序言：“记住温济泽的最后留言”文中，也谈到他同此案的关系。

王实味冤案由李维汉“引发”，康生定性，毛泽东参与造成，经过五十年后，到一九九一年才彻底平反。李维汉是党的元老，经历过王明路线与各种曲折，文革中捱整受害，终于彻悟。他一九八〇年找邓小平畅谈党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问题，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导致邓小平随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篇讲话，论述封建专制传统对我们党和国家体制的种种严重危害。这时李老已八十高龄，以带病之身写回忆录，还历史本来面目。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为王实味平反，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李老为该院领导。他说：王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是他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这一大案、难案。可以说，没有李维汉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王实味的冤案是难以彻底平反的。我们党内像李老这样的前辈实在是太少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文中批评延安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等级制度”现象；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号召大家向“大人物”提意见。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不安，曾深夜到研究院看了墙报，当即提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于是研究院的“整风运动”转为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毛还下达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斗争。于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份，中央发布了康生做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大批逮捕“失足者”。

温济泽和王实味都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一九四二年整风时，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十一日，温济泽写的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日记，曾在六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后来康生插手，一九四三年四月将王实味逮捕，用逼、供、信的办法，将王打成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和“五人反党集团”的头头。一九八二年李维汉去世前，嘱托温济泽找有关部门为王实味彻底平反。经过多年努力，王除“特务问题”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注释中平反外；所谓“托派问题”，到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经过多方查证才作出平反决定。一九九二年一月，温老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在另一篇《为什么这

样"左"》的长文中，他总结王实味冤案的六大教训为：一、要解决历史上对托派的错误看法。二、对敌情的过火估计（当年国民党特务根本不可能混入党内）。三、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武断的恶劣作风。四、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斗争王实味搞了千人大会，"左"风压倒一切）。五、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六、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我认为这六大教训现在并未过时。

应该对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有个历史决议

那天在《炎黄春秋》开座谈会碰见一位曾在社会部系统工作的负责人。几次见到他都想跟他谈谈延安的事情，他知道我在一九五〇年就看到过唐纵日记，文革时他也在秦城关过，因此也想找我谈。我想，我们谈了之后，延安的事情可能搞得更清楚一点。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唐纵在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我觉得这个事情简直太奇怪了。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抢救运动时，延安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从白区到延安的人里面，除开那些最老的地下党人以外，大部分都是我们这样抗战前后参加革命、年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时统统被怀疑，统统要抢救。

丁东：我觉得毛泽东也不见得认为真是有多少特务，实际是以这个为借口整人，让人怕他、服他。

李锐：这当然是一种最坏的假设。

中国从近代革命起，从孙中山起，都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本人属于"五四"运动、大革命以前那一代，林彪、邓小平属于大革命那一代。大革命以后到一二·九，就是我们这一代，主要的还是青年知识分子。我们这一代人对蒋介石感到无望，非常厌恶，是向往共产党的，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抗战前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抗战前夕，全国只有四、五万党员，抗战开始后，发展为八十万党员，主要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我认为毛泽东一直没有认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本质。他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知识分子，尤其高层知识分子都划属于"反革命"一类；也根本认识不到科学知识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不管有多少缺点，我们这些人是热爱共产党的，是支持共产党的事业的，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的。毛泽东那一代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基本呆在农村，可以说同当时外界的主流社会是隔离开来的。我们也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些红军的消息，知道他们到过遵义等一些情况。抗战初期，有些老同志离开苏区和红军队伍被派到大城市，但是同我们这一代人直接的接触很少，所以毛那一代可以说对我们这一代人不够了解；对于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厌恶蒋介石，会放弃城市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投奔共产党，投奔延安，不够理解。再加上

对国民党的所谓情报、特务的力量看得太大，对敌情的估计过分，加上国民党的报纸也登了王实味的文章，引起恐慌，对我们这些进入延安的知识青年采取了基本不信任的态度。其实王实味如果真是打进来的特务，国民党的刊物怎么会登王实味的文章呢？那不是自己害自己吗？连这样一点常识都没有，或者就是视而不见。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曾经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可是到了抢救运动，对满腔热情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不信任，都按特务审讯，将国民党的特务力量估计得如此之大，将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估计得那样坏，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一直到现在仍然只肯说"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邓小平对反右派也是只承认到扩大化，绝对不承认自己全错了。李逸民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延安的抢救运动99%搞错了，实际上按唐纵的说法，一个特务也没有，是100%地错了。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一九八〇年萧克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对打AB团，富田事变做个结论，清算一下。后来组织部由陈野苹牵头负责，结论都搞得差不太多了，王震起来反对，又放下来，不了了之。王震与萧克是对着干的，他们都是湘赣边区的，萧克原来在六军团是领导王震的，后来到了二军团贺龙那里，王震就没去。

现在，一二·九参加共产党的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要死光了，我们是等不到真正、彻底地搞清楚那场抢救运动来龙去脉的一天了。但是对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做出个定性的历史决议，根据至今公开出版的当年那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两岸目前公开的档案，材料应该是足够了。将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一二·九参加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欠下的这笔账继续欠下去，对我们是无所谓了，但是对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是个考验，看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勇气，做出个"第三次历史决议"，包括清算"六四"风波，以史为鉴知兴替呵！

最近，听说有中央领导人，同社会科学院和党史研究室一些负责人大谈要维护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文革中毛泽东的有些东西是正面的，写党史不能够完全批掉，对毛忠实到了这个程度！前几天我参加了一次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活动，有一百多校友参加，我原来是北京校友会的会长。武汉大学扩大了，有四万多学生，合并的学校里面有原来的水利电力大学，那个学校过去我还管过，武汉大学的现任校长原来就是那个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参加了校友会，和大家见面。他讲，明年要纪念武汉大学成立一百一十周年，武汉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张之洞，一八九三年张之洞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学堂，那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他特别讲到毛泽东，说

一八九三年也是毛主席的生日，我们武汉大学的诞生同毛主席生日的偶合很有历史意义，把毛泽东大大地吹捧了一顿，思想僵化到这个程度。当然，老一代人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很难完全解决的，他们能够说毛泽东犯过错误就很不容易了。但是大学应当形成一种自由讨论问题，多元、科学研究评价历史的学术环境。还像过去一样的党化教育，能够教育出具有现代化的德行和学术水准的学生吗？这种状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整风、抢救运动的四大总结

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影响太大了，我想将这个运动产生的严重后果，最后再总地谈一下：

一）确立了“一把手”说了算的领导体制。在整风运动伊始，整风学习委员会已超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如同后来的文革，由领导小组代替了书记处的职能。随着整风的不断深入，毛泽东着手改组书记处。一九四三年三月，在周恩来等人缺席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左右手刘少奇、任弼时纳入书记处，并以多数表决通过，毛有最后决定权，开启了中共名为集体领导，实为“一把手说了算”的历史。毛泽东随后提出的四个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成为统一于中央一把手的党的组织原则（这一发明权属于列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沿用至今。受李维汉谈话的影响，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长文，严厉批评了这种制度，但是邓自己不仅立即将此文置之高阁，很快提出新权威主义，随后又出现他制造的“六四”风波，并在江泽民接班时，正式宣告：“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二）开始了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倡导马列主义中国化，核心问题是谁能成为代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结果产生了列宁主义。在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同时，这个问题由毛的秘书张如心率先提出，他在《解放》周刊，接连发表两篇文章，要全党高举“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对王明的批判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同时，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七月六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肃清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亦有这一概念的表述。事实上，从整风开始，老一代革命家颂扬毛的讲话就不绝于耳，开始了中共造神的历史。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一百0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全面阐释毛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现在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他的遗体纪念堂，参观者络绎不绝；新华门前的边墙上，还刷着大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左”翼人士还在怀念文革。中国不熟悉欧美的西方文明，在英语中“个人崇拜（personalcult）同“邪教”是一个词。我们现在的中央领导中有不少人还不同意普世规律，还反对三权分立。

三）进一步发展了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内战时期，一九三〇年打“AB团”起的“肃反”共杀了10万人，是以武力镇压和刑讯逼供解决的。延安整风从王实味案、张克勤案开始，通过网罗罪状，采用刑罚“逼、供、信”等手段，引诱“坦白”，违心认罪，后来发展到开群众大会，坦白标兵做报告，互相揭发，乃至出现所谓“分析特务”的认罪。这种形式的政治运动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纵容了群众性暴力，产生了“红卫兵运动”。

四）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另一大“成果”，就是给知识分子、尤其知识青年，戴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紧箍，只要一唸咒语，就能让你服服贴贴。刘少奇“论党”等文件，宣扬做驯服工具，实现了奴隶主义对党员的精神控制，使讲假话、大话、空话流行，使告密者找到滋生的温床。

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当然是成功的，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识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阶级性、党性，消灭了一切人性，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但是，这场运动造成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肃反、反胡风、反右……，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一直到文革，创造的罪名有二十多种（见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布的“公安六条”）。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平等、博爱，更不论人权、人道、人格、人性、人情，等等，都被彻底破坏和抛弃。

不认真反思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历史，直到现在仍将过去的种种错误蒙盖起来；还是要用“枪杆子、笔杆子”治天下；政治体制改革说说而已；依旧是舆论一律，绝对不准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规定的条款，实在令人痛心无已！半个多世纪前的错误做法延续至今，实为不总结教训的必然结果。

1. 陶铸的夫人曾志写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记述了这次演讲比赛，但是与事实有所不符，我母亲曾多次打电话给陶斯亮更正她母亲的记忆，陶斯亮后来代她母亲致了歉意。
2. 李鼎铭：（1881年—1947年）原名丰功，字耔（一作芷）香。陕西米脂桃镇桃花峁人，出身农家。1903年赴绥德应试，考为廪生。1913年利用临水寺开办一所国民小学，兼任校长，后又在桃镇创办了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教书十余年并开办中医馆。1941年夏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3. 《搪瓷茶缸》一文里并没有写明这个茶缸是周恩来夫妇送的，说是一个朋友帮助买的。我向父亲核对，他很明确地回答：那个茶缸确实是周恩来夫妇送的。我想，母亲那样写，大概是不想用这件事炫耀吧。
4. 王克敏（1876 - 1945）浙江杭州人，字叔鲁。曾经中过举人。1917年段祺瑞执政期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此后三度出任财政部长。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发布通缉令抓拿王，遂逃往大连。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王于该年12月14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一职，1940年3月该“临时政府”并入汪精卫

的南京国民政府，王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又任南京国民政府内务总署督办、中央政治委员等要职。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王被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同年12月25日死于狱中。

5. 即《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一九八0年十一月十七日。

热河办报



一九四七年九月《群众日报》同仁合影于赤峰报馆（地主大院），左二起鲁蛮、李锐、朱九思、张维冷



一九四七年热河林西，左起：张维冷、李锐、鲁蛮



一九四七年李锐在热河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林西动员大会，新参军民兵在台上演说



一九四七年李锐在热河林西



一九四七年热河赤峰“胜利果实”大会



李锐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承德冀热辽日报社



一九四七年林西群众大会会场



一九四七年六月国民党战俘经过群众日报社门口

准备离开延安

一九八六年我应约写过一篇近二万字的长文《回忆热河办报》，后来编入《李锐往事杂忆》一书中。现在根据记忆谈些有关情况。热河两年可说是我独当一面工作的开始。

毛泽东什么时候去的重庆，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吧？日本正式投降是在八·一五嘛。那个时候，对于日本投降，在延安的人好像没想到会那么快，没有精神准备，似乎有一种自我欣赏，认为是苏联出兵，所以加速促成了日本的投降。实际上恐怕还是美国原子弹起的作用，我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和它对日本本土的影响，估计是不够的。

丁东：前两天，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对我说，王芸生临死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过去说日本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可是苏联红军八月十四号出兵，日本十五号就投降。实际上是苏联知道日本要投降才出的兵。所以王芸生说，日本投降还是因为美国扔原子弹。

李：这是我们这么讲历史，实际上日本投降当然是因为原子弹。

丁东：实际上是原子弹炸得日本受不了了，决定投降。原来苏联、美国、英国三家说好了，苏联出兵对付日本，苏联却迟迟不出兵，直到日本马上决定投降了，他才赶快出兵占地盘。

李：当然了。我刚才看了陈云的讲话，他说苏联出兵对共产党还是有

利的。没有苏联红军进去解决了日本关东军，你占领东北就谈不上。随着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有原在苏联的周保中（金日成原来是周保中的部下）、冯仲云、韩光等一批东北抗联的老干部，大概刘亚楼也在里面，人不多，陈雷等大概都是那一批。北满有抗联的一批干部，是不是有一点部队我不清楚，有也不会很多。

丁东：北满的区域相当于现在的黑龙江省？

李：对，黑龙江。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在延安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大多数人的情绪：疯狂、欢乐，如鲁艺的人打着火把遊行，一直遊到杨家岭，大概有十来里路。把棉衣都拆掉了，八月嘛，以为马上就要离开延安了，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蘸上煤油，当火把点。其实很多人后来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撤离延安。而像我这样在报社工作的人又是一种情绪：就是对整个形势的担忧。我在《解放日报》国内版一直管包括军事方面的评论，所以头脑比较清醒，并没有很多的喜悦，马上关心到一个问题：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考虑到恐怕会打，而且倾向于认为非打不可。我的《龙胆紫集》“延安杂忆十首”，最后一首即写此种心情：

昧旦争传倭寇降，山沟火炬喜如狂。
夫妻默默窑中坐，天下谁家待较量。

我同那个时候的妻子范元甄两个人坐在窑洞里心情很沉闷：日本投降以后，国内的局势怎么样？前途是什么？觉得个人要做离开延安的准备。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者到大后方去，或者到前方去，不会再留在延安，而且估计我们绝对会是最早一批走的，因此准备得很积极，到了非常具体、非常细小的程度。譬如：我有一口箱子，得卖掉，大被子也要卖掉，认为绝不会在延安过冬了。那个时候中央有一个总方针：向北发展，守住华北，争取东北，向南防御（考虑对国民党和谈有个让步，江南的部队撤到江北来）。根据这个总方针，准备调延安的部队和干部到热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走出延安，北上承德

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1]以后，延安党中央由刘少奇主管。关于解放区全局的安排，毛泽东去重庆前，中央就做了这样的决策：党中央迁出延安搬到热河，以此为根据地，联系整个东北和华北。因为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承德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决定中央撤出延安后，到热河落脚。日本占领时期将东北分为九个省，热河省是延安通往东北的门户，省会是承德，包括了赤峰、朝阳这些城市。那个时候的命令是这样的：山东调三万部队到冀东，协助冀热辽肃清所有的伪军，开辟热河，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且扩大冀热辽军区，以

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由李富春去打前站。刘少奇在电报中说："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同热察省并且有全国各个解放区同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就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所以那个时候把控制东北和冀热辽作为关键。实际上毛泽东后来并没有走，留在了延安，只是中央工作委员会搬到晋西北了。随后冀热辽改为分局，属冀察晋中央局管。

到一个地方必须首先把报纸办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李富春就去找博古，向他要人。博古就找我谈，让我参加冀热辽中央局打前站的工作，去独立办报。当时在《解放日报》的年青人中间，吴文涛、吴冷西他们进入延安时，或是进陕北公学，或是进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之后安排报社工作，没有很多地方工作的实际经验。而我在进延安之前，就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过，当过省青委书记，独当过一面。前面讲过，博古当时是南方局负责人，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后，他到过湖南邵阳（长沙大火后，省委搬到此地），向省委全体会议作传达，我是会议的秘书长。一九三九年秋，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是湖南代表，在会议上听他作报告。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办后，我从中央青委调到报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因此他很了解我，所以选了我。当然还由于我在报社工作比较出色。我立即同意了。

那时，我的前妻范元甄调到《解放日报》有半年多了，她原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过记者，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区办报。俩人被安排跟着打前站的杨家岭大队走，有几十个人，直接去热河。大队的负责人是刘秀峰，知道这个人吗？做过建设部的部长，解放战争时是张家口的市委书记，后来到了华北局。我们就马上做准备，首先是交通工具，延安牲口不多，记得给了半匹骡子带东西。我带的东西一半是延安出的《解放日报》，再就是在杨家岭的中央图书馆找到的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另外我自己还有点东西，有些书，合起来有一百多斤。我自己的东西中最珍贵的是毛泽东的两篇社论手稿，我在报社后期管社论，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其中一篇谈生产运动的，"毛选"中没有收入。（这两篇社论连同他写给湖南老朋友的两封信，在长沙时，我裱成册页，题名"当代墨宝"。）《龙胆紫集》中有诗记述：

字若龙蛇笔有神，征途万里总随身。
桑干河渡曾浸水，手迹珍藏见寸心。

那个时候邓力群正被下放到中央图书馆做管理员，是他给我挑的书，大概挑了好几十本。

丁东：你们一共有多少骡子呢？

李：好像有五六头，刘秀峰有一匹马，可以骑，一般队员只有驮行李的骡子。

丁东：是任何人的行李都可以驮吗？

李：个人的行李有限制，每人二十斤。我自己随身背的衣服包，为了轻装，大被子都没有带，只带了一床小的，我分到的半个骡子就是给我驮资料。

丁东：您这半个骡子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是因为级别呢？

李：工作需要。那个时候在延安级别是大灶、中灶和小灶，就三个级别。毛泽东他们是小灶——特殊灶，高级干部吃中灶。在延安《解放日报》，陆定一、余光生他们吃中灶，我们吃大灶。衣服只分两种，毛泽东他们是一种，我们是一种。

所谓大队，也不过三、四十个人，男男女女分成两三个组吧。我记得是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五日从飞机场排队出发，李富春特来送行，还同我谈了几句话。杨家岭大队的队员中我现在记得的：一个在杨家岭管生活的行政处长，陕北人，姓张，非常好的农民干部，做事非常细，大队的骡马都归他管；杨作材，他是我武汉大学的同学（在学校时名杨克穆），比我高两年，一九三六年法律系毕业。他家在九江，是搞房屋建筑的，他虽然学法律，也懂得技术，会盖房子。他在延安最有名的事就是负责设计修盖了杨家岭的大礼堂，一个跨度很大的拱形建筑，没有梁，石头砌的，可以坐好几百人。那个时候他是在王家坪的总参工作，英文很好，美军观察组来时，给叶剑英当过翻译。我跟他在一个小组，他是组长。他去世前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我们是好朋友。

已经是多少年没有走路了。从延安出发，头两天大概只慢慢地走了三十里，后来五十里到六十里，也就这样一个速度。有一两匹牲口女同志可以轮流骑，我是一直走的。我们经过清涧、绥德、到黄河边的佳县，韩天石那时在佳县当县委书记，他是在中央青委精减以后去的那儿。我记得是在佳县过的黄河。过了黄河就进入山西，到达晋西北解放区的忻县，由此再往北一直走到天镇，就很兴奋了。为什么呢？天镇可以坐火车到张家口。那一路虽然一直是走，相当累，但是非常愉快，非常兴奋。这一路都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整个陕北都是解放区，清涧、绥德、米脂都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只有榆林还不是，是邓宝珊的，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带着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那里。天镇那时已经解放了，也是我们的地方，从那里一直到张家口都是解放区，那条铁路也是我们的。那一路确实是喜气洋洋。《龙胆紫集》中有两首“离延安赴热河”，其中第一首记下了这种心情：

宝塔山头映曙光，人欢马啸整轻装。
苍龙已缚魔犹在，红日将升夜岂长。

到了张家口休息了半个来月，把我们每个人都安排得很好。在路上大家都睡在一起，集体睡觉，夫妻没有可能同居。到了张家口就照顾了，我

们单独一个房间，范元甄就是在那里怀上的儿子。我上次讲了，范元甄在延安早产过一个孩子，还打过两次胎，那时不能有孩子，可是一到张家口就随意了。在张家口我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去参观《晋察冀日报》。那时《晋察冀日报》搬到了张家口，用转筒机印报，大转筒机，用卷筒纸，几万份报纸半个小时就印完了，在延安根本没见过。在清凉山是平板机，一张一张地印。《晋察冀日报》当时是邓拓负责，他大概有事没在，因此我跟谁有了一面之缘呢？张春桥。张春桥是副总编辑，由他接待，我们打着《冀热辽日报》负责人的牌子，参观了小半天，一边看，一边聊。看了印刷间、排字房。在张家口，就记住了这两件事情。张春桥好像没去过延安，搞不清怎么到了晋察冀，他原来在山东，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个什么有名的人物。邓拓的名字我知道，为什么呢？他的名字在《晋察冀画报》上面出现过，而且一直是《晋察冀日报》的负责人，所以就记住了。延安整风时，《晋察冀画报》挨过批评，登了聂荣臻的大幅照片，没有登毛主席的。

离开张家口，还是走路，最后到了承德。从张家口到承德，一路都是原敌占区，尤其长城一带是无人区。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四个字：惨不忍睹。《龙胆紫集》有诗记：

人圈经过不忍睹，烂衣烂裤野人般；
小儿炕角裸身抖，敌后创痍在眼前。

由于我们在张家口停留时间比较长，后于我们离开延安的《解放日报》的人反而先到了承德，因为东北急需要人去办报，他们要赶到东北。其中原因我下面再讲。

《解放日报》派去东北的有吴文涛、王揖一批人。由于去东北的路还没有搞通，他们先于我们到达承德后，暂时滞留在那里。驻在热河的苏联军队是九月份撤走的，将承德市全部交给了我们，《解放日报》这些人就先接管下热河省原有的一张报纸，大概叫《中苏新报》，后改名《大众日报》。我们这一行人到了承德后，吴文涛就将报纸交给了我们，几天之后他们就去了东北，这是十一月下旬左右了。报纸归热河省委管，书记是胡锡奎，我和范元甄两人负责，有个副手林采，他原来是冀东报社的前方战地记者。同延安的记者比，林采水平和文笔差了些。冀东的负责人李运昌，当时是热河军区司令员（他后来和李昌住一个楼，他是李大钊的侄儿、李葆华的堂兄，年纪可能比李葆华大一点）。到十二月，也可能是第二年，一九四六年的一月份，冀热辽分局正式接管了报社，《大众日报》就不再归省委管，报纸也改名为《冀热辽日报》。

热河的地位变了

前面说了，延安《解放日报》一干人要赶到东北。为什么呢？我们离

开延安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的总方针有了改变，决定不再在冀热辽设中央局，而是尽快拿下东北，立足东北。这个事儿你们知道不知道？报纸上好像都登了。日本刚一宣布投降，朱德和毛泽东就发出命令，要日本向我们投降，共产党的队伍要接收他们所有的占领区。冀东北地区的曾克林，动作神速，率领部队从冀东一下子就出了山海关，先于国民党的部队到了沈阳。苏联红军驻在那里，他们的司令一下子搞不清楚曾克林是哪方面的。曾克林告诉他们，自己是共产党、八路军，红军不信，说要到延安去弄清楚。他们派了架飞机，让红军的一个负责人同曾克林一起飞到延安。那当然一下就搞清楚了。毛泽东不在，刘少奇立即决定派人去东北，乘红军的飞机，马上走，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变局。那架小飞机可以坐一二十个人，有彭真、陈云、吕正操、林枫、王首道，大概还有王鹤寿几个人。这一飞机人决定了什么呢？独占东北。

丁东：抢下东北，是不是因为陕北等地区都不发达，东北是比较发达的地方？

李：陕北当然很可怜，只有饭吃。当时的概念是这样，但是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到了东北以后才知道。

丁东：这着棋到底是毛泽东走的，还是刘少奇走的？

李：恐怕主要是刘少奇走的，毛泽东在重庆，刘在延安主持工作，通过电报与毛泽东交换意见。

丁东：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个电视节目，好像比较突出刘少奇的功劳。上边走这着棋，下边的干部对于大局心里清楚不清楚？

李：我那个时候心里是清楚的，因为富春跟我谈了话。

丁东：当时用什么人前前后后有变化吧？一开始不是李富春和林彪去冀热辽打前站吗？

李：对，曾克林坐飞机到延安以后变了。林彪走在山东的路上收到电报，让他去东北，李富春也去东北，由程子华到热河，冀热辽从中央局变为分局，由晋察冀管。

十月底，中央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第一、二副司令员分别是吕正操和李运昌（因为李运昌抗战时在冀东，一九四六年一月从东北调回热河），彭真一直在北方白区党，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有功，到延安后，毛泽东才熟识，很看重，取代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党校工作。陆陆续续到达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二十四人，占七大七十七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有张闻天、高岗、彭真、陈云、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恒、林彪、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程子华、吕正操、王首道、谭政、刘长胜、乌兰夫、万毅、古大存、陈郁、肖劲光、罗瑞卿，还有陈正人（当时尚未入中委，是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张闻天、高岗、彭真、陈云是政治局的。其中程子

华、萧克、黄火青、杨青、赵毅敏留在热河。开始中央总的方针是“关门打狗”，山海关关上大门，我们全部占领东北。那个时候，已经接收了四、五十个城市了，四平街以南，哈尔滨以北，佳木斯以南都有了我们的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对东北局的指示是这样的：竭尽全力，大战全东北，万一不成，也造成对抗的力量，以利将来谈判。大概后来看不行了，让出沈阳，死保长春，死保四平，而不是建立农村根据地，彭真就是执行这个方针的，叫做保卫马德里。在军事上要拼，就是拼主力呀。彭真建立根据地是有经验的，军事工作的经验少一些。晋察冀主要是在平山那一带，仗没有彭老总他们打得那么多。四平一役打了十多天，损失非常大。林彪下决心，“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下令撤退，不打了。高岗跟我详细谈过东北解放的全过程，他和林彪、罗荣桓、陈云，还有黄克诚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于是硬将彭真挤走了。彭真是一九四七年初从东北调到中央的，此后，东北的领导集体为“林、罗、高、陈”，前两人管打仗，后两人管建设。黄克诚也曾同我详谈过这段历史。

那时延安并不知道东北的具体情况，日本人占领东北那么多年，国民党也不清楚啊。情况错综复杂，大的方面是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美国同蒋介石的关系、还有苏联同蒋介石的关系。美国并不愿意东北完全被苏联控制，希望蒋介石能插进去，因为朝鲜北半部那时已经归苏联了，美国只控制着南半部，所以他们希望至少东北变成一个南北朝鲜的局面。

丁东：实际上是日本战败之后，留下的真空怎么瓜分的问题。朝鲜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瓜分，他们想怎么分就怎么分，而中国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家都不是美国和苏联能够完全指挥的。

李：蒋介石的政府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中苏两国之间有一个中苏条约，苏联人在东北从日本人手里接管的地盘，要交给蒋介石，不能交给共产党。因此不能公开地交给我们，城市还是要交国民党接管。但是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到东北一下子就站住了呢？当然这些关系随时在变化，恐怕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你看那个赫尔利在到延安时谈得挺好，一回去就变卦了。美军观察组的史迪威还是不错的，观察组派到延安来的那个戴维斯，一九八九年我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在旧金山湾区）接受邀请访谈时，还见过这个人，谈过话。

丁东：美国当时的主张是要成立联合政府。

李：对，成立联合政府，和平，不打，美国并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司徒雷登准备当大使。

丁东：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说法，恐怕不是事实。

李：蒋介石违背了美国的方针，可以这样讲，蒋介石是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我们派到东北去的干部、部队是从四面八方调过去的，作风、

水平等各个方面很不一致。

丁东：都是共产党最强的力量吧？

李：是。所以中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有一些冲突，包括那个时候有人指出毛泽东有错误，彭真有错误，指出中央东北方针有问题，我觉得这都不奇怪。应该讲，出现了一些问题，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问题在后来的争议，我所知道的争议，是黄克诚跟我讲的，从一九四五年的十月持续到四六年的上半年。

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一日，国民党由秦皇岛登陆的先头部队，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向我们山海关的守军大规模地进攻，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行军途中，山东军区的第一师和新四军黄克诚的第三师还都在徒步往东北赶，山海关就是冀东李运昌他们那一点兵力。国民党兵强马壮，十六日占领了山海关。山海关一失守，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只得绕道走了。黄克诚的新四军是从苏北北上的，经过山东，走了一个多月，疲惫不堪，最后绕到锦州以西，就是朝阳那个地方，与李运昌的部队会合在一起防守，阻止蒋介石的部队继续前进。山海关失守以后，形势就变了，东北的门户被打开，国民党向北，占领了绥中、兴城、锦西，直到锦州。中央原来关门打狗，独占东北的方针是办不到了。黄克诚就给中央发电报（那个时候中央委员可以直接向中央提意见），说这样打不行，还是要先占领两厢。我们在东北集结的力量都是徒步强行军到达的，非常疲惫。蒋介石的部队是海运到东北的，全副美式装备，我们没办法和他们比。

丁东：毛泽东那时想占领整个东北，他不知道蒋介石那边是什么配置？

李：毛考虑蒋介石比我们离东北更远，以为不如我们快。我们冀东、冀热辽的部队捷足先登，先进入了沈阳，但实力有限。黄克诚的疲惫之师，武器都没带。黄克诚同我谈，新四军在苏北接到电报：东北的好武器多得不得了，你们不要带枪械。结果到东北一看，完全不是想象中的局面，根本没有拿到武器装备（那时有个说法：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且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黄克诚讲，那时候有三方面的电报向中央建议，主要是先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占领北满等次要城市，后夺取大城市。一方面：北满的高岗和陈云，二方面：前方的林彪，三方面：黄克诚，这三方不谋而合。红军时代黄克诚是三军团彭老总那个系统的，抗战时又在新四军，林彪是一军团的，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在那个时候林彪能采纳黄克诚的意见，我认为是很不简单的。黄克诚对我讲，他和林彪刚开始在整个的东北方针上是完全一致的，同高岗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没有林彪、高岗、陈云还有黄克诚这些人的一致性，东北的形势后来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延安同意了他们的方针。于是我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撤离锦州。如果真打的话，那个损失就大了。

丁东：共产党后来为什么能用一两年的时间彻底扭转了形势？

李：林彪决定撤退，调整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在军事上讲是决定性的一步棋，保存了主力。而另一方面呢，蒋介石也打得很疲劳了，也没有力量过松花江。松花江以北，北满、哈尔滨是我们的，很富啊。这一地区从九·一八以后一直是和平稳定的。一九六〇年，我被下放到北大荒农村劳改时，当地农民告诉我：日伪时期，那里的玉米是喂牲口的，日本人肥肉都不吃的。后方北满，很富饶。另外南满呢？后来陈云到南满当书记，虽然我们撤出了南满的城市，但是坚守了已经解放了的农村和小城市。

丁东：北满和南满是指现在的哪一片？

李：北满主要是指黑龙江，整个的黑龙江就叫北满；南满是辽宁，中间就是吉林。从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到四六年的六月，蒋介石在占领沈阳、长春、锦州这一线以后，也停战了，这就使我们得到了一个休生养息的机会。后来战局的扭转有三方面的原因：打仗第一是要兵源，我们集中力量在东北自己的地盘内搞土地改革，通过土改的方式发动群众，在农村征兵，得到兵源的补充，而蒋介石的兵源没有我们发展得快。打仗第二要装备，日本人在北满的武器装备，苏联全部给了我们。第三，苏联那时是帮助我们的。

丁东：第二、三条里面还是有些文章的。刚占领东北时，蒋介石装备好，共产党装备不好。占领两厢可以扩大兵源，但是装备是没有办法扩大的。

李：那时陈云大体上跟我谈过这些情况，他是这样讲的：第一点，苏联出兵，关东军无条件投降。关东军没打过仗，是日本人养精蓄锐准备对付苏联的，可以说关东军所有的装备包括仓库里面的东西苏联人全部交给了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武器装备苏联当时怕国民党来，运到了苏联境内，后来又都全部运回来交给了我们。当然他们搬走的那些机器没有还回来，他们把鞍山的工厂都搬空了。东北解放时，鞍山这些地方我都去看过，那些大的工厂都没有复工。一九五四年我到苏联参观，看到他们的水电站装着从丰满拉走的我们的设备。

东北的最后阶段，毛泽东打锦州的那步棋是对的。林彪那时就是要先解决长春，包围长春，困死长春的国民党守敌，长春饿死了很多人哪。毛则坚持先打锦州。大概来回争论了很多次，林彪最后同意了毛的方案。所以决定东北胜利的最后的战争，毛还是比较高明的，因为他不在东北，处于战争之外，可能看得比较远一点。林彪在东北，他对具体困难知道得多一点。

丁东：毛是从全局出发，林彪不愿意冒险。

李：拿下长春是有绝对的把握的，而打锦州在可否之间。打锦州，林彪是亲自到前线去视察阵地的，朱瑞就是那次牺牲的。他在苏联学的炮兵，管炮兵部队。锦州拿下后，驻在海城的国民党第一百八十四师师长潘

朔端率部起义，热河有一个国民党的韩梅村起义。这是个湖南人，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分区的保安司令。这些起义在那个时候都起了一些作用。

困难重重的《冀热辽日报》

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了冀热辽分局的机关报，报社的物质条件同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的《晋察冀日报》没法比，相差太远。日本人占领时期对热河不很看重，不像对待东北那几个省，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设备。我们有个小转筒机，还是从锦州搞来的。原来辽宁地区分为两个省，一个辽东省、一个辽西省，辽东的省会是沈阳，辽西的省会就是锦州。纸张开始也不够，报纸只出一页，正反两面。可恶的是什么呢？我们只有老五号铅字，晓得老五号吧？五号字有两种：新五号、老五号，延安的《解放日报》用的是新五号。老五号字体大一些，所以两个版面可容纳的字数相对少了不少，不到两万字，我记得抽了条以后3，增加了五千字。

但是最困难的还是人，职工基本都是原报社留用人员，工厂不要讲了，记者、编辑，也都是留用人员。延安出来的人开始只有我和范元甄两个人，后来争取到了一个廖经天。延安时他曾和黄乃一起在王家坪总参搞日本问题，后来调到《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黄钢来了，还有个华山，晓得华山吗？

丁东：最后跟红线女结婚了。

李：对，跟红线女结婚的，他写的那个故事《鸡毛信》很有名。已经不在了，黄钢、华山都不在了。另外就是从山东来了两个县委书记，一个叫鲁森，这个人现在在鞍山，原来当过鞍山市委书记，另一个叫沈毓珂（后来当了朱德的秘书），读过中学，好像是山东一个专区、专署的科长还是什么，也是县委书记级的干部。他们都没有搞过文字工作，文字能力不行，但是从农村出来，对基层熟悉。沈毓珂的夫人叫田绿萍，是山东的初中学生，跟田纪云同过班，也调到报社工作，她现在常来我家，总有八十二、三岁了。后来又招了些从北平来的学生。这些都是解放区来的人。工厂的情况呢？有三个从延安清凉山印刷厂过来的，十分得力，管工厂，他们自己都能够动手排字。一个叫金钢、一个叫吴国正，还有一个专管印刷的师傅。现在他们好像都还在，金钢后来在冶金部工作。

报社留用人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日伪统治下的那股奴性很令人讨厌，他们过去编报都用协和语。我过去记得很多，现在忘得差不多了，比如“勤劳奉付”之类，有很多根本不是汉语。这个用法必须彻底改变。

除了人的问题，承德的办报环境也很困难。热河的军事形势是非常紧

张的，实际上等于前线，离承德六十公里的平泉就是国民党的占领区。那个时候的历史情况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国共谈判的时候，蒋介石点名要我们将张家口和承德还给他们，这两个城市是军事谈判中间的焦点，国民党非要不可，而我们坚决不给，形成僵局。所以国民党就在平泉耀武扬威。他们有个十三军军长石觉领着部队驻扎在那里，很厉害。我们在承德的部队，是李运昌领导的部队，他那时候给大家的印象很不好。为什么呢？他的那支队伍原来不是占领了锦州，打进沈阳了吗？可是国民党队伍一出关，他兵败如山倒，一仗就被赶过了平泉，丢了锦州，一直退到承德，让国民党占领了平泉。和谈之前，比华北、山东其他所有地方都打得糟糕。可是到东北后，就属他们得到的武器最好，黄克诚他们什么新家伙都没拿到。总之，我们在热河军事上处于劣势。全面情况我不十分清楚，我自己估计程子华对冀热辽的领导也是有问题的。那个时候热河是军分区，分区司令员是谁呢？最初是萧克，记得我去了不久他就被调到晋察冀去了。晋察冀是大区，驻在张家口，下面分成几个地方和军分区，热河是军分区，冀热辽是地方分局。那时另外的大区有晋西北、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东。晋察冀的军事那时是否还由聂荣臻掌握呢？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把萧克调上去了。

那时报社的困难是全面的，什么事情都要我管。譬如纸张的来源，热河纸张非常短缺，另外就是电。没有电就不能印刷，也收不了电报，报纸就出不来。电是个什么问题呢？承德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小发电厂，机组大概就是千把千瓦小时，煤要从东北运来，最困难的时候烧木材发电。后来在附近搞了一个小煤窑，勉强维持。那个电厂的厂长是谁呢？——周建南，延安时期的老熟人。我就去找他，说没有电，这怎么办？俩人商量的结果，决定用两台小机组——很小，一百千瓦小时的机组，保证两个部门用电：一个是打仗离不开电台的军区，我们那时叫做："宫里面"，因为它驻在避暑山庄的行宫里，再就是保证我们报社的用电。这样我们勉强维持着。这是纸张、电，另外就是电台。我们有个从冀东来的电台和收报员，收延安的来电，也收中央社、合众社这些外电。但是收报的质量太糟糕，特别是中央社、新华社的电报错词很多。记得有一个编辑，那个编辑也叫黄华，边区大学来的，他成天就是管校对电报。到最后他的本事到什么程度呢？电报不是都是数目字嘛，一个汉字用四个号码表示，他把所有的电码都记住了，不要查电码本了，到了那个程度。到了后来，我又找分区、找军区要电台，要他们派一个干部来。曾经找了一个红军老干部来管电台，稍微好了一点。后来报社转到赤峰、林西，那个老红军走了，又换了一个人。那个家伙差劲透顶，他从地方上找来一个成份不好的女人，闹恋爱结婚，简直不行，根本没有办法。电台的人员不行，器材也不行，我就经常往上面跑，跑分局，跑军区，从军区想办法。因为那个时候非要收延安台不可，而且还需要能够自己直接收到国民党中央台。那时还准备出内部《参考》，这是延安的经验，这样可以供分局的领导更多地了解当前的形势。

此外报纸的发行也是问题，出了报，印了上万份，却发行不下去。问题在哪里呢？东边国民党占着，进不去，北面交通不行，没汽车，报纸要靠肩背。我下去查过，有的县收到的报纸一大堆、一大堆地放在那里，根本发不下去，就拿来糊窗户。另外还有其他生活上的问题。所以热河办报的这段经历对我的锻炼很大，事无巨细，全面地管。

丁东：当时这报纸也没有定价，往下发就是了？

李：就是这样，发就是了，不卖，那个时候没有卖报这回事。

报纸与分局的关系

但是最大的困难还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些，纸的问题、器材的问题等等，都可以克服，最大的困难来自领导，分局的领导即把握不住形势，也不与我们沟通，这个问题非常难以解决。

那时冀热辽分区管几个什么地方呢？热东、热西、热北、热南，好像是还有热辽，这样几个地委。地委书记中有王国权，他后来在外交部当副部长；强晓初大概是热中地委的书记，不归冀热辽分区管，属于冀东分区。县委上头有地委，地委上头是区党委，那时不叫省委，叫区党委，区党委上头是分局党委或者是中央局。

丁东：冀热辽分局受晋察冀中央局的管？

李：对，四六年底，四七年初以后划归为东北局管。

丁东：层次还挺多的？中央局底下有分局，分局底下有区党委，区党委底下才是地委？

李：对，现在没有中央局了，现在省委下面是地委，地委下面是县委。我们的名堂比国民党复杂得多，国民党的党部是个乱弹琴的东西，美国的党更是，只管选举总统，连地方组织可能都没有。

丁东：您这个报纸是一个分局的机关报？

李：是分局机关报，原来是省委，后来有了分局以后就归分局了，由《大众日报》改为《冀热辽日报》。

丁东：分局的报纸相当于什么级别呢？

李：行政上比地委要高，职务上可能同地委书记差不多。不过也是根据归属情况变化，因人而易。比如：《人民日报》原来不归中宣部管，不算中央一级报纸，归中宣部领导后就是部级了；新华社原来是副部级，后来成为部级。

丁东：现在这个级是很清楚了，战争年代可能不是分得那么清吧？

李：党在战争年代对报纸抓得很紧，从延安《解放日报》起，即建立了一个传统，各级党的第一把手都要直接抓报纸，报纸始终是党的笔杆子。比如我在湖南省委的时候，《新湖南报》归省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管，但是省委书记黄克诚也抓。周小舟管的时候，我是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他走了，我离开报社，接他的宣传部长，虽然不直接负责报社的日常事务，但仍然管报社的大政方针。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省报由省委宣传部负责，归省委管；中央的报纸《人民日报》，由中宣部负责，归书记处管。《人民日报》后来不是由胡耀邦直接抓过吗？江泽民学了毛，抓枪杆子和笔杆子。

那个时候冀热辽分局的宣传部长是谁呢？赵毅敏。这个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河南人，延安的时候，他在中央宣传部当过科长，好像在中央研究院也担任过什么职务，解放初期是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中央联络部王稼祥当部长时，他当过副部长。那时大家都叫他赵大爷，这个大爷可以是褒词，也可以是贬词。反正我跟他接触的那一时期，他这个宣传部长一篇文章没写过，办事大而化之，对事情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是个老好人。但是他跟我谈过对胡乔木有看法，不喜欢胡乔木。他现在还在，就住我这个楼，九十九岁了。我不晓得他文革时的处境怎么样，他是不爱得罪人的。

丁东：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他在中联部接待外国的共产党和马列组织，经常露面。

李：他在国外住的时间也很长，对什么都不是那么积极，比如“六四”以后，我不是找一批人去签名吗？他就不同意。他跟我的关系那么密切，碰到这种事情，他就不干。

在热河，就是赵毅敏管报社。我碰到的最苦恼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赵毅敏不准在报纸上登战争消息，而我总是想在报纸上反映一些军事形势。写军事形势我比较有把握，在延安对全国的军事形势我都报导过，起过好作用，甚至给中央以帮助。以前不是谈过吗，那个时候我写的几篇军事评论，王家坪总参谋处搞军事的人都问：你们是不是搞来一个军事评论家？所以这方面我比较熟悉，能够掌握住形势。但是分局就是不准报纸报导军事方面的东西。我们打了败仗当然不能谈，打了胜仗也不能谈，反正是报纸不能谈军事，好像一谈就透露了我们的军事情况。又因为那时有个军调小组在承德，生怕得罪了国民党方面。我不同意，就发生了冲突。

那个时候东北希望热河能够在军事上配合他们，这样可以使东北局面好办一点。热河不干。其实热河的兵力是不成问题的，就是不想打，不愿意配合东北，希望少给自己惹麻烦。觉得承德太危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平泉顶着，一加劲马上就可把承德拿下来。程子华是这种意见的主要代表，他有一个反对速胜论的思想。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不是批评过“速胜论”，提到有个相持阶段吗？而我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会比较深，比较厉害，我就跟他争论：解放战争没有相持阶段，只有退。我先退出来，然

后反过手来打。我们从延安退出来，于力量上无损失，只是失去一点地盘而已，却分散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然后再抓住要害打，可以速胜，可以很快扭转局面。记得我写过一篇社论《战局在开始变动》，交给程子华，他不赞成。当时在热河就是那么一个局面，我当年的日记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录。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由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很多，我给在中央工作的胡乔木写过一封信。他回信说：这些反映很好，对中央了解情况有帮助。胡乔木的回信现在找不到了，我自己写的那封信的底稿还在，夹在一堆旧纸当中保存了下来，这封信当年曾在延安新华社的内参上登过。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不知你是否还在延安，希望这封信你能收到。我来承德已三个月，自从吴文涛去东北后，我就接替他们主持报社工作。此间因处于前线的环境，许多工作可说尚未纳入正轨，如，煤的供应不能保证，电力仍未完全恢复，各项问题虽能引起领导的注意，但一时还不能全部就绪。东线实力不明真相，分局不做解释，我在承德半年多，几乎没有参加过分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干部责难甚多。元霄节后，省委规定讨论两天，当会有些收获。东线失利的原因，自己无统一的传达。干部思想有点普遍存在和平观念，缺乏必须保持热河和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也还有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其它如本位主义、多头领导，恐亡症，就是恐蒋症等等，也多少存在。具体事例，不便详谈，略谈此间报纸宣传并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宣传上的保守与被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延安就播出北镇失守（北镇就在辽宁西部），蒋军将大举向热辽进犯。但这一实例性的消息当时均未能及时见报。元旦（四六年元旦），我写了一篇《保卫热河》，也被搁下，理由是特务在承德造谣很厉害，登出后人心浮动。而事实上，老百姓消息比我们灵通。经过几次争辩，始发表出来，但是还是用“延安电”，不敢说是我们自己的情况，然而敌军已逼近矣。这篇蒋军继续侵犯的消息，也是因同样的顾虑不能及时发表。蒋介石打我们也不发表，就怕老百姓动摇。最近蒋军继续进犯，为了及时发表，几次都是反复争辩后，才放“马后炮”，以致宣传攻势不能主动展开。而热河活生生的事实很多，一切都要有待延安表态，延安表态后仍踌躇不定。军调小组招待记者，已刊的消息说有冲突，而冲突的内容则怕人心不安而摒弃，不愿意报导，迟了几天，才又发表。今天的事实证明，及时发表对解释这些消息与人心安定是有帮助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宣传领导，对报纸只是个别的、不经常的联系。宣传方针好在总政还有指示，否则真是会糊里糊涂。全党办报，有的基层、区县工作还有开展，而上层反差，根本不懂得利用报纸进行工作。

城市以及不少新解放区的农村，宣传工作比一般的老区有更便利的条件，交通、经济、文化、教育及技术条件都比老区好，按道理应该有更好的开展才对，而事实却相反。此间自己没有书店，报纸因常常停电，印制少，发行慢，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饥渴得很。从领导重视这个角度来看，与国民党比更有甚之。那个邓有德（李锐夹话：一九四四年夏，邓有德曾跟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从重庆到延安，是国民党新闻系统的要员。）最近跑到北平管广播，北平国民党的报纸大小有十多家。如何从政治上、组织上、物质上重视宣传工作，是新区开辟的一大课题。首先必须统一，领导必须统一，各个部门应当加强联系、配合。比如这个小军区有个摄影组，大军区有个摄影组，（李锐夹话：小军区就是热河的军区，大军区就是冀热辽分局。）而报社却没有一个摄影记者，要不到。摄影、新闻需紧密地配合。这不比在山沟里了。（李锐夹话：延安《解放日报》不可能发表照片，因为没有制板的条件，只能发表木刻。）我觉得中央对新形势下的宣传工作应有个决定，从思想上、实际上克服目前存在的一些缺点，以快步前进。

报纸是宣传的最重要的武器，从延安出来，痛感到我们准备工作之不够。无论编辑、记者、电台都感到人手大大缺乏。看看我们各地出版的报纸，恐怕只能是以政治上强而聊以自慰，与许多外报相比，特别是在地区版面上未免相形见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除外，《晋察报》也是这样。我觉得应该设法在张家口办一个高级的新闻专校和附属联大，从各地抽调干部去受训，各地单位也要办中小型的学校及训练班。关于新闻工作的经验，各地也应很好地交流，合办专业的刊物。今后是否应有一个专管新闻事业的机构，包括电台在内，过去是军管，今后恐怕是不行了。（李锐夹话：我这个意见被接受了，解放以后成立了新闻总署，新闻总署国民党是没有的。）

陆定一同志在离开报社的欢送会上讲，今后各地的报社不应该是一个模子，然而，今天事实上还都是“小解放日报”。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地方报纸能不能登一般中间开明人士的观点的文章？对全国系列问题，如重庆事件，地方报纸是否应当及时写评论？现在是等《解放日报》表态，反正自己人手也不够。如何把副刊办得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听刘白羽谈，你对《新华日报》副刊的改造很慎密，很想阅读你在《新华日报》的讲话。

除在大城市办大报外，还应当办小报，争取一般市民。如果自己仍只有以低级趣味、风花雪夜讨好读者的小报，而没有一支有趣味、有风花雪夜，又有政治观点，内容健康、为广大城市读者所喜爱的小报，恐怕难有自己的读者。如在北平的报纸上经常看到的那种文章，这种感慨就更激烈了。

党的宣传部门，无论是解放区和蒋管区、中立区都应该有专人负责写稿，专门投给中间报纸的刊物。子冈（编者按：彭子冈）的一篇《张家口

漫步》比我们出几本书的作用还大。记得过去，我们还以外国医生的身份写通讯，《长征》大概就是陈明写的，现在自己有了报纸的方便，这方面总的做得太少。

给胡乔木的这封信即使现在来看，也还是站得住的。这封信说明什么呢？一个是反映当时热河的情况，另一个是说明我这个人从事一项工作，总是比较全面地研究问题，不是被动地、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从工作本身敞开来考虑，从各个方面、从全国范围、从传统上，从历史各方面来考虑问题。解放后到了湖南，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也跟黄克诚吵过架，他不让我随便写有关朝鲜战争的社论，我硬要写，他也没有办法。后来闹到中央，请示中宣部，那时胡乔木还比较松动，回电认为我的意见对。

所以在热河办报最大的问题是领导。分局的领导保守，有和平思想，被动，不懂得利用报纸在报导新闻的同时，写社论，写评论，就怕人心浮动。实际上报纸不公开地谈问题，谈事实，谈形势，人心更难稳定。

北平、承德，留去之间

大概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月份，军调部在北平成立了，我们共产党在那里的负责人是叶剑英、李克农，后来饶漱石也去了。除了北平，在东北，像长春、沈阳都有军调小组，李立三就在长春，热河也有个军调小组，设在承德。我刚才讲过的那个杨作材就在军调小组当翻译，好像吕振羽也在那个军调小组工作过。军调组国民党方面也有人。北平的军调部有个执行部，工作人员都住在翠明庄，那是日本人搞的将校招待所，叶帅他们都住在那里。军调部成立后，延安派了很多人到北平，于光远他们那一批人，还有周杨也去了，就准备在北平办一个《解放报》三日刊，不是日报，是张四开的三日刊。大概在二月份，我们的报纸变为分局的机关报不久，《解放报》三日刊就向张家口和热河要人，要有办报经验的人，我就让范元甄去了。热河当时那个形势是乱糟糟的，人心不定，干部都想走，华山也想去，因此对我很有意见。我为什么让范元甄去呢？是有些公私兼顾。于公，她在《新华日报》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有名气，活动能力也强。那时彭子冈、徐盈啊一大批报人都在北平，范元甄在重庆就和她们很熟悉，派她去是非常合适的。于私呢，因为范元甄怀了孕，她认为影响了她的发展，吵架吵得很厉害，闹得很没办法，让她离开，我可以安静地好好工作。因为那时候，在那样的条件下办报，一天到晚没日没夜地工作，她长期地闹下去，也很受不了。

李克农在北平军调部是负责情报工作的，范元甄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他就认得她，李克农也知道我，这样范元甄到了北平，他就让范元甄帮助他搞情报。程子华出差到北平，李克农就向他夸奖：你们派来了一个好角色。

范元甄到北平，报社给她的任务是：第一，替报社内外沟通，把外面的消息和报纸传给我们，把那个时候的整个形势状况写信告诉家里。那时北平的报纸很多（华北地区的报纸那时已经叫《人民日报》了，解放后搬到北京就变成中央的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解放后落在上海，变成华东的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后来则变成南京的报纸了），我让她把北平和各解放区每天的报纸都弄一份带回来，我则把热河每天的报纸交三十份给她，替我们在北平发到各个地区，特别是发给延安，宣传热河，起这个作用。我们的《冀热辽日报》虽然只有两面，老五号字，印刷也不好，但在北平影响很大。那个时候范长江在北平，他夸奖我们的报纸，说热河的报纸办得最好，办得活泼，认为我们的报纸有群众，接近群众，其他的报纸则面目千篇一律，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没有太大区别。

丁东：当时办报纸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订，当时就是往下发吧？

李：发。

丁东：那《晋察冀日报》也要往下发？

李：那很难讲了，不一定。那个时候《晋察冀日报》发不到热河，反而能发到北平这些城市，都是利用军调部关系，利用他们的飞机，哪个地区有军调小组，哪个地区就会看到各个地方的报纸。战争环境报纸的发行非常困难，火车不通，根本发不出去。范元甄为了搞到各方面的资料，在北平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外面的信息，特别是可以直接得到中央的信息，知道中央的动态，便于我们把报纸办得比较好一点。第二，替报社买东西。我想首先解决旧五号的铜模问题，让她在北平打听如何采购新五号字的钢摸，还派了报社经理部的负责人到北平去与她联络。

那个时候军调部的班机北平—承德，承德—北平，每个礼拜来回一两次，可以带信，带东西。范元甄从北平买了很多书回来。我们在热河，除开我从延安带了一点书以外，基本上什么书都没有。那些留用人员，根本不了解全国的情况，更不知道世界的形势，非常孤陋寡闻。所以，除开报纸以外，她从北京买了很多的书，我现在用的老《辞海》就是她从北平买回来的，两厚本，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编印的。范元甄从北平寄回来很多报纸、很多材料以后，我就把我住的隔壁房——前房，变成一个资料室。我那时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睡地铺的前后房，我自己住到里面那间去了。

范元甄在北平还起到一个了解情况的作用。那个时候北平有很多记者跑到解放区做采访，有国民党报纸的记者，也有中立报纸的记者，承德也有人来。记者中有好的，也有差的。我念一段我写给范元甄的信：“北平于前日来两记者，一名王焕仁（中央分社），一名张福东（《华光日报》）。王表现露骨进步，云抗战初到过延安，此次是途经山西、冀中徒步到平，过去是西安《国风日报》的，说认识杨庚。张则一听语气即是在

北平敌人环境下生活的，无大破绽。他们表示回平后愿据实报导这边情形，特别愿向救济总署呼吁，救济这边老百姓（他们要下乡看看）。我们可抓住其诺言，能做点好事也好。请注意其情形，详为打听告我，作以后参考。此后有记者来，盼先打听通知。”我就想，这些人回去以后，写承德、热河怎么写。热河，特别是东线，战争没有停止，那种摩擦、小仗啊，没有停止，国民党企图由点到面对热河采取蚕食政策。执行小组，就是那个停战的执行谈判小组已经去东线，老廖，就是廖经天，从《解放日报》出来后，在我们那个地方当副总编辑，他准备去，但是美国人不准带记者去。我在那封信中还说：“延安有人到平，一定详细探听对目前形势有何报告，写信告我。现在仍是自己摸索，甚苦。”那个时候程子华他们不跟你谈形势，我们对总的形势搞不清楚，办报纸，不了解形势，掌握不了啊。你看我这个信里有这样的话：“对目前形势及延安有什么报告，北平的报纸上有许多东西可以转用。”那个时候，彭子冈到张家口去了两次，报导了张家口，我看到了十分欣赏，觉得我们解放区出来的人就不如大后方的人，他们写东西写得活泼。彭子冈是以《大公报》记者的名义，他们两口子都是党员。

我和范元甄不在一起，反而比较好沟通，两人在通信中谈工作，我让她在外面多写新闻，练习多种多样的形式写稿。我们互相谈对方的缺点谈得很多，我批评她很多。我那时已经较为成熟，当然延安的经历有很大作用，但是也与在热河主持工作，独当一面，一个人挑担子有关系。这个担子很不好挑，报纸同任何工作的性质都不同，别的工作出了问题可以改，而报纸天天要和读者见面，出了问题没法改。有一点差错，大家马上就知道了，错一个字都不行。你看，我在信里是这样讲范元甄的：

但你之许多基本缺点还是由于接触基本群众的实际太少所致。即从党内来说，与中央领导同志、强的上级同级接触多，而与一般干部共事少。当然说你眼睛向上而不能向下，这不妥当，但不少事和不少人都非你所看得起。而这些事，这些人又都是现实，又非与这些人合作，事业便不能前进一步。在政治上作为一个成人是极不容易的。我们还年轻，未经过大流血斗争，几年来又关在山沟里。而中国旧社会之上层极复杂，许多人也极老练，极狡猾，希望你一步一步朝成人走去，不要靠小聪明，而真正依靠阶级的立场和判断。因此有机会，还应去接触接触城市的下层。北平的下层也是极复杂的，无上海的产业工人，也无汉口的码头夫，甚至人力车夫也比沪汉不同。北平有其独特的封建传统，了解此种残余的封建特性是很重要的。譬如北平的寓公很多，特别是抗战期中，华北各城乡许多地主都跑往北平。他们的动向与争取（分化）是一个很大的工作，而政权又不在我们手中。如可能，在上层也应逐步作些典型调查（他们的财产、子女、抗战八年变化、政治态度、兴趣、生活……）这工作要长期积累，要有集邮者的精神，发生嗜好。要报导日常的现象是容易的，但要报导这些现象的根源却非易事。我今天特去看二区斗争兴泰隆配给店，掌柜的请群众原谅，群众开始时就真想原谅他（这会开得还不好）。北平这个地方，文化

运动、学生运动有传统，市民却只有顺服的传统。那几个公园，那些小摊铺，那个天桥和市场，极可爱，但又极伤人志气。北平人的哲学很是‘知足常乐’的，不信你与洋车夫拉拉话，和伙计们聊聊天，便会知道。这八年也许有些变更，过去我所知也极少，所谈也许很皮毛。希望你真能步步踏实，去掉一切‘情绪影响’，埋头干下去。这种上层工作也是一个埋头工作。

国民党在北平影响远不如江浙湖广，与北平关系深者是西山会议派、张继一派人。这些，许多历史书你必须好好读，北平的变动史，也是中国的近代史。我觉得你没有好的读书习惯，似乎还不爱读史地书，今后必须好好读历史书，这比英文要紧。特别要熟习许多人物，许多历史派系，这与工作关系甚大。《近卅年政治史》即寄你，注意搜寻这类书看（当然这些书要批判眼光）。

对于处理北平这样一些汉奸，还不见中央的言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四十年的官僚、宝贝、祸种。搞北平的上层，特别是地方势力，不熟悉这些人的家谱、年谱是不行的。而对于封建的这一面，你过去是知识、感性很少的，盼多下功夫。看看报社的班子，名角虽多，（李锐夹话：是说《解放报》那个班子里有周杨、钱俊瑞、于光远等人。）但他们是熟悉上海、江南、华东的，里面没有熟悉北平的。陈伯达、范文澜、杨秀林倒是此中人物。（李锐夹话：杨秀林就是后来的教育部长杨秀峰，他那时叫杨秀林。他们三个人都在北平教过书。）

话说回来，到北平别的事不能做，文章可以多写两篇，杂感也可以多写多练。这里连个会改文章的人都没有。”

我还在信中还谈到对城市工作、办报的一些看法：

今晨躺在床上，曾想到以一个十三年居承德之正义人口气，向《大公报》投一稿，说明今天热河情势。因时间与可能，‘石沉大海’而作罢。但这种方式是可以采取的。我们在北平工作同志应打进所有报纸，以各种各样形式替各报撰稿，扩大地盘。

……

现在东线紧张的形势还是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

接到延安电，说你们已出三日刊，名《解放报》。以后日刊是否还改名？什么时候可出日刊？你的工作进行顺利否？（李锐夹话：她那个时候已经在《解放报》工作了。）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问题？你们恐怕也得准备特务捣乱。这是一定会有的，重庆的那套捣乱经验还不搬到北平来！想到那一种紧张，倒又想来尝尝，在家里真呆老了，整整六年！

在家里，是讲在我们自己的地盘：在延安，在热河，呆得太久，很想到国民党区，毕竟那里复杂一点，工作有味道一点。我考大学时在他家住

过的、父亲的那位老朋友叶筱松还在北平，民国初年曾在交通部做过事，此时在北平当寓公。他的儿女现在还在。范元甄到北平时找到了他家，见到了这个老头，老头儿还给我写过信。这个人就变成了叶剑英统战的上层关系，叶剑英还请他吃过饭。

那时候通信之间，谈得最多的是什么呢？范元甄到北平不久，产生了新的问题：范元甄对承德的领导不满意，离开了承德就不想再回去了，想留在北平或者去南方，而且一定要我和她一起走，一定要我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通过延安把我调出来。

丁东：那她要是真做通了叶剑英或者李克农的工作？

李：那当然可能的，就会把我调出去的。我念念这一段信：

突然接到胡政委的电话（李锐夹话：就是胡锡奎）他昨天自赤峰回来，和他们一起谈了许久。目前干部思想是一大问题。东面的不坚持工作，跑回，一般坐待和平。（李锐夹话：那个时候非常麻烦，抗战八年被搞苦了，干部不想下去，不想打仗，渴望和平，这个现象很普遍。）仍是搞东西，（李锐夹话：那时为自己捞东西，就跟现在搞腐败一样，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农民的本质所决定的，部队基本上是农民的队伍。进城了，看见人家生活好，眼红了嘛。）普遍思家。知识分子想去大城市，局面开展了，不愿意在热河，苦、没有劲。发动群众工作还只是动手做，许多思想问题未解决。正在演《李自成》，可能有一大思想反省运动。热河的根未扎下来，而干部都思迁。此问题确实甚严重。

因此又想到自己，（李锐夹话：这里我就检讨自己了。）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也是急着想出来？

觉此地领导弱，周围人事无强者，（李锐夹话：没有高明的人哪。）不如意，进步会慢，天地太小，固步自封的危险。

不愿和你分开，感情的、生活的、与工作的（尽管这个期间我们很别扭，你曾使得我精神上很苦，但我相信自己之转换这一形势）。

喜欢北平，喜欢大城市，斗争复杂，自己也适合，有兴趣。

这些对不对呢，基本上由个人出发的。当然党可以考虑调动，但北平党能否这样做呢？这边是否同意呢？我个人态度如何呢？这是一个矛盾，这矛盾前信已谈及。就个人，愿出来；就这边工作，应很好坚持下去，做出成绩。

关于工作地区，本可以就干部条件选择的。但现有一根本的区别，即解放区与国区。两个区工作是两种性质。前者是建设新国家政权、社会一套；后者是在人家政权下作反对的斗争。当然，北平比京沪还不同些。想

我们这样一些人应该在外面还是应在里面，确需很好考虑。

所以我自己对于出来不出来这个问题，依我现在情况，不能也不便表示意见，听候党的调度。当然你可以活动，（李锐夹话：范元甄在北平可以为我活动。）我现在需要很好安心工作，而且要安心长期工作，否则对这里工作会有影响，不小的影响。这种情形，我这种复杂矛盾心理，你当能体谅。

关于你之留平，及我自己情况，明天拟去找赵大爷一谈。应和他一谈，不然光这样和你写信，这是不好的。

所以我这个人还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哪。

丁东：您给范元甄写信，讲的大道理还挺多。

李：啊，很多，针对她的缺点。这个人有些毛病一辈子也不改，到最后成了那么一个人。你看她的那些信就知道了，这个人优点是很多的，她的文字能力很强，字写得比我好，悟性并不差，最后变成了那样一个人，真是可惜。

丁东：这个期间您跟她通信的频率是一周一次？

李：信都编了号码，给她写信等于写日记，有时是每天写，我自己的日记就写得很少了。

丁东：日记就成了信了。

李：后来和谈破裂，北平的军调部撤销了，范元甄在一九四六年的五月回到报社。

勉力办好报纸

我在给范元甄的一封信里谈到当时办报的一些具体情况：

很意识到自己脾气越来越急躁，许多事看不顺眼。譬如，记者们写的消息，八股、又长，不知道说过了多少次，自己碰着即动手改。改后与他们看，但经过林手照样不动，编辑部照样不动，看大样时干瞪眼。华山去了这么久未回只字，已去信叫他回来再说。社论仍是无人写，这两天我也动不起笔来。今天与赵谈，他说：那就少写些吧。因形势之特殊，前线紧张，要求为报纸开一次会也做不到……有什么办法呢？

我知道毛病在自己。急有什么用呢？鞭子只能往自己身上抽，客观就是如此。只能有这样的地步，要求高做不到，同时惹人厌，自寻烦恼，显得自己之傲慢。所以我必须下最大决心，慢慢来。什么都是一步一步改进，一蹴而就是不会有的。

这两天做事不多，看报看书较多——就多读些书吧。也这样想，反正大家都不急。

刚才刘白羽来坐了许久。他说很爱承德，好材料很多，可写一本书。也许我们呆得太疲，尽看缺点，失掉新鲜的感觉。大概还是他对的。我们怎么样从发动群众上来建设一个城市，这是一个伟大的主题。你的热河报导中辍了，能写还是写吧。这两天早醒睡在床上，就想如何以中间人士身份来写热河，投在《大公报》等刊物上。尽管只能想想，但这样的工作总是应该做。……

我在想编一本办报的书出来，予记者、编辑。

……

本市通讯员现已有二百人，真能起作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现在有不少人（女的多）想来报社工作。黄钢可能来。（李锐夹话：这是二月份的信，黄钢大概三月份就来了。）记者的稿件是无综合，写现象，长而累赘，时间性极差。我提出主要三点意见：1、要有全局的眼光，加强与市委、省委、省府、市府的联系，了解全盘工作及定时概括总结。现在新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日常的与定期的、典型的与综合的、零碎的与概括的很好配合。3、计划性，以后定期写采访中心，定期开会。

……

这两天颇有些想法：当记者，到处跑跑，多长些见识，写些好东西，真能做党的耳目。晚上和刘白羽谈，应向外面各种报纸学习，特别如张恨水、萨空了。从新闻经历来说，我们实在可怜。听说乔木在《新华日报》有一个报告，曾印出来了，请写信往重庆要一份来。关于办报各种经验材料盼为我收集一些，很想研究一下。这一碗饭要好好吃下去。

那时我每天的工作有一项，就是改大量的标题。编辑报纸标题是个很大的事情，刚开始编辑们写标题，还不完全是协和语的问题，而是根本不会标，标不出来。后来编辑部的工作逐步有了改进，大家的标题有进步。我在延安《解放日报》有一个时期管最后的清样，到印刷厂去看最后大样的清样，我就像延安时一样，坚持去印刷厂看清样，最后训练大家，要他们自己动手。为了提高报社人员的水平，把报纸办好，上级不传达形势，我经常自己在报社内部作报告，座谈时局。另外就是自己多写稿子，经过《解放日报》的改版，我自己还比较能写东西，也动员报社其他的人写。按我们从延安出来的要求，他们所写的东西都不符合规格，报纸是新闻，来稿和自己的记者写的稿子不像个新闻，你不能够报啊。你让他写新闻稿，他不会，所以得把很多东西改成新闻。报社的编辑没有经过这个专业训练，可以这么讲，当时我手下没有一个人会改稿子。他们写了，我予以鼓励，自己动手认真地改，整天到晚工作，没完没了。黄钢出了一本回忆

热河生活的杂文集，他自己写的序言中特别讲到，我改他的稿子改得好。

当时报纸的内容，我坚持一个是要有评论，这是从《解放日报》带来的传统；一个是要有社论，带一种指导意义；另外就是新闻要反映当地的形势，比如土改中的清算、斗争。我记得在承德，有一次把两个汉奸（其中一个当过热河省省长）枪毙了，报纸作了报导，写了社论，对当时的形势起了好作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有一篇社论《不要二满州》，影响也很大。社论中讲到："热河当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制造第二满州国，不能让热河再陷入暗无天日的黑暗之中。"那时热河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匪，就是原来的地主武装。东北日本投降后，那个地主武装的问题特别严重。湖南刚解放时我在湖南，国民党留下来的一些部队加土匪也很多，但没有东北厉害。高岗跟陈云联手在北满剿匪，真是把土匪搞干净了。热河北部的剿匪那时仍是个十分重大的任务。土匪刘庆明及其部下配合蒋军扑向各个县城，侵占了建昌、朝阳、北票、临渊、平泉，历时近半年。所到之处，旧满州国的头头、主任都重新上台。平泉、黄屯两市被侵占的时候，还有日本人随意地开着小汽车穿城而过。著名的战犯、刽子手王华在临渊当团长，杀人无数，说杀就杀（民谣说：杀不杀，问王华）。一些掠夺民财的惯匪，成了中央军的旅长、师长，或是地方的父母官，一些敌伪时代统治人们的机构与人事都复活了。我这篇社论写得比较活泼，说老百姓称他们为"遭殃军"，就是"来了中央，百姓遭殃。"老百姓把他们切身的经验编成这样的民谣："恨中央那太狠毒，抢民钱财把人诛。日本军，认亲父，汉奸特务钱再数。聚一起来胡乱做，硬入民宅奸民户。蒋介石啊真造孽，溜须外国害本土"。

丁东：这是真正的民谣，还是您给加工的？

李：加工的很少，这些民谣已是层层加工了。社论中还说："每个人又要身份证了，抓劳工的办法又恢复了，国民制度又来了。在建平大平房附近一个月就征兵两次，包括十七、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不论男女都入营送去当兵。满州国时代的苛捐杂税有七十二种，热河的老百姓反映现在的捐税比那时还要多，土地、人口、房屋、宰杀、拉车、乃至鸡鸭鱼肉，滑冰馆都要抽税。四月间，有一个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建平对老百姓训话时说：干脆劳工、国民，勤劳奉公的都要。日本人把底打好了，一切都应该照旧。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超过了满州国。因此，老百姓除称他们为"二满州"以外，又痛恨地称他们"赛满州"。如今受"二满州"之害的不仅是穷人，连富人也无法安身。国民党军在热河执行对半分粮的办法，你有五石，他就要二石五斗。如此一再重复地对半分下去，穷户、富户迟早都要到粒米不剩的境地。平泉街北的沙头村，一百户的村民就有五十户断了粮。现实的教育使得老百姓想往八路军和民主政府。"……等等，社论中写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我自己有一本《热河烟云录》，那时在报社写的文章大概收进去了一半，有十四、五万，共一百廿篇文章。最长的一篇是讲热河的土地关系，短的只一、二百字。

丁东：当时报纸篇幅、版面也小。

李：也不全是，那个时候胡乔木有篇文章《短些、再短些》，鼓励写短文章，对我有点影响。那个时候蒋介石的垮台恐怕确确实实是绝对的。现在有些人对一九四九年持怀疑态度，如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丁东：李泽厚对所有的革命都持怀疑态度，辛亥革命他也持怀疑态度。

李：是。但是研究历史不能离当时的现实情况。我翻开在热河写的那些文章一看啊，那个日本人搞的“无人区”，我从张家口走到热河，经过那个“无人区”，亲眼目睹那里的人硬是没有衣服穿啊。日本人搞“无人区”，把人都赶走，结果人们到外面无法活命，又回来，回来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们走过“无人区”时，自己所有的衣物，除身上穿的以外，全部捐献出来，给当地的老百姓。那是八年的灾害啊。我后来不是到北大荒去劳动吗？日本人在北满的政策完全不一样，非常稳定，搞得很好，和在战区的掠夺完全不一样。日本人的政策鬼得很。

丁东：当时共产党在解放区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比国民党区要好得多？

李：好得多。减租减息，完全倾向于农民。我在热河赤峰附近参加过挖地主的浮财，那地主真混蛋，把粮食埋在地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挖出来时粮食都变成灰了。我们就在报纸上报导这些东西。

丁东：当时共产党干部的供应是从当地解决呢？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呢？

李：我们的粮食都是从当地来，因为热河那个时候地主手上面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你知道那个“分浮财”吧？抗战八年，东北有很多地方是比较稳定的，日本人对上层人物非常照顾。在建昌那一带，就是锦州到承德的铁路以南，我到过一个蒙古人家，那个蒙古人和我父亲一样，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我进去以后发了一点“财”：满屋子的书，我挑了一点出来。

丁东：那时的政策，比如“打土豪、分浮财”，谁有权力去打，谁有权来分呢？

李：农民那，把农民发动起来去分。农村刚开始土改时，站出来的那些人，就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那样的“勇敢分子”，什么类型的都有，非常复杂，很多地方土改成了“夹生饭”。就是一些狗腿子，甚至于地痞流氓成了积极分子，占了优势，而真正的贫雇农、下中农，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东西。

丁东：一般老实农民不好意思去拿人家的“浮财”。

李：我还写过这样的社论：《消灭假农会》。农会中有假的，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有假的。这是一种规律，哪个地方都一样，天下都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是痞子运动，一般好一点的老百姓都不敢讲话，而且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基础，不像蒋介石在那里搞了很多年。你看那个陈永贵[4]，原先就是维持会的，因为他那个村子没人比他能干，他就上去了。

丁东：陈永贵就是个能人。

李：啊，有能力，没有文化，但能出口成章，做报告可以做几个小时，讲得天花乱坠。这种人在农民中到处都有。

我们的报纸有些比较活泼的东西，倒也不是什么有意去搞的，全是从下面收集上来的。比如这篇《消灭十三军》的文章，记者记述了民谣：

吃菜要吃白菜筋，打仗要打十三军。
消灭石觉美械化，热河人民有太平。
十三军，“赛满州”修人圈，要“国兵”，
收编土匪杀农会，强奸妇女活畜生；
劳工一个不能少，挖沟砍树修碉堡。
十三军，扫帚星，热河百姓眼中钉，
掉在水里往死打，莫让疯狗再横行。
去年古山攻坚战，一命归天“常胜团”，
民主联军更威风，两仗消灭六个团；
围场打得哇哇叫，十四点钟缴枪炮，
隆化承德拿下来，热河解放眼看到。
石觉“孤舟遇大风”，
如今“万事不亨通”。
砍倒大树要挖根，一定消灭十三军。

从最大的问题到最小的问题，我们在报纸上都有反映，工作方法也有反映。那个时候郭小川在丰宁县当县长，离承德不远。丰宁县发动农民土改，工作搞得比较好。郭小川写了一篇关于丰宁县的文章，我们报导了以后，还写了一篇社论《向丰宁学习》，这是四月五日的社论。后来把郭小川调到我们报社工作，我离开热河后，他就跟朱九思合作，以后就一直搞报纸工作了。南下时他留在武汉，没有去湖南。那篇社论是这样写的：

丰宁县的群众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根据该县三月中旬的报导，解放后的四个月中，全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饥寒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全县百分之九十七的村子发动过清算复仇及其它群众斗争，而且每个村庄都经过一至三次斗争。（李锐夹话：那时主要就是斗争地痞汉奸。）全县绝大多数村庄成立了农会和自卫队。他们的威信与日俱增，而且村政权都已为群

众信得过的人所掌握。

丰宁县为什么能够在短期内做出成绩来呢？这是由于该县领导上真正掌握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实行了全县党政军民干部一齐动手的办法。（李锐夹话：郭小川是从延安出来的，当年的那个整风、毛泽东思想还是有效果的，他采用全县党政军民干部一起动手的办法，这个东西程子华他们就没有。）他们的县区干部统统下乡去做群众工作，县上经常只留一个人在家。没有这种魄力，不舍得下本钱，不动员全体干部的力量，决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然而有许多同志仍存有这种观点："都下乡去做下边的工作，家里的事情岂不都没有人管了？"他们天天喊干部少，不但自己不下去，也舍不得把干部放下去。（李锐夹话：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q 丁东：现在干部下去是扰民，跟那时候不一样。）他们那一套"正规制度"和"衙门架子"简直是神龛上的牌位，神圣不可侵犯。有的县长根本没有下过乡，或者下过乡没有过问过群众的工作。有的县工会主任几个月没有下过乡，有的建联会同志下了乡，却把佃户动员到县上来开会。党的负责干部也有同样的毛病，甚至县委组织部长都没有下过一次乡。究竟下了乡后，家里的工作是否真正耽误了呢？我们仍来向丰宁县请教：县政府的民教科长下乡后，民办公助型的村学建立了十六处。私塾得到了初步改造，群众不同意读《四书》了。说"那是走弯路的，学有用的东西是走直路。"你看，教育工作岂不做得更好了？公安科长下乡后，案件反而减少了。原因是在发动群众中普遍成立了自卫队，每个村二十人至四十人不等。人们自动禁赌，搜查坏人，捕捉土匪、汉奸余孽。村政权在积极改造中，民政科长当然比在县上更忙起来了。其他做经济建设工作的同志，发动群众减了租，又有机会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群众生产运动当然也更容易推动起来了。由此说明了一个真理：在新解放区，群众发动了，群众站起来了，一切工作都会有办法，都会有生气，都会做好。否则，就会一切都做不好，就将一事无成。嚷干部少，家里的事无人管，那只能被看是作一种遁词。基本群众的普遍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这里没有任何机可投，任何巧可取。只有过了这一关，我们才能走上平坦大道，一切工作才会有基础，才会顺利开展。上上下下的干部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群众工作的好坏，应当作为目前判断各部门工作好坏的准绳。

就丰宁县来说，他们过去发动群众主要是通过清算运动，今后普遍转入减租减息运动中去，应该继续过去的好作风——党政军民一齐下手，（李锐夹话：那个时候还不是土改，还是减租减息，并没有平分土地。）争取百分之百的村庄掀起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热河人民受封建压迫、民族压迫异常深重，要使他们从几千年的封建锁链和十四年之久的敌伪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还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不动员成千的干部下乡，没有党政军民一起动手，一致配合，而仅靠少数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努力，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我们希望全热河党政军民各级机构、各级干部，来一个大动员，来一个下乡运动，把热河的

广大群众普遍发动起来!

丁东：现在我就想，当时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几招经济政策也是很厉害的，因为人还是有一种对公平的想往，共产党他缩小了贫富差距，而且当时干部相对比较廉洁。

李：共产党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基本问题是农村，他管的事情都是农村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热河就感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干部一进城，麻烦，还不如不进城，过了八年苦日子，进了城以后就想到自己。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在日记里面、信里面都有自我批评。批评什么东西呢？到了林西以后，那里很冷，到零下四十度，又没有取暖设备，写字时墨水瓶都冻住了。没有墨水用，你怎么写字呢？冻得没法工作，而且有一次冻病了。热河军区那些部队干部一进林西就解决什么问题呢？做皮衣、皮裤。我也向人家学习，做了一套。事后自己很难受，谴责自己。

丁东：当时是用自己的钱做呢？还是公家统一做？

李：当然是公家的钱，公家照顾。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明确的等级制度，但对机关首长是可以照顾的，当然部队里面更厉害了，所有那些我碰到的部队头头都有皮衣服。

丁东：做皮衣皮裤是做到哪一级呢？比如像您这报社算是哪一级的干部？

李：没有规定，当时就是一两个人。

丁东：您是报社一把手，那做皮衣皮裤是您自己决定给自己做呢，还是上级决定给您做？

李：看着各个机关都那样干，我一提，我们报社那个管事物的人马上就给我办了。回忆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丁东：因为部队是军事共产主义，他的供给制是采用配给的方式，但又不是平均的。

李：这个在部队里面有明确的规矩，地方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延安时代有过，解放战争时没有。进湖南以后，就比较好办了。为什么呢？因为供给制对有家的人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稿费，在热河就几乎没有稿费制度。

丁东：像当时的纸张等都是调拨下来的，也不存在一个经济核算问题？

李：那个时候还是供给制，纸张是东北供给，就是打报告要，其他就是分区给我拨款。报社自己也搞些业务，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解决零用钱的问题。

丁东：那时报社这些人的待遇是全是供给制呢，还是有的人是供给

制，有的人是薪水制？

李：全部是供给制。

丁东：留用人员呢？

李：我记不太清楚了，留用人员好像不同一点，好像还是保留了原来日本人在时的薪金制，因为他要养家糊口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法币[5]跌价，边币——我们自己的钱上涨，比例一天一个样，变化得很厉害。

丁东：那就是说，法币在热河也可以流通？

李：还流通，但是市面上尽量让边币占领市场，减少法币的流通。

丁东：日本统治时期的那个钱不能流通了？

李：那个钱大概全部作废了，那个时候到北平去买东西全部用法币。

丁东：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占领到哪儿，就有一个钱的问题。比如说热河，原来日本占领时期，他肯定是用一种钱。

李：都有自己的钱啊，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钱，陕甘宁边区有陕甘宁边区的票子，晋察冀边区有晋察冀自己的钱，都有自己的票子。原来在江西不但有自己的票子，还有自己的银行。

丁东：那时，热河是用晋察冀的票子，还是自己印票子？

李：好像没有单独的票子，是用晋察冀的票子。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可能用的是晋察冀的票子，我从前还保留了几张。

丁东：像您这种供给制生活，也多少得给发点零花钱吧？

李：有一点，不多，但是比在延安要多一些，我的信里好像写了一些这方面的事。

丁东：那像范元甄到北平工作，她用得就多一些？

李：她的钱就多一些了。她带去买东西的钱那是要报账的，有经理部门直接管着，买了什么要有发票。经理部门就是分区管财政的人，那个时候管财政的人是高自立。这个人你们都不知道，原来陕甘宁边区的，大概是物资厅长还是财政厅长，老江西干部，当年很有名的，去世的比较早。

热河办报小结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我的长子范苗生于撤退途中。十一月份报社迁至林西继续办报，范元甄和报社家属暂时退

到齐齐哈尔。后来局势稳定下来，家属又都回到热河，范元甄则坚决不愿回报社，就留在了东北。

承德是个过路的地方，各个地区、特别是延安那一带来的、华北来的人都先经过这里落脚，再去东北，这些干部就向东北局告状，都说热河不行，反映到西满军区，那时西满分局书记是李富春。其实那个时候冀热辽分局的领导班子整个地讲并不弱，副书记有黄火青，还有赵毅敏、欧阳钦，他那时候叫杨青，后勤部长是张令彬，后来当过总后的部长，司令员开始是萧克，主要就是程子华领导不行。

丁东：没有开拓精神？

李：很怪。程子华人呢，其实是个好人，长征干部，四方面军的，大概和徐海东一起，好像在二十六军，郭述申是政委，最早接触陕甘宁边区的就是二十六军，斗过高岗他们。后来程子华找高岗交流过。高岗跟我谈过，是郭述申的直接责任，程子华没有责任。最后，一九四七年的十月高岗来了，在热河呆了近半年。

丁东：高岗厉害？

李：厉害。他来了以后，分局的会议每次我都参加，我就更看清楚程子华了，他简直不行。大概是一九四八年年初，程子华被调到前方打仗去了，黄克诚到冀热辽分局担任领导。我自己则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高岗回东北时，和他一起到哈尔滨探望范元甄和长子，就留在东北局作了高岗的政治秘书，没有再回热河。我走了以后，欧阳钦也离开程子华，跑到东北。黄火青后来到晋察冀区党委当书记去了，胡锡奎也走了。

现在回忆承德这个阶段，那张报纸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影响范围不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突破分区的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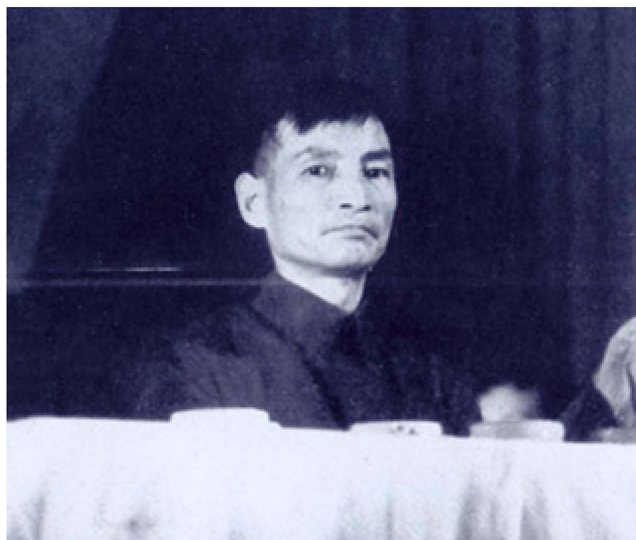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是于1945年8月28日飞离延安赴重庆和谈的。
2. 赫尔利：（1883—1963）全名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曾担任过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1944年8月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11月7日从重庆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会谈，后接任高斯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因协调失败，于翌年11月20日辞职回国。
3. 即缩小行间的距离。
4. 陈永贵：（1915—1986）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农民。1942年日伪时期曾任村伪维持会代表，后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出任村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1964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同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不久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文革中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在京病逝，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5. 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国家信用法定货币。1935年11月4日起，规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取代银本位的银圆。1948年8月19日被金圆券替代。

东北一年半——给高岗、陈云当秘书



高岗在东北



陈云在东北

给高岗当秘书

在延安时，我同高岗没有直接接触过。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我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主管中央青委的是陈云。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次，学习唯物史观，教员是艾思奇，我们中央青委几个人（我、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后来有蒋南翔、黄华等）都去听讲。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也参加学习，总是坐在角角上，从不作声。这说明他与陈云的关系。那时，他还没有把自己看得有多了不起，党也没有把他抬得很高，他没有后来那种霸道的味道。

以前讲过了，抗战胜利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出延安到热河办报，一九四七年十月赤峰闹鼠疫时，有一天，高岗和秘书刘家栋（刘在延安时曾任陈云秘书，我们认识）突然来找我，高岗穿着一身防弹服，吓了我一跳。当时分局和其它机关都已搬到乡下去了，只有报社（我任社长）留在赤峰，因为乡下没电，离开了电力报纸没法出版。晋察热辽分局这时已归东北局领导。一两年来，在热河工作过的和路过的干部，到东北后，都反映分局领导薄弱，问题甚多，因此促成了高岗亲自来检查。我立即向他谈了我对分局的看法。

高岗到赤峰后，没有先同分局领导见面，而是直接下到农村考察，跑了半个来月才同分局领导会谈。他又让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农村了解情况，证实他的看法。原来中央开土地会议时，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后来当过人民大学校长）向中央报告热河土改非常成功，得到中央表扬。但实际上很粗率，假农会多，坏人当道，贫雇农没有真正翻身。高岗后来在分局做的工作报告，是我帮他起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还根据晚上收到的中央文件改正了报告中的一个错误。他后来又到冀东视察了近一个月，一九四八年二月返回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时，我以探亲身份随行。

上次谈了，范元甄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随报社家属撤到东北，那时西满分局在齐齐哈尔，分局的书记是李富春，分局有张《西满日报》，范元甄便带着孩子留在了《西满日报》社工作，报社的社长叫王阑西，解放后当过文化部副部长，这个人好像现在不在了。后来热河形势好转，撤到东北的家属都回到报社，范元甄坚持不回，转到阿城糖厂去任副政委。我跟高岗到哈尔滨，就是想说服范元甄回热河。大概因为缺一个笔杆子，到了哈尔滨高岗就让我留下给他当政治秘书。公私兼顾，我就留下了，正式当他的政治秘书。我跟高岗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住楼上，我与他原来的秘书刘家栋住楼下。

丁东：那时候范元甄做什么？

李：范元甄就赋闲了。我到了哈尔滨以后，她从糖厂退出来，正好东北局成立了一个巡视团，张闻天当团长，记得范元甄好像在那个团里挂了个名，没有再做什么具体工作。

丁东：那后来您到沈阳之后呢？

李：我到沈阳之后，她到了辽宁省总工会，是和宋平在一起的。

在不久后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高岗决定派黄克诚到冀察热辽分局当书记，原分局书记程子华专任军职，到前线打仗。

担任高岗政治秘书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东北局总结土地改革会议，这个会开了一个多月。高岗在冀察热辽分局视察工作那段期间，东北的土改由凯丰负责，左得很，侵犯中农利益，杀人、死人很多。我还记得在会上黄克诚批评凯丰：同江西时期一样左，只是因为支援前线，战争胜利关系，严重错误被掩盖了。我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在《东北日报》上两整版全文刊载，文中坦诚检讨了所犯错误。二是参加内蒙高干会议，也是一个多月。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工作也归东北局领导，东、西蒙统一成立了自治政府。高岗只在会议初期到场，最后一天作报告，我则天天参加。内蒙的工作有许多特殊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土改工作中，除了也存在左倾错误外，还犯有轻视蒙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汉族干部完全不了解蒙族人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出现拆庙宇、焚经书、打喇嘛等事件。会议结束前，我将会上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向高岗作了汇报，为他起草了总结报告的全文。后来这个报告以高岗《在内蒙高干会议的讲话》为题，也在《东北日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新华社做了广播报导，解放区的报纸都转载了。

丁东：您在东北后来和彭真打过交道吗？

李：没有，我一直没有和彭真打过交道。我以前讲了抢救运动中彭真和我之间的问题，我始终没有机会同彭真单独谈过话。

丁东：跟林彪有吗？

李：没有。林彪在东北局会议上根本不发言。我跟林彪后来见过一面，是收复海南的时候，他从广东坐火车回北京，也可能是回武汉，他那时不是华中局书记嘛？经过长沙，大概停留一下，我们省委十几个人在黄克诚带领下到火车站迎接他，我当然排在很后面。他却看见了，说：哟，你也在这里。

丁东：他还是认识您。

李：认得。因为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局面很稳定，东北局在哈尔滨开会，我列席所有的会议，他有时候也来参加。我们这些人当年对林彪的印象好极了。

当陈云的政治秘书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即回转东进，准

备解放沈阳。高岗在哈尔滨他住的楼上，召开东北局几位领导人（陈云、林枫、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张平化等）的紧急会议，讨论接管沈阳的总方针。我也参加了。由谁去负责接管沈阳？李富春、张闻天想去，高岗考虑了以后，还是认为陈云合适。那时跟着高岗工作，由于日常太清闲，除了起草一些电报外，无事可干，我几次要求下去做一些实际具体工作。特别是后来马洪来了，他可以帮助高岗写东西，我就更坚决地要求离开。此时高岗便放了我，让我随陈云一起去沈阳。陈云是知道我的（前边说过，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陈主管青委的工作），也愿意要我。这样，我就离开了高岗，跟着陈云做政治秘书了。

沈阳的接管对全国影响太大了，这是中共革命以来接管的第一个大城市。会后，陈云立即集中参加接管的主要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并严格组织管理，一切服从统一指挥，包括部队在内。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陈云任军管会主任，副主任伍修权、陶铸（兼市委书记）；军事：伍修权，政权：朱其文、张学思，治安：陈龙，财贸粮食：易秀湘，铁路：刘居英，工业：王首道，房产归市政府张学思负责。这七大系统共抽调了新老干部四千多人。我们于十月二十九日从哈尔滨乘火车南下，陶铸、伍修权从前线到达专列的停留车站跟大家汇合。陶铸说，沈阳市内情况尚好，市民悬旗欢迎。接管沈阳的大方针政策是离开哈尔滨前在东北局会议上定好的，具体的实施措施都是一路在火车上谈的。至十一月二日，军管会一路在火车上开了五次会，会上决定先要解决五、六万俘虏吃饭问题，每天要准备十五万斤粮食，由朱其文负责；王首道负责解决电力供应；作出的决定细致到通知所有入城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因为市内自来水系统一时无法恢复，等等。十一月二日黄昏，军管会主要人员共乘大小十七辆汽车入城。

关于陈云领导接管沈阳的整个情况，我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接管沈阳纪实》，刊在《中共党史资料》总字第四十期上，后来编入我的《往事杂忆》一书。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局开了半个月高干会，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长文即从这次会议写起。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谈三大经济问题：财政开支、工业投资和物价问题。会议精神主要在让干部懂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改变过去习惯了的游击习气。譬如那时有人认为："铁路虽然好，但是最大的弱点是不能随便指挥，不如毛驴听话。"

丁东：您在沈阳呆了多久？

李：在沈阳呆了四、五个月，到了沈阳就和陈云住在一起了。开始住在大和宾馆，在市中心的转盘那儿，是日本人修的最好的宾馆。现在我们有地铁和高架桥了，而我那时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便利交通的转盘，感觉沈阳真大。

丁东：接管了之后，生产、市场恢复得怎样？

李：恢复得很快。陈云进城以后主要抓的是：第一恢复交通，第二恢复电力，第三是粮食、煤炭的供应；另外就是原来的城管机构人员不动，警察不动，特别是过去维持交通秩序的不动。我们进沈阳是在晚上，解除了武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有几万人，满街都是。沈阳的地下党很有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在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丁东：接管了城市之后，财政来源从哪来？企业一时恢复不了，也不能给你交税呀？

李：印票子呀，发我们自己的票子。国民党的票子停用，其实他们的货币贬值贬得很厉害，金圆卷已经等于废纸了。国民党人心丧失得非常厉害，这可能与他的腐败有关系，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城市，管理人员大搞"五子登科"（捞票子、抢房子、车子、位子，搞婊子等），各人捞个人的好处。

丁东：共产党财政上有一套。

李：就是火车上，在陈云领导下制定的全套政策以及一系列具体办法发挥了作用，贯穿到各个系统，大家都遵守。那个时候，只要交通没有问题，粮食、煤，基本生活用品供应得上就行。沈阳秩序恢复得很快，大概是第三天供电就基本正常了，市场恢复得也很快，物价稳定下来。那样快地将物价稳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云向中央报告接管沈阳的经验，对全国其他城市的接管起了很好的借鉴作用。那些报告是我帮陈云起草的，现在都收集在《陈云文选》里。

进沈阳以后除了帮助陈云起草电报、文稿以外，还帮他管了两件事：报纸、外交。那时外交有两个女翻译，一个俄语，一个英语。俄语翻译是林莉，林老——林伯渠的女儿，她与孙维世是莫斯科在一起的同学，一直没有结婚[1]。那个英文翻译后来在外交部工作，是李汇川[2]的爱人。我记得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接管沈阳时美国的总领事没有走，我们估计美国在观望。朱其文接见美领事的时候，翻译回来对我讲，说朱市长有失掉立场、失掉原则的话，对对方过分迁就。朱其文抗战时期是李运昌系统下面冀东的干部。我就跟陈云汇报了翻译讲的情况，研究以后，陈云就决定将朱的市长职务撤了[3]。

丁东：那问题还挺严重？

李：当然处理还是经过中央同意的。另外就是报纸，我主要管大样，管有关报导，像陈云接见工人代表，发表的重要谈话啊，我都负责整理成文在报纸上发表。

丁东：当时沈阳原来的报纸还有没有？

李：我们一进城就出了一张自己的市级报纸——《沈阳日报》，后来东北日报社的人马很快也到了。

丁东：当时民营的报纸还有没有？

李：民营的报纸我记不太清楚了，可以查查当时在东北的那些人的回忆录。东北国民党的报纸当然查封了。对于国民党留下的各种资源的处理，公务人员的留用，以及如何解决俘虏等等问题，沈阳军管会所制定的专门方案，后来都得到中央的认可。那个时候陈云还有过一个和平土改的思想，所以后来中央分工没有让他管农村。

沈阳城市接管告一段落之后，生活仍然是很紧张的，各条战线成天汇报，成天开会。陈云那时处还理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部队违纪的问题。陈云在部队中也是有威信的，因为对纠正原来彭真领导东北局在军事和建立根据地等方面所犯的错误（这同当时毛泽东的指示有关），他同林彪、高岗是一致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进沈阳后，部队的最大问题就是到处随便接管，乱拿东西，除了大的行动，还有个别的小部队和个人单独行动。我记得有一个领事馆，部队的人去了之后，丢了一辆自行车，是一个负责站岗的人骑走的。陈云要求凡有这种行为，部队要自己揪出来。后来部队订了很多条条，所有的接管物资一律不准动，上上下下实施严格管理。

丁东：接管财产总得有个政策界线吧，什么可以接管，什么不能接管。

李：那时候乱，接管长春的时候部队就相当乱。我们是农民队伍，游民文化。我给你讲一件具体的事情吧：热河的鸦片后来实际上变成货币了，所有从热河去东北的干部都带烟土，我原来的妻子范元甄也带过，我们那时叫“代金”，到了东北可以变钱。

丁东：鸦片卖给谁呢？

李：还是出境，同国民党那边交易，交换物资的时候当作外汇使用，因为不能用我们的票子向他们买东西嘛。我记得主要就是布匹、日用品的交换。那时在前线，一些国民党同共产党没有开战的地方，双方的部队实际上也互相换东西。

丁东：当时共产党这边有人抽鸦片？

李：干部中间没有，老百姓中有，日本统治热河时，相当多的农民都抽，我见过那些抽鸦片的人的手臂，就像苦瓜一样。日本人在热河的罪恶之一就是种鸦片，抽鸦片，我在热河的报纸上还就烟匪问题写过社论。

在大和旅馆住了大约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搬到离它不太远的一栋房子里，是原来国民党的一个银行家的旧房子，日本式的建筑。两层楼，分为两边，陈云住一边，我们两个秘书住一边。我住楼下，另一个秘书余建亭住楼上（听说这栋房子现在在沈阳被保留为“陈云故居”，我的名

字也列上了）。到沈阳后，陈云第一件事是到商务印书馆，同几位老店员闲谈旧事，他年青时在上海商务馆当过学徒。当时战局的发展太快了，解放军简直是势如破竹，陈云知道自己不会久留东北，将很快离开沈阳，于是在东北各处转了一圈。我在路上帮他买了一批书。

丁东：陈云比较爱看书？

李：主要是利用书，不是看得很广泛，他读一本、两本，就要把它读通。

丁东：买书当时都是用公款吧？

李：公款。

丁东：当时买书，您个人买书是不是也可以用公款一块儿买呢？

李：那不行。给陈云买书是可以的，给我自己不行。陈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除了抽烟，听说晚年也戒了。

我们参观了沈阳的那个小故宫，也还有一定的场面，陈云很兴奋，看过后就跟我聊，问我：北京怎么样？我说：这个故宫同北京的怎么能比呢？小玩艺。北京的故宫，骇死人的。然后就一路看到鞍钢，鞍钢那时停产了，我记得平炉炼钢厂的厂房好像有几百米长。他一看也很感叹。一九三五年夏，我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实习过，对工厂的规模、炼钢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还知道一点。还去了本溪，好像安东也去了，最后转到了吉林、长春，丰满，走了将近一个月。那一个多月的参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丰满水电站。我进武汉大学的时候填过一个表格式的答案，里面有一栏：你最感兴趣，将来最希望做的是什么？我写了一句什么话呢？朱光潜那时候有两本相当流行的书，一本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另一本是《谈美》，我都读过。记得好像是后一本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忘记是他自己的话还是引用外国人的话）：人看到瀑布的时候，在感到自然力量雄伟的同时还看到风景的美丽。我就把朱光潜的这句话填到那个栏里了。在丰满看到的景象，立即让我联想到这句话。我过去没见过水电站，丰满那时有两台机组发电，大概是六七万千瓦，当年印象真是了不得（现在是几十万一台了），其他机组都被苏联搬走了。大坝当时没有修完，施工时有缺陷，我们正在补修，有苏联专家在帮助。在鞍山，在丰满，那真是看到了现代的先进的工业生产，对我来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对我后来愿意转行水电是有影响的。

丁东：鞍山的机器不是被拆走了吗？

李：但是看到了规模和生产力呀，以前没看见过。长辛店那个工厂还是皮带轮转动的机器，相当落后的，那时在全国来说鞍钢是最大的工厂了。待看到鞍山，看到丰满以后才感到，生产力多么厉害，印象确实非常深。陈云过去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工业，印象可能更深一些。另外印象深的就是东北的交通，日本人修的公路和铁路。陈云看了以后一个总的印象

就是现代化的生产力，必须走这条路，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出路。日本的武器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好，除了它国内的工业基础，就是还有东北这么一个大工业基地，而我们在内地一点也不知道。东北的城市那么繁荣，沈阳比哈尔滨更好，哈尔滨当然也有一些工厂、商店，但没有很多的重工业。日本为什么能够打中国，打东亚，还敢轰炸珍珠港，有东北这么一个基础，当是条件之一。日本一占领朝鲜，就开发鸭绿江；一占领东北，就开发松花江。日本占领东北是一九三一年，三二年、三三年就建设丰满水电站，建得很快。鞍钢也是一样。而我们中共，不知道水能发电。我们还去看了大连，看了港口。跟陈云那一趟转游就确定了自己的一种认识，对经济、对生产力的认识；认识到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大胆，跟美国人都敢干。

丁东：当时大连是不是苏联占着呢？

李：是苏联占着。

丁东：陈云去了跟苏方接触不接触？

李：通知他们了。大连我们有市长、市委书记，行政机关由我们管辖，军事上归他们，旅顺口是军港，由他们专管。

丁东：您那回去看没看旅顺港？

李：记不太清楚了，也可能去了。那一趟跟陈云的大参观，同我后来想离开宣传岗位很有关系，是感性起了作用。

不再干秘书

北平解放的第二天，我就跟陈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饭店，当夜还参加了宴会，庆祝林彪进城。然后陈云就到西柏坡开二中全会去了，我没有去，是周太和（此后做了陈云的秘书）跟他去的。我帮陈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到琉璃厂，买了一大木箱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书，是为他留中央管全国的经济做准备。

丁东：他知道要让他分管全国经济了？

李：是的，他估计到了，在沈阳时他就估计到了。但是他跟我谈过，他是想回上海工作的，不愿意留在中央。这方面我比较在行，逛琉璃厂过去我有经验。

丁东：那时买书是付的什么钱呢？是人民币还是大洋呢？

李：那个时候好像是用人民币。在北平住了一段时候，又回到沈阳，是四五月份了。然后就南下，我和陈云坐一个专列，记得还带了刚从苏联回国的李敏。车到北平以后我就离开了陈云，和南下的王首道他们联系上了。陈云很想留我，但是我不愿留在中央，延安时在中央呆了六年，呆腻

了。

丁东：那时您不愿意留在中央还有什么考虑？

李：不想再坐而论道了，想干点实际工作。

丁东：不愿意当秘书。

李：唉，留在陈云那里，那个中央机关生活我知道。解放战争那几年不管怎么样，自己总是独立干了一件事情，办了一个报，管一张报纸除了文字工作，还有行政事务什么的，个人的长处、个人的能力各方面还是可以得到锻炼和发挥的。后来离开热河到了哈尔滨，给高岗、陈云当秘书，工作性质很单一，就是跟他们开会，动笔杆子。当然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跟着他们接触了一些领导层的人和事，知道了党内人事关系之复杂。关于文字能力我自己并不怎么看重，倒是觉得自己在观察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某一种长处，发觉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这是由于知识面比较宽一些。比如对程子华的看法、对土改那个“左”的看法，同高岗能够合拍。接管沈阳对自己也是个新的经验，在许多对旧社会的政策方面能够跟陈云一致。

丁东：当时陈云说没说一些挽留的话呢？

李：当然挽留啦，一定要我留在他那儿。我说：你若去上海，我就跟你去，你留中央，我不跟你；谈到这个程度。他还是要留啊。我到湖南以后，一九五〇年他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调我到北京，要黄放我。黄克诚连信都不给我看，这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五二年我调到北京以后，陈云又让周太和找我谈，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又没有同意。我说：你告诉老板，让我做点事情吧。

离开北平南下前，还在北平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我的二姐李英华和她的丈夫，他们是从南方地下党辗转来到的。一九八二年李英华在中央党校主持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工作，当时朱厚泽、胡锦涛等人都在这个班学习。这同我当时在中组部的工作很有关系，特在此处提一下。

1. 林彪有一个远房侄女也叫林莉，她的父亲张浩是烈士，也在前苏联待过。2011年5月30日美国“文学城”网站上一个网名叫春妮的人留了这样一个帖子：“我母亲林莉的悲剧源自于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苏联国际儿童园的学生们称她们大莉莉，小莉莉，我母亲岁数小一些。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的悲剧源自于孙维世，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养女，又是被林彪看上的，而她的丈夫金山又知道江青的底细。大林莉与孙维世是好朋友，她在新华社工作。因为江青点了孙维世与大林莉的名，广播电台的军管会把小林莉的档案调了出来，背景相似，上报中央管新闻的陈伯达，就有了后面的悲剧。本来还有林彪这个椅子稍微能踩着，林彪又倒了，这下我母亲林莉彻底掉入了无底洞。在洞里艰难的生活了12年。她来过美国，在66岁时因癌症去世。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

边。我们都在美国。”

2. 李汇川：（1917—1999）北京市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50年进入外交部，历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代司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1973年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980年8月任研究所所长，1983年2月离任。
3. 朱其文：（1909—1987）江苏省如皋县范湖洲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北平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委员。1953年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越南大使等职。

南下——创办《新湖南报》



一九五〇年李锐在长沙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大姐夫唐家桢、李锐，后排左起：大姐李琬华、二姐李英华。



一九五一年李锐在长沙与妻子范元甄和长子范苗的合影

确定“归队”

丁东：您愿意搞经济，可是跑到湖南又搞了宣传？

李：那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是五月份离开陈云、离开北京的。上次谈了，在沈阳的时候我就跟陈云讲定了，他若留中央，我不跟他，要南下。

丁东：您主要是不是还有点想回家乡的观念？

李：当然想回家乡，南下就是往南走啊，要么河南，要么湖北，要么湖南，再不就是留在部队里。我就想回家乡看一看，别的地方都不感兴趣，一心想去湖南。因为范元甄诊断出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做甲状腺开刀手术，我自己到天津去报到，知道了湖南的班子主要是三个人：黄克诚，王首道，还有金明，他们都在天津。黄克诚那时是天津市委书记，还没有完全交接，是王首道同金明带领队伍先走的。

丁东：您离开陈云到黄克诚那儿，是您主动找黄克诚联系的呢？还是陈云向黄克诚推荐的？还是黄克诚提出要您？

李：都不是，细节我也记不太清楚了。黄克诚在冀热辽，冀热辽那个时候归东北局管，但是南下的这个事情还得中央决定——什么人带着班子进湖南，那是由中央决定的。

丁东：中央是由谁来定？中央也得有具体的人来定啊。

李：中央是由毛、刘、朱、周他们定的。

丁东：毛、刘、朱、周也管不到您这一级干部吧？

李：是这样的，中央决定南下后，东北局的摊子就缩小了，除了高岗留下来，其余大批的人都进关，东北局没有留下多少人。像王首道、黄克诚都算是东北局的干部嘛。黄克诚带领冀热辽的人进天津，先接管天津，之后再南下接管湖南。这是省委班子，当然同时还有接管地委的班子，我记得有三四个地委班子，武光带了一个，好像是冀东的，还有山西过去的，周惠那时也是地委班子的。

丁东：像您这一级的干部是省委定的吧？

李：还在东北时，由东北局陈云、黄克诚他们定的，我自己那个时候提出来去湖南。

丁东：您提出来，总得陈云、黄克诚他们之间商量吧？

李：对，他们商量，周小舟就是他们定的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在天津我没有见到黄克诚，工作问题是跟王首道谈的。我一到天津，冯文彬就找我，要我到湖南去当青委书记，那时李昌，蒋南翔等一些过去中央青委的人又都回去干青年工作了。我没有同意，态度很坚决。跟王首道谈了以后，就确定让我管报社，这在我是“归队”了。我本来是不愿再办报的，但是那时一方面自己还没有其他更熟练的专业可挑选，另一方面参加沈阳的接管后，确实感到一张报纸在新解放区的威力，加以有老关系，

轻车熟路，也就服从安排了。所谓“老关系”是这样的：黄克诚被调去接替程子华领导冀热辽的工作，当时察哈尔也归分局管辖，改称冀察热辽分局，于是《冀热辽日报》改名为《群众日报》，进天津的时候，这个班子一起带去，办《天津日报》。黄克诚要南下，报社当然继续跟着他走，那个班子是相当完整的，有编辑部和经理部，我当社长时的一些老人都还在，像朱九思、廖经天、谢文清等，大家都很熟悉，过去相处得也很好。

黄克诚比我们晚到湖南，后来跟我谈过原因，他在天津拖了个把月是因为要求跟毛泽东见一面再走。长征以后他就没有见到毛了。他没有去过延安，抗日战争时一直在新四军，解放战争时在东北。

丁东：七大他没有参加？

李：没有，黄克诚没有参加七大。

丁东：那他是被缺席选举的？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吧？

李：对，他是候补委员，排在很前面。所以黄克诚等到毛谈了一次，谈话内容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毛问黄克诚，进城以后的中心工作是什么？黄克诚讲：经济呀。毛说：不对，是阶级斗争。

南下

我们大队人马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多钟乘火车离开天津的，五月二十六日凌晨到了开封，在那里见到了周小舟以及省委的金明、刘型等人，过去都不认识。省委中认识的人有高文华，我去延安前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他是省委书记，彼此十分熟悉。周惠是益阳地委书记，一九四〇年在延安中央青委时就认识的。长沙市委的班子是在开封定的，有曹瑛和闫子祥，曹是市委书记，闫是市长，他们俩也是省委委员，那时候省委是不设常委的。这两个人我都熟。曹瑛原来叫石磊，平江人，我们在东北认识的，他当时是长春市委书记。闫子祥在延安保安处时和我同住过一个监房，后来在建设部工作，设计研究院的院长。他最近刚去世，是一九二九年的党员，很不错的一个人，他这个人没有被重用过，很可惜。省委下边大概有四、五个地委，长沙地委是武光，现住在我们二十二号楼一门；常德地委是乔晓光，后来到广西当地委书记去了；醴陵地委是刘什么；另外一个衡阳地委，还有一个湘西区党委。所有班子的基本人马都集结在开封，在开封住了一段时间。我在开封时就跟报社的朱九思、谢文清碰头了。新的人员中李冰封、柏原、陈牧天，都是我离开冀热辽到东北去以后，报社从北平去的一批学生中调的。其中陈牧天是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后来我从湖南转业到北京搞水电，把他也要去了。他后来在水电总局当过副局长，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成了所谓“李锐反党集团”的成员。

在开封时，廖意林和苏辛涛夫妇也加入进来。与廖意林不期而遇，分外地高兴，一九三六年暑假我们同在长沙办三日刊《湘流》，分手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苏辛涛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一九七九年改正后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负责编《经济研究》，已经去世了。廖意林文革时自杀了，尸首都没找到。

我记得在开封，听过邓子恢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子恢。那时候好像叫华中局，不叫中南局。那时全国分为：西北局、东北局、华中局、华东局、西南局，华南分局。广东、广西属华南分局，归华中局管。邓子恢是华中局副书记，书记是林彪，林彪在前线，邓子恢主持日常工作。他主要是谈接管的事。我因为参加过沈阳的接管，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

我们在开封没有停很久，六月三日就离开去武汉，六月九日进汉口，在那儿过的夏天。在武汉，为了充实我们这支队伍，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从武汉大学找了四名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其中刘海金后来被打成右派，很早就死了。后来又从中原大学调入尹正义等十个人。全报社七八十人住在一个旅馆，我和九思同住一间可以办公的房子，晚上热得睡在阳台的地上。在武汉我还见到了范元甄的家人，他们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女婿爱护有加。

在武汉停留时，记得没有听过什么报告，主要是准备到湖南办报的具体工作。我跟朱九思商量确定报社的班子，编辑头几天的版面内容，商量着哪些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应先介绍，并且写好了创刊社论：《庆祝新湖南的诞生》。报纸定名《新湖南报》，请毛泽东题写报名。

这里讲一下我跟朱九思的关系，现在我们还是非常好的朋友。朱九思也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是一九三四年进去的，他是一九三六年进去的，读外语系。九思是扬州中学毕业的，扬州中学那时候在全国是有名的中学。一二·九运动后，他是我们那个秘密组织青年救国团的成员之一。在热河的时候，他开始是在赵尔陆的纵队当政治部民运部长，后来那个纵队解散了，我就把他争取到报社当了副总编辑（那时范元甄也是个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原来在冀鲁豫边区当县委书记的鲁森。进天津后，黄钢也离开了报社，去从事原来的电影专业。我在开封归队报社，朱九思可能有点想法，因为在《天津日报》他是第二把手，一把手是原来晋察冀哪个报社的头儿，一个很老的同志，那时黄敬的夫人范瑾也在报社做负责工作。

我们是从武汉徒步进军湖南的。从延安出来到热河，我有半个骡子驮资料；从东北出来时是骑马，这时候因为南方马少，都走路。

丁东：您从北京到开封是坐火车吧？

李：是火车。

丁东：开封到武汉呢？

李：也是火车。不过好像有些人是乘汽车，走了三、四天。

丁东：武汉到长沙没有火车？

李：武汉到长沙就走路了，火车还不通。记得经过赤壁，赤壁在咸宁，我们就走那个路线进入了平江，在平江休息了一阵。

丁东：东西有没有马匹驮呢？

李：我记不太清楚了。有吉普车，但是我们没有乘过。

丁东：人走，东西在车上？

李：大概有卡车或什么车，公路是有的。从平江进长沙是坐卡车的，报社一大班子人都在车上。我印象中从武汉出来，在湖北境内，一路上农村、城市非常的破败，很贫穷，疮痍满目的样子。但是一进平江，那个小县城非常干净，非常整齐，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我写过几首诗讲南下一路的感受：

一九四九年南下过武汉（二首）

昨午方辞古汴州，
今朝喜见黄鹤楼。
故人星散夺天下，
新侣云来访旧游。[1]
堂内参经全教友，[2]
湖中渡假泛轻舟，[3]
过江踏破交通路。[4]
救国何妨作楚囚。[5]

另外一首是：

过江又见汉阳门，车进东湖思故人。
白浪掀天风骤起，莫非为我洗征尘。[6]

过平江

并非特具故园心，一过通城景物新。

土铳三千迎北伐，梭标十万欲西拼。

口丁减半暴徒在，村屋夷平草木欣。

廿载红旗曾不倒，擦干眼泪接亲人。

我是平江人，在平江停留期间，就跟那里的人有了点接触。那个时候，平江的地下党好像跟我们还没有直接接头。金明到了平江，就跟和谈代表程星龄谈和平解放长沙的事情。程星龄是程潜同族兄弟辈，同程潜的关系很接近，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为人很正直，同我有来往。后来被打成右派。

丁东：在平江您没有和您的亲属来往？

李：亲属来了一个，是我的一个堂兄，我二伯父的儿子，住在长寿街。听说我到了平江，非常兴奋，就跑到县城来了。我跟他见了一面，谈到老家的一些情况。

丁东：您母亲当时在哪呢？

李：母亲在长沙。日本投降以后，她曾回平江待过一阵，后来就一直住在长沙。

进长沙

我们在平江呆的时间不很长，然后就进长沙了。应当讲那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喽，亲人、朋友之间多年生死不知，现在一下子回来了。长沙是八月五日和平解放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新华社，报社兼任新华社的工作，每天由电台向总社发新闻。电台的人和新闻记者先进的城，做准备，我们是跟着金明带领的大队人马，随部队坐卡车于八月六日晚进的长沙。长沙城外有个东屯渡，我们从那个渡口下了卡车以后就徒步进城。地下党湖南省委组织了一些老百姓沿路夹道欢迎。长沙没有城墙，走了里把路就进了城。

进城以后我们住在小吴门口的何键公馆。何键在国民党时期当了很多年的湖南省长，抗日战争时的省长是张治中，和平解放时的省长是程潜。

何键是在香港去世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一直住在香港，没有回来。金明、我们都住在何键公馆，那时省委的谈判代表团也住在那里。公馆门口人山人海，群众围在那里，没有办法，得与市民见面：共产党的代表团进来了。当时临时找了一张四方桌子，因为何键公馆距大街——现在叫中山马路还有十来米的距离，就把桌子摆在大街口上。金明站在上面讲了一篇话，向程潜、陈明仁致敬，讲得很客气。当夜我要向总社发接管长沙的新闻稿，与金明在"致敬"还是"致意"这个措词上发生了一点争论，因此，后来在省委工作中，金明对我有意见。

在听讲话的人群里面我看见了一个熟人，长沙人——曹国枢。一九三八年我在湖南省青委工作时，他是省青委的委员。他的家庭在湖南是个大家族，叔父还是伯伯叫曹伯闻，是何键当省长时的民政厅长，解放以后是民主人士。曹国枢在清华与蒋南翔一班，一九三六年毕业，都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的头头，党员，他的妹妹曹国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头头，一二·九运动时很有名。一九三八年初，曹国智和她的丈夫萧敏颂（北京大学一九三六年毕业，一二·九运动时北大的头头）同省委发生了一些争论，抗战时期就脱党了。长沙解放时萧敏颂是湖南民盟的头头。曹国智后来在一九七九年恢复了党籍。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事情呢？宋平是一九三六年进清华的，联合大学撤退到长沙，去昆明之前，是曹国枢介绍他加入的党。曹国枢就在那个欢迎的人群里面，我发现了他，但是没有跟他打招呼，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怕话旧惹麻烦。

在省委内的人际关系

我那个时候虽然非常兴奋——十多年了，回来了，当了主人，但在那个场面下还是非常冷静的，可以说表现得相当成熟。

有过延安在解放日报工作的经验、热河自己又独立主掌一张报纸，加上在东北给高岗、陈云当政治秘书的经历，我已经比较懂得了党内人事关系的复杂，南下后就比较懂得人事关系的重要了。南下这些人，高文华是老关系；曹瑛过去虽然没在一起工作过，但是也是老关系；王首道是在东北局开会认识的；黄克诚在东北局时对我可能还没有印象，他在东北局那次总结土改开会后就调到热河去了，但是他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因为和省委的那几个人都有些老关系，进入湖南以后，我的人事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丁东：这个班子全是湖南人？

李：金明是山东人。王首道、刘型、周小舟、曹瑛、黄克诚、高文华，都是湖南人，还有陈再励，是民政厅长，是平江人，我的同乡，老红军。黄克诚到湖南以前，由王首道当家，但是在省委里面金明很霸道，尽管我十分注意，也还是和金明发生过上面提到的那次冲突，好像他总是压

在王首道的上面，首道不太舒服。我看出来了，曹瑛也看出来了。但是时间不是很长，大概不到两个月。

我是同金明一起南下的，他一路跟我谈杨纯，他大概知道我和杨纯在武汉秘密学联时有过恋爱关系。金明的夫人叫郑琳，现在还活着，是杨纯的同班，也是我们武汉秘密学联的，就是我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开完全国学联大会后，带回徐州那批人中的那个郑琳。她后来在山东跟金明结了婚。金明还跟我谈，他追求过杨纯，杨纯没有同意，向他介绍了郑琳。在苏北区党委的时候，黄克诚是书记，金明是副书记，杨纯是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张彦。杨纯同张爱萍离婚后，和张彦结合。这里还可以多说几句。郑琳与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文立徵曾经有过友情，他们那时都在山东敌后。山东刚刚解放时，有人看到郑琳去给文立徵扫过墓。

创办《新湖南报》

长沙正式宣布和平解放是在八月九日。那个时候湖南的报纸第一是国民党湖南版的《中央日报》，一直到八月十三、十四日还在出版，和平解放嘛。民盟也有一张《民主报》，长沙原来有个《大公报》，那是旧省政府的报纸，办了几十年，在解放前即停刊了，另外还有不少民办的晚报，大小有十来家报纸。我们接管的是《中央日报》，到八月十五日才出创刊号，就是有个接管的问题在里面。

《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是一个比较有头脑，有爱国心和进步思想的老报人，先后有好几个共产党员在报社编辑部工作过，长沙和平解放他是有功的民主人士，曾主动找到湖南省工委协助程潜的起义。《中央日报》的全套人马、全套设备、全套房产都移交给我们，真正的和平接管。正式交接是在徐长兴饭馆，是长沙以烤鸭著名的饭店。我们与段梦晖一起吃了一顿饭，一桌酒席拉拉手，非常礼节性地接管了《中央日报》。这样，《新湖南报》在《中央日报》很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上，十五日非常顺利地出了创刊号。现在回顾《新湖南报》创办经过时，是不应该忘记段梦晖的贡献的。当时我们留下了《中央日报》的人员，经理部经理还是当经理。

丁东：那您这儿不是也有经理部吗？

李：有啊，他的经理到我这儿当正的还是副的，记不清了，反正原班人马都留下了，其中有一些进步分子。工厂那部分，我带去的人当厂长，吴克真，在延安时他就是《解放日报》印刷厂的负责人。

丁东：他那些编辑、采编人员呢？

李：都留下来了。接交不久段梦晖就离开了湖南，到华中的军政委员会当了一个委员。我给你念一段我的回忆文章：

我们进入长沙之后，同地下党的同志会师了。长沙解放前地下党在新闻界有强大的力量，许多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官方或民办的报纸中任职，在国民党统治中的艰难环境下做了很多工作。第一批会合的同志有李龙牧（李锐夹话：他后来调到北京去了），还有傅白芦、（丁东夹话：我知道这个人，很有水平。）梁中夫、柳思、蔡克诚等。他们熟悉湖南的情况，同各阶层的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有办城市报纸的丰富经验。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下的与本地的两部分同志一开始合作共事就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进城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房子问题。《中央日报》留下的是办公的房子和工厂的房子，但是七八十个人得有住宿的地方啊。我记得柳思领着我跑了大半天，才选定经武门已经无人居住的潘公馆作为编辑部的办公、住宿的处所。潘公馆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的房子，当时除开何键公馆以外，那就是大房子了。长沙大火以后新盖的房子，在大马路上。潘公馆又住人又当编辑部。

当时我们这个《新湖南报》的班子，可以说是工作的得心应手，有条不紊，大家事业心都很强。不论从方针政策、版式内容、编辑采访到印刷发行，还是从全党办报到群众路线、读者服务等等方面，因为骨干多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的，懂得如何实事求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服务。现在我有这么个想法，为什么后来报社一百多人中，有五十四个人被打成了右派，数目这么大，就是这个班子太好了，太厉害了；就是由于我和朱九思这两个领导，在报社建立的初期形成了很好的传统，一班子人齐心协力，专心干事，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业务水平都非常高。我离开湖南后，朱九思也调到武汉，省委副书记周惠就将他的一个亲信官健平派到报社任社长。这个人无知又乱来，将报纸变成周惠的讲坛，文革时才查清这个人在原籍福建是“铲共团”中一个持枪的打手。大家当然都反感，都反对。周惠主持反右派时，可以说是将编辑部中优秀的人员一网打尽了！

丁东：全国新闻界之最，比《人民日报》、《文汇报》加起来还多。

报纸的新旧交替

李：应当讲，在湖南解放初期，这个报纸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丁东：你们去接管的班子是供给制，那原来的采编人员，印刷厂工人，也是供给制吗？

李：这些得去问那些人，我记不大清了，他们现在可能回忆得起来，可能还是原来的薪水，没有动。我记得程潜的待遇是很高的，那个时候他还有特殊经费，很高。

丁东：是和平解放嘛，程潜的资格那么老，比共产党领导人年纪都大。

李：我记得一九五二到北京就是薪金制了。

丁东：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个体制怎么接轨，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您这个南下班子是从延安传统过来的。

李：我们开始都是供给制，原来的人恐怕不是供给制。

丁东：你们都是军事共产主义。但是它当地的报人，不管在《中央日报》，或者在民营报纸，还是要过普通市民的生活吧，他们还是要挣薪水的呀！

李：市民生活没动，大概有个总方针。这个应该再查一下，很多人可以回忆得起来。

丁东：两个模式往一块链接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矛盾？

李：没有。

丁东：两部分人的生活待遇有没有什么差别？是享受供给制的人生活比较好，还是有薪水的人生活比较好？

李：你把我问住了。

丁东：有的老帅刚解放的时候，买书都没有钱。

李：他们的津贴费比我们高不了多少，但是他们服务人员多，他们那个级别的干部，生一个孩子用一个保姆，生五个孩子用五个保姆。

丁东：需要什么，公家就供应什么？

李：对。没有供应的项目就得自己掏钱。

丁东：《新湖南报》走上正轨以后，报纸本身有经理部，那它是挣钱还是赔钱呢？允许公开订阅吗？

李：这个我就没有管，朱九思分工管那些工作。

丁东：您根本就不问。

李：我主要管编辑，最重要的是社论，天天有社论，还有文章和要闻等要管

丁东：主要还是执行党的喉舌的功能？

李：对。我管政治，经济、生活这些都是朱九思管。

丁东：当时像《大公报》，解放初期虽然保留下来，但是日子很不好过，就是因为正宗的党报是喉舌，他们的民营报纸地位十分尴尬，发行量

下降，经营就发生了困难，因为它的资金来源完全靠发行和广告，没有财政拨款。对政权交替时期的这种报纸的状况，现在研究不多。

李：湖南省志里面有个新闻志，一些情况可以从那里面查出来。

丁东：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角度，有些是这些年才提出来的。比如对《大公报》历史地位的评价，就是这些年才提出的。

李：柳思还在，一些细节可以找他问一问。

丁东：当时您办报的经费是？

李：当然是国家的公费。

丁东：这个报得卖、得订吧？

李：卖的。

丁东：当时占领长沙以后，这个报纸的发行量怎么样呢？我瞎猜，比如您在热河办报的时候，那个报纸肯定收不回成本，因为那个报纸有时候送都送不出去。但是《新湖南报》不同，这时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了。

李：那时已经有经济观念了。

丁东：社会各界、各单位都要订这个报，订报就得出钱。报也可以拿到街上卖吧？

李：那我就记不清楚了，应该有零卖了，同《中央日报》应该是一样的。

丁东：共产党进了城，人们还是愿意看看它的报纸是什么样，肯定能卖出去。我估计个人也有订阅的。你们那时有没有广告呢？

李：我记得有一个读者服务栏，由廖意林负责，办得很活，因为廖意林一直在国民党区工作（在陶行知那个社团内）。《新湖南报》若要写得细致点，可以找一份来，合订本有的是。

丁东：《新湖南报》也好，《人民日报》也好，它们总的来说是一个类型的报纸。

李：我们的《新湖南报》那时候在全国来讲，算是办得很好的，《人民日报》还介绍过。范长江他们曾经在徐州同我往来过，对我大概有印象，因此在北京一听说是李锐在湖南办报，就写过评介的文章。

丁东：那个时候您是报社的总编？

李：不，我是社长，朱九思是副社长兼总编辑。

丁东：但是他这个总编管经营，您这个社长反而不管经济？

李：对，经理部门的事情归他管，我就管评论，这个是最重要的，我

就抓住这个要害。钟叔河不是写过一篇《李锐识小》嘛，写了一些我当时的情况。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厉害的呀，口述社论，有人帮我做记录，打出清样，稍作修改马上就变成一篇文章。他们给我查过，我在报社一年多，不到两年，写了一百多篇文章。

我给你念念《新湖南报的诞生》这本书的序言，这是报社的老人们出的一个集子。

毛泽东说过，一张省报对于全省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湖南那个时候是新解放区，办好省报就更加显得重要。由李锐担当这项重任，可说是人地相宜。他的老家是平江，童年和少年在长沙渡过，大革命时当过童子团的小队长，一九三六年的暑假在长沙办过宣传抗日的《湘流》报三日刊，抗战初期在湖南地下党省委工作过。当他十年后再返湖南时，满城鞭炮火花声。他比一般南下干部熟悉湖南情况，又比本地干部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并且一直列席省委的常委会，（李锐：这里写的不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常委会，就十来个省委委员，省委每次开会的人都不多，我一直参加会。）对当时的情况和工作步骤都心中有数，因此写起评论来得心应手，一气呵成，感情充分，说理透彻。即使在三十年后读来，仍觉虎虎有生气。至于在当时影响之大就不用说了。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密切注意群众的思想情况，主动提出宣传的课题。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李锐同志把评论看作是报纸的旗帜，在他和朱九思同志的主持之下，《新湖南报》的党性确实非常鲜明，文章是生动的、尖锐的，具有党报应有的战斗风格，同时又培养出一支朝气蓬勃、忠心耿耿的新闻工作队伍。

李：就是办那个新闻干部训练班。

丁东：您这个角色其实主要就是省委的发言人？

李：对，一点不错，就是省委发言人，那个时候没有出版局，没有新华社分社，就是我们这张省报。后来成立了新华分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一直到新华书店，以及后来的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和其它一些出版社，他们的负责人都是我们报社派去的。谢文清就是新华分社社长，最开始我还兼过新华分社的社长。可以说，解放后湖南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靠《新湖南报》的基础，报社在人事配备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为后来打开湖南文化工作的局面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年在那些单位，都可以看到《新湖南报》的作风。湖南的出版界在全国一直是很不错的。报社当年办的那个新闻培训班的学员，现在散布在不少的地方，有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了。

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

还有一件事情虽同办报没有关系，还是值得谈一下，即保护了曾国藩

的故居。

延安整风时，范文澜写的一本小册子：《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属于干部必读书。当年我是接受不了的。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曾国藩的后代有我的好朋友，小学时同班，我去过他家里，大门口有对联：“诗书继世，忠厚传家”。一九四九年我回到长沙后，没有下过乡，对土改那种批斗、杀人看不惯，利用自己在省委宣传部的身份，向湘乡县（曾国藩老家）下了道命令：曾国藩故居绝对不准动。因此，曾的藏书和稿本等才全部保留了，现在得以出版《曾国藩全集》。当年还听到过一个有关故事，日本人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用降落伞逃生，落在湘乡（日本人没有占领），到曾国藩故居参观，家中后代男女有八个人会讲英语。八十年代初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对照我们的高干子弟，我讲了这个故事。遗憾的是，当年没有注意到保护左宗棠等人的故居，完全破坏了。

从《新湖南报》出来的人才

李：所以，《新湖南报》当时在湖南，不单是一份起宣传作用的报纸，同时开创了一个事业。

丁东：主要是您当时用的这些人，回过头来看，水平很高。不论是朱正、钟叔河，还是李冰封、傅白芦，都不是省级水平的学者，而是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

李：噢？你是这样看？

丁东：全国各省都有一些自己的文化人，但是这几个人不同，影响不同。

李：有些人确实是冒出省界了，特别是朱正、钟叔河、李冰封他们。

丁东：这几个人拿到全国也不成问题。

李：这个似乎确实同我当年的看人、用人方针有些关系。

丁东；那年我帮高增德编《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他就是要把朱正、钟叔河这些人编进去，因为这些人是全国有名的。在山西同样也有很多右派，在本省很有名，但是到全国，人家不知道他是谁。

李：你这个提醒很好，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丁东：他们这几个人的水平不一样，关心的是全局性的问题，最后拿出的东西，不是就湖南说湖南。比如朱正写的关于反右派的书，就是全国大视野。

李：那个东西我没有细看。

丁东：《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李：钟叔河虽然搞的是清代的事情，但那是《走向世界丛书》啊，是个非常不错的事情。

丁东：水平非常高。

李：他把当时的洋务运动的作用都回顾起来。

丁东：重新评价中国近代怎么开放的历史。当年李一氓虽然没有见过钟叔河，点名要他进古籍整理小组。傅白芦也是一样，我没见过他，但是我当时编《顾准寻思录》时就把他的文章编进去了。顾准的遗作最早编进了《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傅白芦认为那篇东西应该进，最后让胡乔木给拿下来了。

李：胡乔木还干过这种事？

丁东：胡乔木说人已经死了，文章也没法修改，就别登了。所以在《中国社会科学》（试刊号）上有顾准的这篇文章，正式出的时候就给拿下来了。

李：胡乔木是个两面性的人物，这个将来要写，要留下一笔。

丁东：《顾准寻思录》里傅白芦的文章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讲得很清楚。

李：李慎之现在把顾准讲得非常之高，你知道吧。

丁东：是。赵紫阳也是这么看。我认为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确实是高。比如您今天跟我讨论的五种社会形态，顾准当时就看出这个东西套到中国不行。郭沫若讨论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从什么时候分期，顾准说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因为当时马克思就不知道东方的情况，连欧洲的一些考古的新成就，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他也没有见到。所以说他的五种社会形态，根本就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顾准当时就看得一清二楚，确实了不起。如果当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了顾准的文章，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惜让胡乔木给拿下来了。

李：这个人好事做得很好，坏事也做得很绝。顾准幸亏有个好弟弟陈敏之啊。

丁东：高增德在八十年代初办《晋阳学刊》时就发表了顾准的遗作，那是吴敬琏转给他的。但是《晋阳学刊》影响太小了，《中国社会科学》影响大得多，当时要是登出来，顾准会更早被人们认识的。

李：傅白芦这个事我都不知道。

丁东：那本书是我请您题的书名嘛，您没细看。您再去看看。

李：是个什么书名？

丁东：《顾准寻思录》，五个字是您题的，里边有傅白芦的一篇文章，写得很有水平。

李：附带讲讲傅白芦这个人，我们几个人对他很有意见。十二中全会后湖南省委组新班子的时候，柏原，李冰封都进了省委，傅白芦也被提了，但是他不很好合作，到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和湖南那个新班子闹别扭，闹得很厉害，不干了，当了甩手掌柜。

丁东：他是从北京调回去的吧？

李：是从北京调回去的。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子搞呢？在湖南你应该好好干嘛，怎么能甩手不干呢？我后来就同他没有来往了。

丁东：但是这次回忆《新湖南报》他又写了文章啊，说了你的好话。

李：他对我不会像我对他那样，他不会的。 11

丁东：这几个人的水平就是比较高。同样是右派，别的省的好多右派没有他们的水平。

李：没有全国的观点。

丁东：光有勇气，没有高度。

李：朱正跟我的关系你知道吗？

丁东：我知道他后来找过您。

李：八十年代初他找我时，我根本记不起来了。怎么能记得呢，那时候有一大群人嘛，我在湖南的时间又不长。那时我在组织部当常务副部长，朱正谈湖南反右情况，过去我完全不知道，于是就把他的一篇回忆和评论反右的信在《组工通讯》上发了出来，影响很大。

丁东：那封信确实写得很好。我参加编《大学人文读本》，里面就有一个主题讲：人怎么面对挫折。我建议把朱正这封信编进去，有人不赞成，给撤了。那一卷不是我当编辑，要是我编，一定要收进去。

李：我把朱正的那封信给耀邦看了，耀邦作了批示。

丁东：这使他后来成了全国人大代表？

李：不全是。戴晴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朱正，发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于是朱正成了有影响的公众人物了。我记得他有一句话："到我为止。"他希望他所经历的灾难以后不再发生，到他那一代永远结束。

丁东：他的信里面主要讲这个观点：挫折、苦难固然可以磨炼人，但是它也扼杀了更多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了，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毛泽东说六不怕，结果整了那么多人哪，把人才都给毁灭了。朱

正那封信交给您以后，您做没做过修改？

李：改了，压缩了一点，因为在《组工通讯》上登不能太长嘛，但是最要紧的东西都保留了。这篇东西发表后，尤其是耀邦作了批示，形成全国性的影响，朱正的社会地位各方面都起了变化，湖南也就接受了，以前是死不用。

丁东：朱正本来的影响仅仅限于鲁迅研究一个领域，后来胡乔木也抬了他一下。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

丁东：胡乔木说：编辑都要读朱正的书。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把许广平的错误都指出来了，因为她的《鲁迅回忆录》是根据政治需要写的，不符合历史事实，让朱正给纠正了，他能够纠正许广平，也很了不起。

李：那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丁东：所以胡乔木也抬举了他一下。但是要不是《组工通讯》这事，他当不了全国人大代表。现在国内出的所有关于“反右”的书，还是朱正的这本最好。

李：对，是朱正那本，朱正有思想，尊重事实，有独到见解，又勤于动笔，接触的方面也较广。他的书应当广为传播。

离开报社

我是在一九五一年的上半年脱离报社，到省委去了。原来小舟是宣传部部长，我是副部长，可以不去部里上班，只呆在报社。小舟走了，我成了宣传部长，就非去坐班不可了。

附录——“傅斯信”摘录

……

从友人处看到了丁东先生和李南央女士记录整理的李锐伯伯的《南下——创办新湖南报》一文。在这篇《南下——创办新湖南报》中，有以下关于家父傅白芦的记述：

“十二中全会后湖南省委组新班子的时候，柏原、李冰封都进了省委，傅白芦也被提了，但是他不很好合作，到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和湖南那个新班子闹别扭，闹得很厉害，不干了，当了甩手掌柜。”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子搞呢？在湖南你应该好好干嘛，怎么能甩手不干

呢？”

事实并非如此。

家父1983年服从组织决定回到湖南工作后，正值湖南“左”的错误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文革还没有得到彻底否定，一些地方派性严重，致使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困难重重，邵阳市以王安义为首的“高司”派闹得新建的市委班子处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家父派报社两位记者前往邵阳了解情况，写出题为《邵阳地、市派性严重，问题成堆，亟待解决》的调查报告，反映邵阳“文革”头头王安义等及其保护者的问题，刊登在只供极少数领导干部阅读的《情况》上，供内部参考。谁知支持王安义一派的某领导干部竟将上述内参稿交给王安义，王安义大肆翻印，广为散发，在进一步大闹邵阳市的同时，组织人马先后五次冲击湖南日报，使“正气不得伸张，记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得不到保障”。而此时实则支持王安义一派的省委主要领导，不但不支持报社编辑部根据党章规定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王安义的严重情况，不去追查泄密的某领导干部，不去处理制造事端、冲击省委机关报的人，反而在省委四届九次全会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湖南日报。此后，对家父和报社新领导班子的各种谣言、非难纷至沓来，直至家父离休几年后仍不绝于耳。

家父在1984年5月24日向省委负责人和中指委派驻湘联络员小组负责人的报告中，在列举不断加剧的种种非难后，写道：

“‘11.11批评’的前前后后所发生的这些事实，只要不是傻瓜，都会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孤立的、偶然的事情……

作为经验教训来总结，当然不希望用‘误会’、‘没有通气’一类的话敷衍过去，而希望真心实意探讨一下实际原因。是不是因为那个时期报纸的一些新闻、评论、《情况》触犯了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那个思想体系了呢？触犯了还想继续坚持‘左’的流毒，不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迷恋于派性残余的极少数同志了呢？因此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文革’惯用的那套‘搞臭’、‘整材料’、‘穿小鞋’、‘架空’……等等办法，来压制批评，施行打击报复。这与党的《准则》、《党章》的有关章节对照，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在中指委[12]的过问下，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公开揭露了王安义的问题，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王安义这样一个劣迹昭著的造反派头头，曾经被湖南省委认定是反“四人帮”功臣，省委主要负责人甚至登门向他赔礼道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1981年到现在的三年时间内，王安义一伙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湖南省委根据中指委调查组、省委检查组查清的事实，确认王安义是“三种人”，撤销省委1981年17

号文件和省委其它文件及省委负责同志的讲话中类似1981年17号文件的错误评价。

这就是家父“和湖南那个新班子闹别扭，闹得很厉害”的真实情况。应当说，不是家父跟新班子“不很好合作”，不是他“不干了”，要去“当甩手掌柜”。而是遭受二十多年磨难，却始终有志改革，想为国为民做事，又一身“书生气”的家父，触犯了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那个思想体系，得罪了某些继续坚持“左”的流毒，不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迷恋于派性残余的人，被这些人用“搞臭”、“整材料”、“穿小鞋”、“架空”……等惯用的伎俩，逼得难于甚至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以致突发心脏病，只能住院治疗。

家父的《老眼》一书中，对他从北京回到湖南工作的种种经历有详细记录；当年湖南日报人事处处长罗印文叔叔的《拒绝遗忘——八十年沧桑记事》一书里，对家父任职时的种种处境也有比较详尽的表述；还有许多当年曾经在报社工作的记者和工作人员的文章和谈话中，都能了解到当年发生在报社的一系列事件的真相。

……

傅斯

1. 李：就是带着那个报社的班子，很多都是新结交的了。
2. 李：当年一二·九的时候，我们利用教堂开会，打扮成基督教的教徒。
3. 李：那个时候武汉的秘密学联在东湖的船上开会。
4. 李：生活书店在交通路，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站，为内外联络处。
5. 李：生活书店的经理顾一凡还活着，在北京，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捕过。
6. 李：进武汉后，就是在东湖逛了一下，没有到武汉大学里面去。另外拜访了武汉大学电机系的教授赵师梅，我在学校的时候，他对我非常照顾。
7. 李：通城是湖北，破败得不得了。
8. 李：这是讲当年平江起义喽。
9. 李：那个红白斗争打仗的时候，平江的人口减了一半。
10. 李：一九四九年南下，湖北境内城乡破败，入平江界，房屋田亩整齐。
11. 傅白芦的儿子傅斯和我父亲在新湖南报社的一些老朋友看到这段“口述“后，认为我父亲不了解傅白芦先生回到湖南后的具体困难，对傅的这段评述有失公允。考虑到这是李锐的“口述往事”，不是回忆傅白芦的文章，因此在编辑、整理成书时，没有对他的这段讲述进行修改，将傅斯就此事写给一位友人信的摘录作为附录，附在此篇之后，供读者了解全面情况。——编者
12. 中指委：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简称。设立于1983年10月

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之后，1987年5月26日“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之后撤销。

我和水电



一九五八年三月李锐陪同周恩来查勘三峡



一九五八年四月在新安江水电站工地（黑色轿车右侧为李锐）



一九五七年十月在北海举行的水电展览会上（右一为刘澜波）



一九五四年十月乘皮筏勘查黄河上游（右三：李锐，右五：李鹗鼎）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李锐随燃料工业部代表团访问苏联（右七：李锐）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李锐随燃料工业部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大学的留影



一九五四年三月查勘黄河时李锐与苏联专家库兹涅佐夫的合影



一九八0年李锐与来华考察三峡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师团代表团团长在一起



一九八一年李锐复出后视察龙羊峡水库工地

开创水电事业

离开湖南，转业进京

我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廿九日离开湖南到北京的。在这之前，我曾多次向黄克诚提出不再搞宣传工作，希望转业到工业建设岗位，他一直不同意。直到他知道自己也要离开湖南，到北京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时，才同意我的要求。我是和他同乘一列火车北上的。我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三日的日记里写有这样一段话："廿五深夜一点从长沙动身，各界隆重欢送黄老。车开之前，与送行者挥手告别，心中似无惜别之情。我为自己另辟一条大道了。"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庆幸自己终于不再坐而论道，可以干些实事了。

到了北京，才知道我被分配到燃料部管水电，周太和告诉我这是陈云同志的意见。开始住在翠明庄招待所，几天之后胡乔木听说了，给我打电话，动员我到中宣部管党史研究，被我拒绝了。田家英和黎澍来看我，我向他们表态：笔杆子洗手不干了，投笔从工。我将带到北京的有关中国近代、当代史料的书、资料、很多是大部头的书，还有我收集到的党史资料全部送给了田家英。其中最珍贵的是全套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是陈长簇送给我的，他是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同盟会会员，退休前一直当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长。田家英是带着逄先知来的，把这些书和资料都拿走了。这说明了我当时的一种心态：从此埋头干工业，搞经济，不写文章，不搞这套名堂了，下半辈子下定这个决心了。

住翠明庄的时候，第一个跟我接头的是燃料工业部的办公厅主任王林，他是高文华在领导北方局工作时，北方局同中央之间的交通，"六十一人"[1]这个案子的情况，就是王林带到延安去的。抗战时期他也到了延安，在李富春下面工作，属组织部系统，管内外交通，就是负责延安党中央同白区地下党的联络。我以前谈到过，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时，那个大队的副队长叫王林，就是这个王林，他那时负责大家一路上的吃喝拉撒睡。所以，我们算是老熟人了。王林向我介绍了要我去负责的水力发电工程局的情况，说这个局是燃料部部内的一个局，原来的局长黄育贤，解放前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电处的处长，另外有个副局长张铁铮，东北人，是原来修复丰满水电站时的负责人，比我大五六岁，是个老同志，三十年代初的党员，坐过牢，特别把他从丰满调到北京来搞水电的。他对张铁铮的评价是：这个人是个夸大狂，迫不及待地要搞大水电站，他要我注意，不要跟着他后边一路瞎忙活。他还谈到五〇年，燃料部召开过一次全国水电会议，那个会议也就是了解一下全国水电的情况，范围不大，并没有提出发展水电的大计划。那个时候，我脑子里面对水电完全是空白，王林的介绍算是部领导给我的第一个信息：水电现在还提不到

国家的议事日程。然后他就给我介绍燃料部内部的分工情况。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分别是孙然、程明陞和康世恩，就是后来当过副总理的那个康世恩。孙然在“三反”运动中被打下去了，接替他的是徐达本，后来是煤炭工业部的副部长，大概文革后期出了问题。这三个总局设在部外，是事业单位。也就是人事、行政归部里管，业务是独立的。燃料部的部长是陈郁，副部长李范一（民主人士），刘澜波和李人俊（后来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主管电，李主管油。一大批共产党老干部，很老的干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国家计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

接了一个没法干事的摊子

王林谈了这些，我就走马上任了。燃料部那个时候在北京饭店对面的一幢大楼，计划司等几个主要的部门在部大楼里面办公，三个总局在外面，电业管理总局在府右街的口口上，就是现在中宣部旁边的那个院子。水力发电工程局在哪里呢？在西交民巷一栋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面，过去好像是家银行。局里有三十来人，四五个县一级的老干部，技术人员以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老人为主，有黄育贤、张昌龄、李鹗鼎、程学敏、陆钦侃、王伊复一些人；局下边分几个处：工程处、计划处、总务处。当时这个水力发电工程局管什么呢？可以说几乎没有它能够管得着的项目。已经具备发电功能的水电站如丰满水电站，它的修复工程归东北电力局管；开始施工的水电项目也无权管，如福建在建的古田溪水电站，浙江黄坛口水电站，都归地方管。刚刚立项，正在准备施工的水电项目，如四川的狮子滩水电站，归四川省领导。水利部管的水库就更不用说了，如北京的官厅水库，淮河上游支流的那些水库，都是只有防洪、灌溉之类作用，根本不考虑发电。黄河有个黄河水利委员会，那时正在考虑要修水库防洪，不是后来那个发电的三门峡工程，当然还是水利部的项目。就连勘测我们都插不进手，武汉有一个勘测队，也归地方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地方上和各部门各自为战。

丁东：那这个部内局到底是管什么的呢？

李：管水电的计划。怎么管？就是出点主意，也可以下去看看，提提意见，在技术上帮帮地方的水电项目。部里面的领导很少过问这个工程局的工作，它实际上就是部计划司附属的一个水电智囊。我知道陈云把我放在这里不是随随便便的，是有他的想法的。但是上任之后，了解到燃料部不重视水电，工程局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即明白这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工作局面的打开，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

上任伊始的当头棒

丁东：您去了是不是就成了一把手？

李：对，我去了当然是一把手，我当局长，张铁铮还是副局长，黄育贤改当总工程师。但干水电我是外行，因此到任后，开始阶段就是了解情况，一声不吭。我走的第一步棋是什么呢？下去看，有两个地方在施工嘛。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我到局里时黄坛口施工中出了问题，已经停工了。另一个项目古田溪还在施工。于是我就考虑：下去看。看了，了解了具体情况才有发言权。我先到的浙江。浙江的工业厅下面有个水电机构，管黄坛口施工。黄坛口出了什么问题呢？它是衢县地方上修的小水电站，主要技术负责人徐洽时，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我国第一批留美学水电的，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水电处那一部分人的头头，现在还在，九十多岁了，他后来当过浙江省水利厅厅长，老资格。中国过去这些负责基本建设的人，虽然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但是缺乏实践经验。水电站都是建在河流上的，需要修一条坝把河流拦断，坝的后面形成一个水库，水一立方米重一吨，就是说，水库蓄水会对水库的基础和河的两岸形成压力，压力大小是由坝高和流量决定的，而拦河坝本身的重量，也对河床和两岸接头处形成压力。因此大坝地基必须非常可靠，与两岸接头处在地质上也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实际情况呢？黄坛口开工前，他们只是一般性地查一查，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地质情况，结果开工后，先是开挖地基，然后开挖左岸，这才发现左岸岩石破碎，是非常松脆的岩层，拦河坝无法接头，越挖越不行，只好停工。我到浙江以后才具体了解了这个情况。这同中国自古以来科学的落后有关。那个时候有地质系的学校我只知道清华与北大，而地质系学的主要课程是什么呢，是找矿、开矿，地质就是管矿产：煤矿、石油、铁矿、有色金属，就管这些。没有工程地质同水文地质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是随着后来水电建设的发展，才在大学建立起来的。

黄坛口工程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件大事。你想嘛，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就出这种乱子，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情。中央纪检委派人到局里来找我谈话，态度很凶，要我们做检讨。我只好承认这是水电系统出的问题，我有责任。

丁东：那您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李：我们是中央的工程局，黄坛口是个水电工程，当然属于你中央水电部门管，那就是你们的责任。这其实是不讲理的事情，黄坛口根本是浙江地方上干的事情，我们是代人受过。在部里面，晚上谈话谈到一点钟。谈了以后，《人民日报》发消息，写了很严厉的社论批评，记得题目就是《黄坛口的教训》。那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哪！算是给我这个刚打开锣鼓的局长当头一棒。

丁东：按说，这很容易说清楚的。黄坛口工程开始的时候，您还没有到任呢。

李：那不管。你现在管这个事，我就找你，不找地方。

丁东：那是谁告的状呢？

李：应该是报社、新闻界的人捅出来的。反正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丁东：那后来有人因为这个事受了处分吗？

李：黄坛口后来是这样办的：我们请了苏联专家。在这之前，燃料部煤、电、油三总局都有苏联专家，电主要是火电专家，水电有两个专家，都在丰满水电站管具体施工。一九五三年我将工程局改为独立的水电总局后，请来水电方面的两位苏联专家，一是搞计划、勘测设计的，一是偏重于具体施工的，都很不错。前者跟我同年，叫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我平反复出后，一直到他去世，我们之间有通信联系，我的女儿南央和外孙女后来去苏联，还在他家住过。两位专家来了以后，就去看黄坛口，发现坝的上游一点的地方地质情况比较好，可以把坝拐一个弯，在上游跟左岸接头，这样黄坛口就复工了。一直到现在，黄坛口的运行情况还是很好的。但是教训总是存在的。对我来讲也是很有好处的吧，算是坏事变好事，上任伊始这一棒，让我深刻地了解到地质情况在水电建设中的分量，是头等大事。这个问题深入到我脑子里面去了，让我认识到地质人员是水电工程绝对不能缺少的。

丁东：中国没有，外国有吧？

李：外国早就有，西方早就有了，苏联也有了。

丁东：中国以前没有建过水电站，所以一般人不知道水还能发电。

李：是的。黄坛口虽然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人主持技术，但是因为过去没有干过啊，不懂得地质条件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就好像没有打过仗的人，打第一仗，总要吃点亏，才懂得了这个仗是很难打的，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印象就会非常深。

然后我就到了福建古田溪。

进入角色

古田溪不是一个堤坝式的水电站，它的落差是通过隧洞形成的。先修一个水库把水蓄起来，然后将水从隧洞引到下游，在下游建电站。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打隧洞。那个时候用的钻机是干钻，不是水钻，施工时，粉尘大得不得了，工人非常苦。那个时候都是那样，修铁路也是干钻打隧洞。通过考察这两个地方，虽然只是一两万千瓦的小电站，我对水电开发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知道这是非常复杂艰难的建设。在古田溪的时候，我还碰见一个人，是我的中学（岳云中学）和大学同学，杨德功。他在中学时比我低一班，进武汉大学比我晚一年，是土木系的。这个人现在大概在上海。他那时候是古田溪工程负责技术的工程师，工程的行政负责人是梁东初，这个人的名字可以记下来。山西人，抗战时，他在晋察冀的沁源县当过县长，那个县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个模范县。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接触过沁源县的材料，还写过文章介绍这个模范县。梁

东初是个非常豪爽的人，他本身的文化不是很高，但是不是那种农民干部，非常懂得使用技术干部，视野非常开阔。进城以后，像他这样懂得使用知识分子的干部并不多，这种干部是很不错的。福建选拔他来负责这个水电工程局时，是从他所在那个县的县委书记的职位上调过去的。我去了以后，他从杨德功那里知道我比杨还高一年级，对我简直是尊重之至。这个人原来是准备重用的，可是一九五九年我垮台以后，他也垮了，文化大革命时大概在山西被整死了，非常可惜。

这一路，随我一起下去的是两个人，一是总务处的，管行政事务，另外一位是我挑选的技术专家——陆钦侃，是张铁铮介绍的。我一到工程局就问过铁铮，局里在水电理论知识的全面性、实际经验方面，哪几个是拔尖的？他就给我介绍，除黄育贤、张昌龄两位领导外，还有程学敏、陆钦侃、顾文书等，他们各有所长，并且都参加过三峡工程的研究。那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聘请了美国有名的大坝专家萨凡奇，来中国考察三峡建设水电工程的可行性。萨凡奇带到美国一批中国技术干部，大概有三四十人，在美国设在克罗拉多州丹佛市的美国垦务局，研究三峡的初步设计方案。后来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无法顾及此事了。这些人大部分回国，有一些留在了美国，像徐怀云，一九七九年我访问美国还见到了他，前面提到的徐洽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的大学多是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这三所有名的大学念的，后来又大都去过国外留学，像覃修典、程学敏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我一路跟陆钦侃坐火车、住宾馆，让他给我上课，讲水电的基本常识，特别是讲他在美国的经验，他所经历的事情。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谈吧。因为我听得进去，听得懂嘛。比如水电的基本知识：一个是流量，一个是落差。水文的特点他也跟我谈了，即不重复性：每条河流在每一个点上是不重复的，年年不同，因此河流的水文记录非常重要，每条河流在不同的地段都要设水文站，要记录水文资料。最重要的是，水文利用的流量是平均流量，譬如这些概念：一年是8760个小时，一年约3200多万秒，陆钦侃告诉我，这两个数字必须记住，因为水量是按立方米/秒计算的——一秒钟通过某一过水断面的水量，这是河流流量的计算单位；小时呢，用来计算电量，一千瓦的发电机运转一小时等于一度电，一年是8760小时，一台多少万千瓦的发电机一年运转多少小时，它产生的电力就是多少万度。他说一个水量单位，一个电力单位，你必须记住这些基本数据。然后他谈到，建设水电站的关键是流量和落差。

这次下去大概花了个把月的时间，除了初步了解了水电是包括经济、技术、地理各种条件的复杂工程，有了些水电建设的基本知识，还了解了一个问题：水电同其它的工程很不相同。如火电，相对比较简单，修个发电厂房就完了，煤炭由别人提供；钢铁厂也是这样，矿石有别人管嘛；纺织厂也差不多，就是机器和厂房，别的不用操心。而水电则既要有建坝的自然地理条件，还有社会人文关系，比如淹没问题及随之产生的移民问题。建设一个水库，它不是光发电，还有形成水库之后如何综合利用等问题，譬如防洪功能、航运功能等等，非常麻烦。那个时候，淮河正在修水

库，北京的官厅水库也在修，我已经认识到这些水库不应该仅仅是水利工程，都应该是综合利用的工程。

这一路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即理解了中国开发水力发电的资源非常丰富。抗战时，我就曾从湖南乘车一路到四川去，经过乌江啊、重庆啊，那时就亲眼看到过沿途河流的情况。现在则知道了，中国的河流多处于温带，流量大，所以常闹水灾；但是河流多落差，是水力发电的极好条件。回到北京，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变水电工程局隶属在部计划司下面的局面，作为部内局是根本办不成什么事情的，只能受制于人。一九五三年年初，正好有人要使用我们所在的办公地点，反正我们也没有几个人，我就把工程局从西交民巷搬到燃料部的办公楼，在部里办公，之后就着手建设独立的总局——部外局。但是这样，势必违背了燃料部领导，还有王林他们的办公厅、计划司等设立工程局的原本意图。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个时候党的领导干部最讨厌闹独立性，特别是我刚刚调来，就如此大张旗鼓，领导会觉得你不安分，怀疑你是要跟别人比高低。因此在部里，我的想法没人可以商量，至多跟张铁铮谈谈。铁铮是个好人，坐过牢，是冀鲁豫的县级干部，但是性格有些懦弱，表达能力也差一些，口才不好，也不能写，想的事情讲不出来，不能让人家理解。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心要成立总局。电力总局和计划司都反对，部里面通不过，我就给陈云直接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恐怕现在找不到了）。我在报告里面谈到日本的电力是以水电为主，他们在朝鲜、台湾都搞水电，一进入东北就建设了丰满电站，也是搞水电。我们中国的水力资源如此丰富，开发的条件也非常好，而北方、南方有很多省市又都没有煤，因此应该多搞水电。很快，陈云将报告交给了薄一波，批示：同意成立总局，还亲自找陈郁当面谈了：让李锐干点事情吧。

开创水电事业

丁东：那您就绕过部里了？

李：绕过了，给陈云的报告绝对不与部里通气。因为在我酝酿的时候，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电业管理总局。他们认为：你干嘛要成立水电总局？水电也是电，放到我电业总局下面就行了嘛。他们觉得：电业总局管全国火电厂的运行，全国电网归我管，你当然也应该归我管嘛，当然认为再搞第四个部外局毫无道理。那时候我们全盘学习苏联，苏联只有电力部，没有水电部，水电总局就是归在电力部里，我将意见提出，在部里面酝酿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意见，没人同意我的想法。所以我就直接写报告给陈云，他就找陈郁谈了。陈郁是老同志，你知道吗？

丁东：我知道。

李：他在四中全会是跟何孟雄、罗章龙他们在一起的，后来去了莫斯科，从苏联回来后在延安没有太得到重视。从延安出来进东北，管煤。解放的时候，全国的电量也就是八十亿度，所有的机组，加上东北大概也就

是两百万千瓦，很有限。中国没有石油传统，那个时候石油也很可怜，只有个玉门油田。因此虽然陈郁是燃料工业部部长，其实他只重视煤炭生产，轻电，不管油。到了水电工程局，我曾经发过牢骚：水电根本不在陈郁的话下。一九五九年批斗我的时候，还批判了我这句话，说我当时故意讲这样的怪话。

陈云批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首先是要搬出部机关，有自己的办公地点，这就需要地方盖房子；其次，工程局只有三、四十个人，成立总局要招兵买马。编制搞多少？人从哪里来？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姚依林的商业部正在变动（记不清楚是谁给我介绍的了），商业部原来有个直属的建筑公司，有一批搞建筑设计的技术人员和一些老干部，现在要取消这个建制，我正好全盘接收过来。这个建筑公司的负责人黄元镇，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是天津民先队的头头。我不是讲过住在我楼上的金树望的夫人、王克敏的侄女王遵笈吗？王遵笈就是黄元镇介绍加入民先的，我是从他那里才弄清楚王遵笈为什么在延安被抓起来的问题。黄元镇后来一直在水电系统工作，还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他的夫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郝诒纯，非常有名的地质学家。黄元镇带着这个建筑公司来了，首先干什么呢？在北京的北郊一个叫六铺炕的地方，在那里一大片地方盖房子：盖总局办公楼，盖勘察设计院，两栋大楼比邻相建，总局在前面，设计院在后面。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也是由我们盖的。还建了不少职工宿舍，都是三、四层楼，那时算是很大的建筑群了。然后我就招兵买马。

丁东：成立了总局之后，资金就直接掌握了吧？

李：对，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丁东：上项目的钱就直接拨到总局了？

李：对，国家计委的钱直接拨给我们，这就跟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计委的钱是拨给燃料部的，前面说过了，燃料部那个时候有三个独立总局，计委的钱是按这三个总局给的。水电的经费归在电业里面，而电业总局那些人热衷于短平快，就是要搞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所以，水电是只有吃饭的钱，没有干事业的资金。

丁东：火电来得快。

李：是啊，火电来得快。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还是包括了两个大的水电工程：新安江，刘家峡；这是违反了当年人们“中国不能够搞大水电”的认识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丁东：您是怎么招兵买马的呢？

李：简单点儿说，招兵买马就是把地方上那些跟水电建设有关的部门都统一到水电建设总局的名下，都归我管。

丁东：改变隶属关系。

李：对。丰满电站的修复工程归总局管了，浙江黄坛口、福建古田溪那两滩子，武汉的勘测设计院，还有地方上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跟水电挂得上钩的部门，都归到水电总局名下。为了加强总局的领导力量，我从地方上调了几个干部到北京，副局长沈信祥就是从丰满电站调来的，他是上海工人出身。铁铮调到北京后，他是丰满的负责人。总局的摊子搭起来后，我接着就从地方上调了一批技术干部成立了北京勘测设计院，实际上开张时的建制也就是一个勘测设计处，后来扩大成勘测设计总院。前边说了，它的办公室地点就在总局大楼的后面，归总局管。

丁东：归您管的有多少干部、多少工人呢？

李：总局、设计院两栋大楼，四五层，总局本身有一二百人，那个时候，总局管的修复工程就是丰满、黄坛口、古田溪；计划开建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峡，还有四川的狮子滩、江西的上犹江；参加的建设项目是三门峡；另外，水利部的官厅水库、以及淮河佛子岭等项目，我们参加了一点人力（水利部修这些水库都是为了防洪，根本没有考虑建水电站），外加勘测设计院几百人。人数嘛，干部有几百人，施工人数以千计吧。那个时候搞五年计划，新安江和刘家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个大项目，我记得狮子滩、上犹江、以礼河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项目。计划司安排全国电力时，因为江西不产煤，就找了我，问有没有可能搞水电，因此搞了上犹江。以礼河梯级在云南北部，都是高水头。另外就是广东的曾志找我，建设了流溪河从化温泉水电站。总局成立之后的两三年内，全国共建设了八个水电勘测设计院：东北、北京、武汉、湖南、四川、云南、广西、浙江。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集中了这么多的人，管了、上了这么些项目，铺开了这么个摊子，算是起步了。

搞建设需要知识分子

局里从各地调来一些老干部，但是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是不懂水电业务的，我自己虽然在努力学习，也只是初级阶段，刚刚入门。总局的具体工作，特别在业务方面，我得靠技术人员。受毛泽东延安整风的影响，掌握政权后，我们党的干部对旧中国留下来的技术人员是另眼相看的，对那些人是打问号的。打问号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可以给你讲几个故事。为了了解水电站，熟悉水电站的施工，从黄坛口、古田溪回来两个多月后，一九五三年三月我到丰满去住了一个月，在那里认识了丰满水电站的总工程师——于开泉，他负责电站正在进行的修复工作。于开泉是日伪统治时期丰满的技术人员，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毕业，跟抗日名将赵尚志同班，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毕业后到日本帝国大学读书，学了水电。日本人修丰满电站的时候，他回来了，日本人用他，让他当施工方面的负责人，他是电站唯一的中国工程师。按照党的政策，这种人当然属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使用。我让于开泉给我上课，他就跟我讲日本人统治

时候的事情。日本人非常残酷。丰满有个万人坑，死了很多工人，都埋在那里。他告诉我，丰满的施工质量很差，坝体里面蜂窝狗洞，乱七八糟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漏水漏得一塌糊涂。他跟日本人吵过架。总局缺乏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我考虑把于开泉调到总局，就让他先到北京汇报工作。结果吉林的公安局就派人跟着他，因为有一次运行的时候，机组出了毛病。水电站不是一台一台的机组吗？我们的保卫部门是怎么干的，每一台机组前面派一个持枪的人在那里站岗，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保卫工厂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因为于开泉给日本人干过事，就怀疑机组是他破坏的，就监视他，所以跟梢跟到北京来了。我们对技术人员的不信任到了这个程度！刘澜波知道了，就向我了解于开泉的情况，我告诉他：这个人绝对可靠。刘澜波就出面通知吉林方面：把你们的人撤回去。隔了不长时候，我就把于调到总局，让他当了副总工程师。还有一个胡福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很不错的一个人，我任命他当了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设计院院长是个老干部，王鲁南，在抗战时期是地委一级的干部，是局里老干部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胡福良有一个皮箱，他大概比较看重，总是带在身边，肃反的时候就有人反映了。总局有个保卫处，那些保卫干部就怀疑胡的皮箱里藏有电台，将情况报告给了王鲁南。王鲁南就找了我，谈他们的怀疑。我就跟他讲：这样好不好，你既然怀疑，就趁胡福良不在的时候把箱子拿来，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他又不敢。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有一次我们要派个代表团到瑞典去考察水轮发电机，瑞典的水轮发电机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人在丰满水电站装的六万多千瓦的大发电机都是瑞典造的。我就让胡福良带队去瑞典。我的想法是：他若回来，就可以让大家相信这个人是可靠的了。他当然回来了。还有一件事，一九五四年我到苏联去的时候，带了一个翻译李名播，是专家办公室的负责人，东北人，老俄文翻译，俄文很好，人也不错。可是人事部门告诉我：这个人有问题，不能去苏联。我就说：拿材料给我看。那个材料里有：李名播，日本人统治时期在丰满工作，给日本人当过俄文翻译，还有什么、什么的……，有特务嫌疑。我一看材料上写的年龄、履历就跟李名播对不上，他的岁数不可能有那样的经历。我让他们再继续查，把情况真正弄清楚了再说。查来查去，原来是个同名同姓的人。我们党里做人事工作、保卫工作的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个文化水平，你有什么办法！解放前，共产党又不掌握政权，大学生毕业，不在国民党政府或资本家的企业里工作，你让他到哪里去？这是多简单的道理。可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用、愿意用，并且信任在旧中国工作过的技术人员的党内人士是比较少的，发挥这些技术人员的能力和才干真是难哪。

我同胡乔木的关系很深。一九五六年他让我为《人民日报》写文章，我写了一篇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当然是有感而言的。但是不久毛泽东就搞了“大跃进”，这种社论有什么用呢？

抓住龙头

前面我讲了黄坛口的教训，让我懂得了地质对于水电建设的重要性：搞水电必须要有懂地质的人。因此总局成立的初期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我就把勘测队伍的建设当成头等重要的工作来抓。没有勘测就得不到基本资料，没有基本资料就无法进行河流规划，没有规划，就谈不到工程设计——哪个地方可以建电站？电站可以建成什么样的规模？设计不出来的。演话剧先得有剧本，勘设院就是写剧本的。这个逻辑道理过去没有人像我这样清晰、明确地讲过，包括黄育贤他们那一批原资源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在国民党时代干了多年，而且在国外留过学、实习过，也从来没有系统梳理过地质勘测与水电工程的关系。

丁东：人从哪儿来呢？

李：当时总局只有一个叫张兴仁的干部原来是学地质的，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修建水电站的工作，算是懂得一点工程地质。他后来参加了三峡论证，现在还在天津，跟我有来往。记得燃料部在一九五三年分配过一次地质干部，那个时候燃料部领导的概念是：地质就是煤炭同石油的问题，电要什么地质呢？所以国家分配给燃料部的学地质的大学生，他们只给了水电两个人，其他都分给了煤炭总局和石油总局。我当时在会上就跟刘澜波吵了起来，吵到后来把桌子一拍，甩手走了：你们这样干，我不参加会了。刘澜波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他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态度。从部里要不到人，我自己培养。北京有个地质学院，院长是刘型，原湖南省委的秘书长，老熟人，我就找了他，请他帮水电总局办一个地质干部训练班，学员从我们自己的一些有经验的干部中选，再从社会上招一些高中毕业的，学制两年，专学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就是这个地质干部训练班，为水电系统的地质队伍打下了个基础。

一九五三年我还参加过一次计委的工学院毕业生分配会，那时候人事分配由国家计委的人事局管。水利部干部司只去了一个处长。那个处长在会上讲水利系统如何如何，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方面的干部。我就起来发言：“水电的工作比水利系统复杂得多。”我以官厅水库打比方，说那个水库漏了水，水利系统也不管。结果那一回，土木系、水利系毕业生一家一半，水电总局第一次和水利部平起平坐。水利部的那个处长回去以后就发牢骚：这倒好，你们派我们去，负责人不去，人家水电去了个大头儿，我们当然讲不过人家。从此以后，国家计委算是对水电有了概念，了解了水电工程的复杂，过去计委没有人知道还有个水电，以为凡是跟水有关的就是水利部的事儿。

丁东：当时为水电争投资您也得去吧？

李：是，都是我自己去。那个时候国家计委有个燃料局，对口的就是燃料部，管钱、管投资、管人，什么都管，但是都不了解水电。国民党时代的政府有个资源委员会，它下边有个水电处，而我们党谁知道这些事情呢？没有人懂得。连燃料部内部的很多人都不懂水电建设的复杂，你要人家怎么知道？朱镕基毕业以后在计委燃料局工作，他就是管水电的，那个

时候是一般干部。

丁东：您见过他吗？

李：我没见过。我是一九七九年平反回到电力部以后见到他的。他那时在经委，和他打过交道。朱镕基跟柳晓昂（毛泽东的《碟恋花·答李淑一》中提到的柳直荀烈士和李淑一的儿子）在清华同班，关系非常好。柳晓昂同我关系密切，记得以前跟你说过，他的母亲同我大姐是同事。

丁东：您敢于这么干，自己直接找计委、找陈云、跟刘澜波吵，我觉得跟您的身份比较特殊有关系，您给陈云当过政治秘书，给高岗也当政治过秘书。

李：有关系，但主要还是本身的条件和性格使然。像副局长张铁铮这样的老干部，更不要说像黄育贤这样的老技术人员，他们都不了解共产党的运作方式，而我是比较知情的。国家计委的头头是高岗，他手下两名得力助手马洪、安子文我都认识。我比较了解上面的情况，所以胆子比较大吧。另外还有悟性，这个非常重要。我就是一趟浙江、福建，一路陆钦侃给我上课，一下子对水电就有了通盘的了解，就抓住了黄坛口教训的要害，把地质勘探工作放在水电建设的龙头地位，以此牵头，全面铺开水电总局的工作。

那个时候，苏联正准备修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书《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写的就是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地质勘探的全部经过，有十几万字，是用报告文学的文体写的。发现这本书以后，我就把北京所有书店里的这本书统统买下来，大概有一、二百本，让总局的干部看，还发给总局的下属单位，然后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在总局的内部刊物上发表。那是一九五三年的六月，水电总局一成立我就要求在内部办了一个工作交流的月刊。苏联有一句成语："丈量七次再裁衣"。就是说，给一个人做衣服，你要为他丈量七次之后才可以动手剪裁布料。作者就用了这句成语，描写决定一个水电站的开工，要首先细而又细地把地质勘探工作做好。后来访问苏联，我了解到苏联有过非常严重的教训，他们在地质工作上吃过大亏，所以在建设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时，地质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作者在书里不仅写了苏联人自己吃过的苦头，而且还写了西方国家修建水电站时碰到的地质灾难：五十年间西方国家河流工程的技术事故有一千起以上，而灾祸的百分之八十发生在美国。作者写了美国有一个坝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面，最后这个坝垮了，淹死了很多人。因为岩石虽然很结实，但是有隙缝，裂缝很多，形成水库以后，在水压的作用下，水在这些裂缝中长期湍动，慢慢侵蚀溶解了这些缝隙，岩层最后破碎，使座落在它上面的坝最后垮掉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也有建了坝以后拦不住水的事情发生，一些工程建好了以后无法使用，变成了一个纪念碑。我介绍这本书的文章出来以后，在水电总局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学习勘测工作的高潮。我们接着召开了全国勘测工作会议，并且请了苏联专家参加，在会上让徐洽时讲黄

坛口的教训，这就更进一步明确了总局水电开发，地质先行的方针，水电这盘棋的棋路开始有门道了。

宣传开路

接下来我干的就是抓宣传。水电，大家都不了解，那我就宣传，必须让社会知道它的难度和功效。这跟我是办报纸出身有关吧。一九五三年总局创办了《水力发电》，一本月刊，起初是以科普为主，讲水文、流量、落差、水电站施工等等这样一些水力发电的基本知识。这个刊物一直办到现在，中间没有停过，现在发展到《四川水力发电》、《西北水力发电》、华东、四川、贵州……等七八个水电刊物。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学普及委员会，它下属的科普读物出版社要我去作报告，在一个电影院里。讲完了以后，我将讲稿编成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工业化科学知识：工业的动力——电（水力发电）》，由他们出版。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三篇文章：《水力发电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作用》，《水力发电的基本知识》和《我国的水力发电建设》。第一次印数是两万，后来又再版。他们还出版了我写的另一本小册子《黄河的治理和开发》，一九五七年电力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介绍苏联经验教训的小册子《苏联的水力发电建设》。

办刊物、出书，这都是对外宣传、向全社会宣传，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内，要让国家计委、燃料部各级领导知道水力发电是怎么回事。一九五七年总局在北海公园办了一个水电展览会，把中国的主要河流修了一大套模型在展览会上展出，说明现在中国的水电站有多少，水力资源如何，利用情况如何，前景如何。展览会介绍了水力发电的基本常识，特别以新安江水电站为例，用模型说明新安江建成以后是个什么样儿，发电量多大。总理看了展览会，还帮我做宣传：那是一个好展览会，大家都去看看。结果中央委员、各部委负责人，一共有一百多人参观了展览，中央的同志，除开毛泽东、刘少奇没有去之外，朱德、周恩来、陈毅、薄一波、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邓子恢，连宋庆龄都去了。社会上参观的人次有三十多万，是很轰动的。这一下，社会上才知道：哦，水可以发电。正好西哈努克来中国访问，住在东交民巷原来的法国大使馆，总理找到我说，你把那个新安江的模型搬到西哈努克住的地方去，让他看看。周恩来这个人是非常细心的，他看了展览会后，印象很深，想起来可能对西哈努克有点作用，或者给他些什么印象，知道我们在进行这种大建设。那天我就把模型搬到宾馆，等着总理来看布置得行不行。等到过了晚饭时间很久总理才来，我就发了牢骚："总理，我肚子饿了呵！"他说："我还不是跟你一个样！"（他刚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总理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知道头两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也召见过我。）一九五九年，水电总局还在北海公园利用北海与什刹海结合部一、两公尺的落差，建了一座装机容量为十千瓦的少年先锋水电站，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水电、热爱水电，参观过水电站的儿童里将来会有水电事业的人才。这个电站现在不知还有没有了。

丁东：我看过那个水电站。

李：哦，你还看过？所以这一下就把局面打开了。让头头脑脑们认识了水电。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台湾和东北搞的水电站，以及云南那个几千千瓦的小玩意儿，他们都没有看到过，都不知道。这个展览有简单的基本知识介绍，又有模型说明，还用模型解说水电的前景，在领导层造成的影响非常明显，可以说展览会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

在开办展览会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以总局的名义召开了全国水力资源普查会议。那时候在大家的思想中，认为全世界水力资源最好、最多的是苏联，他们已经建设了不少水电站，还正在建大型水电站。而我们在普查会议上得到的数据是：中国的水力资源是五亿多千瓦，这还只是理论蕴藏量，因为那时计算的主要依据是原有资料，会议上所谈数据都是从书面材料上计算出来，我们自己还没有对河流状况进行过全面实地考察。苏联有多少呢？只有三亿多千瓦。有了数据，我就对苏联专家不客气地说了：水力资源是中国第一，不是你们。而且从开发条件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世界第一。水电的开发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造价问题。苏联水电站的建设费用通常很高，是火电站的几倍。苏联地域辽阔，欧洲部分是平原，河流没有很大的落差。他们在伏尔加河上修了那么多的大电站，可伏尔加河只有两百多米的落差，是一条平原河流，河流的落差低，工程量大，发电效益有限，与火电相比，造价自然高。而我们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的地势是西部高，东部低，河流多是东西流向，南北河流只有横断山脉的那么几条，其他都是东西河流。长江从发源地到入海口，有五千四百米的落差；黄河将近五千米，流域中经过的山脉河谷多大落差，与平原河流比较工程量相对要小得多，发电效益却要高得多，因此造价相对火电并不高，基本相仿。这一下，可以说从概念上把大家说服了。而我主要是要说服谁呢？说服头头：中央的领导，还有计委、燃料部内部的人。燃料部内部为什么总说不要乱搞水电？我刚到燃料部，王林就让我不要听张铁铮的话，搞夸大方案，就是因为苏联电力专家组的组长警告过燃料部陈郁、王林这些人：你们中国人不要随便搞水电，我们有大教训。水电造价高，发电量有限，得不偿失。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建设中出过大问题，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水电站在战前开过工，由于地质出了问题，被迫停下来了，战后重新开工的时候，将坝址换掉了。还有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工程，浩大极了，淹没损失也很大，是平原河流嘛。所以苏联的水电大概要比火电贵好多倍。斯大林是热衷于搞水电大工程的，电力投资大部分搞了水电，又得不到多少电，所以苏联搞电的人对水电的意见大得不得了。而我们这样一解释，从根本上推翻了苏联专家的说法。对于西方国家的情况，我也讲到些，但是细节不清楚，不可能去参观，而且当年也不便多宣传美国和日本。所以，我就下决心要到苏联去，实地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苏联专家这么反对中国大搞水电，得到第一手的可靠资讯。

访问苏联

丁东：访问苏联是您的意思，不是刘澜波的意思？

李：去苏联主要是我促成的。刘澜波不了解水电，但是对电他还是熟悉的，在燃料部内主管电力，我动员他去苏联参观一次，作实地考察。我跟澜波在延安就认识，关系很好，我是可以跟他发脾气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学苏联，苏联专家反对搞水电，他当然跟专家的观点一致。没法说服他，就希望通过访问苏联，让他跟我的意见一致。我们的代表团叫电力代表团，一共二十一个人，搞水电的十二个人，比火电略多。刘澜波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在苏联访问了三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发，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回来。

代表团中水电方面有新安江工程局局长王醒，他是山东的干部，抗战期间在莱芜县一带，担任过县委书记，南下时是专员，还当过建设厅长。新安江工程局成立的时候，我向华东局要干部，华东局命令浙江省委给人，省委就给了王醒。另外就是我们设计院的院长王鲁南；黄坛口工程局党委书记石青，县委书记级的干部；王宝基，清华毕业的，曾经和程学敏一起在英国实习过，地下党员，在总局技术处负责整个资料管理；总局的副局长沈信祥；大概还有两个技术干部，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翻译李名播，还有罗西北；罗西北是罗亦农的儿子，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的（比李鹏高一班），留学后回国，他既是技术干部，也是代表团的翻译。到了莫斯科以后，又加入了四个人：李鹏、林汉雄（张浩的儿子）、贺毅（贺晋年的儿子）、崔军（崔田夫的儿子）。他们四个人在动力学院同班，我们去的时候，正面临毕业，所以让他们四个人也来当翻译，跟着我们行动，苏联很多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去过。我们访问了电站建设部、电力部（电力部是管运行的，电站建设部管火电站、水电站的建筑）、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参观了已建成的和正在修建中的十四座水电站，还有动力、机器设备制造厂，总有七十个单位。三个多月时间中听了很多报告，与水电有关的有三、四次，还跟各方各面进行了四十次以上的会谈。

我们首先到电力部，部长为我们介绍了苏联电力的概况，之后，我们就和火电的人分开行动了。火电系统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行程，访问火电设计院，火电工地等等，大部分时间跟我们不在一起。我看到电力部的房子很新，火电系统单位的办公楼也都是很新、很大。水电设计总院的房子很旧，坐落在莫斯科一个偏僻街道上。这让人明显感到：苏联火电吃得开，水电则跟我们的处境类似。在苏联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前前后后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另一个月是在外面跑，在莫斯科主要就是同水电设计总院的负责人员交流，做到盘根问底。苏联第一代的水电专家都在这个院里，院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各个处的负责人，都是这批人。我那时只有三十六岁，那些专家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有个老水电专家，快七十岁了。在设计总院的访问期间，我了解到苏联水电建设的很多情况，了解到它的发展过程。在旧俄时代，水电开发差不多同欧洲、美国是同步的，发电基地最早是在高加索、格鲁吉亚。从斯大林时代起，最重要的就是开发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和古比雪夫两大水电站。列宁不是说过：“苏维

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是社会主义”吗？所以苏联一贯对电力的发展十分重视。有一尊列宁的雕像，手指指向一个水电站，那个电站我们也参观到了。

我每天去设计总院，设计总院的院长跟我们谈，总工程师跟我们谈、副总工程师跟我们谈，各个设计处、技术处、勘测处等负责人都跟我们谈，谈他们的经验。我还问他们要资料。苏联当年很多技术资料是不给我们的，对我们的援助是有保留的，最先进的技术资料不给我们。这个底我知道，我想尽一切办法问他们要资料，只要你开口同意了，就一定要到。我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拳拳之心感动了他们，设计院的副院长理解了我的意思：要讲一点苏联过去吃过的亏。我不好直截了当地问：你们打过什么败仗啊？我说：中国也经历过战争，打了胜仗，没有什么，打了败仗，为什么败了，这种教训对于以后的战争才是最重要的。我说，我喜欢搞历史，喜欢知道败仗。他懂得了我的意思，主动给我讲了一些他们的教训。

从设计总院出来以后，我们就到了列宁格勒，那里有个很大的水电设计院，然后就参观了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刚开始不让我们去看，后来才知道了原因：全部是劳改犯人在那里施工。看到了它的规模，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他们在为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做施工准备时，在旁边新建了一座城市——斯大林格勒市，因此水电站的投资就更大了。之后去了高加索，参观了明格查乌尔水电站，装机容量三十六万千瓦，就是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丰满水电站的设备，亲眼证实了原来曾经听说过的传言：苏联红军撤出东北的时候，把我们的设备拆了运回去了。还有卡霍夫卡，它是建在德聂伯河的一条支流上，在德聂伯河的上游看了德聂伯、卡涅夫一些电站。还有亚美尼亚的塞万水电站，拉兹丹河梯级上五座电站的第一级。还看了格鲁吉亚的赫拉姆水电站等等，参观了两个容量在两千瓦的农村水电站。作家出版社出了我的一本《李锐日记——出访篇》，对这次访问我几乎每天都写有日记。

丁东：考察过程中刘澜波是跟您在一起，还是跟火电在一起呢？

李：主要是水电，重要的报告和会谈我都争取他和我一起听，重要的工程我都让他跟我们一起参观。他那时候的兴趣也在水电，因为火电那些名堂都是差不多的，无非是机组大一点、小一点，厂房大一点、小一点。

丁东：出去考察以前，您知道要去多长时间吗？

李：一开始没想到会呆三个多月。由于黄河规划已经搞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也基本确定了，国内的事情不太多，就在苏联多看了些地方。

丁东：考察的经费当时是怎么出？

李：那是国家计委给的。

丁东：出国经费一开始有没有计划，有没有限制呢

李：没有。

丁东：需要多少算多少？

李：对，需要多少算多少。

学以致用

回国之后，我写了一份详细的《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1955）》的报告，这个报告也收在《李锐日记——出访篇》一书内。我在报告里谈到苏俄的电气化计划，为什么列宁那样看重电，介绍了苏联在二次大战以前水电建设上遇到的主要困难：它的人口集中在欧洲部分的城市，但是那里的水力资源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水力资源在人烟稀少，很少工业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而且欧洲部分的河流又都是平原河流，只有在格鲁吉亚、高加索那里有点山区河流，所以开发水电的条件十分不利。伏尔加河三千七百多公里长，落差只有二百五十米，河床很宽，而且都是沙土、软基，地质条件很差，坝体需要建得非常宽，造价当然就高。苏联还有过这样的教训：德聂伯水电站修成以后，高压线的设备技术跟不上，发了电送不出去。我当然也谈了我们需要向苏联学习的地方，他们的水火电力配合，水力资源的补差工作做得很好。我还用自己从苏联那里学到的经验创造的一个命题："水电建设中的动能经济问题及动能经济同河流综合利用的关系"，讲解水电跟全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我对水电建设上升到经济发展理论高度思维的阐述。我讲建火电厂非常简单，什么地方需要电，就在什么地方建。火电烧煤，买就是了，只要有煤的市场，它就不缺煤烧，煤矿的开发和运输，火电厂自己都不用操心，只管买现成的煤就是了。但是水电完全不同，除了农村小水电站，只要是稍微大一点的水电站，尤其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必然牵涉到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消耗掉它所发的电的工业在什么地方。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全国的电力不到二百万千瓦，整个国家也没有多少大的工业企业，这个问题那时当然不存在。而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要大发展。苏联有个什么概念呢？一座水力发电厂，它的投资如果是十块钱的话，那么要消耗掉这个电厂十块钱电量的经济与工业的投资就是五十块钱。因此，修大水电站不能不考虑到国家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那个时候的输电技术，电网的输送距离顶多是四五百公里，一千公里以上的距离那是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开始的事情。过去技术上是交流送电，后来才发展为直流送电。发了电，要送得出去，这个问题是同电站建设平行的。在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所谓"动能经济"的概念，修建水电站，首先想到的就是消耗它生产出的电力的工业和地区经济的问题，一种全盘性的思维方式。否则修了电站也只能是个摆设，没有用。当年要修建长江三峡，我坚决反对，也是基于这个道理，水利部刚一提出，我就觉得非常荒谬。而且搞那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只为了防洪，根

本不考虑发电，就更是开玩笑了。在河流上开发的任何工程，都必须是河流的综合利用开发，这是我那时就已经非常明确和坚定的看法。修个大水电站就是个大水库，要考虑它的防洪效应、灌溉效益，它跟水产养殖、航运的关系，甚至旅游。像新安江电站修成后，库区形成千岛湖，变为一个风景游览区；现在市面流行的“农夫山泉”，就是新安江水库中的水，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反过来一样，修个大水库，就不能不利用它发电。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淹没造成的移民问题，因为苏联地广人稀，它的水电工程移民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教训太大了。新安江电站移民三十万人，淹没了建德、淳安两个县城，对那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经济布局造成影响，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非得全面考虑不可。另外水电站直接受到国家机械生产能力的限制，电站设计发电量大，机组必然大，国家自己是否有能力建造这些设备，靠进口，国家是否有外汇能力，等等。还有施工中的材料供应问题，新安江施工的时候就碰到水泥供应不上，我找过总理；浇灌混凝土要沙子、要卵石，坝址附近的河流有没有好沙子，有没有好卵石，每天施工需要多少，每天能够挖出多少，运进来多少……，那是以百吨、千吨为单位计算的。所以结合考察苏联得来的经验，我用“水电建设中的动能经济问题及动能经济同河流综合利用的关系”这样一个说法，从实践到理论把水电站的建设问题基本讲清楚了。我在这份报告里还附带讲了水电工程造价的计算问题。我前面已经讲到过，苏联的经验，水电工程的造价是火电的三、四倍，西方的经验也差不多，水电工程的造价比火电贵一倍、两倍，甚至于三倍、四倍。但是他们的淹没损失的赔偿是与工程开支分开计算的，赔偿资金分摊到防洪和航运收益里。而我们呢，当时做水电工程预算，全部打入工程投资内。从苏联回来我把这个道理讲通了，这笔费用就不再算入水电工程的投资。火电的建设费用低，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被人们忽略了，就是它建成后的运行费用，即发电使用的煤、煤的运输费用，都没有作为火、水电投资比照的元素，全由国家另外包了。

访问苏联的附带收获

我过去多少知道一些第三国际、王明跟苏联的关系，这样一些历史上的事情。特别是听到过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国后传达的一些内容，那个传达的范围很小，只有中央的一些人听了，我是听黄克诚给我讲的。毛泽东去苏联本来是准备跟斯大林会谈的，可是到了之后，斯大林一直没跟他见面，毛泽东就跟斯大林派来的联络员发了脾气：我不是来住旅馆的，是来谈问题的。这样斯大林才见了毛泽东，与他长谈了一次，内容主要是谈当年王明、博古的左的教条主义问题。

我们在苏联时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在斯大林的家乡格鲁吉亚，那个电力局长就非常傲慢，格鲁吉亚的工业发展得比较好，他对亚美尼亚、乌兹别克这些左右邻居都瞧不起，跟我们讲亚美尼亚的闲话，讲乌兹别克的闲话，讲他们什么东西不好，什么东西不行。还傲慢到这个程度，问我：

你们中国人有没有桔子吃？因为格鲁吉亚产桔子，是那个时候苏联唯一产桔子的地方。我就感觉到苏联的民族矛盾很深，特别感觉到少数民族跟俄罗斯人的矛盾。俄罗斯人当然到处都有，但是他们同所在地的少数民族相处不好，隔阂很深。

我跟刘澜波在莫斯科时住在一个叫基辅的中等水平旅馆，为了省钱，两个人住一个大房间，两张床。我俩每晚经常闲聊到十二点，甚至一、两点。毛泽东访苏的传达，刘澜波就完全不知道，我就跟他谈，一起议论苏联、议论毛、议论高岗等问题，以及高层人事关系、国家政策，个人的经历等等，什么都聊。通过在莫斯科期间的这些闲聊，我同刘澜波的关系就完全疏通了，对水电的看法他就跟我完全一致了。

丁东：刘澜波比您大几岁？

李：比我大七、八岁，他是大革命那一代的人，北大毕业的，曾经是东北工作委员会的工委书记。他那时就排在陈郁的后面，用现在的说法，是第一副部长。我们在一起整整三个多月，苏联大的地方几乎都跑到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中亚细亚，大概就是乌克兰、西伯利亚没有去。火车、飞机、船都乘了。所到之处，应当讲，上上下下待我们如同兄弟姐妹，对我们的帮助是真诚的。虽然他们有规定，最高级的技术对我们要保留，资料不能全给我们，有些失败的情况也不能乱讲，但是最后还是提供给了我们想要的很多资料，谈清楚了他们水电的教训。这次访问团里水电系统的干部，回来以后都在各自的工作中起了作用，后来都参加了水电站的实际施工。在这次出访以后，总局又派了一批技术干部和工人，到苏联的施工现场工作、学习一年。我前面讲到过的那个梁东初，就是其中专门学习隧洞开挖队伍的领队。

三门峡的教训

前面讲了黄坛口的教训。虽然为此我挨了批评，但那不是我造成的错误。三门峡则不同，我是参加了的，因此有必要单独谈谈这个大教训。

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条患河，经常闹洪水。国民党时期就有个黄河水利委员会，我们掌握政权后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前身是一九四六年在冀鲁豫解放区成立的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一直归水利部管。水利部那时就提出要在邙山（三门峡下游有个邙山）搞一个工程，修一座几公里的土坝挡洪水，认为邙山淹没损失少，修土坝比较容易（那里的地质基础不能修重力坝，只能修土坝）。但是我们认为坝太矮，水库的容量很小，装不了多少洪水，起不了什么作用，主张修三门峡。三门峡坝址最早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搞了一个黄河防泛规划，三门峡形成的水库容量大。水利同电力两部双方争论得很厉害，于是就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以便长远考虑和解决黄河的问题。主任是李葆华，副主任是刘澜波，我和张铁铮都是委员，请来了七位苏联专家。中国的洪水主要是夏秋之间的事情，苏联则不

同，大部分河流在寒带，夏天没有洪水，洪水是桃花汛 ，再加上苏联人口稀少，即使发点洪水也问题不大，很多河流连堤防都没有的。苏联河流上的工程主要是建水电站，没有防洪功能，因此河流归电力部管。水利部请的专家是农业部来的，对水电是外行，不行，我们请来的专家都是电力方面的，这使我心中有数。这样，黄河规划委员会的专门办事机构就放在水电总局里面，办公室主任是张铁铮，主体是我们的人，掺和些水利部的人，地质部、交通部也有人。这下就方便了，说起来是跟水利部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合作，但是黄河规划基本上是我领导，按照水电的思路开展，黄河上游的水文资料、坝址的勘查，河流踏勘等等，都由我们管。黄河的勘测工作，特别上游，都是水电总局做的，黄河全流域的四十六座梯级电站，就是那个时候规划的。能够如此安排，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很有关系，他为人谦虚，处事平和，能够接纳不同意见。不像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林一山，霸道到了极点，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黄河水利委员会现在出的委员会史书，还把我们的参予写进去了。

丁东：这四十六个梯级电站现在已经修了多少个了？

李：已经修了十来个了，最上面的是龙羊峡，还有李家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大峡、青铜峡也修了，总装机容量540.8万千瓦。详细情况可以查一下。

丁东：以后还修吗？

李：还可以修，不断地修。

丁东：黄河现在都快没有水了。

李：有，上面还是有的，就是有个截流灌溉的问题，宁夏截水截得太多，没有必要。宁夏没有那么多的人口。当年黄河整个流域的规划，是按照我们综合利用的原则进行的。解决了黄河流域的统一规划问题，这是件大事情。

但是三门峡工程出了问题，原因比较复杂。三门峡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而苏联没有像黄河这样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流，他们对上游的水土保持很乐观，水库的设计寿命是五十年。当年黄河的泥沙问题我不懂（例如并不知道华北平原是黄河泥沙形成的），水电总局的技术干部很少人研究过黄河，加之泥沙问题也不归我们管，那是黄河水利委员会跟水利部的事情，他们应该掌握这个关键问题。结果，三门峡坝建起来，不要讲五十年了，第一年一拦水就出了问题，水位抬高之后，向上游回水，造成泥沙大量的淤积，靠近西安地方的水流变缓，泥沙在潼关以上堆积起来，情况非常严重，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所以立即停止蓄水，马上改变方案。但是三门峡已经造成了二十八万的移民（官方说法是十五万），原计划是安装一百万千瓦的机组啊。后来的方案对原设计做了彻底的改变，将坝底施

工后封死的排水道重新打开，让泥沙下泻，同时，两岸打隧洞排洪、排沙，三门峡成了不蓄水水库，蓄水发电改为径流电站，就是来多少水发多少电，发电能力只有二十万千瓦了。三门峡工程，黄万里是反对的，还有一个反对者温善章，我们水电系统的一个年青技术干部，很有头脑。我在三门峡的问题上，那个时候也是稀里糊涂，当时我不知道黄万里反对，只知道温善章提出了反对意见，苏联专家未予理睬。三门峡工程自己虽然不是主持者，但是我是积极掺和了的，这是我搞水电中最大的教训。

丁东：这个项目是以水利部为主的？

李：是国家工程。

丁东：国家工程还是得有谁牵头吧？

李：牵头的是两部：水利部、燃料部，水利部为主。但是施工的时候，我们水电建设总局派了很多干部进去，张铁铮当过三门峡工程的施工处处长兼负责工程管理的工程局副局长，局长是从湖北省省长位置上调去的刘子厚。

丁东：当时紧着搞三门峡是为什么？

李：就是要解决黄河的防洪问题。

丁东：怕淹了郑州？

李：那当然了，还有开封。黄河是条悬河（河床底高于开封城墙），几千年的问题了，几乎年年发洪水，多次改道，大禹治水就是治的黄河。国民党时期不是还决了花园口嘛。

丁东：那个决口是故意决的吧？

李：是故意决的，为了阻拦日本军队南下。历史上黄河曾经改道七次，整个华北平原就是黄河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对黄河这条河流研究得最清楚，理解得最透彻的，是黄万里。他跟我谈到黄河形成的历史，黄土高原泥沙下泄，一般水土保持解决不了的。治理黄河的根本办法是另外开一条顶用的河道，让黄河改道，修小浪底、修什么工程都没有用，因为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是黄土层，不稳定，也没有法子让它稳定。六〇年我下台后听说三门峡出了问题，虽然那时我已经不在位了，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当时有一种盲目性。应当说，我那时不懂得泥沙问题，对黄河的整个问题也不理解。但是黄河利用四十六个梯级开发水电还是对的，黄河上游没有出过问题，直到现在，基本用的是我们五十年代搞的那个计划。

为水电争投资

丁东：您能不能讲讲当时是如何为水电争投资的，在什么场合，怎么争？

李：可以讲，在能源工业中，遇到的困难最多、麻烦最大的就是水电，再没有比它难要投资的了。譬如石油开采，主要是技术上的困难，国家投资非常慷慨，它跟周边环境、地区的关系也不复杂；煤炭就更简单一些；火电是短平快，反正是一要电，就给钱、上马。

争投资，那个时候就是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前面讲了，水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先后上马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还有一个上犹江，那个时候叫做五大水电站，都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先后开工的。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到这五座水电站的投资，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刘家峡，因为资金受到三门峡开工的影响。三门峡是国家项目，主要是为了防洪，不算电力系统的项目，是国家单独投资，比较好办。我前面讲了，当时我们的投资都归燃料部计划司管，可那里的人都是热衷于修火电的，现在还有一个人住在二十四号楼，苏哲文，是清华电机系毕业的，比我低一年，后来是水利电力部计划司的司长，在燃料部时是计划司副司长，管电的。最开始争的时候，就是要将刘家峡列入勘测计划，计划司就反对。刘家峡在兰州，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始终这样讲：没有刘家峡就没有兰州的发展。因为甘肃没有煤，没法建火电厂，没有电，兰州怎么发展？刘家峡的装机容量差不多比新安江大一倍，兰州的发展就靠刘家峡。

这里可以顺便讲一下，一九五五年燃料工业部分撤销，成了三个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部的部长就是刘澜波，一个副部长，是原燃料部办公厅主任王林，两个部长助理，我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原来管火电的电业总局局长，其实过去燃料部的电业总局就是管理火电。部长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设一个火电总局，一个水电总局，另外还有一个管运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这样一来，我的发言权就比较高一点了，争取到刘家峡上马。

狮子滩是一九五四年开始兴建，装机容量4.8万千瓦，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第一台机组就并网发电了，我专门为狮子滩发电开过一次庆祝会，发表过一篇文章。狮子滩电站是龙溪河梯级电站的第一级，是龙头，它不但发电量大，而且兼有防洪效益，灌溉面积是五千亩。这个电站的建成意义十分重大，从开工到发电也就三年时间，让人们真正认识到水电建设在工期上与火电相比绝不逊色，而它的综合效益是火电无法比拟的，它的动力是源源不绝的河水，非常干净。不像火电那样，投入使用之后，还需要不断地供给煤炭作为它的燃料，对周边环境不断排放煤炭燃烧后的废气。应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水电能插入五大项目，是超过了我的预期的。特别是一九五六年新安江电站的开工，记得那时陈云是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知道新安江要上马，找我去谈过一次话，直截了当地问我：建新安江你有没有把握？敢不敢负责？他知道新安江跟丰满是一样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工程，而且他脑子里面的印象是，苏联专家警告过我们，中国没有能力修这么大的水电站。我回答

他：我可以绝对负责地告诉你，我们有这个本事，一定会把新安江修好。（为了解大坝的地质基础，当时在河床地下挖了一条隧洞，我下去看过。）新安江移民三十万，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淹没的都是好地方呵。移民的事情跟浙江谈判了很久，那个时候浙江省领导幸亏有谭震林、顾德欢，支持我们，最后接受了，要是放到现在，就很难讲了。

可以放手干了

电力工业部独立以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跟刘澜波两个人合拍子，他放手让我去干，部内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举个例子，我们还在苏联的时候，接到中央的一个电报，说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建三峡，请我们考虑，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刘澜波没有把握，问我怎么答复。我就告诉他：现在搞三峡绝对不行，于是他就回了电报：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可以说，刘澜波在水电方面跟我的意见已经是完全一致了。

如果说莫斯科之行，解决了悬在我头上的尚方剑："中国不能够乱搞水电，要吸取苏联的教训。"有人再这样说，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苏联水电的开发条件同中国完全两样。而燃料工业部的撤销，电力工业自成一体，则解决了内部的掣肘，对发展水电，部领导认识统一，我可以放手干，在部内没有障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之后，我们有了五个大项目，随着三门峡工程局的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的成立，水电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三门峡施工的时候，工程局长是刘子厚，而管施工的、有经验的人就是我们的张铁铮——担任工程局的副局长，总工程师是我们的李鹗鼎。因此到了一九五五年，水电的局面就完全不同了。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局面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曾经为《中国水电发展史》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这篇文章代表了我对中国水电总的看法。我给你唸一段：

"一九一二年，在云南昆明市郊螳螂川上建成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但在旧中国，水电曾长期是一个陌生事物。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开始修建几座装机仅几百千瓦的水电站。日本占领东北时，在松花江、鸭绿江等河流上大规模发展水电，但并没有相应地产生中国的技术力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〇年十月，第一次全国水力发电会议，才为中国水电建设事业揭开了序幕。"

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的第一次论争

丁东：那时候您搞新安江陈云还担心得很，三峡大多了。

李：三峡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水利部那时候真叫开玩笑，提出

的方案更是荒唐。林一山要把重庆市淹掉，牺牲重庆，彻底解决湖北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没有这么荒唐的了。

丁东：到那时为止，中国只能搞一些很小的电站，他一下子搞那么大。

李：我们那时修建的最大的工程就是狮子滩，4.8万千瓦，那是自己搞的。另外就是古田溪，那是打隧洞，也就是两三万千瓦，黄坛口大一点，也不过三四万千万。新安江那时候就算是有国际水平的工程了。苏联都是平原河流，没有搞过峡谷工程，美国的葛兰峡谷大坝、胡佛大坝比新安江、刘家峡也大不到哪里去。

丁东：新安江的水量也是很大的呀。

李：不是，新安江是建在小支流上，水量不大。

丁东：可是它的干流是富春江。

李：富春江短粗，没有黄河大。黄河同红水河类似，红水河发源于贵州，经过广西，一年的总流量是五百亿立米以上，黄河也是五百亿。中国全部河流的总流量不到三万亿、两万七千多亿立米，长江一万亿。中国人口太多，人均占有水量在世界的平均水平之下。

丁东：林一山是怎么提出建三峡工程的呢？

李：那是因为一九五四年的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中国自古以来重视防洪，有大禹治水的传统，“善治水者，善治国。”毛泽东早就为治淮题过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到湖北，林一山陪他乘兵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那个时候的职务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长委成立于一九五〇年，它的前身是国民党政府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前边不是谈过吗，一九五四年我们正在苏联访问时接到中央的电报，说水利部提出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我们不是回了那封反对的电报吗。当时我们也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三峡的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一九五六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五、六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二百三十五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一百七十五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六十米。二百三十五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二百三十五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

力发电》的九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林一山的那篇文章是两万字，在这个专号上我也写了两万字，我的文章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林一山两万字的文章里提到水电的只有五百字，他要修三峡就是为了防洪和南水北调，根本没关注发电。我们除谈长江的洪水三峡能否解决的问题外，还谈长江的整体规划问题，尤其动能经济问题（就是前面谈过的电力同整个国家经济的关系），动能经济问题同黄河的比较，还有建造三峡的技术问题等等。当然不像现在认识得那么全面，那时还不懂得生态环境问题，也没有谈对航运的破坏，集中在经济、技术、防洪、发电这些问题上。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大鱼网主义》。那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这么一条消息，广东有个县委书记，倡议编织了一个可以捞几万斤鱼的大鱼网，一网就能把他那个县海湾里面的鱼全部打尽。当然后来一条鱼也没打到。我就借了这个题目，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划是个大鱼网主义。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十一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这个会议为大跃进拉开了序幕，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薄一波、李富春等都参加了，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批判周恩来和陈云，毛泽东说他们两人反了他的"冒进"，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冒进的社论也拿到会场上来了。那篇社论毛泽东说没有看，是刘少奇批发的。南宁会议讨论的时候，毛就狠狠地批评周恩来和陈云，认为他们离开右派只有五十公尺了，批评得非常严厉。周恩来当场挨批（陈云没有参加），会议的空气很紧张。南宁会议之前有个杭州会议，已经开始批"反冒进"了，但是批得没有南宁会议那么厉害。周恩来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反毛泽东"冒进"的错误。所以南宁会议又叫做："反'反冒进'"。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上马问题，他在一九五六年写了"高峡出平湖"的那首诗，报上登了头版新闻，已经表达了赞成三峡上马的意愿，所以水利部、林一山他们才会做文章、搞宣传：毛主席都说要修三峡了嘛。那时候毛泽东的一句话不得了啊。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薄一

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名字的，因为我写过他的早年——《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那本书，他知道。一九五〇年周世钊等老朋友应他邀到北京会面，谈过我在写他的早年。薄一波提了我这个反对派后，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这样我就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我第二天去南宁，派了专机，告诉我电报说要讨论三门峡的问题。我心想：三门峡已经开工了，能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央办公厅来人还说飞机先要在武汉停留一下，带上林一山一起去，我就猜到电报可能多了一个"门"字，心里就有了底。又想到应该借此机会向中央领导宣传一下发展水电，便带上了被王林扣下的我给中央写的报告，还找了负责水电规划的工程师程学敏，让他赶制了一张全国待开发的大中型水电站示意图，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应该开发的水电项目都标在了上面。我就带了这两份资料单刀赴会了。飞机过武汉，接上林一山，我看到他手下的魏廷铮带着一个大箱子。毛泽东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都是我的老熟人，以前说了，胡乔木是我在湖南做地下工作时就认识的，田家英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到了南宁，他们跟我简述了会议情况，都替我捏了一把汗。当时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都参加了会议，周小舟也来了，也替我担心。我自己倒是没觉得怎么样。我和林一山到的当天晚上就开会，谈三峡。开会的房子很小，房间里面坐了二三十个人，一个长条桌，大家面对面坐着。我们俩人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就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毛又问我要谈多长时间，我说：半个小时。我说："林主任，请你先谈。"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是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从汉元帝谈起，谈历代皇帝怎么防洪等，大体上就是他一九五六年那篇长文的内容，但是这次将二百三十五米的坝高改成二百米，也提到了水电。我猜他是看到了我们的文章。讲了两个小时。我感到他讲的中心不突出，特别是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轮到我时，就谈得尽量简单，深入浅出。我说三峡工程是个什么玩艺呢？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至少是一千七八百万千瓦，甚至两千万千瓦，而现在全国所有电站的装机总容量是五百万千瓦，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我说不清楚。根据苏联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是谈苏联，西方是不谈的），全国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电网，要分散成几个电网，每个电网，有好多个电厂并在网内，最大电厂的容量在电网里面最多不能超过30%或40%，不然就不好调度。我打了这样的比方：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全国更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另外还有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苏联的经验，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那么消耗掉这些电力的耗电经济项目的投资至少要五万元。三峡是个超大水电站，什么时候上马，应该由电的需要来决定，不是由防洪的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照旧可以防洪。随即谈到防洪，我把长江的历史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说长江跟黄河不同，是条很好的河流，讲到堤防的作用，一八七〇年长江历史上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荆江北岸的堤防也并没有被冲破，被

冲破的是湖南。我唸了两句唐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自古以来，荆江北岸云梦泽有许多湖泊，是为长江临时分洪用的。到了明朝，宰相张居正是湖北人，将荆江北岸大堤修高，洪水来了向南岸陆续冲开藕池、调弦、太平、松滋四口，冲入洞庭湖。水退后，被淹过的土地都会丰收，而北岸的云梦泽的湖泊则逐步消失了，因此湖北人并不感谢张居正。现在长江在我们的手里，是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方法防洪的。最后讲到了三峡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最困难的问题是地质勘察，要确定电站的坝修在哪里，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就像篮球比赛的淘汰制，十个球队打比赛，要打几轮，逐轮淘汰，最后才能决出冠军。这个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航运我没有讲，移民也没有强调，那个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不深。这样一讲，大家都听懂了，我实际上已经是胜券在握。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林一山去南宁时，带了一皮箱资料，他的文章写得很长，大概一两万字。我的文章也有好几千字，因为讲完三峡后，我借着这个机会谈水电，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水电。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这一下情况就清楚了。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你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南宁会议出了个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是要培养秀才。毛泽东就说，我们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

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把带来的那张示意图拿了出来，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一九七九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但是一九八二年初又合并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着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我就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了。那时我对毛虽然不像后来了解得那么多，但是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我与他面对面地接触过一次，对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当时就同胡乔木谈过。田家英也同我谈过一些毛的事情，讲毛的性格时用了一个手势：手掌伸出来两面一翻，意思是毛这个人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明明是跟他走的，可是他变了，就翻过来整你，他自己从不做检讨。还谈过他离开毛时，要提三条意见。这么一种性格，权威又那么大，威信又那么高，我确实害怕到他身边去。于是就立即回答说：我搞水电，很忙。他说：不要紧，兼职嘛。这就没办法了，我就不好回嘴了。虽然毛泽东说我的文章写得好，我心里想，你就看文章写得好，没看到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全面的，我是懂经济的。你过去能听信林一山的话，就是没有经济观点，也缺乏科学知识，跟林一山水平差不多，否则不会有"高峡出平湖"的想法。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后来我在秦城坐牢时用龙胆紫药水写的诗里面，回忆这一段时就写了：

案前摆战场，亦似叙家常。
诸公心落石，朝日雾飞光。
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
已非涂抹手，斩水劈山忙。

在会上我记得胡乔木批评了林一山，讲得很厉害，说你以后再不能这样了，夸夸其谈，弄得中央搞不清楚情况。

南宁会议后两部合并，我只好给刘澜波解释，祸不都是我惹的，我去以前就有人反映了水利与电力的矛盾，毛主席才硬要把两部合在一起的。两部合并以后，水利部的部长李葆华资格比刘澜波老，当了部长，刘是第一副部长，这正副的关系就很大了。水电总局要跟水利部的水利工程局并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不是总局局长了，局长是黄宇齐，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你不是讲资格吗，这就好对付了，黄是八级干部，而且我是部外总局，你是部内局，钱正英蒙了，只好说：那还是以水电总局为主吧。所以水主火辅的方针，水利电力部接受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水电的比重，在全国的电力中要达到一半。水电系统的人都很高兴，欢天喜地：这下好办了——主要是解决了投资问题，有钱干事了。但是这一直是钱正英的心病。

丁东：那时候您是副部长，钱正英也是副部长？

李：是啊，但是她排在我前边。

丁东：钱正英资格并不老吧？

李：当然不老，级别顶多跟我一样：八级。那个时候在中央部里，八级就是很高的了，周建南才九级。但是她是女同志嘛。不过中央开会，部里除了李葆华和刘澜波两个人参加，我也去，是部里的特殊人物。

丁东：那时候有几个副部长啊？

李：副部长多了。

丁东：两个部的副部长合到一起了。

李：水利部我记得有冯仲云、钱正英，至少有这两个人。电力这边，两部一合，王林就离开了，我是副部长，还有一个管火电的。

记下水电的历史

但是费尽艰辛，刚刚打开的这样好的一个局面，几乎是转瞬即逝。一九五九年以后，由于我在庐山出了问题，水利电力部搞了一个所谓的李锐反党集团，还加上三大罪状：“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全国水电系统受牵连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不下二百人，多是水电队伍的精英。文革中，钱正英更是解散了北京和地方所有的水电勘测、设计和科研单位，停办水电学校，将人员分流，水电总局也被撤销，档案资料被烧毁或丢

失，只有成都、昆明两所勘测设计院，由于院领导奋力顶住，得以保留。刚刚起步不久的水电事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情况、很多材料，人们都不清楚，没有人知道水电这个事业受到的迫害。我一直建议办一个《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刊物，用史料征集的办法把整个水电发展的情况搞清楚。十年浩劫很多资料损失了，如果再不抓紧收集的话，将来收集就更困难了。另外就是活的资料，很多从事水电的人年纪大了，退休了，要趁他们精力还可以、还能写，收集一些回忆录。直到一九八五年的《中国水电年鉴》上才有一些比较好的详细的记载。《水电史料》第一期是一九八七年开始出版的，到一九九七年因为国家不准再出版内部刊物了，办了十一年后不得已停了下来，一共出了二三十本吧，是不定期的，刊登了总有四百多篇文章，两三百万字，基本上整个水电建设七八十年的历史，从中国建第一座水电站起，到抗战之前、抗战时期、一直到我们开发水电的情况，有了较清晰的轮廓。我有一篇文章《抓工程质量的教训》，记述了新安江建设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新安江电站进入施工高潮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在那种头脑发热的情况下，要保证施工质量真是太难了，使用的水泥也出现过质量问题，还发生了左岸山头大塌方的事故。当时的副总工程师，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潘圭绥，天天待在坝上亲自监督，工人操作有一点点不合乎要求，他就站在那里不走：你们一定要按质量给我完成。为了施工中水泥供应不上的问题，我带他一起去见过周总理。他是一九八六年去世的。新安江工程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能够在“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只讲速度，不讲质量的大环境下，保证了这样好的工程质量，是非常不容易的。潘圭绥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敬业精神，是水电队伍的骄傲，这样的光荣传统是应该继承发扬的。

为了编《水电史料》，我还下决心找一篇一直找不到的东西，就是那份带到南宁会议上的报告，终于在九十年代把它找出来了。你看看就是这个报告：《如何加速水电站的建设》，成稿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那是一九五五年底、五六年初的事情，那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都要了解全国整个经济建设的情况，俩人都找各部门的一些同志个别谈话，问情况，并且通知所有的部、委和总局直接向中央写报告，汇报自己负责部门的全面情况和问题，说文章不怕长。

丁东：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会儿？

李：差不多吧。记得我和刘澜波等几个人到中南海，当面向刘少奇汇报过一次。另外就是我写了这个报告，有二三万字吧。这个报告现在看起来，应当说还是站得住脚的，对水电总的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清楚说明。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开南宁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对水电还是那样不了解呢？

丁东：他没看到你的报告？

李：对，是王林的问题。我的报告当然要先交给刘澜波和王林审阅，王林一看就把它压下来了，因为在报告里我批评了过去燃料部的领导，批

评了他们对水电的不重视和对水电的压制态度。他就把我的报告扣下来，没有送上去。

丁东：您不是向刘少奇汇报过吗？那是当面谈的呀？

李：当面不可能谈得那么详细，最重要的还是文字，而且中央是那样讲的：每一个部，每一个总局，都直接向中央写一个报告。王林硬是把我的报告扣下了，我一直都不知道。“六四”以后，中顾委内部斗我的时候，王林还讲过我的闲话。

丁东：他也是中顾委委员？

李：是，他是李鹏的关系，后来补的。在陕西省委时，他跟刘澜涛一起斗胡耀邦。陕西不是有个胡耀邦事件吗，一九六五年耀邦在陕西施行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作法，其中有支持长途贩运，后来当过耀邦秘书的林牧协助参与了这项工作，就被开除党籍，判了劳改。此事就是王林直接执行处理的。

丁东：那时他是西北局书记？

李：西北局的副书记。他在文革后期大概欠过一些账，他当过西安市委书记，整了不少人。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电力部，刘澜波调他回来当了副部长。那时候告他状的材料一大堆，我跟澜波说冷处理吧，后来不了了之了。

丁东：您写的报告没有给陈云送一份？

李：没有。那个时候遵规守矩。这个报告第一部分讲水力发电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的巨大的推进作用，比如一个水电站建立之后，有这么多的电量要消耗，就好促进耗电工业，如铝业、化工，化肥等等的发展。四十年代美国的萨凡奇为什么提出修建三峡呢？他就是看重了三峡蕴藏的大电量，美国可以来投资，在附近建化肥厂，搞化肥加工，那时美国需要化肥。第二部分从经济上跟火电进行了比较，发电成本只有火电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还可以缓解煤炭供应和铁路运输的问题。水电的投资主要是土木建筑，沙石料成本很低，机电设备的投资只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而火电是三分之二。而且水轮机组技术含量低于火电使用的燃气发电机组，火电的汽轮机一分钟三千转，水电的水轮机一般是二三百、四五百转，最低的一二百转。水电施工工期只要计划好，并不比火电长。第三部分讲了水电对电网调节负荷比火电灵活，火电厂启动发电，得先烧五六小时的煤，而水电站只要一放水，几秒钟就可发电。我还特别强调了水电站的综合效益，可以防洪、发展航运、养殖等，这些都是世界上公认的、常识性的问题。我还讲了中国水力发电特有的优越条件：河流落差大、流量大、分布广，靠近大城市等等，很多河流的大落差都在峡谷地区，工程量小，可以得到很高的水头，大发电量。最后讲了解放六年来水电发展的概况，为什么水电建设发展的速度快不起来，原因在哪里。这就讲了王林他

们，说电力系统的领导对于水电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计划长期不明确，摇摆不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水电项目实际上并不是从全国电力的发展，水、火电合理配合综合计划考虑的结果，是建不了火电时，不得不用水电补空子的结果。水电打的是遭遇战，开始你争取，他不给，后来没有煤，建不了火电，又要你马上就上，非常匆忙。而苏联的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前期准备工作都做了二十年。当年我还不了解，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煤炭输出国家）都全力发展水电，水主火辅。有的国家五十年代以后，水力资源都开发得差不多了。

丁东：您等于告了他们一状。

李：是的。计委的燃料工业计划局，一九五三年“对今后水电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的正式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了五十万千瓦到一百万千瓦的水电站，需要在五年或者十年以后才能考虑。这个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对燃料工业部党组“关于目前燃料工业情况和今后情况部署的报告”的指示中，也提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仍然是火力电站。因为目前建设大型水电站的条件一般还不具备，所以必须从小型、中型着手，由此来培养工程技术力量，准备大型水电站的建设。

同水利部的根本分歧

中国历朝历代治理洪水都是一件大事。大禹的父亲叫鲧，他治水采取的方法是堵，把水堵起来，跟修水库的意思差不多，但是一堵就出问题，传说鲧后来被杀了头。大禹治水是疏导。当然现在搞不清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大禹这个人。不管怎么样，自古以来，中国的防洪都是：修堤防，这是挡；有湖泊的地方就用湖泊分洪、蓄洪，就是疏导。长江同黄河不同，自古以来，虽然也有水灾，由于两岸有很多湖泊可以分洪，所以从未发生过黄河那样大的洪水灾害。长江是世界上一条非常好的通航河流，没有它，就没有两岸的发展和长江三角洲肥沃的土地。

水利部是我们党刚一掌握政权时就成立了的，它是国家最重要、也是最重视的一个部。这大概还是沿袭了中国各朝代的传统：国家治理视洪水为大。水利部自成立以来至今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完全没有经济观点。防洪缺乏一种经济的实效观点，没有综合的规划、综合的措施，没有一个防止多少年一遇洪水的治理标准，就是将洪水的灾害解决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总想一步到位，一提就是防止“千年一遇”，“永远、彻底地解决”长江的水患，如此的绝对化——一次性完成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且在措施上，水利部就只接受了一个用水库防洪的思想，从来不做多种比较方案，分析、研究哪一种方案效率最高、最经济。

举个例子，一九五三年丰满以上的松花江遇到了接近千年一遇的洪水，水利部那时就是要用丰满水库的库容来解决洪水问题，上下游都不修防护堤。那次我和刘澜波两个人租了一架民航飞机去看，丰满电站上边华

店县城的堤防工程没有修，所以水库蓄水高度不能太高，否则上游就淹了，可是下游的堤防也没有修，水库若开闸放水，当时的流量是七千秒立米，下游受不了，水又放不得。虽然最后利用水库连蓄带放，将一万七千七百秒立米的洪峰峰值消减到七千六百秒立米，但是上下游都受到了很大损失。你看，水利部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只守住一个水库，其他一概不谈。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燃料部管水电的时候，官厅水库就开工了，是治理海河工程的一部分，就是个防洪水库，根本没有考虑发电。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水利部就是个花钱部，就是向国家财政要钱，完全不管工程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一上任，就找水利部的李葆华、钱正英，跟他们谈：水库可以发电哪。他们说：这个我们不管。我就建议：右岸的排洪隧洞用来发电行不行？水利部硬是不同意。没有办法，只好在左岸再打隧洞引水发电，同时重新补做了水库的地质勘探，你水利部不管，我得管。结果发现库内地质情况有问题，水库漏水。还可以附带讲一下十三陵水库，那是大跃进时水利部搞的工程，也是根本不考虑地质情况，十三陵水库是蓄不住水的呀。因此，可以说从我上任的第一天开始，同水利部就发生了根本分歧：建设综合利用型水库还是单一防洪型水库的完全不同的开发方针的矛盾。

淮河是一条扇形河流，它的上游河南和安徽有许多支流，流到安徽蚌埠以下才变成干流，然后经江苏出海。淮河历来水灾严重。那时钱正英主管淮河治理，就是一个“堵”字，在它的支流上修了一连串的水库：佛子岭、梅山、响洪甸，还有磨子潭……等等。但是淮河的洪水主要在干流发生，支流控制的流域面积很小，修了这么多水库起不了什么作用，又不修电站，没有灌溉功能，简直就是白扔钱嘛。所以我们就硬掺和进去，打补丁、加修水电站。到黄河规划时，我们就将办公室设在水电总局，从山东入海口一直到青海发源地海拔五千公尺，全流域勘察，规划了四十六座梯级水电站。而长江规划呢？长委由林一山统着，我们插不进去，结果他们就死守住一个三峡，一守就是四十年，从一九五四年直到一九九四年三峡终于开工。三峡的问题与后患，那么多人提出方方面面的意见，还有现在一时还说不清楚的影响，水利部统统不管，就死抱住一个三峡，用三峡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用三峡来解决南水北调的问题，解决一切问题。钱正英主持的论证会，连个第二方案都没有。我们那时就提出过一个比较方案，比如三峡水库要得到五百亿立米的防洪库容，投资要一百亿，如果利用长江现有的湖泊、洼地蓄洪，加上堤防，得到的蓄洪容量同样是五百亿立米，投资却只需十亿元。而实际上现在修成的三峡大坝是175米，防洪库容只有两百多亿。非常奇怪，我们这个党就是用这种人，只听这种人的大话，国家就允许这种人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提拔重用这种人。

一九八二年我离开电力部到组织部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报告“我对水利工作的意见”给中央，批评了几十年来水利部的错误的指导方针以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包括三峡在内的一系列工作。水利部总是想用

水库来防洪，大跃进以后修了五万多个水库，现在有一半变成险库，已经垮掉了的有几百个。水利部造成的最大的一次灾难是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桥水库垮坝，三个大水库和几十个小水库一起垮了。钱正英说是死了两三万人，其实是死了二十四万人。直接被淹死的十万人左右，因救援不足，缺粮、缺药、传染病等因素死亡十四万左右。真是可怕到了极点，报纸上却从来不让登这些事情。钱正英一直把持的水利部，建立的所谓治水思想传统，是怕水而不是顺应水、利用水。根本问题就是以粮为纲，填湖垦殖：把湖泊围起来造田，建水渠，搞漫灌，名堂多了，把良田变成盐碱地，把天然湖泊全搞掉，湖北省原来有一千多个湖泊，现在只剩下八十一个。绝对乱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讲也讲不完，都是后患无穷的事情，无穷的包袱让国家揹着。在一九八三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赵紫阳将我的这个报告作为一号文件，在会上发了。

一九九八年长江发了较大的洪水，又是一通抗洪抢险，歌颂英雄事迹。武汉有个刊物《今日名流》，我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水利部的工作，标题是《防洪可歌可泣，抢险劳民伤财》。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六日，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守候在荆江大堤上，坚持到最后，没有下令炸堤分洪，成为赞歌。荆江分洪工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建成后，堤后分洪区人口只有一万，且家家筑有高坎，备有船舶，洪水来了可以自救。政府规定，分洪区内只能进行农业活动，不得发展工业和城镇。可是水利部根本将这个分洪工程弃之不用。到了一九九八年，分洪区内人口密度竟然是长江沿岸平均人口密度的四倍。让学地质出身的温家宝上堤严防死守，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其实一九九八年的洪水远不如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当时武汉的水位，比一八八七年千年不遇的洪水还高二米），却造成那么大的灾害，就是水利部一贯只言三峡，不管其他的防洪措施造成的。所以我有一幅对联说他们："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一九八〇年，长江水电网向国家提交了一个工程纲要，用四十亿的投资来加固长江的堤防，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通过了一个决议，但是水利部对此没兴趣，根本不做。

我们和水利部的深刻矛盾，毛泽东一句话：两部合并，结果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束缚了水电的手脚，特别是我在庐山出问题下台以后，水电可说是被钱正英破坏得体无完肤，水电事业整整停滞了二十年。钱正英欠下的这笔帐不能总这么糊涂下去，我相信以后会有年轻一代的水利、水电科学家清算的。

现在想起来，如果不合部，我还是待在电力部，也许后来个人的遭遇也会不同一些。文革中周恩来在葛洲坝出问题时提到过我，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出来的契机，但是钱正英根本就不理会，我在大别山的磨子潭水电站里一直待到一九七九年的一月，才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你去论证，现在不上马，将来到底怎么办才合理。这样，一九五八年的三月，周恩来带队考察三峡。关于这件事，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周恩来带队考察三峡》。周恩来带队考察的时候，参加的人有水利部、电力部、科委、计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几个省的负责人，还有苏联专家，一大船人，我记得胡耀邦也去了。总理在船上开会，开会时有文件，一本一本的。总理没有让林一山发言，让我第一个发言，钱正英代表水利部发言，矛头还是对着我。那时南宁会议的具体细节、我跟林一山的争论、写的文章，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人们的意见还是一边倒地赞成三峡上马。但是苏联专家的发言是站在我一边的。会开完了以后，人就都散了。然后我就参加了三月份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成都会议，我记得那个会刘澜波、李葆华都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总方针，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成都会议搞出来的。

丁东：成都会议时，你已经开始做毛的秘书了吗？

李：我这个秘书有过正式任命文件，而且没有"兼任"二字，也没有"工业秘书"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的职务只是副部长（两部合并后，我升为副部长），通知我参加，应该说是毛的兼职秘书身份的作用。我曾经问过毛：你让我来当秘书，需要我给你干些什么事情呢？他手在空中那么一划：天上地下，什么都管。你看，毛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的口号，但也着重讲过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话，只不过后者没有多少人留意就是了。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是：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33%，农副业增长16.2%，财政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1.5%，钢、煤等产品增长30%～35%，粮食增长16.6%，棉花增长24.8%。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情况的。但是三峡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个"促退"的决议，三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四月五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主要内容是：三峡是个长远的事情，施工准备工作要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它，或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长江的规划应该是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几种关系互相结合，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长江的防洪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储洪排涝等工程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说，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这三个问题统一抓住，这个决议制定的长江规划基本原则就是：统一规划。这个有关三峡的决议是总理主

持的，我参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现在来看，像成都会议、后来的北戴河会议等，为“大跃进”做了那么多的决议，只有这个三峡决议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水利系统根本不执行这个三峡决议，依然我行我素。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我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平反，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复职的，还是到水利电力部当副部长。一进水电部办公楼的大门就看到毛泽东对葛洲坝的批示，有一面墙那么大的牌牌，摆在大厅里：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一看就非常恼火，莫名其妙嘛，这根本就违反工程建设的法则，哪有没有搞好设计就开始施工的道理。那年二月份两部分开，水利电力部又回到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水利、电力的两部格局，我就让人把那个大牌子给取掉了：赶紧摘了吧，这不是丢人吗！

葛洲坝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号，毛泽东的生日。钱正英知道毛内心里是醉心于“高峡出平湖”的，干不成三峡，葛洲坝对毛是个安慰，而且葛洲坝完工以后，三峡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坚决反对修葛洲坝的，他是从建三峡出发的。三峡水电站发电后，供电量多少时有变化，也使下泄水量随之变化，这就影响航运。因此需要修一个葛洲坝，作为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是本末倒置。

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还发了那样一个根本违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示还得了，林一山当然反对不了了。后来葛洲坝出了事，周恩来把担子交给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干。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们还把刻有毛泽东那段批示的一块大石头，正式安放在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也好，可以让后人看看，我们过去就是按这么荒唐的“圣旨”干事情的。

葛洲坝开工以后，因为地质问题没搞清楚，中间停工两年。后来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谈话中总理还特别把我提出来：李锐就反对在干流上先修，他赞成先修支流。他又问：“李锐哪里去了？”有人说：李锐还被关着（我是六七年到七五年在秦城被关了八年）。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当年，毛泽东接受了我的观点，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建三峡，周恩来也没有。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后，只有林一山、钱正英两个人不断地向中央提意见，要上三峡，还有张光斗，是钱正英最倚重的水利专家，后来加上李鹏。地方上也有积极分子，湖北张体学，还

有王任重，都积极，李先念是湖北人，也被他们说动，他们总是闹着三峡上马。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或七三年，有过一个毛泽东对要求上三峡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钱正英这些人不死心，修不成三峡怎么办呢？就修了那个葛洲坝。

丁东：当年您主张先建小的水电站？

李：这不是一个概念，我主张的是河流的梯级开发，三峡不应该修，因此葛洲坝也根本不应该修。

三峡是怎样上马的

三峡最后到底是怎么上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邓小平一九八〇年七月去过一次三峡，那时长委的主任是魏廷铮，林一山原来的部下，他陪同邓小平，把邓小平给说动了。怎么说动的呢？"三峡建成后，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毛泽东虽然有"高峡出平湖"诗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峡事体之大，到底没有敢干，我估计最后说服他的是军队的意见。五十年代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将军，让他从军事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看法，他给中央的意见是："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这大概最后把毛说服了，毛毕竟是打仗出身。邓小平则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周恩来对他的评语）。张爱萍告诉我，他专门跟邓小平谈过三峡问题，小平怎么讲呢："你胆子太小。"因此在这点上，邓不如毛。邓在三峡的问题上如此，在"六四"开枪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举重若轻"。邓小平那时的态度，其实已经决定了三峡必然要上马的最后结局。

宋平跟我谈过一九八〇年邓小平找他谈三峡的事情，他回答说：主要的问题是投资问题，国家没有钱，给挡回去了。后来邓小平一直鼓动着要上，一九八二年论证了一个一百五十米的方案，是两级开发，下边还要再修一级。我知道这个方案水利部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防洪有限，两级还需要重新勘察坝址，他们不会干的。后来这个方案果然不了了之。一九八四年二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这个时候李鹏已经是副总理了，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有一次邓小平接见外宾，接见后邓小平把李鹏留下来谈三峡，他问李鹏：为什么不上三峡？不是说修好以后万吨轮船可以直通重庆吗，为什么不修？李鹏说：移民问题很大，非常困难。邓小平就说：那好嘛，成立一个三峡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独立出来解决移民问题，由国家管起来。那个谈话记录很快就有人拿给我看了。我心里想，这不是在骗小平么！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干呢！南京的长江大桥，武汉的长江大桥，只能通五千吨的船。

丁东：现在的讲法是万吨船队。

李：后来改了，改成万吨船队。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中央以“4号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长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这个人是应该记下一笔的，他对三峡“功不可没”。后来赵紫阳跟我谈过，三峡省筹备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来，叫做不三不四，都是穷地方，无法解决问题。他最后把王任重带去看，王任重是最赞成、最积极的人之一嘛。到三峡库区去了一趟，王也无话可说。这样一年以后，在紫阳的建议下，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又发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本来，为了一个水电工程建一个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三峡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算是他们那些人的低谷吧。

这期间，最出名的反对派意见得到的传播，是戴晴在一九八九年编辑的那本《长江，长江》。这是一本文集，是孙越琦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在对三峡作了为时三十八天实地考察后写的调查报告。报告写出后，原来答应刊登的媒体不敢登了。这里要提一个人：许医农，她是贵州出版社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说是全国最优秀的女编辑。许医农常驻贵州出版社北京办事处，她从戴晴那里知道了这本书后，立即与贵州的出版社老总联系，要老总授她全权在北京把这本书印出来。两会召开的前几天，北京的一个印刷厂赶印出了五千册。戴晴很厉害，立即拿到当年两会代表们住的宾馆小卖部出售，还在两会召开的当天，在大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这本书的发布会。这本书和戴晴的会外游说，直接导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峡工程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这件事五年不议。后来这本书由贵州出版社大批印出，刚刚发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销毁（后来在香港出了香港版）。

不是“五年不议”吗？后来怎么又闹起来了呢？还是李伯宁的“功劳”。中央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后，他当了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一九九一年他经手了一部《三峡在呼唤》的纪录片，送给中央领导们看。王震看后落了泪，经过钱正英的动员，那年春节他在广州找了张光斗为首的十个水利方面的专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王震立即给邓小平、江泽民还有李鹏写了封信：“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很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加快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听了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有人告诉我，王震在会上骂我：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我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他们就又去查，王震确确实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不是反对分子。王震对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当面也对我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

一九九一年的两会之后，李伯宁又给王任重写信，说过去不允许宣传三峡，现在应该改过来，大力宣传。王看了就把信转给江泽民、李鹏，三

月份江泽民批了：“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请李鹏、家骅同志酌”。五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贯彻江泽民关于三峡工程宣传工作的这个批示，这样一来，三峡上马的宣传就哄起来了。而反对意见的发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面之词。

“兴建三峡决议”是在翌年——一九九二年的人大通过的，那个被通过的三峡论证方案是怎么产生的呢？三峡论证原来由计委与科委负责领导，钱正英却设法让他们退出，由水利部领导，由她主持。参加论证的四百多个专家，分成十五个专业组：经济、防洪、施工、地质等等，每组的负责人都是赞成上马的水利部的司局长。像黄万里等反对派，就不让参加，实际上是一个假论证。论证不谈长江整体流域规划，就是独立地论证三峡工程：大坝的高程、规模，等等。打个比方，皇帝选皇后、妃子总要有几个候选人嘛，不能只有一个候选人吧，可三峡根本没有比较方案，是个孤案。论证是如何通过的呢？每个专业组就通过自己那个组独立的题目：防洪、地质、发电、船闸、经济，等等，就像是做单独的科研课题，各组只通过本组的论证题目，根本不是将三峡当成一个总体工程来论证。即使这样，各组通过论证时，仍有九名专家、两名顾问和一位政府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我把名字唸给你听，中国人民是应该记住他们的：陆钦侃（防洪组顾问）、侯学煜（生态与环境组顾问）、陈昌笃（生态与环境组专家）、程学敏（电力组专家）、方宗岱（防洪组专家）、何格高（综合经济组专家）、郭来喜（综合经济组专家）、黄元镇（综合经济组专家）、覃修典（电力组专家）、伍宏中（综合经济组，专家），李玉光（移民组专家）、廖文权（移民组、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人大表决之前，江泽民找万里，万里那时不是人大委员长吗，让万里一定要保证三峡方案在人大获得通过。就这么干。今年（二〇〇二年——编者注）二月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消息，现在查出三峡库区两岸山体有两千二百多处有崩塌危险，需要花四十多亿将山体固定。这是开玩笑，山体怎么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么去固定？楼的地基可以想办法改变，那个比萨斜塔的地基也可以想办法处理，库区水一泡，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最后努力

一九八五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艰难，出版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约二十篇文章，十五万字。一九九五年，我将文章增加到近四十篇文章，连同附录，共四十五万字，大陆却没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一九九六年四月写的，那是三峡开工后一年，给中央的上书，希望三峡还是停下来，停有先例，丹江口停过工，葛洲坝也停过工。我说，现在还没有做多少工作，还来得及再研究。写好后先寄给朱镕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话，请转送给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朱镕基给我回了电话，说：给江泽民看了，总书记要你照顾大局，以后不要再提反对的意见了。此后，我没有为三峡的事情再写过文章

和上书，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反对三峡的人提出的减少危害、尽量补救的方案，我都帮助递给中央。香港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封底刊有编者的长篇介绍，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话：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我为什么反对三峡到底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我为什么不赞成上三峡，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再把它总结一下，三峡问题当年考虑，现在考虑，反对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防洪。从防洪角度讲，不能够依靠一个水库来防洪。当年搞三门峡，以为三门峡控制了黄河流域90%的流量，来了洪水，可以都装进去。那时我不懂得黄河泥沙的问题，苏联专家讲这个水库的寿命是五十年，以为五十年内，我们可以把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做好，把泥沙控制住。实际上黄河的泥沙是控制不了的，上游的黄土高原非常松散，特别是水位高低变化更易导致松垮。黄万里对黄河是最有研究的，他反对修三门峡，他根本反对“黄河清，圣人出”的说法，认为黄河一旦变清，将对两岸造成更大的危害，因为它是一条悬河，清水流速快，势必加大对两岸堤防的冲击，构成更大的洪水威胁。现在长江的荆江大堤就有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不听反对派的意见。三门峡蓄水以后，泥沙很快淤积到了西安，只好废掉水库，改蓄水发电为径流发电，三门峡别说装下所有的洪水，连一天的水都不敢蓄。三门峡的教训，三峡是应该借鉴的。退一步说，咱们就先假设三峡水库可以蓄住水，没有淤积问题，但是单就它对长江流域的控制，跟三门峡完全不能相比。三峡大坝在宜昌的口口上，只能控制住整个流域面积的一半，即只能控制住西水，对下游完全不起作用。而长江发洪水的规律是：最早是北面（支流），其次是西面（支流），最晚是南面（支流），北水，西水，南水，洪水的汛期是错开的，所以洪水发生率没有黄河那样频繁。那么为什么会有大洪水呢？是由于汛期的变化造成的，汛期早的推迟了，汛期迟的提前了，南、北、西水碰了头，就发生了洪水。三峡对四川以下这三面来水是管不到的，而下游发洪水最大的危害是内涝，就是支流的水位抬高了以后，不能及时排到干流里面去，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造成涝灾。所以三峡水库控制长江洪水的说法，根本就是夸大其词。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三峡对湖北来说，可以减轻荆江大堤北岸湖北的洪水威胁，但这又出现了新问题，三峡流出来的清水会对荆江大堤造成过去浑水所没有的冲刷力，荆江大堤会因此变成危

堤。因此，长江全流域的防洪还是应该按照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的决议：堤防、利用湖泊洼地蓄洪、分洪并进的方式解决。西方的很多河流，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等，都是靠堤防防洪。印度有严重的洪水问题，也是靠堤防。自古以来，中国的堤防是世界第一，老祖宗传下来的成功方法是不应该丢掉的。西方后来的防洪还有保险方式，灾民受到的损失由保险公司赔偿。总之防洪的办法很多。

第二、发电。钱正英他们也知道三峡主要用来防洪是站不住脚的，为了让三峡上马，逐渐将它演变成发电为主的工程。从发电角度看，更简单了，一句话：三峡不是个好电站。因为三峡水库毕竟控制着长江流量的一半，上游汛期到来以前，水库的水位需要降低，留出防洪库容，但是万一哪年遇上枯水，先把水放掉了，可来水又不多，落差减低了，发电势必受影响，对电网的供电造成极大的不平衡。

第三、航运。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北京不久，就碰上水利部又提出修建三峡。我就邀请那年随能源代表团访问美国时，认识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师团的司令员率代表团访华考察三峡。美国的水电是世界第一，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团员里有最有经验的修建船闸的工程人员。看了以后，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会议，请有关部委参加，由司令员发表考察意见。他说：长江是条世界上少有的黄金水道，没有道理修筑大坝把它破坏掉。大坝那么高，需要修多级船闸？对航运不利。可惜没有起作用。三峡论证时，交通部是最反对的，本来四十五分钟的航程，现在船要在五级船闸里折腾好几个小时，一条通航的河流，三峡把它完全破坏了。

第四、投资。三峡就是个钓鱼工程，开始说是投资三百多亿，后来改成五百多亿、八百多亿，现在最后落实的据说是一千八百亿，快两千亿了，这在西方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我的女儿南央刚到美国时在达拉斯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工作，美国要在那里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超导对撞机。这样的国家项目，美国法律规定需要由国会每年投票批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结果正式上马的第四年，因为工程花费超过最初提交的预算，国会投票让这个工程下马，已经投了四十亿美元（$4billion，是我们中国说法的40亿），又给了四十亿用于遣散人员，将挖通的隧道回填成原来的样子，因为当初美国国会跟达拉斯州政府有合同，土地是州政府提供的，若国会中途终止工程，必须将那里的土地恢复原貌。你看，美国人是这样干的。而我们，三峡最后的投资是人大投票通过的八倍，照干不误。现在三峡运行的经费靠什么？都摊到老百姓的电费里了，人人出钱，无偿的。三峡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第五、移民。我认为三峡最大的问题还是移民问题，论证时的移民数目是一百一十多万人，实际上一百三十万人都不止，二十年间还有一个自然生长，他们总是往少里打。三门峡移民二十八万，至今四十多年了，移民们还在闹。前面谈过了，我在新安江工程时就碰到过移民问题，那时候

人都听话，政府组织人敲锣打鼓，就把移民送走了。即使如此，一九七九年我一回到电力部，遇到的就是新安江的移民问题。新安江移民三十万，两万人回迁，你把他送走了，水库的水没蓄到位，他又回家了，搞得你没有办法。后来国家又拿出好几百万元重新把他们移走。因此移民费是个无底洞。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新安江移民的故事：有个人家就是舍不得移走。新安江后来不是成了千岛湖吗？千岛就是那些淹没后露出来的山头，这家人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孤岛上。小孩子没地方读书，买东西要划船来来往往，结果最后一家都淹死了。我们这个国家是不讲人权的。美国的习惯我知道，如果老百姓不愿意移，政府是不可以强迫他移的。

第六、地质问题。最近一个记者不是写了三篇文章吗，发表在《改革内参》上，就是吴敬琏主编的那个刊物上。这个记者对三峡库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了移民问题、考察了水库的地质问题。三峡水库的地质问题当年我们知道得不详细，长委自己是知道的，他们的地质人员查看了三峡坝区明朝、宋朝的县志，那个地区明朝发生过三次断航，就是因为两岸滑坡，岩石垮下来，堵塞了河道。长江在三峡为什么多险滩，就是两岸山体滑坡形成的，还有泥石流。有一个资料说是断航二三十年，有一个资料说是八十多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山体崩塌现象呢？就是因为长江在三峡的峡谷地带，山体是幼年不稳定岩层组成的，八十年代三峡开工以后还发生过大滑坡。一些县城迁移了三次，滑一次坡迁一次，刚刚盖好房子，又滑坡，没办法，又得迁。这个记者的材料里说，有的新盖的房子就盖在山崖边上，移民提心吊胆地住在那里。水利部明明发现了那些历史记录，可是为了三峡上马，瞒下不报。这种事情若发生在西方国家，是要判刑的。我在中顾委的时候，有一个老同志贺彪，是邓小平的亲家，洪湖地区的老红军，已经去世了。我在中顾委谈三峡问题时，他最支持我的意见，最反对修三峡。他说：我在洪湖打游击的时候，三峡库区十几个县都跑过，那里的泥石流非常厉害。那就是山体不稳定嘛。山体本身就不稳定，形成水库以后，水库里的水对周围山体形成极大的挤压力量，更增加了它的不稳定性。三峡第一年蓄水以后不是发生过附近天然气井喷的事故吗？那个记者的文章里说，大庆油田常常对不出油的油井采用灌水的办法，就是用水压破坏地壳的平衡，使油出来。因此井喷事故与三峡水库有着必然的联系。还有一个地震问题。三峡本来是一个小地震区，水库形成后，增加了对库区地壳的压力，而且水库蓄水、放水，水涨、水落，造成压力大幅度无规律地变化，极可能诱发地震，原来的地震只有四度、五度，现在可能提高一倍。这不是危言耸听，广东的新丰江水库就出过这种事情。听说现在他们拿出四十个亿，用工程的办法、铆钉加固的办法，解决山体不稳定。我知道他们过去讲过，三峡库区的不稳定山体有四百处，现在调查是两千四百八十九处，比过去增加了几倍。所以三峡地质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山体的不稳又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生存。过去李伯宁不是有个说法吗？就地后靠，上山种柑橘，解决移民问题。山体本来就不稳，人一住上去，挖地基、盖房子、种树，更增加了不稳定，移民的新居大量坍塌。后来朱镕基去看了说：别后靠了，往外移吧。

第七、还有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问题、古文物问题、库区、特别是重庆市的垃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过去都没有提出过。我同西方的专业人员接触，他们告诉我：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在一个水库边上。城市需要用水，供应城市人口的需要，这就必须是干净的水；城市又需要排污，排出的必然是受到污染的水；这是一对儿绝对的矛盾。重庆市一千多万人口，净水哪里来，污水哪里去？我就听说葛洲坝水库建成后，水里没有鱼了，船工们喝了库中的水，得了各种疾病。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地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现在就是围着江泽民转嘛。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黄万里是去年（二〇〇一年）去世的，我记得九月八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谁呢？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三十年代从美国回来的，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黄家子女、女婿一共有七人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对长江上

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八十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中间一女钱正英，左右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黄万里跟钱正英有亲戚关系，钱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节，他俩都到黄家拜年，可三峡论证，就不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在清华被排挤，到八十五岁才让他上课。可张光斗在清华就吃得开，还是两院的院士。黄万里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马寅初、陈寅恪并列，有独立的人格，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趋炎附势的人成了大气候。我们的国家将来后患无穷啊！当年三峡如果不是我劝阻，自是大灾难。三峡工程的负责人潘家铮算是讲了良心话，回答"三峡最大有功人是谁"的问题时，他说：是李锐，是那些反对建三峡的人。

改革开放二十年，经济上改了，但是政治体制保留了原样。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一九七九年我写的那篇文章就是这么来的。一九八四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还有赵紫阳的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一九八〇年，一九八四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紫阳、陈云他们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一九九二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耀邦早就下台了，中央反对三峡的当家人紫阳也不在了，我们四个人在中顾委挨整，张爱萍等七位上将因为反对"六四"开枪，处境也不好，陈云在"六四"的问题上也只能做到保留了我们四个人的党籍。在这种大的政治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百七十七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六百六十四票，三峡工程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可以说，没有"六四"，就没有三峡，这也是邓小平

留下的两份遗产，欠下的两笔债。

最后一次去三峡

我说了，一九五八年去三峡，是陪同周恩来去的；平反复出后，一九八〇年又去过一次；今年（二〇〇二年）五月份最后去了一次，是五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三峡工程开工以后，最先是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催了我几次，让我去三峡看看。三峡工程的负责人陆佑楣，八〇年是陕西汉江上游安康水电站的负责人，我去安康工地见到过他，他对我还是有些怀旧之情的，也邀我去看一看。我考虑再三，甚至想到"坚决的三峡工程的反对者也来参观三峡工程"，可能会被人宣传利用，但这也无所谓，还是应该去看看。这么大的工程，他们困难很多，大坝施工发生裂缝，香港电视台给我打过电话，问我的意见。我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们说：根据我的经验，大坝浇筑由于气候的关系或者其它原因发生裂缝，这不奇怪，而且很容易堵住，不难挽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三天中，陆佑楣各方面照顾得很周到，陪我整整参观了一天。去三峡之前我在湖北赤壁参加中华诗词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我是中华诗词协会的名誉会长，能写点旧诗，属于业余爱好。陆佑楣派人到赤壁接的我。我们先看展览馆，管理人员拿出大纸让我题字，我就把在赤壁已经打好腹稿的第一首诗的首句写上去了，七个字："横空出世史超前"。他们后来在《三峡工程报》和《水利电力报》头版头条登了出来。这个"史超前"可以看成是一种赞扬，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是个双关语。在展览馆，陆佑楣给我介绍了三峡工程的整体情况，包括一千八百亿的投资。那天上午，看了船闸，北岸和南岸，整个要害的地方都看了一下。下午开座谈会，规模不大，二三十人，都是各项工程的领导，几个正厅级干部。有个记者对三峡有意见，没让他参加。他写了一本书，书里写了我。在那个会上我讲了一番话，他们也录了音，会后对录音做了整理。我就把我想好的三首诗都给他们唸了，第一首是：

横空出世史超前，高峡平湖现眼边。
但愿无忧更无恙，巫山神女总开颜。

第二首是：

南宁四十四年前，木已成舟独自怜。[3]
黄老曾经调侃甚，弥留时节梦魂牵。[4]

第三首诗是：

旧地重来廿二年，分明非梦也非烟。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忠与奸。

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历史自有公论。

我那次去三峡，就给他们留了这三首诗，用大纸写的，两大张。他们在报导中一个字也不提，座谈会内容他们也不讲。

抱憾终身

恢复机构、收拾人心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我平反回到北京，好多水电系统的老人知道了，到火车站接我。记得有张铁铮、林汉雄还有林肖侠。那时候我女儿南央也回来了，陪我住在水利电力部办公楼对面大院的招待所。每天来看我的人川流不息，大体上知道了一点水电已经被搞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安子文想让我去党校，胡乔木听说我回来了，想让我去中宣部，我坚决不去。钱正英到招待所来看我，我向她表态，愿意归队，在钱部长的领导下工作。

丁东：她那个时候是部长？

李：钱正英从一九六八年以后就一直当部长了。但是我回来后第二个月，两部就分开了，刘澜波是电力部的部长，我还是在电力部当副部长，管水电，另外还兼管科技委员会和教育。那时很有趣，刘澜波还曾经争取过把王光美调到部里来当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我兼主任。结果后来王光美被胡乔木弄到社科院去了。

上任之后先是摸清情况，才知道水电总局没有了，水电科学院也被砸烂了，水电勘测设计院全国就剩下成都、昆明两所；五十年代初我搞起的那几个水电学校更是什么都没了，原来办得最好的北京水电学校，连房子都被人家弄走了，根本没办法恢复了。面对几乎是毁灭殆尽的局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机构：首先是恢复水电勘测设计院，没有它，你干不成事情。所以，那时我就到西安去恢复西北勘测设计院，到湖南去恢复中南勘测设计院，到杭州去恢复上海华东勘测设计院；东北的水电勘测设计院文革中并到水利系统去了，怎么也搞不回来了。另外就是恢复了北京勘测设计总院，恢复了水电总局。

丁东：您这样收回，等于是从水利系统把这些机构要回来了？

李；不是。那时候这些机构根本就没有了，文革中全部被拆散了。水利部过去自己是没有什么勘测设计机构的，它下面只有三个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治淮委员会，淮委还曾经被取消过，后来

又恢复了。水利部的设计随施工走，没有单独的设计部门。文革中，被拆散的那些水电机构的人员都被下放到各地的工地或工厂劳动去了，要恢复机构，我首先得把人弄回来。再有就是原来很多水电机构的房子都被人占了，还得重新要地皮、要钱、盖房子。要地皮、盖房子，还算好办，恢复的几个设计院都盖了新的房子，西安的也好，湖南的也好，杭州的也好，都盖了新房子。那时，最大的问题是调人。文革中下放，人的户口都跟着下去了，再回来真是太难了。上海华东勘测设计院为什么放在杭州了呢，就是这个问题，杭州户口好解决一些，上海根本没办法。整个水电系统，机构、人员的恢复过程极为艰难，文革中连设备都被挖掉了，据说是挖地几尺，那样地来破坏，水电总局所有的资料都被烧掉了，不可思议。

水电总局是水电建设的总头头，水总的房子也被别的单位占了，经过努力，收回来一部分，可是过去那些得力的人都不在了。我先是把张铁铮要回来当局长，他文革中老婆也离了婚，不记得他那时是下放在哪个工地上，把他要回来了。副局长想要找一个技术出身的人来做，原来水总的总工程师黄育贤文革结束后，刚可以出国就到美国去了，一九七八年去的，怎么也不回来了，伤心啊。我当时很想用一个叫翁长溥的人，三门峡施工的时候，他是技术处处长，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但是大家都反对，我也没有办法，后来让他到云南勘测设计院当了院长。再有就是潘家铮，这个人是搞技术的，还能写文章，写小说，非常聪明，很难得，我非常想把他提上来。我这个人爱才在水电系统是有名的。可是在支部会上讨论他的入党问题，只有我一个人投了赞成票，其他的人都反对，所以我也没办法。结果他被钱正英搞到水利部，很快党籍、职位都解决了，钱正英这方面的本事很厉害。总局原来工人出身的副局长沈信祥，我没有把他调回水总，因为批斗“李锐反党集团”时，他是最积极的分子。他后来在电力部基建司当副司长，就那样下去了。

但是铁铮毕竟年纪大了，比我还大七岁，大概也就干了不到两年，中央离休政策一下来，就做顾问了，后来就用了王干国，他原来是四川电力工业局的，我不认识。

丁东：潘家铮对您的诗还是挺感兴趣的？

李：那当然。在这方面，他对我还是佩服的。铁铮这样的老人，年纪都比我大，潘家铮提不上来，翁长溥也不行，王干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是党的政工干部出身，就是那么一种局面。虽然原来我在水总时的技术骨干李鹗鼎后来当了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但是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人比较正派，业务也好，就是政治上弱了，胆子太小。举个例子，我平反复出后不久，我在秦城写的那些诗，就是后来那本《龙胆紫集》中有二十多首在《人民日报》第四版整版登出来了，李鹗鼎看了以后，吓坏了，觉得不该公开刊出。后来宋晓梦为了写我的那本传记，访问了许多水电系统的老技术人员，别人都谈得很多，敞开来谈，只有他什么也不敢谈。大概因为李锐是个敏感人物吧。所以我说他政治上不行，完全不行。

与世隔绝二十年，很多人我都不熟悉了。所以，文革后的水电系统虽然恢复了一些原有机构，但是人散了，没有一个凝聚的中心，水总再也没有第二个李锐了。特别是三年以后我从水电系统退下来，水电建设的局面就再也没有打开。到现在为止都是这个样子。五十年代我用的那批老技术人员中，有两个人我想方设法调回到北京部里，到现在还在起作用，特别是在三峡工程论证时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一个是陆钦侃，一个是程学敏。这两个人后来都由我提名，进了全国政协，他们不是花瓶委员，讲真话、讲实话。但是政协本身是个花瓶，他们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丁东：他们俩都是原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

李：啊，都是。李鹗鼎也是资源委员会的，也是政协委员，而且是副部长，可是只敢跟着走。为了凝聚水电的人心，一九八O年我去新安江时，提议成立了水电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团结、凝聚作用，团结水电力量。另外就是前面谈到的收集、整理水电史料那件事。

丁东：您平反复出后在水电部工作的那三年又争取到了什么项目呢？

李：攀枝花的二滩水电站工程没有争取到，上了广西的天生桥，鸭绿江上的云峰水电站，是跟朝鲜一起搞的；另外就是湖南的五强溪，那是很大的工程；再就是澜沧江，是后来才上的，也是个很大的工程，澜仓江上游在云南；华东上了闽江干流上的水口电站。还有安康水电站，在汉江的上游，是1978年开工的，我去看过，就是那次见到的后来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

丁东：您后来工作的这三年，跟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从体制上是不是有所不同？各省是不是也可能搞？还是仍由中央投资？

李：还是中央投资。我搞的水电还都是计划投资，有的让省里出点钱，但省里都不愿意出，因为投资大，那个时候水电也不可能私有化，私人经济插不进来。

丁东：跟朝鲜一块搞的水电项目是不是都是咱们出钱？

李：跟朝鲜一块搞的水电项目，投资是共同的，用电也是一家一半。鸭绿江上的云峰水电工程投资是一家一半，共同拥有。有的厂房在我们这边，有的厂房在他们那边。

丁东：施工是咱们搞，还是他们搞？

李：施工基本上都是我们搞。当年那些工程的年度投资都不够，就是因为有个葛洲坝还没有完工，那时水电每年投资的一半都被葛洲坝吃掉了。而葛洲坝，前面说过了，这个工程是个根本不应该修的，就是钱正英一手搞起来的，还有湖北的张体学，这两个人一起唱的戏。

丁东：他们是给毛主席过生日送的礼物。

李：是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工的。后来林一山又掺合了。葛洲坝后来实际上是林一山的总负责。所以，这个人很难讲，不是那么非常原则的一个人。

丁东：可是葛洲坝出的问题是他解决的？

李：是啊，葛洲坝后来由他总负责。长江水利有一个强大的技术队伍，技术干部很多。他们为三峡做的工作是很厉害的，三峡是自己设计的。

丁东：现在人家觉得您在水电系统时，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比较好？

李：那一点不错。关键的问题是打了那个“李锐反党集团”，把水电队伍的精英几乎都包进去了，整个水电因此受了二十多年的影响，加上钱正英在里面捣鬼。

因此实际上，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电力部，至离休这三年，对于水电，只是做了恢复机构、调整机构的工作，水电优先的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成立了能源委员会，我当过副主任，也没有解决。历史上的原因我已经谈过了。胡耀邦跟赵紫阳当政的时候，都有过明确的表示：“要优先发展水电”，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这里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体制的问题。在这个体制下，要做到水电优先是不可能的。因为水电优先的经济效益反映不出来，而这个效益在西方，人们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出访巴西、美国——重新反思

一九七九年的五月份，国务院组织了一个能源代表团到巴西、美国去考察，有煤、电、油三家。因为我又管水电了，部里就叫我去了，陆钦侃陪同。巴西当时正在修伊泰普水电站，是建在巴西与巴拉圭交界的界河——巴拉那河上的。巴拉那河是世界第五大河，水量很大，比黄河大五倍，蓄沙量是四千五百万吨，不算太多，但是没有航运。伊泰甫以上的流域面积是八十二万平方公里，上游的干流、支流已经建了不少水电站。伊泰普的水头是一百一十八米，坝高一百九十六米，水库总库容二百九十亿立米，大概装机容量是一千三四百万千瓦，年均发电量为710亿度，实际发到900亿度。是世界上现在运行的最大的水电站，三峡起来后可能比它大了。

丁东：一百九十六米是净高？

李：是净高。

丁东：那比三峡高。

李：比三峡还高。拦河坝坝体总长七千七百六十米，站在坝的一头看不到对岸。三峡的坝长也就是一公里多。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施工我都看过，但是一看伊泰普的施工场面还是大吃一惊。施工现场的施

工人员真是很少，浇灌混凝土的沙石料用跨河的钢缆索运输，起重运输机浇灌混凝土，完全是机械化。工人们住的都是一栋一栋的小房子，上下班都有自己的小汽车。

丁东：这么宽扩的坝址，上头还不淹没什么？

李：没有。伊泰普建在山区，人烟稀少，移民只有一万，跟三峡比什么也不算。伊泰普是一九七五年正式开工的，我们是一九七九年去的，一九八四年开始发电，也就是九年，到一九九O年装完全部机组，总共历时十六年，土石方九千多万立米，混凝土浇灌一千二百多万立米。但是它七四年提出的总投资预算是三十一亿美元，到一九九一年完工时的计算是二百三十四亿美元，超过预算七点五倍，当然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和贷款利息。所以，三峡刚开始论证时提出预算几十个亿，我就知道，纯粹是钓鱼工程。

巴西的水利资源是世界第二，次于我国，它已经开发了四分之一，水电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装机容量世界第四，发电量世界第三，煤出口。看完巴西伊泰甫水电站以后，我对我们的水电资源开发的意见就更大了。当然，巴西这个伊泰普水电站修成了以后问题很多，电长期卖不出去，对环境破坏也很大。

那次出国，《人民日报》上登了消息。很多人在报纸上看到后说：李锐这小子又出来了。那是二十多年以后，我的名字第一次见报。

丁东：这之前，您的诗《人民日报》不是早刊出过一个版了吗？

李：不是，那是这以后的事情。我的名字多少年以来再次见报是与那次出国有关系。

丁东：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出国的代表团还不多。

李：不多。那个时候去巴西，还没有直接飞越太平洋的航班，我们是先到的巴黎，住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那个大使馆的环境很好，杜鹃花特别大，很珍贵。我们在巴西呆了一个礼拜。

丁东：考察都是大家一块考察，您考察水电，那些搞石油的…？

李：在巴西的一个礼拜是统一行动的，后来在美国呆了十六天，考察水电系统，我和陆钦侃是单独行动的。经过旧金山的时候，我约了水总原来的总工程师黄育贤还有徐怀云，在机场见了一面。

在美国，我们首先访问了垦务局，它是美国的水电中心。国民党时期资源委员会的一些技术人员在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领导下，就是在那里做的三峡初步设计。我们看的第一个、也是美国最大的水电站是胡佛水电站。这个电站是萨凡奇负责设计的，建在科罗拉多河的干流、世界有名的大峡谷科罗拉多峡谷上。科罗拉多河是美国西南干旱地区最大的河流，全

长二千三百多公里，流域面积是六十二万平方公里，接近于黄河，流经美国七个州，从墨西哥入海。这条河的上游流域面积的降雨跟黄河差不多，有二百至五百毫米，下游不到一百毫米，很干旱，年平均流量是黄河的40%。雨季最大流量和旱季最小流量相差四百多倍。这种差距是河流的一个重要特性，黄河是差一百多倍，长江只差三十多倍，所以，长江是一条非常好的河流。克罗拉多河的年蓄沙量也是比较大的，平均每个立米是十二公斤，黄河是四十六公斤。克罗拉多河从干流到支流一共建了大大小小二百七十三座水电站，装机总容量是八百四十多万千瓦，年发电量是二百五十三亿度。

丁东：美国搞水电是政府投资还是公司投资？

李：基本上是政府投资。我到美国去看了以后，了解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水电的股票在美国是最稳定的，水电在电网里面卖的电价比火电高。因为用户的用电量有高峰，有低谷，通常是晚上高、每年最后几个月高。水电可以用水库放水、按需求变化随时调节发电量，因此是用电高峰时的主要供电来源，而高峰期的电价比平时高一倍、甚至两、三倍。所以在西方，人们都愿意向水电投资。水电还有一个特点，运行费用远远低于火电。一是因为设备精度低，维修费用就低；二是水电的厂房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无人管理，特别是梯级水电站，管理人员更少，劳力费自然也就省。

在美国我还看到一种梯级发电靠船闸通航的河流，都是美国陆军工程师团修的，那次去美国接触了这个工程师团。我们不是也有个工程兵吗？我自己还当过水电工程兵的头头。美国那个工程师团真是厉害。还有过鱼的鱼道，有的鱼，你修了鱼道，它不过，白修了；有的鱼道修了以后，它过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都有。所以你必须把这鱼的性情弄清楚以后，才能修鱼道。

在美国呆的那两个多礼拜，了解了美国的水电发展史，从十九世纪开始，到我们去的一九七九年，美国最好开发的水利资源基本都开发了，水利资源利用率是50%。这是九十年代初，现在开发利用得可能更好了。

丁东：这是您第一次出访西方世界，对您的政治观念有什么影响呢？

李：有一个很大的印象：技术是没有国界的。谈起技术问题来，彼此的概念都一样。另外就知道，巴西的水电工程是由美国投资的，接触和理解了资本输出这个概念。为什么人家愿意资本输出？就是为了赚钱，技术输出、资本输出是一回事情。萨凡奇当年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三峡感兴趣？就是技术可以输出，资本也可以输出，帮助中国修成三峡，美国可以在它旁边建设耗电企业，像化肥厂什么的，卖回美国他可以赚钱。

其他的方面，比如美国的交通，我看到美国农村，没有哪一家不通道路的，高速公路发达到了极点。在旧金山，高速公路的单向竟有七条道，

可以七辆车并行开，而我们现在只能并行四辆车。美国是我见到的交通最方便的国家。我在美国参观一些水电站，接待我们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小飞机，可乘坐五、六个人，我就乘过这种小飞机。小飞机更快更方便，哪里都可起落。

丁东：像您这一代人，是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反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又是如何反思的呢？

李：我对水电能源的反思就是从一九七九年的巴西、美国之行开始的。懂得了人家在一个世纪里面，为什么开发得那么好，就是人家确确实实是从价值规律来的。人家是股份制，火电的股票不稳定，因为它会随煤的价格波动，但是水电没有这个因素，因此股值稳定，上面讲了，它的股值还高于火电，大家都愿意买。而我们搞经济不是这样，不同来源的电混在电网里吃大锅饭，水电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我当年在南宁会议上提出优先发展水电，也只是从资源的角度考虑，因为中国的南方、西南、西北都缺煤，水利资源多，而且中国的水电可以做到多快好省，所以应该提倡开发水利资源，并没有真正地从经济规律上去认识。

过去我们以为只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实现综合利用，实际上人家西方早就实现综合利用了。美国综合利用最好的是田纳西河，可惜我们那次没有参观到。它在一九三三年就成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对流域进行综合治理，使田纳西河流域成为一个具有防洪、航运、发电、供水、灌溉、养鱼、旅游等综合效益的水利网，把沿流域原来比较贫穷的州都发展起来了。那真是开发得好！应该讲，他们那里看不到什么失败的东西，人家是真正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所以，到美国一看，我就完全通了。

除此之外，从人的社会生活上来讲，印象深的就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我们现在不是绿地上有自动喷的那个水吗？美国那时候街道旁都是，凡是种有草的地方都有自动喷水，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全国都有。我还发现人家的生活非常方便，在没有城市的地方，许多公路到了交界的地方都有一个大超市，超市是个占地很大的平房建筑，外边有大的停车场，人们买东西、逛超市都是开车，家家都有小汽车，有的人家还不止一辆，生活是真方便。

另一个感触很深的事情是，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是非常尊重的、平等的，没有我们这种上、下、高、低的概念，尊、卑、长、幼没有那么厉害。家庭里，小孩子的独立性都挺大。那一次我们到一个美国普通家庭做客，他们自己家就有铁板烧烤设备，在房子外面放个桌子就吃饭，非常随意，自由得很。我们还去了拉斯维加斯，离胡佛大坝不远，建在沙漠里的一个城市，城市的中心就是赌场，赌场里还有跳脱衣舞的。陪同我们去的垦务局的人问我：你敢不敢看？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看的。我们坐在赌场中间的一张小桌子旁，舞台上跳着扭屁股舞，并不是裸体。那些人到你的桌边来转，一直脱。我感觉人家也是一种习惯，喜欢那样子，可是我们

就像人家有伤疤一样，其实人家完全是为了休息、娱乐。而且她们还跟你照相，等你离开座位的时候，她们将放大了的合影当场给你，我真没有料到，现在那个照片我还保存着。当然是他们主人付款了。考察的一路上陆钦侃照了很多照片，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主人把所有的相片都洗出来了，装好，每人送了一本。人家那工作效率之高啊，真是无以复加。

那次去，带队的是康世恩，因为他是副总理，卡特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们，在白宫与我们座谈了一阵。我觉得它那个白宫也很随便，不像我们。另外，国务院有个宴会，那是最高规格的接待，我发现不过如此，人家的宴会真简单，就四、五个菜。陆军工程师团也宴请过我们，客气归客气，菜都是非常简单，量也不多，同中国完全是两回事情。

所以，到巴西、美国的那次考察，应该说是大开了眼界，不仅仅是看了他们的水电事业，而是从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好，建设也好，社会文明的程度也好，对它都有了一个初步的、全方位的了解。这次出访，应当讲，对于我们自己一贯自诩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脑子里面是没有了；不单是水电，而是从整个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来讲，人家的资本主义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

现在乱了套

在西方国家，水电虽然属于国家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它的资金来源、特别是建成以后的运行费用，靠的是股票，西方的水电在能源工业、特别是电力工业系统内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能够吸引投资，并且能够真正地赚大钱。这些情况到美国去了以后，开了窍。但是平反后只干了不到三年，我就又离开了水电这个岗位。在我们这个体制内，人决定一切，有得力的人，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人不行，事情就办不好。我从水电岗位退下来时，水利、电力两部再次合并了，水电总局又被撤销，其他的水电机构都跟水利并到一起，其实是被水利吃掉了，成了水利的附属品，只有一个水电工程学会是独立的，做了些呼吁、收集资料，总结历史的工作。一直到现在，从绝对数量上来讲，我国的水电虽然在全世界已经排在前三名或者前四名，但是从电的总体结构看，水电在我国能源中所占比重跟五十年代初是一样的，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二十。

世界银行是不给火电贷款的，它只给水电贷款，这非常好地说明联合国对能源的侧重，他们是真正执行了一个好的能源政策的。国际环保组织都反对三峡，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于世界共识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没有科学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共产党是一个农民党，没有科学头脑，摆在那里好好的水力资源就是不开发，就是要搞葛洲坝、上三峡。六十年代发现了石油，以为就不得了了，甚至建了一千多万瓦的石油发电厂（后来又改成煤电厂），现在石油消耗量大，又要靠进口了。煤炭后来发展成乱挖小煤窑，造成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管理混

乱，草菅人命。其实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恐怕也只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过好作用，“大跃进”以后就乱套了，文革十年更是胡来了。

丁东：中国一搞市场经济，短缺的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现在又出现过剩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还是挺不好弄的。比如发电这个事，那次咱们去三峡，还去看了葛洲坝电厂，他们当时就面临着一个调度的问题。因为清江隔河岩也要发电，葛洲坝也要发电，好像还有一家电厂也要发电，几家都想发电，结果是电网调度反而照顾不过来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用户。将来三峡的电谁用？中国过去电总是短缺，这两年忽然不短缺了，这个问题政府以前还没有遇到过。让那些小火电停下来，谁也不愿意。因为一停工人就要下岗。

李：盲目性、一哄而上、地方主义、各个地方乱来，等等，这大概是专制体制下所谓的市场经济的特殊现象，是否也叫“中国特色”？没有民主制度，哪里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现在这个样子，叫四不像，这个国家是乱套了。从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应该讲，我们国家的经济部门、特别是管计划的部门、电力系统本身的能源策略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的口述往事里这件事是要特别写下来的。这个失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重庆是酸雨最严重的地方，因为它主要是火力发电，还有其它的工业污染。重庆的砖房使用年限很短，一二十年的砖房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酸雨把砖都破坏了，酸雨严重到那个程度。攀枝花也是有酸雨，甘肃兰州酸雨也非常严重。环保部门对于酸雨是有统计的，只是不公开。中国的煤炭消耗现在可能是八亿吨，火电是用煤大户。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失策，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

我一生在三个工作岗位干过。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宣传与新闻，自己做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并且也幸运，早离开那个岗位，一九五二年就转业了，所以后来“大跃进”那些宣传浮夸的玩艺儿同我不相干。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自己锻炼出来一点写作的本事，当年起的作用也是正面的。第二个工作岗位就是水电，打开了一个局面，曾经想将水电变为国家能源的主要支柱，长江、黄河、红水河几大水系都进行整体规划，形成一个全国科学的水电发展体系，可惜不仅未能实现“水主火辅”，而且水电永远处于落后地位，没能跟上世界潮流，遗憾太大，抱憾终生哪！自己为此写了诗：“请问问题在何处？只因水电未先行。”第三个岗位就是中组部，可能遗憾不太多。组织纪律，有些事现在还不好谈。

丁东：您这个结论可能太伤感了一些，是从您个人的感觉来的。将来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恐怕您对中国水电的作用要比对新闻和组织部那段工作所起到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共产党从事新闻和组织的人太多了，但是共产党从事水电的人是凤毛麟角，尤其这个资源和开发条件是世界第一的，对于中国水电的历史来讲，您在当中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李：我自认为所起到的是正面的作用。

丁东：您把水电变成国家的政府行为，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水电的发展。我觉得，要不是您这个人能量比较大，在上面又有背景，跟陈云说得上话，换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摊子弄大。另外您又是搞宣传出身的，不但让内部的人认识水电，还在社会上做了宣传，转变了一个农民国家只知道将河流作为洪水猛兽防御的传统观点，让大家认识到河流是源源不绝的能源，并且您鼓动同气相求的人，留下了很多文字资料。因此，从中国的水电发展史上来说，恐怕您在这方面的作用确实无人可比。

1. 1930年代，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两次遭到国民党的大破坏，大批干部被捕入狱。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前夕，为解决北方局的干部人员严重不足问题，也为了避免日军占领华北后，关押在狱中的中共干部遭到杀害，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建议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通过关系保释出狱。他将这一建议报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央经讨论后批准了刘少奇的建议。后来在刘少奇等的安排下，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杨之华、王其梅等61人即履行自首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曾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文件。这批干部出狱后即被分配到各地参加了中共的抗战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共执掌政权后成为省、部级或局级高干。1966年文革开始后，为了给刘少奇定罪，康生向毛泽东重提此事，在毛的授意下，立专案审查，即是文革中有名的“61人叛徒集团案”。把当年按照中央指示自首出狱这件事重新定为“自首叛变”，对61人中尚在世的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或监禁。文革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此案获得平反。
2. 桃花汛：又称春汛。是开春时因河道中冰凌融化形成的洪水。
3. 这个“怜”有多种解释：怜爱、怜惜、自己可怜自己。
4. “黄老”，就是黄万里。“调侃甚”，就是他讲的将来修三个铁人的那句话。“弥留时节梦魂牵”，黄万里逝世前关注长江抢险抗洪，留下了遗嘱。

大跃进、庐山之后



一九五八年七月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游庐山植物园合影（右一：张霖之，右二：李锐）





一九六〇年四月李锐去北大荒前在居所楼前与孩子们的合影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两个姐姐到磨子潭看望刚出秦城监狱的李锐



一九七八年七月李锐与到磨子潭看望他的长女李南央在坝前合影

跟着中央转

丁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水利电力部修的水库特别多。

李：我自己还是比较谨慎的。福建那个时候想一哄而上，我去看了。他们想在红军长征时路过的一个地方，长汀上马汀州工程，我去了以后制止了。我说：没条件，不要上。像这样的情况，我还制止过一些。大跃进中我直接负责的项目就是闽江上游的紫坪铺，现在仍在建设之中。当时关于地质情况争论很大，到底适不适于修坝？修什么形式的坝？苏联两位专家自己的意见就不统一，我们地质人员的意见也不一致。大跃进时期强行上马，挖导流隧洞时塌方，死了两名工人，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工程就停

了。紫坪铺的问题我让罗西北写了一个材料，这个事情我参与了。

丁东：那些项目上马都是中央投资吧？

李：那时候投资都是“钓鱼”，这两个字就是那个时候实行起来的。就是先干起来再说。那些工程都是群众性的，特别是水库建设是劳动密集型工作，不像在城市里建工厂。

丁东：一平二调，把民工弄来干就得了。

李：工资很少，有饭吃就行。所以这笔帐我也搞不清楚。大跃进就我个人来讲，我基本是围着中央转的，水电系统的具体工作做得就很少了，较大的事情过问一下，一般的事，很少过问。虽然对一些水电系统本身的工程制止过一些，但是也有想趁机多上一些项目的思想。有些是可以上的，有些上的是不对的。后来刘少奇主导了调整，基本建设差不多全部下马了。

丁东：跟着转是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了吧？中央开会就把您叫走？

李：是的。他打电话：把李锐带去。五八、五九两年，基本上是一个会接一个会。毛为什么开了那么多会呢？他就是利用地方的各路诸侯对付中央，也就是对周恩来、陈云他们施加压力，因为周和陈提出了反冒进。毛不喜欢在中央，中央没有与他合作的人，下面的人跟他有共同语言。像上海的柯庆施啊、湖北的王任重啊，还有四川的李井泉，那样的人。我对毛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所以真的不想当他的秘书。从南宁回到部里，刘澜波说我中了状元，我就告诉他：我要碰鬼。

丁东：那说明南宁会议以前，周恩来和陈云主持经济？

李：他们后面是少奇，是他批准《人民日报》发的那篇“反冒进”社论的嘛。

丁东：那这以后国务院管经济的人是谁呢？

李：富春。陈云没有什么发言权了，经济工作就由富春管起来，富春跟毛跟得最紧。成都会议的时候，富春跟我闲谈，他说：李锐啊，陈云同志是四中全会上上来的。这话厉害吧？意思是：陈云是跟王明的。他跟我讲这个，是因为知道我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

一九五八年一月份南宁会议后回到部里不久，就跟着总理察看三峡；三月份就是成都会议，一开就是二十多天，那次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会议完了回到北京，不几天后又到武汉开华东计划会议；接着又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四月初到广州开会，讨论超英赶美；广州会议完了，就是八大二次会议，然后就又是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面红旗，办人民公社。十一月二日至十日的郑州会议我没有去，那是毛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纠正了农村中一些过左的“共产风”的做法。这期间，毛泽东常找我去谈话。南宁

会议后找过，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期间都找过。

北戴河会议之前的华东计划会议是柯庆施主持的，我是作为水利电力部的代表参加的，不是作为毛的秘书去的。那时候全国的几个大区同时开计划工作会议，订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总之是要翻番。华东的会议当然也要翻番，钢铁怎么样也要翻一番，那时候热闹得很，各工业部的部长都在会上为柯庆施捧场。翻番需要电，柯庆施问我要，我就是不点头，我说：你们翻吧，我反正翻不了。柯庆施气坏了，邀我去参观上海的厂子：一个是做电压设备、变压器什么的一个小街道厂，一个是造万吨大船的造船厂，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地方。看了回来，柯庆施还指定让我们看电影。我给柯庆施写了封信，我说：你这三个厂子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特别是那个街道小厂，都是手工操作，造出的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你那个造船厂，造的只是个空壳壳，里边的机器设备都没有，没法开呀。船用柴油机需要很大的马力，我知道这个底细，你从哪里搞呢？我就这样顶住了他，一直顶着。从上海回到北京，我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给他的第一封信，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写的，信写得比较委婉。我说我们湖南人有一个词“霸蛮”（就是勉强做办不到的事情），有些事情霸蛮可以解决，有些事情霸蛮没有用处，我说电就不能霸蛮。你过去讲过要波浪式前进，可现在都不是波浪了，都一哄而上了。我说：这样下去不行。

北戴河会议上，毛根本不找我，我就知道，那封信他看不进去：你泼凉水。北戴河会议之后，全民大炼钢铁，我也去看了一下那个高炉群，太可怕了，那是不行的。

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的武昌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让我去了，还找我谈了话，大概他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又觉得我说的都对头了。记得他跟我说：你这封信的态度还不够明朗。我心里想，写得不明朗，能不这么写吗？写得太明朗了，你一棍子打过来了怎么办？其实意思我是写清楚了的，是你没有看懂，或者是不愿意看。这个人哪，他就是不愿意做自我批评。那次谈话谈得蛮好，我把很多问题都提出来了，还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一次开完会，在过道上碰见，我又谈到对森林的破坏问题，也就是那个土法炼钢的问题，他不太听得进去。反正武昌会议那个时候是大转弯了，所以五九年初比较平稳，到了二月份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陈云就敢提一点意见了。他提到钢，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五九年钢产量是一千七百万吨，比五八年翻一番，他建议降到一千三、四万吨。这次郑州会议我没参加，我给毛写了一封信，这次写得比较系统一点了，讲到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信写好后，我先给陈云看了，他很赞成，周太和建议我最好也给富春寄一份，因为他认为我这样做有点像是在背后拆富春的台。我估计这也可能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照顾富春一下吧，周太和会意到了。我就把给毛写的这封信抄了一份给富春，在给毛的信上加了一句，说我这封信也抄了一份给富春同志。三月底开上海会议，让我参加了。上海会议刚开始是工作会议，后来变为政

治局扩大会。会开了几天以后，他找乔木谈话，把我也叫去了。我一进房门，他就指着我说：李锐，你这个人是不能当强盗的。讲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毛在大会上作报告，有一段的题目就是：李锐怕鬼。我才想到他的意思是说，我给他的信还要给别人看，我若只写给他，我的东西就可以变成他的东西，可是我同时给了富春一份，他就不好利用了。他另外还有这样的话：李锐，你只把骨头给我吃，不把肉给我啊。这是说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给他的一封信，这是我给他的第三封信了，在这封信中，我对大跃进的意见提得就更明确了。但是他还说我只给他骨头吃，没给他肉吃，肉很少，还非要让我坐到前面去，向我鞠躬，说：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把我恭维得不得了。在上海会议上，有一天开会时，他突然说了一句：我当统帅，小平你当副帅，我当主席，你当副主席。那时候，是七个政治局委员并排坐在前面，那次会林彪也参加了，少奇坐在毛的旁边，小平在少奇的旁边，跟毛隔一个坐位，毛是隔着少奇指着小平说的那句话。下来之后，我们几个人就议论，连胡乔木都不理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田家英说：是不是他昨天晚上吃多了安眠药，讲话讲走嘴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这么回事：当时乱子出得很多，他总是有责任的吧，他那样说，是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他对少奇不满，是少奇没有搞好，借以摆脱自己的责任。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的心态很可能是这个样子。

丁东：现在有人写了篇论文，说在大跃进当中刘少奇头脑也很热。

李：很热，都很热，那没有不热的。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的那股热劲！少奇在成都会议上提出要个人崇拜嘛。成都会议时我参加小组会，负责向毛汇报开会的情况，因为他不参加小组会。一次小组会议上，我听见少奇讲：我们跟主席比呀，差一大截。邓小平也说：我们对主席是可望而不可及。柯庆施讲得就更厉害：我们对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这些话我都汇报给毛听了。我跟毛说：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头。毛讲：他们是有所指的。“有所指”就是指的周恩来、陈云，认为这两个人对毛不服从。上海会议上虽然毛把我捧得那么厉害，我自己是比较清醒的，当然心情是愉快的。记得上海会议开小组会的时候，薄一波问过我：你跟毛主席谈话到底有什么绝窍？赵尔陆也单独找我谈过话，谈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对冶金部发牢骚，说他的工作根本没法干，冶金部搞的那些小高炉炼出的都是渣滓钢，根本不能用。也是希望我向毛传话的意思吧。

丁东：赵尔陆当时是几机部的啊？

李：他是一机部的部长。造设备要钢材，没有合格的钢材做不成设备嘛。

丁东：冶金部是王鹤寿？

李：对，冶金部长是王鹤寿。

丁东：王鹤寿当时脑子比较热？

李：他跟得紧。翻番，他原来不赞成，后来毛一说要翻番，他也主张翻番了。他不讲真话。七月初开庐山会议，赵尔陆是带了一大木箱子不合格的钢铁上山的。

上海会议开过之后，就是压低指标了。总理在开工业会议时大大地表扬了我：他就是向主席写信的李锐。意思是上海会议开得那么好，我起了作用。所以那个时候，赵守一见到我说：李锐啊，你红得发紫啊。那时候确实全国性的问题想得多一点，参加了几次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给毛的三封信起了一些作用，算是我个人的一次高潮吧。接下来就是七月份的庐山会议，形势大变。

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

一九五九年七月，党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我不是中央委员，也参加了那次全会，是毛让我去的。前边说过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我被毛点名当了他的秘书，回到部里，刘澜波说我“中了状元”，我回答他：我要碰鬼了。这句话一年半以后即不幸言中。而从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对我讲：“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算，则只有三个月。那次会议的情况，我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述甚详，这里就不讲了。

一九五九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了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三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那时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都只是受到撤职处分，没有被开除党籍，还有工作可做，只有我一人是被一撸到底，随后送往北大荒劳改。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此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在一个炕上，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

我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到的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一九六一年秋天，有一年多的时间。到了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的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那三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被人当作斯大林）；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应当说品德还比较好，脑袋瓜也还灵光，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再继续追究。这可能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原来当过冶金部

副部长（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请求党重新处理，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对于庐山召开的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而深感绝望，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这件事就过去了。

刚到兴华村的第一个工作，是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臭得很，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了六一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记得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拣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而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二姐也给我寄过一桶吃的，都是救命的。

跟我同时，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八五〇农场劳改，两个人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是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拣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呵！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到了六一年十月，田家英知道我快饿死了，他大概是从澜波那里知道的，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因为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想法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

以，让我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而且街上有卖鸡蛋的，五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八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到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还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所以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么，又带着三个孩子。

共产党这样的错误，人类历史没有过

我在北大荒第一是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挨饿；第二是知道了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老百姓活得还可以；第三是知道了解放后农民生活得实在是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过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个空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是自己几乎被饿死的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三十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了解到中国这种胡来的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人。共产党这样的错误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因此比他们晚回来三个月，那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还是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的。

在北大荒劳改时，我记一点日记，里面还是写下了我的心思。从北大荒回来先路过沈阳，我的二姐在沈阳，她看到我那些日记，就扣下来了，后来大概烧掉了。她去世以后，我去她家找过，在遗物里没有找到。秦城八年写的那些诗词中有回忆北大荒的生活的，有一首“忆秦娥·茫茫甸”，很能反映那时的心境。

茫茫甸，西风暗起霜天变。
霜天变，牛车拉草，夜空鸣雁。
北飞南越何曾厌，千江万水常相恋。
常相恋，抬头望断，低头思念。

妻子离婚，流放磨子潭

临离开北大荒时，虎林电厂有人送了我一袋黄豆，自己还买到一小桶

蜂蜜，我带回北京都交给了范元甄，当时那是好东西呵。回来后和范元甄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话谈。一天，她把《参考消息》递给我，说：给你看看吧，你现在没有资格订这个了。吃饭时，我单吃。一天家里的阿姨蔡嫂给了我一个大馒头，范元甄就到厨房里训她：你干嘛把大馒头给李锐。我就想：和这个人绝对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了。

我在北大荒时，她曾经给我写信说要离婚，我回信说等我回来面谈吧。此时，我就等她开口。一天她说，我们还是离了吧。我立即回答：好。两个人就坐了公共汽车，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旁边司法部街的中级法院。一进法院大门，范元甄就哭了。进到办公室我才知道，她此前已经撤回自己的离婚申诉。但是路至此已走绝了，俩人办了离婚手续。离婚证明我现在还保存着。

去北大荒以后，水电部每月发我一百二十元，不是原来的工资级别了。离婚后，三个孩子我每月每人负担二十元，三个孩子共六十元，我自己还有六十元，给母亲每两个月寄三十元。母亲住在长沙的大姐家，大姐不要我的钱，可是我有责任，自己每月留四十五元。那时四十五块是很值钱的。我后来到安徽磨子潭继续劳改，还是那里首屈一指的富翁。

不久后我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跟黎澍、田家英有过来往。我跟田家英见面是电话相约，到鼓楼的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喽，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记得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是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当然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跟黎澍是在鼓楼马凯餐厅见的面，他请我吃饭。那次也是谈了很久，谈到彭德怀，最厉害的就是这句话了：历史上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就是这些提意见的人，哪个皇帝能够留名呢？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一致。我跟黎澍谈了我想写谭嗣同的想法，他建议：写谭嗣同还不如写孙中山。黎澍对孙中山是很感兴趣的，他最有名的著作不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那个小册子吗？我跟黎澍的交流就是谈历史，谈得来，跟田家英就是谈毛。

其实水电部对开除我的党籍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九五八年水电、水利两部合并后，李葆华是党组书记。我回到北京后，水电部党组讨论过恢复我的党籍，结果没被通过，这样，就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最关键的原因大概是范元甄的揭发材料（应该是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她写的）。这份材料当年被邓小平下令烧掉了，他看过后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也看过这份材料，他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北京后，刘澜波是坚决反对我跟范

元甄复婚的，他说："天底下没有这样恶毒的女人，李锐如果跟范元甄复婚，我们水电部党组集体反对。"我只能据此推测范元甄在这份材料里揭发内容的厉害，里边一定会有我和她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一些话。主张开除我最积极的还是水利部的人，内部的帽子说我是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

磨子潭水电站是水利系统管的，就是不把我下放到我自己曾经负责过的电力系统的水电站，告诉我是去劳动改造，我不同意。最后谈妥了是让我到那儿去搞文化教育，当文化教员，党籍问题、工作问题过两年再说。到磨子潭以后，我没有给黎澍和田家英写过信，怕影响他们。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从秦城出来以后，我才跟黎澍恢复来往，家英则在文革初期自杀了。

丁东：黎澍当时是在中宣部还是在社科院工作？

李：好像是在中宣部。因为他那个时候住在《红旗》杂志社在沙滩那儿盖的房子里。社科院是文革以后才有的。

问：对，文革以前只有学部，没有社科院。

最后平反，安子文再次帮我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的磨子潭，就在那里给水库的职工当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被一架专机弄到北京，在秦城蹲了八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出狱，直接又被送回磨子潭。事情的起因是六七年，好像是夏天、还是秋天，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就是乔木、家英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主席秘书中最危险的人其实是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我猜就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后来我平反回到北京，归还我的材料时，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这也可以证明抓我与陈伯达有关。

第一次到磨子潭，一直到文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记日记。从秦城再次回到磨子潭后，我又恢复了记日记的习惯。我的大女儿南央为我整理，在美国出版的《李锐日记》（三卷本）和《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年—1979年家信集》（再次回到磨子潭直至平反复出期间与家人的通信和申述信）两本书，可以说是我在磨子潭的流放生活和如何最后获得平反过程的最准确的记录，这段经历可以不谈了吧。

我最后获得平反，安子文的帮忙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党里面看重我的是安子文。一九七八年形势发生变化，胡耀邦执掌中组部，组织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安子文先于我入院，两人在病房里碰了面。不久他即得

到中央平反通知。返京前，他对我说：我一回北京就找胡耀邦，解决你的问题。他和胡耀邦是亲家，他的女儿安黎那时是胡德平的妻子，两个人后来离了婚。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卅日接到中央通知，一九七九年元月四日从安徽合肥回到北京。水利电力部党组直到九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一月廿三日，才正式做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

附录一——李锐在北大荒给范元甄的一封信

元甄：

七月十二、十四信并照片七张，七月廿一日即收到。

自七月八日起，开始夏锄大突击，到廿二日告一段落，其间共有五个竞赛性的大突击日（分场各队及队内部），整整十四天，都累得很重。竞赛五次，老头排得一冠军、二亚军。质量总是第一，工效有时比青年还高。老头们六、七十岁了，实是英雄好汉。我的工效比老头标兵约差1/4-1/3，同其中身体较弱的差不多。一天也能锄两亩多地（许多地草难锄，老头们说是来北大荒几十年没遇到过的，因涝灾所致）。主要是技术问题，近苗根不敢放手下锄，手薅的多，消耗力气并不少于他们。老头排共种三百多亩菜，也参加种大田。“宁种十亩田，不种一亩园”，菜地本来是细活，费工多的。因种得多，还时常帮搞大田及其他杂活。菜地也是一片草地（此间草长得特别厉害）。这几天补了大头白、西红柿等苗，才有点绿菜地了（几乎所有夏菜都要变成秋菜了）。老头排去年三十多人，因去年累垮和不愿再干的，今年只剩下十六人（连我），而经常干活的只有十人左右，两付犁杖，对付三百多亩菜地还有其他活计，任务很重。这些人都是山东移民，同北大荒奋斗了几十年，能吃各种苦耐各种劳。但经过去年及半年来的缺粮，原来壮实的人都骨瘦了。常有各种牢骚（此村过去很富足，每户平均每年杀猪即二头），但干起活来是不愿落后的。“庄稼活没有一桩是轻快的”，首先是体力经得住，其次是技术。我观察过他们的手，大都是变了形的。以前信中提过一个周老头（周福仙），他的手指与手掌全是弯的，主要是握镰刀的原故。我只有三个月，现在手指已捏不拢来，每夜手指如打球“戳”了手似的肿痛。山东人百年来向东北移民垦荒，特别是北大荒一带，最能生动说明中国农民好品质：忍苦耐劳，团结互助，聪明能干。这儿老头们几十年同苏联人和日本人一同生活过（兴华村原是从乌苏里江边虎头被日本人赶过来的，那儿是“国境”线，与苏联人隔江相望，过去常有往来。现在他们叫许多庄稼的名字和用物，还用俄语），对俄国和日本人种庄稼都是看不大起的，觉得远不如中国人。日本人占领时，也是这样佩服他们的。这些人对种庄稼有很大自豪感。

由于每天劳动时间长，体力消耗大，每天生活中常感受的一种事，不

能不是“饿”的问题。虽然我只44岁，年龄不能和他们比，但体质实远不如他们，自己设法全力抗住。首先是不能病倒（且不要说病倒后的各种具体情况）。所以老头们平时常夸奖我能“抗得住”。因涝灾，前一阶段多雨，劳动强度付得特别大，有的地播种2-3次，各种具体情况不身历其境，也很难理解。我“抗得住”，首先当然还是精神、思想状态正常：自己应该经受这样劳动的锻炼，对自己以后半生有绝大好处，也很悔这样同群众一起生活劳动参加太晚了。但有时感到抗不住时（特别是无风之日，小咬等猖狂，在地里干活时，头部包扎如修女，但露出面部咬得红白斑斑，咬人东西叫出名目的有七八种之多），思想也有顷刻的波动。但经常的状态是好的，是你之所谓“单纯”。以前信中常提到身体情况，是因自己常考虑在当前具体条件下，如何能顺利通过劳动锻炼，真地弄得病倒或疲弱不堪，于公于私都不好。还想让你知道一下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外表可能像四四年伤寒之后，身上骨瘦也相似，皮带圈又缩小一格。各种老病重现，如双手泡痒比过去范围大（大概老晒太阳原故，近较好，厉害时影响睡觉）；常拉肚，每次便前，近来腹痛剧烈，想必是蛔虫捣乱，因来此常吃生菜，本村95％人有蛔虫；腰胀，膝盖痛（蹲久了，如种菜时特甚）；不管怎样累，常睡不稳；小腿肚抽筋，记忆力极坏，隔天事记不起来，等等。疖子是新病；现常管不住尿，尿后总剩下一些，裤子常湿。写下这些不是求你“同情”，或“闪起怜悯之心”，而是让你知道，即令如此情况，我自觉自愿在全力劳动，从而从各方面锻炼自己。为了不使干活时过饿，“抗不住”，头昏眼花，前些时多吃豆饼，但与拉肚矛盾。为了避免哮喘，早已开始冷水擦身，是有效的，来此没有大犯过。这儿夏天除小咬等外，只有几天闷热，问题不大。冬季排水（即挖沟渠等）活极重，我当早做各种准备。

为抗住目前吃粮困难，各家户都有些办法：挖野菜（种类极多，我帮人挖过）；一半以上人领粮回家，自己调剂；捞鱼成风，有的多少有些余粮；菜园中新土豆快下来，等等。我同一老头去捞过三次鱼，两次是利用中午一小时，第三次是昨天大休（七一休息后的一次）。过去辛苦，消耗体力过大，过水草地，水齐大腿，常摔倒，在泥水沟洼中捞，全身都是臭泥水，回家还得彻底洗身洗衣。得失相较（得到的营养和消耗的体力）是否合算，是个问题。是一种“老头鱼”（次于泥鳅），刺多，可腌好晒干。第二次六十条（二寸左右长）晒干后，全部猫吃了。第三次同住的刘排长（管畜牧的）也参加，有半脸盆，还没吃完。前次信中提到咸鱼，自然不必寄来，留在家中吃。队上食堂开始试办“小馆”卖菜（能不能办下去不一定，因无油），油炸丸子要粮票，此外有黄豆，豆腐。今天开始，4到6毛一小碗。我今天大大改善，精力好得多。如果能继续下去，一月花上30元也是值得的（不是每天有卖的，无油即停止）。为包裹事，没料到引起那样大篇，连续议论。由张队长收，当然是他同意的（此间干部，下放军官，有补助的，收食物等，生活中常事），北京邮局控制既严，你对此事如此反感，包裹不要再寄。虽然说实话，希望能有油质的、营养好的饼干、巧克力、代乳糕等物助我“抗住”，但我知道使你勉强办事非常不好。不过在看法上，不是与此地群众“同一水平”问题。

最近一卷报纸、两本《红旗》收到。报纸可不再寄。照片除这次七张外，以前收到的都是我在家时照的：共十一张，苗、妹一起的共五张（席地而坐的二张，一大一小相同，观花，大半身，侧视），么么三张（动物园飞禽馆放大，阳台，梳二小辫），我与三儿，你与三儿，你蹲着与么儿闻花。你随便说买个本子贴着，哪儿去买本子？此地只有小学生用小本子，纸是分场自制的。虎林也只有土纸本。托人去虎林买物几乎是难办到的。

住房前菜园共种了十五种菜：玉米、土豆、大头白、黄瓜、西红柿、大小辣椒、蚕豆、向日葵、窝瓜（此地特有，关里无，比土豆还好吃，可顶粮，一个大的几十斤重）、茄子、白菜、小萝卜、豆角、葱、韭菜、蒜，外加黄烟。其中西红柿30株，小辣椒一小垅，十几株蚕豆是我有兴趣种的。目前只有白菜、水萝卜可吃，弄点酱油拌着吃，其他还得一个月左右。黄瓜可能半月，也只能当水果吃。没有油，大家对菜的兴趣也不那么高了。我们种的土豆长得还好（约二百多亩），但担心因留种和外调，吃不到多少。估计一个月以后，小麦下来，如不外调，主食情况可能好一些。我自己当尽一切努力不生大病，劳动能“抗得住”，迎接冬季的考验。你没有过“饿”的经验，现在是饿与劳动强度高同时的问题，我对自己能经得住，比有些老头们“抗得住”些，自己是满意的。长此下去，自己不设法改善是不好的。上述病症原因，当然是营养不良和劳动过累，睡眠不足（每天平均睡5—6小时）以及原来体质所致。

关于寄物事，有以下几件麻烦，如你厌烦，无时间，不办都可：1）打蛔虫药，此间久已无此药。有一种白片的，像服普通药一样，如要饿肚吃的不要寄，我抗不住。吃的方法要告知。2）此间医生（部队二年护校）很负责，为我治疖想了很多办法。他需要高领棉毛（或线）衬衣，到处买不到，希望我在北京想办法（上次寄来的点心分与过他），我没全肯定答应。他个子同我一样。3）张队长托我买表，我说北京久已缺货，买不到的。但恐他们以后还有托办事，不好全拒绝。这些对你确是负担，你时间有限，因此可以不办。

如寄物，请附上一两个口袋（可买装洗脸用具的那种），可装点食物，以及饼干盒之类，此间太湿。下半年有布票一丈多，你们需一般的布，可买好寄你们。那个么么用的大白瓷缸筒（寄卖未成的）如便寄，可寄我，极有用。来信请附寄些邮票。粮票烦续弄些，仍挂号寄。

你身体情况有进步否？看来北京供应较前困难。你们不要节省，假日上好地方吃些好的。营养与劳动应成正比。所谓“苦干”，真影响到（经常影响）身体是并不合算的。想给苗、妹、么写信，来不及了。昨天全部时间给了“老头鱼”（跑了二三十里草甸子），今天下午下雨，利用此时间写了信。苗苗考试结果如何？他的信写得很好，只一个错字，“安排”写成“按排”，字还不算好。小妹转学结果如何，么么太有趣了。乱吃点东西，注意

好，对肠胃锻炼有好处。看到农村孩子们的生活，我们太贵族化了（当然不是专讲卫生问题）。

给安部长信附上（也寄一份与部党委）。

每天还是做点体操锻炼。容易生气、发急的毛病是否有改进？

李锐

7.25.（1960）

附录二——李锐在北大荒给安子文的一封信

安部长并中监委：

接到水电部党委通知，中央已同意关于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五月中旬，中央组织部连处长来虎林找我谈历史问题时，曾说明这次是全部复查我的历史，并谈到我的“处理决定”中其他是枝节问题。因此曾引起我的一个错觉，以为中组部复查之后，我的“处理决定”才会最后审定。我在北京时，对党籍问题后来有些消极思想，感觉自己多年以来不够一个党员标准，开除就算了。只是觉得“处理决定”中有许多例证与事实不符（我对“处理决定”写的意见中，是“有些例证与事实不符”）。连处长离开虎林时，我又提出这个问题，说“处理决定”如有修改，希望能最后给我一阅。关于我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我在虎林写的材料仍不够，连处长嘱我再写补充材料。我在此间一边劳动，一边挤时间将几个历史问题的补充材料写出（“几个历史问题的补充材料”及“关于以上几个问题的补充”共两份），于六月廿七日交农垦局组织，谅北京早已收到。在这两份补充材料中，有些地方也附带说明“处理决定”中例证不符合事实之处。现在接到部党委转来中监委通知，方知复查我的全部历史与中央最后审定我的“处理决定”是两回事。我现在要求中组部与中监委对我的“处理决定”中所举例证事实，能逐条查对清楚，作出必要的修正。关于党籍问题，中央已作决定，我也不可能再提出新的要求。

（接到部党委通知时，正是第一次大突击，痛苦了很多天，痛哭过几次。过了好几天情绪才正常——附告）

吏部文章







一九九六年五月与老伴张玉珍和女儿李南央在涿州影视城



一九九八年十月李锐与武大同学刘清（左四）重返武大

重返世间

一九七九年平反回到北京正式上任之前，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五日，我先回了趟长沙，看望母亲，我和她二十多年未见面了。那时母亲已经糊涂，似乎认不出我是他的儿子。

在长沙见到了很多过去新湖南报和省委的老人，还有亲戚朋友，当时在位的一些省委负责人也来看我，方知我与世隔绝的这二十多年，特别是

文革十年的世间沧桑，庆幸自己文革时被关在里边，否则以我的性格，可能早就没命了。

从湖南回到北京以后，我即写了一封信给黄克诚，谈自己了解到的湖南的情况，请他转中央。这封信的草稿留下来了，我唸给你听：（以下根据录音整理——编者注）

春节前后我回到长沙探亲，碰到了省委几位负责同志和一些在职、不在职的老同志、老同学，有政协副主席和一些民主人士，知道了一些湖南的情况。

我第一谈的是张平化的问题，张平化在湖南工作近二十年，人们有这样一种比较一致的、或者说是过分的说法吧：没有为湖南做一件好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湖南的派系斗争相当的复杂，我弄不清楚，但据说张当时是支持这一派或者是那一派的，至今仍旧被关压或者是下台的那些造反派的头头都是同他有关联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讨论的时候，湖南表态最晚，据说张平化当时在北京遥控。有的厅局长告诉我，《人民日报》对湖南省委会议的报导，毛致用关于这个问题的表态那几句话是事后加上去的，当时开会的人并没有听到他讲过。这件事人们议论最多，街头有过大字报。人们讲，湖南打着一块招牌，是毛主席的家乡、华主席工作过多年的地方，所以挡住了大家对湖南问题的批评。

第三，湖南积存下来的冤假错案很多，省委的平反工作很迟缓，又不明快。我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唐麟（我走后的省委宣传部长，跟着周小舟一起倒霉的前湖南省委常委、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的女儿来找我，讲她母亲唐荣前为她父亲催办追悼会的详细的过程。唐麟的追悼会困难重重，几经周折，唐荣前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在开唐麟追悼会时，她心脏病突然发作，当场去世。因此追悼会停开，几天后，开了两个人的追悼会。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另一名成员杨第甫参加了他们两个人的追悼会，但是报纸上不登他的名字。杨在七O年的时候还曾经担任过轻工业局的顾问，但是不久以前连顾问的名义都没有了。周小舟的追悼会至今还没有开。省委在给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开追悼会的时候多半用什么说法呢？“不幸死亡”，都没有真正地、明确地平反。

第四，我接触到的一件比较大的冤案，是反右派运动的时候，《新湖南报》以邓均洪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编辑部一百一十个人，有五十四个人被打成右派，直接负责制造这个冤案的人是官建平。官建平原来是所谓的地下党员，后来查清楚，他根本就是混入党内的一个骗子，曾经是一个铲共团的副团长，他本人也承认过，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又受到了保护，还恢复了他的党籍。

第五，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中层直到上层的干部中间，特别是在一些专搞运动、专整人的干部中间有不少是属于“双突”或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新提拔起来的。由于他们有权，虽然在工作中不称职，不懂业务，又有派性，但是在调整住房和调整工资级别时，都优先，群众对这些人意见很大。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也是当前工作被动、许多政策难以落实的一个原因。德、才、智较好的老干部、有真才实学的老教授、技术领导乃至领导干部都被迫地、或者自己选择离开了湖南。一大批离开了湖南。有的到了外省，有的到了香港。比如湖南医学院有一个懂业务的七级老干部叫李廷之（根据录音判断——编者注），在学院不能被正确使用。另外还有一些老医生到香港或者到沈阳去了，湖南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到安徽去了。

第六，农村的浮夸风、平调风、吃喝风长期以来非常严重。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个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去的湘潭地委副书记，他谈到桃园的一个情况，桃园水利、林业等建设还是有成绩的……，湘西有许多县的农村生活很困苦，最严重的是有的农民还没有房子住。南县、华容、安仁是鱼米之乡，前两年外出要饭的很多。春节期间，我在长沙市看见还有不少要饭的。去年，湖南全省的粮食产量估计是四百亿斤以上，上缴粮食在全国属于前列。人们议论存在粮食单打一的情况，农村就是打粮食，副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一般都是很低的。虽然去年的粮食丰收，但是人们对农村的情况还是比较担心的。

第七，关于省委领导，在干部和广大的群众中议论最多，简单地讲，就是水平低，跟不上目前的形势。对这种情况，街头有大字报。毛致用过去是优秀的土改干部，后来当了县委书记，人还是比较朴实的，但是人们认为他做省委第一书记是不称职的，群众中的流言讲得很挖苦，说他是：“莫得用”。省委的文教书记叫董志文，南下的时候，他是平江县委书记的通信员，文化、政治水平都很低，群众中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笑话。省委领导成员只有个别人是解放初期的地委级的老干部，有一些身体好，能够工作的老干部还没得到很好的安排和使用。省委扩大会对三中全会的传达听到个别同志反映，主要是传达了文件，对于如何解决遗留的问题以及整个的工作的转移的问题没有展开深入广泛的讨论。

我这封信就是直接讲到湖南的人事问题了，还是旧习难改：“关心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我后来到中组部以后，湖南是最棘手的省之一。我们一直想把毛致用换下来，耀邦坚持不同意，他认为毛致用是好的、不错的同志。实际上，湖南的问题一直非常夹生，毛致用一直坚持文革中左的一套，文革中的三种人在湖南猖狂了很长时期，闹得厉害。像杨第甫的儿子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去世前，据说是最接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文革中是中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亲自点名关进监狱，判了十年。一九七八年刑满释放，在邵阳一个印刷厂当工人。湖南省委就是揪住不放，不给他平反，说他是反总理，不让他出去考研究生，不让上学。

反正那一趟湖南之行，自己感觉是真正回到了人世，身不由己地又卷入了人事纠纷。

选拔第三梯队

丁东：文革当中批“二月逆流”的时候，那些副总理都是老资格，余秋里当时还不是副总理，但是气儿也跟那些人一样壮，这还是说明他这个人能量大。对于干部来说，有的干部能量就大，有的干部就是一般的执行者。您中组部干的那一段儿，就不是一般执行者的作为，它的影响是潜在的，拉开来看，会越来越看出它的味道。

李：当时主张干部必须德才兼备，起用一代新人嘛。

丁东：您八十年代初做的那些事，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人事，甚至往后还会再影响十年。这样就等于八十年代一直影响到二〇一〇年。将来您一看，谁、谁上去了，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

李：那个第三梯队，现在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名词不一定妥当，是后备干部嘛。但是这件事本身是绝对正确的，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

丁东：我觉得大量的业务干部、专业技术干部进入党政系统的主流，就是那一次，在那以前没有过。

李：没有。

丁东：这两年不行了。提拔的干部，不是共青团，就是领导的秘书、领导的孩子。

李：现在乱套了。

丁东：这两年好像没听说提拔了某个业务专家？

李：没听说。

丁东：没有了。所以说，把专业干部弄到党政领导班子里面去，这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恐怕也就是八十年代那一次。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咱们的体制大不相同。那些个专业人士，今天进政府当官员，明天离开政府回去继续当专家是很畅通的。

李：那完全是一种习惯的东西了。

丁东：对。今天我是教授，明天可以去当部长。

李：下来以后还当教授。

丁东：西方在专家和官员之间没有一道鸿沟，咱们的这个鸿沟始终就打不通。

李：我对目前的情况完全不知道，人也不熟悉了，现在的印象就是：

只剩任人唯亲了。

丁东：是。现在，院士出来当省长或市长的，好像有那么两个。

李：现在印度的总统是一个科学家。

丁东：前一段时间，韩国金大中提名一个大学女校长当总理，后来没有通过，因为经济上有点不清楚。他们那个体制和我们的体制就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当政的时代，政府里用了很多专家。

李：他是西方的传统呀，像翁文灏。

丁东：王云五原来是出版家，蒋介石请他当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部长，后来当了行政院副院长。

李：蒋还曾经想提胡适嘛。

丁东：他那个体制和我们这个党政官员自产自销的体制不一样。

李：我们这个体制实际上还是一个党的体制，党国一体。党就是国家，国家的东西统统都是这个党的，党包揽一切。

丁东：现在的官员，都是职业化官员。除了当官，不能当别的。您搞第三梯队时，这个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有改变。

李：当时很强调专业化，知识化同专业化相结合。

丁东：当时一批专家进入政府、进入党委，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李：所以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党的问题，党政要绝对分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政党是政党。现在党的官员的权力高于一切，高于政府，高于法律，政府与法律都是附属于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现在搞出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更明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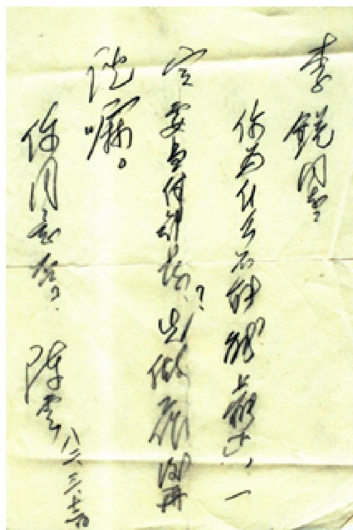
丁东：经济部门的官员专业化程度应该说是比以前高多了。

李：与过去当然是不同了。特别是现在又进入了WTO，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你干不了。

丁东：您在中组部没干多长时间就下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李：我是一九八二年二月从水电部正式退下来的。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就让王玉清给我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以后再说嘛。这样我就没办法再推了。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是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电力代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你对李锐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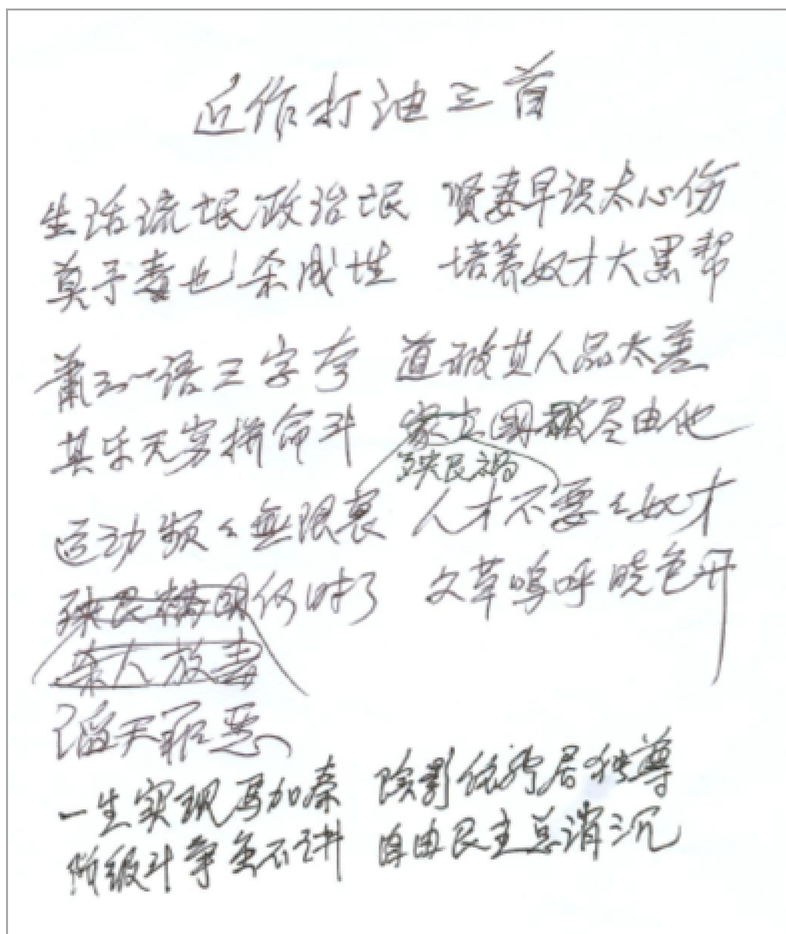
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我担任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但是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



中组部副部长下来是因为陈云收到三封告状信：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好像还有刘泽鹏的母亲。李伯宁是三峡的最积极的怂恿者之一，当然很讨厌我；邓力群是因为我拦下了他提出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宣部的名单，他要把王忍之调到人民日报社；范元甄还是个人的怨恨，我大女儿南央的那篇关于她妈妈的文章里写了这件事。当然，主要可能还是陈云当时对我有了某些不满。我在上海调查上海新班子名单时，碰到了他，他明确地告诉我，让我去中组部，就是要顶住耀邦，他认为耀邦搞“青（青年团）红（红卫兵）帮”。但是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跟人的人，是个干事的人。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什么的。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离开组织部，我又没有犯错误。后来乔石主持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以后我还是进了中顾委。决定让我下来很突然，习仲勋、帅大姐事后才知道，很替我不平，但已无可挽回。

我在中组部这段，详细的事情现在很难回忆清楚了，但是我几乎每天都有日记。等我百年之后，由我女儿南央整理出来吧。

臧否人物



近作打油三首

生活流氓政治棍　贤妻早识太心伤
莫予毒也余成性　培养奴才大黑帮

其乐无穷拼命斗

运动频频无限衰　人才不要要奴才
何时了　文革呜呼晓色开

一生实现马加秦
自由民主总消沉

李锐二〇一一年日记本所夹评毛泽东打油诗草稿

毛泽东

对毛这个人，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了。我怎么给他当的秘书，以前也讲过了。刚解放不久，毛泽东邀请周士钊一些旧人去北京，回到湖南以后，周跟我谈了见毛的一些情况。毛邀他在中南海里划船，向他吟了一首诗，具体哪一首现在记不起了，反正表达的意思是：我现在像皇帝一样在中南海里邀我的臣子一同划船吧，那样一种心态。那时我就多少有了些了解：毛把自己当作皇帝。我的好朋友黎澍一直在白区工作，没有去过延安。他一到北京，看到毛他们住进了中南海，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

吗？”但是“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话，毛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出来。谁都不能惹他，按皇帝的思想办事情，这点我很清楚。所以由于这种原因，我研究他早年，总是想把这个人彻底搞清楚。毛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很极端的个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比如，他和杨开慧结婚前施行试婚（李淑一告诉我的），那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一种新潮。别人谁敢呢？他住在船山学社，那个地方是老房子，隔墙都是板壁，有缝，有的地方隔壁房间是能看得到的，讲话也听得清清楚楚。他和杨开慧没有正式宣布结婚，就住在那里试婚。住在那里的其他人就撵他们走，因为呆不住了，才搬到清水塘去了。可是毛一上井冈山就跟贺子珍在一起了。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毛领着部队两次打长沙路过，都不把杨开慧和孩子接出来。后来何健把杨开慧抓起来，湖南解放后易礼容告诉我，杨开慧被绑在人力车里拉去杀头，一路大喊：“我不要死啊！我不要死啊！”她还有三个孩子啊，怎么能放下！前些年湖南修复毛的故居，发现了杨开慧藏在房顶夹缝内的日记，杨的日记里写毛连自己的堂妹都干，说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我研究他的早年，就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是极其特殊的，极其敢做敢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这一点，从革命来讲，那当然没有问题。他跟蒋介石干了那么久，没有这种性格的人领导，共产党不可能胜利。

谈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我提到过“唐纵日记”，这里可以再讲详细一点。我一九四九年到湖南以后，湖南的公安厅有个副厅长叫夏印，他好像也在延安保安处待过，认识我，告诉我有一套《唐纵日记》。不晓得唐纵为什么没有把它带到台湾，可能行李重了不方便？还是怎么样，把这套东西放在他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长沙解放后就被我们公安系统得到了。唐纵是什么人呢？湖南人，戴笠的二把手，不像戴笠那么有名，但是湖南人都知道他，是黄埔的。抗战期间是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这个组就是负责特务、情报工作的。国民党从大陆撤到台湾去了以后，唐纵大概当过公安部长、警察部长什么的，是军人进入行政系统唯一的一个，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人。夏印问我要不要看唐纵日记，大概他翻了一下，知道我喜欢这类东西，就马上告诉我了。我说：你赶紧拿来。拿来以后，我细细地翻，就翻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写着：“现在延安的情况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真是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确信：延安根本没有特务。在此之前，尽管认为抓的人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要说一个特务也没有，绝对不是这么想的，还是认为这么多人，总会有个把特务吧？幸亏看到了唐纵日记，否则我们这些人中间到底是否真有特务，永远是一个谜。看了唐纵的日记，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党糟糕透了，说是“特务如麻”，其实我们中间就没有特务，一个都没有！但是为什么还要那么搞呢？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像后来写毛的晚年的时候那么系统地想，但是触动太大了！所以后来对于三反、五反，特别是反胡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胡风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无非是有点意见嘛。开除我的党籍的时候，那十多条罪状里面就有这一条，说我是反对反胡风运动的。“反

右”嘛，那是任务，勉强应付了一下。大跃进呢，我是很清醒的，这以前都讲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整人，我始终是打问号的，始终是反感的。我把《唐纵日记》全部翻完以后，重要的地方用红笔打了勾勾，让柳思（他原来是长沙地下党在《中央日报》工作的人，新湖南报社成立的时候他是比较负责的，比李冰封他们的地位要高一点，后来离开报社到出版单位去了，所以反右派的时候好像没有他，他对我一直非常好。）把我用红笔打了勾的地方全部帮我抄下来，抄了很厚的一本，把要害的东西都抄下来了。唐纵的日记里还夹了一些蒋介石写给他的小纸条条，我也让柳思抄了下来。蒋介石的字写得规规矩矩，小楷、很端正。那些小纸条呀，我一点不夸张，上面就是他的指示，讲事情该怎么办，下面是“中正”两个字。

丁东：都在唐纵的日记本里面夹着哪？

李：是蒋介石批给唐纵，让他办事情的条子，他都留着，夹在他的日记本里面。我还留了两个条子，放在柳思抄得的本本里面，非常珍贵的东西。日记抄完之后，就交还给长沙公安局了。柳思的手抄本，我到北京的时候带上了。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和田家英第一次见面，把我的很多书都给他了吗？不是老子要洗手不干了吗？那次，我就告诉了他这件事情，但是那句话我没有告诉他。田家英马上就告诉了尚昆，因为尚昆那时是管情报工作的领导。田家英后来就把我那个本子要去转给了尚昆，因为尚昆要看。大概尚昆看完了以后对湖南讲：《唐纵日记》全部拿来，这个东西到了尚昆手上之后，可能就转到公安部系统去了。八十年代以后，不是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吗？群众出版社是公安部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唐纵日记》朱正看得比较详细，我没有细看，他告诉我删节得很厉害，很不像样子。太可惜了。现在也不知道柳思帮我抄的那个原件在哪里了，是在尚昆的遗物里面？还是收进哪个部门的档案了？我那个时候搞水电，哪还管这些事情，所以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要回来。《唐纵日记》里面，也写了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与宋美龄的关系也略微提到了一点，主要是谈蒋介石的办公习惯等等。看了《唐纵日记》以后，我除开知道我们党内自己乱来以外，还了解了一些蒋介石这个人，蒋介石办一些事情，是相当合情合理的。唐纵到蒋介石家里去汇报，看见蒋介石是单独吃饭，汇报完工作，蒋介石有时候留他吃饭，四菜一汤，非常简单、俭朴。蒋介石不抽烟、不喝茶，喝白开水，生活非常严谨。而且从唐纵同蒋介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个很通人情的人，但是有很多规矩。看过《唐纵日记》后，我对蒋介石的看法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认为他是军阀，是张牙舞爪的人。所以，《唐纵日记》对我认识上“左”的问题，起了一个质的变化，自己后来在工作中，有意识地能够抵制一点就抵制一点。

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影响下，后来成了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毛泽东则是他自己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情都敢干，“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人，都无所谓，任性到了极点。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里，随心所欲。换了任何一个人当家，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

好、林彪也好，都不会搞到后来文革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关于毛，我问过黄克诚，应该说他在苏维埃前期还是不错的，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但是反围剿仗打得好，应该说还有情报的功劳，项南的父亲那时候在国民党里，就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决定长征，也是他送了情报。延安保卫战，有熊向晖、陈忠经、崔建的功劳，他们三个人是胡宗南的部属，熊向晖是最内层的机要秘书，对胡宗南的行动了如指掌。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写，似乎一切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萧克的回忆录里面就提到了毛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其实都是原来地方上的人创造出来的，并不是毛搞的。我就跟黄克诚闲谈，问他：毛在苏区工作做得那么好，仗也打得好，为什么博古他们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能把他的权夺了，而没有人站出来维护他呢？黄老说有两条，一个是毛任人为亲，他喜欢李韶九，那个家伙很坏，打AB团，杀了不少人；再就是毛的脾气太坏，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所以他被夺权以后，没有人出来为他打抱不平。

其实长征以前，张闻天就已经认识到博古的问题，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但是毛怎么跟我们谈的呢？他说，在长征的路上他把洛甫和王稼祥两个人争取过来了。

丁东：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对立面，可是后来毛对张闻天并不好，反而将周恩来搁在比较显要的位置上。

李：他这个人权术是比较厉害的，一生最爱看的书就是《资治通鉴》，读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术。还有，张闻天、王稼祥毛认为都是知识分子，毛从骨子里是讨厌知识分子的。说到底，毛还是个农民，心胸极其狭隘，生活上保留了很多农民的习惯。在中南海他就不能坐马桶，你去到他的中南海故居参观，那里就是一个蹲厕。对知识分子，看起来他还是喜欢乔木。

丁东：乔木职务比张闻天他们低。

李：但他还是喜欢，他确实喜欢乔木。到后来，他对田家英也很讨厌了。

当然，毛泽东有他的长处，否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威信。毛写文章是厉害的，确实写得好，一遍稿子。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从延安带出来四篇他的亲笔文章：两篇社论，两封信，我裱成了一个册页，封面题“当代墨宝”吗？这可以看出那时候我对毛的文章的佩服吧。

丁东：后来这个册页到哪儿去了？

李：我一出问题，中央办公厅就没收了，大概现在在哪个档案馆。

外国人说他有人格魅力，他把斯诺俘虏了，还有基辛格也是。把毛完

全脸谱化，说他从一开始就是怎么样坏的人，也不公平。他没有那么多的优点，也就不可能表现出那么多的缺点。可以这么讲，搞出了那么大的乱子，他有本钱，没有那个本钱，能出得了那么大的乱子吗？那么多人跟着他闹？老中青三代人都跟着他闹啊！毛是变化的，这个变化他自己负主要责任，别人也要负责，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还有我们这批人，还有后来的红卫兵，都有责任。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呼吁要搞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依靠什么？第二、理论和主义是什么？第三、共产党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朱德

丁东：周恩来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人吗？

李：周恩来这个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气，毛给他戴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其实周是最合适当外交家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很有脾气，并不是个完全随和的人。

我对周恩来就是惋惜。毛居高临下，那样欺负他。建国初期一次开会，突然停电，毛立即喊：恩来呢？恩来你去找蜡烛来。周恩来后来就是决心甘当小媳妇，因为他不愿意当刘少奇嘛。我在庐山出事以后，总理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搅到那伙人里去？因为他觉得毛还能听进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话，是他的一个可以通气的渠道吧。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事情，周恩来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刘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就主动讲过要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上又讲。周恩来确实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对他是体谅的，是原谅的。

毛对朱德也是一样，萧克七大的时候不是中央委员，就是因为毛嫉恨他，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拥护朱老总的。朱德到后来没办法，就养兰花，大概在住处养了有上千盆。

丁东：其实朱老总在中央就是个闲人吧？

李：闲人。朱老总后来的政治秘书叫沈毓珂，在热河的时候，他是我负责的报社的编辑，他跟我谈过一些情况。因为兰花怕太阳，朱老总要求搭个凉蓬，保护他的兰花。那个负责办事的人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朱老总的要求转到毛那里去了。毛批了句什么话呢？——“中南海不是朱家花园。”

丁东：闲人还不让人家养兰花吗？

李：毛这么一批，朱老总当然生气了，把兰花都捐给了中山公园，一盆都没有留。在庐山批彭德怀的时候，朱老总发言，我是亲眼看到了，毛把脚抬起来，他穿着双皮鞋，对朱老总说：“隔靴搔痒。”朱老总当即满面

通红，再没有说话。朱老总和彭老总的关系很好。彭老总后来不是被关到吴家花园吗，朱老总常去跟他下象棋，也不谈什么。彭老总爱悔棋，两个人吵来吵去，就是下棋。

丁东：朱德没有参加过整人，他没权。

李：朱老总后来好像管过一点手工业什么的，另外就是喜欢写一点诗。田家英跟我讲过，对朱老总写诗，毛都要批评一下。

丁东：毛自己也写诗呀。

李：是啊。他对朱老总一点面子都不给。

丁东：但是在文革中，毛对朱德还可以。因为打倒的人太多了，他得保留这个牌位。

李：后来陈毅去世的时候，让他又复出，那是陈毅的功劳啊。

高岗

丁东：跟高岗接触中，您对他主要是什么看法？

李：高岗这个人从性格上说，跟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否则毛不会那样喜欢他。随高岗工作期间，他咬牙切齿地跟我讲述过郭述申把火钳烧红了，烫他的屁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朱理治在陕北红军中搞肃反，高岗被关起来，受过刑）。他告诉我，毛泽东到陕北后第一次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比你的处境好不了多少。"高岗还谈到毛在延安时同他议论过周恩来，因为整风中除批王明，就是批周的经验主义；毛还跟他议论过陈云，说陈云这个人"树叶掉下来怕打脑壳"，意思是胆子小，干不了大事。毛真正欣赏的是高岗这种人，他喜欢绿林豪杰，不喜欢知识分子。毛后来提拔高岗，整风以后让他担任西北局书记，把他抬得很高，甚至想过让他当接班人。后来为什么发生高饶问题，这里不谈了。

高岗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文化不高，又不爱读书，好玩：跳舞、下棋，玩女人。譬如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常常找我上楼陪他下棋，一下棋就把电话听筒拿下来，不接电话。他下不过我，有时下到十二点也不罢手。一次范元甄用英语写个条子，催我下楼休息。高岗对老婆很坏，动手打，有一次甚至揪着李力群的头发，从楼梯上推下去。我后来离开他，有一个因素，就是怕他搞范元甄。

但是高岗很看重文化，懂得用知识分子，这是他的一个大特点。可以谈一件事：张闻天是党内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去过美国，年轻时写过小说《飘零的黄叶》（延安《中国青年》上刊登过）。当时东北分九个省，张在佳木斯当省委书记，高同我谈，拟调张到东北局当组织部长，让我起草电报。高岗非常看重张闻天。我到高岗那里工作后不久，他把马洪也调

去了，马洪是铁路工人出身，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过，后来曾任东北局秘书长。安志文那时候当县委书记，高把他也调来了。安志文是安子文的弟弟，是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阶段，高岗就是靠这两个人。安志文是有头脑的，他跟赵紫阳的关系很好。

丁东：我跟安志文聊过一次。他专门把我叫到府右街去，让我介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是怎么回事，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思想很活跃，体改委几个杂志都办得不错，是他在背后支持的。

李：办得很好。安志文还去看过鲍彤。

丁东：不管怎么说，高岗周围这几个人还行。邓小平似乎也爱玩，打桥牌。他也是用很多人，自己最后拍板。

李：邓小平与高岗还是有所不同，邓本身还是有一定的文化的，但个性上跟高岗是有相似之处。可以讲在用人方面，高岗比毛不同一点。高岗知道自己没有东西，他是“放手用”主义，用知识分子。

丁东：像林彪、陈云、张闻天，这些人都属于比较有文化修养的人，高岗是一个修养不高的人，但是他就能主持会议。他主持会议，您觉得他讲话得体不得体？能不能够掌握局面？说话的逻辑性怎么样？讲问题是不是能够抓住要点？

李：高岗是这么一个人，没有书本知识，平常主持会议讲话也不太多，但是能抓住要害，局面他是能掌握的，这一点比较厉害，大家对他还是服服帖帖的，他毕竟主掌过一个地区很多年。原来在陕北，他和刘志丹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自己干起来的，独立为王。我记得高岗跟我谈到东北当时的形势时，谈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北满的根据地建设好。北满背靠苏联，是粮仓，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当时关键的一步棋是什么呢？高岗讲，就是剿匪。那个时候东北的地主武装都打着先遣军、地下军等招牌

丁东：座山雕那一类？

李：对。地主武装非常普遍，有些完全是土匪型的，东北在历史上有这个传统，当然也同国民党的鼓励有关系。高岗那时候还跟我谈过，说陈云没有任何打仗的经验，（当时北满分局陈云是政委，高岗是司令员）他在宾县跟陈云住在一起时，自己拿挺机关枪，保护陈云。宾县在北满，是个很大的县，不是下决心把土匪搞掉，北满不可能有后来的局面，如果没有北满的稳定和巩固，东北不可能那样快地取得全面的胜利。

关于对高岗弱点的看法我曾几次同黄克诚谈过。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在湖南省委工作时，同黄老闲谈中谈到这样几点：1）不读书，太好玩。2）生活很不检点，夫人帮忙给他拉皮条，还挨打。3）用人唯亲。黄老不同意我的意见，尤其第三点，黄老认为这是一般用干部的常态：总得有一个自己熟悉的“班子”。我调到北京后，一九五三年初，中央决定高岗任中央计

划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掌管整个的经济系统，当时计委是与中央政务院平行的。我不便向中央提意见，只好向黄老反映自己的看法：高岗绝不适合任此职务，还是陈云担任好。陈那时是国家建委主任，主管基本建设。黄老又不同意我的意见。因此，高岗出问题后，黄老向人宣传：李锐有先见之明。

陈云

经济上，陈云的思想是比较稳当，可靠地、逐步地前进，不胡来。市场经济他大概不能接受，还是鸟笼政策，就是经济还是要由政府管，要有计划。在理论方面，他大概受邓力群的影响很厉害，他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正确的。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从那套教条里面出不来。

我认为，陈云是与毛泽东相处的人中间最高明的一个。他与毛的关系，用一句话说：“惹不起，躲得起”。陈跟毛从来没有像高岗或林彪那样亲近过，毛也不喜欢他。建国初期，毛让高岗管计委，在陈云之上。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就是毛反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嘛。大跃进后就不让他管经济，靠边站了。

丁东：但是毛一直对他很客气，一直安排得很高。

李：啊，对。你看七千人大会他都不发言。陈云厉害啊，你抓不住他的辫子。中央的会议，他能不去就不去。庐山也是一样，称病，说有心脏病，庐山海拔1100米，医生不让去。陈云在毛泽东时代头脑非常清醒，特别是经济方面，三门峡工程他就反对。应该说陈云比周恩来更厉害，他硬是要自己抠的，什么事他都要自己搞清楚。

丁东：这一点他跟林彪有相似之处，都是躲。林彪解放后也是躲在一边不参加会。就连八届十一中全会，让他当二把手以前，都在大连住着，不去北京。

李：可能还有身体的原因。林彪到最后搞的那一套，比毛本身还厉害。“老三篇”、“四个第一”，“一句顶一万句”，“摇小红书”，我认为那比毛还极端，毛还做不到。

应该说，在党内，我跟陈云的关系还是比较深的。陈云从东北到中央管财经，我不是不想跟他，去了湖南吗？后来才知道，陈云还是想把我调到他那儿，都被黄克诚拦下了。我一到北京，周太和就来找我，说：陈云要你。我说，还是让我做些具体工作吧，搞了这么多年坐而论道，过去我不想留在北京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回来，还想让我干这个？周太和把我说的话反馈回去，陈云说：好吧，让他去吧。前面讲过了，我到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后，想把这个局从部里拉出来，独立成立总局时，写信给陈云请他帮忙，他批了，还找陈郁谈：“让李锐做点事情。”他讲了这么一

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批准成立了水电建设总局，不然哪里会有后来的水电局面呢？根本不可能。所以应当说，陈云对我身上的特点，一些优点是认识的，而且是认识得很扎实的。到后来，是他把我搞到组织部去的。他对书记处讲过这种话：组织部我还要管几年。我若从水电部退下来后没有进中组部，就当不了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党内的地位会很不一样。我今天能够做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影响，有今天这样的晚年，跟陈云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组织部是搞人事啊。过去党里面的习惯，对搞人事的人是挑选得非常、非常严格的。

陈云从延安起就做组织工作，他用人有他长的一面，但是用的人中间，也有很不地道的。譬如：胡乔木、邓力群，他只看到了这两个人文化知识的一面，没看到他们的政治本质不行。他看重邓力群，主要是邓编《陈云文选》，写《陈云传记》，还提出陈云思想。跟邓小平一样，陈云认为乔木是党内的一支笔，这个认识是从延安就开始的，在延安，乔木就替毛写文章嘛。

丁东：邓力群跟陈云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就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李：陈云是这个理念，邓力群、胡乔木也都是这个理念。陈云认为，还是自己的子弟接班可靠嘛。还有王鹤寿，王鹤寿这个人很不地道，陈云一直重用王鹤寿，在东北、五十年代，让他当冶金部的部长，到了中纪委时期，王实际上是第一副书记。王最不地道的是什么呢？在生活会上揭发耀邦。耀邦跟我谈过，他非常痛心。耀邦、王鹤寿和陶铸三个人叫“桃园三结义”，在延安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在王家坪。王鹤寿跟陶铸在南京国民党监狱里一起坐过牢，陶铸的女儿是王鹤寿的干女儿。因为从延安起，耀邦跟王鹤寿的关系就非常之好，大概跟王谈了一些闲话，包括陈云、邓小平的一些事。王鹤寿在会上怎么揭发的，我不清楚具体情况，将来可以问问朱厚泽。

丁东：打中要害？

李：唉，打中要害。

丁东：王鹤寿搞冶金怎么样？

李：大跃进跟着跑，不敢顶，不敢跟毛讲清楚。你自己是管业务的，你应当讲得清楚嘛，一吨钢是怎么出来的？你把个基本道理跟毛讲清楚啊。这个应该说是失职，不负责任嘛。三峡的问题我就讲清楚了，大家就都接受了嘛。

丁东：高级干部敢于提不同意见的有几个呀？很少。

李：讲事实总是可以的嘛。当然这个事很难，陈云都不敢讲。

上边说过了，我进中组部是陈云的意见。我找出了他写给我的那张条

子，是这么写的：

李锐同志：

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

他这么一说，我就必须去了，一九八二年三月正式离开水利电力部后，即开始在中组部上班。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却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通知，事情来得非常突然，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事后，习仲勋找我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我才知道些内情，才知道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的母亲先后分递了“告状信”，陈云在信上批了。事后，我没有要求见陈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批。但是想起了一件事，不知道是否因此得罪了他。一九八三年的一天，陈希同和段君毅跑到组织部，找到部长陈野萍和我谈，说王震推荐陈元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征求我们的意见。王震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关系都很好。野萍不讲话，我看出他不愿意，听陈和段的口气，他们也并不是很愿意，但是都怕得罪人。那时候我已经是常务副部长，一看这形势，就说：陈元刚到北京，对北京也不太熟悉，你们对陈元也不熟悉，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点？我没有完全反对，只是说慢点。他们两个人很高兴，就走了。那次就没有安排陈元当市委副书记。结果后来搞差额选举，他没被选上。西城区的前任书记是组织部一个姓孟的局长，因为我也关心陈元，曾问过他陈元的情况。他说陈元在西城区没干过什么事情，那时候他老婆死了，很伤心，工作上没什么大的作为。加上陈云让我顶住耀邦，我没有照做，这些是否都让他感到看错了人：我这个他过去的秘书，两次亲自提携的李锐，不听招呼，不愿做他的人呢？

耀邦下台以后，跟我有过几次长谈，他告诉我，原来以为我是陈云的人，所以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其实从陈云传话让我去中组部，到我离开中组部，并不像有些传言说的，我常常往老板那里跑。我在中组部期间，跟陈云只有一次在上海的碰面，我去上海考察班子，他正好在那里修养，我去看他，他说了让我顶住耀邦的“青红帮”的那番话。我也从来没有给陈云写过信。只是在多年后，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中委落选，陈云说是李锐捣的乱，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资格参加选举，如何捣乱呢？

改革开放二十年，经济上改了，但是政治体制保留了原样。说是中央有两派，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首，搞特区、市场经济；陈云不赞成，主张“鸟笼经济”。胡耀邦时代，开不成常委会，因为邓小平讲，他和陈云谈不拢，耀邦就没有办法。政治上，“六四”陈云是反对开枪的，“六四”以后是人人表态呀，我记得陈云表态就是勉勉强强的两个字：“拥护”。因为李昌、于光远、杜润生和我曾经在五月廿六日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

1，我们四个人在中顾委挨整。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是在党内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符合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应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了，我们四个人得以保留党籍。但是收入《陈云文选》的这封信，后面几句话删掉了。因此，你不能说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有意见的人，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错了。在毛的问题上，陈云也是觉悟得最早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他的人，像富春、谭震林他们，都是文革以后才觉悟。

胡乔木

胡乔木这个人非常复杂，我同他的关系很深，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他一直被一个东西束缚着，出不来，就是必须有个最高的领导，要服从这个最高的领导，实际上还是做驯服工具，他就是要做一支驯服的笔。耀邦对其人的总结是："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我的诗里面写的是"三日无君"，还客气一点。胡乔木在延安整风期间可以说是帮了毛泽东的大忙，毛对他是极其欣赏的，认为他是整风期间改造得最好的知识分子。

丁东：他帮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整风，整王明的教条主义，乔木从头到尾参加了，特别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授意下，主编了一套《六大以来》的文件，从里面找出教条主义的问题在哪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领导在哪里。全套是很厚的两本，另外还有一本薄的选集（范元甄还去做过校对）。后来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编写，胡乔木也参加了。再就是帮毛写东西，毛泽东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是胡乔木帮助定稿的，最后成为文件了。

乔木是老党员，读过洋书，可以用《伊索寓言》的例子写社论（毛不懂《伊索寓言》）。《解放日报》开办以后，很多社论是胡乔木写的，都已收进他的文集里，那些社论当然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解放日报》改版后，有些社论是毛授意他写的，最有名的一篇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是乔木写的草稿，毛改的。那个时候我管社论，送来的稿子我一看，毛将乔木的原稿改得一塌糊涂，等于重写一过。有的稿子则改得很少，比如《教条与裤子》那篇社论。所以整个的整风过程中间，毛对内的文字工作和在《解放日报》上对外的宣传，主要帮忙的就是胡乔木。甚至还有传言，说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是胡乔木写的。写诗词的本事，我认为毛比乔木大，政治气度也比乔木高，乔木不可能有毛诗词中表现出的那种霸气。毛泽东、胡乔木他们两个人很合作，且合作得很好。

丁东：胡乔木把毛揣摸透了。

李：乔木如何被毛选中，这里还可以说几句。一九四〇年乔木起草，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上蒋委员长书》，内容是为大后方的青年讲话，要蒋介石实行民主。这篇文章在国民党那边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毛泽东看到了，很欣赏，打听是谁写的。于是胡乔木被毛调去当了秘书。

自古以来，中国皇帝的周围都有这类奴才式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我们这个制度也必然要产生这种人。还记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他原来是跟我们站在一边的，后来毛表了态，他就马上转了过去，还写文章批判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因为他的儿子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那里的学生把他抓去批斗（那个原始资料我看过，挨批判时，他还揭发了我，说李锐在庐山会议上如何、如何……）。后来毛泽东去看望他，保了他，他因此获得解放。

从毛死了以后，乔木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品格。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是积极打倒邓小平的，写了长篇的揭发报告。一九七七年邓再次复出，乔木吓坏了，是邓力群帮了他，向邓小平讲他的好话。邓小平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人是个软骨头，固执得很，但是还是一枝笔杆子嘛。”一九七九年理论务虚会中途夭折，就是胡乔木起的作用，他为邓小平起草了“四个坚持”的报告，后来还同邓力群合作，将胡耀邦整下台。我那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对于胡乔木，我是给他脱了裤子的。他有次向胡耀邦哭鼻子说：“你下来，你总书记要让位啊。”现在有人讲胡乔木想当总书记，那我倒不相信，因为邓小平连宣传部长都不让他当嘛，他自己当然是想当宣传部长的。

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我写的很多社论都经胡乔木修改，他非常会改文章，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欣赏胡乔木。毛泽东也改过我们的文章。我记得，改版座谈会的新闻是博古写的，毛修改得一塌糊涂，给我印象非常深。到了承德，当然就觉得连个改文章的人都没有，如何进步啊？长此下去，固步自封，危险之至。我的那本书《庐山会议实录》是乔木鼓励我写的。一九八〇年，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我参加的是国务院的能源组，就是煤、电、油三家的部长、副部长，大概有一、二十个人，我是组长。讨论的时间很长，我在小组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了我所经历的庐山会议的情况，大会发了简报，大概二万多字。乔木看到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写一本书。这就是后来的《庐山会议实录》。开始是内部发行，有人议论。乔木对我说：这本书是我让你写的，出了事情，我负全部责任。所以说，人是很复杂的，没办法简单地说是好人还是坏人，在共产党内部更是这样了。乔木对钱锺书就很好嘛，文革后安排他的住房和工作。他对李慎之也很好，李慎之在党内资历不是很高，乔木后来安排他当了社科院副院长。

乔木这个人的两面性十分突出。他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恐怕有一个要害，就是他要做理论权威，只有他可以提出一些理论上的新见解，别的人都不能提，哪怕他是认同的，但是你不能提，你先于我提出来了，就是反动的思想。我和黎澍对他都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你王若水不能提，周扬不能讲，这个说法应该是我胡乔木首创，是我的发展，你们提了就要把你们打下去。他赞同我写庐山会议，大概也是因为在庐山他的形象是正面的，我写了以后，对他在党内的历史地位有一定好处。

现在的“笔杆子”多是文革时期入党的，当然不能同胡乔木相比，他们没有乔木的那个底子，但当奴才也是一样的。

陆定一

陆定一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廿六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揭发出来的，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中央一级的干部。我在秦城关了八年，后来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怎么知道是陆定一呢？因为他天天叫唤：“毛主席呵，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呵！”。一放风，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去以前，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还是延安的那一套逼供信，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就又翻案，他就这样过日子。后来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是什么人啊？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时，他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这样的人都不信任，胡干、瞎来。

丁东：建秦城监狱时，就准备关共产党自己的高干？

李：搞自己的人。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一九五五年下命令建的秦城监狱。很奇怪，毛的这种心理不知为什么？好象蒋介石他们内部也不是这样。陈独秀也有家长制，这个李达跟我说过，他就是由于陈独秀，当然也有自身的原因，脱党不干了。

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他是文革后最早公开提出赞成多党制的党内老同志，所以邓小平讨厌他，文革以后就没有被安排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薄一波

跟彭真一样，薄一波是被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看中的，彭真和薄一波

都是北方党的

当年我负责编撰《中共组织史资料》，这件事归薄一波管，出版这个书要四万块钱，我就找了薄一波。他知道我是笔杆子，就跟我谈了两件事情，一是谈他和阎锡山的关系，二是谈邓力群的事情他是知道的，他和邓力群分开了，一刀两断了。这是九十年代末，这套书出版之前。他还跟我说，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让我当他的秘书，曾问过他对我的看法，他告诉我，他讲的都是好话。

耀邦下台，薄一波掺和了，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那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案子，要不是耀邦主持中组部，不会平反得那样快、那样彻底。真是恩将仇报。

余秋里

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复出回到水电部，一九八O年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能源委员会的主任是余秋里，水电部出了两个人任能委副主任：王林和我。我是被余秋里看中、赏识的。委员会里还有康世恩、唐克、高扬。

丁东：那时您跟余秋里的关系还可以？

李：啊，很好。他刚开始是要我干专职的。我说，不行，不行。我预计这个能源委员会寿命不长，所以我的屁股还是坐在电力部，我不能离开电力部。但是能源委员会的活动我参加，这个招牌有点好处。

丁东：当时成立能源委员会是不是为了安排余秋里？

李：是为了安排余秋里，要把他从国家计委那个位置上端下来，让他让位，才又成立了能源委员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玩艺寿命不长。但是后来能源委员会又变成能源部了，部长是黄毅诚。以前我好像说过，黄毅诚动员我去看三峡，他是黄火青的儿子。

后来十二大组人事班子，也是余秋里负责，我们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还到我家来过两次，有一次我不在家，他专门来看我。但是到了“六四”以后，他就跟我慢慢地疏远了。当然他主要是对于光远不满，但是我也是中顾委反对开枪的四个文职委员中的一个，过去我俩关系虽然很好，这一下就不行了。我觉得他还是某一种农民心理：老子打下的江山，老子坐，别人不能反对。

丁东：十二大让余秋里管人事安排，主要是谁那样信任他？

李：邓小平。小平喜欢他，他向耀邦特意关照过。

丁东：既然他跟邓小平关系好，为什么还把他从计委拿下来？

李：那是陈云的意见。

丁东：陈云要用姚依林，那余秋里就得靠边？余秋里的经济思想是不是跟陈云不一路？

李：啊。余秋里也确实不行，你想这种人怎么能管计委呢？余秋里没有什么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类似高岗式的人物，有魄力、敢干，他的功劳就是大庆。但那是用的打仗的方式，大会战，楞干、楞钻，国家建设不能总是那样搞嘛。

丁东：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非常欣赏？

李：啊。因为石油人家楞干出来了、钻出来了嘛。实际上大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李四光。李四光突破了西方的石油理论。

丁东：但是能组织人硬干，这也是余秋里的作风啊。

李：硬干，他本身的传统就是这么来的嘛，行伍出身，打仗嘛。艰苦奋斗、日夜奋战，拼命干。但是没有科学、没有知识分子，蛮干是没有用的。大庆油田按照西方理论，那个地方是没有油的，而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理论，认为有油，最后打出油来了。不过大庆油田的油很分散。后来我在中组部组建第三梯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嘛，改变共产党领导层的结构，用有文化知识、年轻的一代，替代下打江山的一代。

赵紫阳（兼评胡耀邦）

一九三五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赵紫阳是省立武昌高中的学生，我跟他没有过接触和交往。武汉秘密学联中，武昌高中的代表是密家凡，他后来告诉我，他跟赵紫阳是同班。我离开武大之后，我们自己成立的那个自发支部吸收密加凡入了党。密加凡在延安也坐过牢，去世以前是湖北省社科院的院长。赵紫阳中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没有上大学，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还是好的。我在组织部工作时作过统计，文革结束时，共产党内文化高的官员大多在中、低层；高层中，文化低的多，有的甚至基本是文盲，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数学考零分。建国初期转到水电工作以后，我的感触很深，党的干部不懂自然科学非常麻烦。乔木让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不是写了那篇《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吗？但是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真正重视，没多少人真能听进去。

我第一次见到赵紫阳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那时候好像是省委副书记。大概是一九五四年，我到广东考察流沙溪水电站，那是在从化县的一条叫流溪河的小河上修建的一个电站。我坐火车去的时候跟梁伯琪同车厢，她告诉我她爱人是赵紫阳，还说紫阳原来在湖北读过书。到了广东后，有一天晚上在省委大院的舞会上碰到梁伯琪和赵紫阳，梁伯琪就作了介绍。那次也没有多谈什么，记得当时的感觉就是赵紫阳人长得不错，说话很客气，因为我是来帮广东修水电站的嘛！

我一九七九年一月平反回到北京，那年的二月份在澜波的努力下，电力和水利两部就分开了，我在电力部任副部长。记得赵紫阳是一九八〇年四月到中央的，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二月电力和水利两部又合在一起，恢复水利电力部，合部后，钱正英是部长。我平反回到北京时不是向她表了那个态：愿意归队，在她的领导下工作吗？她大概原来以为，李锐被整了二十年，应该老实了，没想到还是反对三峡，跟她作对，当然讨厌我。就以年龄到线，让我离休了。她当然没料到，我三月份被陈云调去中组部。六月份要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二月份下来后，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对水利工作的意见》（在谈水电的时候，我提到过这封信），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反复修改多次，一直到进了中组部后才定稿，四月份寄给了赵紫阳。紫阳在信上做了批示，并且将这封信作为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的第一号文件下发给大会。为了不引起无谓的麻烦，我没有参加那个会议。但是会议期间，好多参加的人跑到我家来谈大会情况，说我的那封信和紫阳的批示是个“起身炮”，大家纷纷对水利部一贯的工作方针提出意见。我七月八日参加书记处会议，汇报十二大组班子的情况，见到紫阳，他还以为我参加了水利会，问我：听说争论十分热烈。我因此估计紫阳是反对建三峡的，对水利部的工作是有看法的，对我的那些思想是能接受的。这是我们俩在经济工作上的第一次交往，也是唯一一次交往。后来在组十二大班子时，我多次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与紫阳打过不少交道。他大概就是通过那些接触了解了我这个人。

为了解决三峡的移民问题，邓小平提出成立三峡省，国务院就搞了个三峡省的筹备班子，社会上流传一句话：三峡省范围内的老百姓是不三不四（四川不管了，湖北更不管了），根本没法生活。赵紫阳了解了情况以后，釜底抽薪，把三峡省给撤了，将那个机构改成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那些鼓噪搞三峡的人进入他们的低谷时期。四川人民对紫阳应该是有感情的。文革后期紫阳去收拾局面，当地不是就流传“要吃粮找紫阳”这句话吗？一九九二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时，紫阳已经下台了，我知道四川代表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投了反对票。现在事实也证明，三峡建成以后，四川省一点益处都没有得到，摊上的都是倒霉的事。紫阳在三峡的问题上比耀邦要厉害一点，因为他懂经济。在三峡问题上，耀邦在位时并不是坚决反对的。他下台以后，我把我反对三峡的所有文章和意见书拿给他看，他才完全清醒，写了几首诗送给我。

紫阳“六四”下台以后，我第一次到富强胡同六号去看他，是一九九六年九月廿六号，宗凤鸣陪我去的。“六四”的时候，紫阳让人出面（是不是鲍彤，我记不清楚了），召集我们十几个人开过两次征求意见的会，记得有我、杜润生、于光远、李昌、李慎之、孙长江等人。一次是在紫阳去朝鲜以前，一次是他从朝鲜回来以后，会场在国家科委科学会堂。作为总书记，赵紫阳跟胡耀邦相比，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幕僚团，而耀邦没有。紫阳的秘书鲍彤是组织部推荐给他的，紫阳用得非常好。鲍彤领导的这一班人，是真正帮助紫阳处理“六四”问题的。耀邦最后的辞职信是他的秘书郑

必坚帮他起草的，郑跟鲍彤没法比。我问过耀邦："你干吗要写那样一个辞职检讨？"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要照顾这个家。"耀邦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处理自己最后下台的这个问题上，没有紫阳好。赵紫阳为了坚持真理，可以牺牲一切，准备坐牢，得到全家的支持。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多。

我到富强胡同一共看过赵紫阳两次。感觉他那时候身体不好，但是谈话还是没有问题，谈话的精力、神态都还可以。第二次看他，他主要谈的是吴江[2]那本书，因为书里面写了赵紫阳的一封信，在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那件事上起了坏作用。那次，紫阳把这封信的原件给我看了，内容跟耀邦毫无关系。我后来专门找吴江谈了，希望他再版的时候能修改，但是没有什么作用。这件事上，我相信赵紫阳的说法，他跟耀邦的合作应该是很好的，有些意见也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紫阳觉得耀邦插手本该国务院管的一些事情。耀邦去世前十天，跟我有一次六个多小时的长谈，谈了十大问题，根本没有提他跟赵紫阳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分歧、有什么斗争，以前的多次闲谈中也从没有提起过。

丁东：那次赵紫阳为了吴江的事还专门给您写了两页纸，您给我看过。我记得字写得挺大，两页加一块总有一千多字，您保存得挺好，就是不知道您现在收在哪儿了？吴江的书在香港出了之后，赵紫阳就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心病，所以想请李老来做一个历史的证明。

李：我都记不得了。

丁东：二〇〇二年我们一起做"李锐口述"的时候，您给我看的，就是普通的信纸。这两页纸肯定还在。

李：我的东西乱得很，现在是没法找了。

丁东：我还记得大概的意思。就是赵紫阳曾经将陈俊生[3]的一封信转给邓小平和其他的元老看，吴江在他的书里写了这件事，认为赵紫阳转信是冲着胡耀邦去的。赵紫阳解释说那封信的内容就是陈对党的领导体制以后怎么长治久安的一些想法，并没有针对胡耀邦个人的东西。

李：我和紫阳之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耀邦下台以后邓力群有可能要当总书记，我通过鲍彤约紫阳谈这件事，因为出差拖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才见面。紫阳从下午三点跟我谈到四点半，我谈了此人四十多年一贯制——"左"，并给他看了当年在延安杨尚昆就他跟范元甄之间发生的事作的结论（范元甄的记录件）。他向我交了底：小平对此人总的看法是"左"，不论过去、现在。七月十日，我给紫阳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以书面方式正式揭发邓力群的问题。我是让鲍彤把这封信带去的，怕中间耽误或者被什么人扣了。第二天鲍彤就将信交给赵紫阳，紫阳是否批了什么

意见，我不知道，但是他立即将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七月十四日批了三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三个人都圈了。当晚，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隐去了第三条，没告诉我。那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就没法进政治局了；换到中顾委再选，落选中顾委常委，仅当了中顾委委员，和我一样。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姚监复：宗凤鸣记得他带你去看紫阳，一进门，赵紫阳就跟你说了这句话，宗凤鸣听见了这句话。后来你们的谈话他就回避了。他书里是这么写的："赵紫阳见李锐第一句话就是，你在邓力群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

李：对，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这是我和赵紫阳关系中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当代共产党最重大的事情之一。邓力群很厉害，不得了啊，他在重庆开会的时候讲："马克思的《资本论》上写着：雇八个工人就形成剥削。"谁都不敢反驳他。耀邦下台，邓力群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他把耀邦跟陆铿[4]的谈话记录交给邓小平看的。如果邓力群当了总书记，那今天中国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

我最后一次见赵紫阳是二〇〇四年的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的911号病房，是他去世前二十天。那天见他的情况，我在文章里面详细写了。赵紫阳去世时，香港的《明报》第一版登了一版赵紫阳的照片，第二版就是我写的文章《紫阳同志永别了》，国内很少人看见。

那天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去北京医院看孙大光[5]，他是癌症晚期了。我知道赵紫阳住在同一层，从孙大光病房出来，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四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去，说病房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我老伴儿说："我也是搞护士工作的，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你们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那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了，结果她（指着老伴儿张玉珍）发现那四个人待的房内有一张床上放着一个手机，就拿起手机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他的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个人就到房间外边打了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我看见赵紫阳坐在病床上，对面角落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是旧的，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他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最担心香港出的几本有关他的书的作者会有麻烦，他首先就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说没有问题，这几个人我都认得，他们现在都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你的。"他知道，想看他的人都进不来。紫阳床的后

边有个布帘，布帘后面有三四个人，也没法多讲什么，大概也就待了十来分钟。

出来后很难受，反差太大了嘛。那边孙大光的病房是女儿、女婿，儿子、儿媳，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紫阳孤单一个人，盘着腿坐在床上。

赵紫阳去世的时候，我正好在广东，广州的老人们都很难受，马上就设了灵堂。我们是去的杜瑞芝家，在他家设的灵堂前一起哀悼紫阳的。回到北京，我去了紫阳家，一月二十九日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会我也去了，那天组织部还专门派人在旁边照顾我，组织部的老干局长站在门口接我。

丁东：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李：不是高级领导人，是第一位！共产党总书记里面有两个人不检讨：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赵紫阳，但是两个人所在的时代不同，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时候，共产党小得很，赵紫阳是一个国家在他手上啊！陈独秀从思想上讲了不起，一九四〇年就写文章反对斯大林专制，他跟胡适他们差不多，是看清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民主、科学。紫阳为了维护真理，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直被关到死，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里面恐怕再也找不到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不一定对真理完全理解，因为他的知识有限，特别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完全清楚。紫阳下来以后读书，脑子里天天想事情，跟来看他的人交流，他越来越接近真理。在中国这个社会，要把政治、体制、传统文化等方面完全搞清楚，很不容易。紫阳最后的处境，让他的头脑更容易清醒，我认为他彻底认识了共产党的问题。

紫阳在位的时候《人民日报》登过很多好文章、好意见，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民办报纸，那时政府的决策会受到舆论的干预，国家是逐步地向正常的宪政治国转化的。我已经讲过了我的经历，我是从蒋介石时代过来的，那时一个小官出了点问题，报纸马上就公布了。孔祥熙的女儿带着小狗坐飞机，《新民晚报》一登，孔祥熙就被撤职了。蒋介石在南京也没有盖过一栋房子，国民党的总统府还是太平天国时的房子。我们呢？得了天下以后，什么都据为己有，中南海原本是个公园，袁世凯、蒋介石都没有在里面住过！共产党现在还占着嘛。李宗仁在北京的房子后来给陈云住了，全国各地，给毛泽东盖了五六十处别墅啊！江泽民下来后，在上海找汪道涵谈：小平在上海有个别墅，我也盖一个。汪道涵批评他，结果他还是盖了，把周边很多老百姓的房子拆掉，变成一个公园。一九七八年黎澍和胡乔木在天安门散步的时候，毛泽东纪念堂正在盖，黎澍就跟乔木讲："这个玩意将来会被拆掉的。"

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当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接触的头头儿多了，这些人都很有本事。但是他们跟赵紫阳、胡耀邦没法比，胡耀邦很了不起，他读《圣经》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杰出的人物，只有赵紫阳、胡耀邦这两个。我认为他们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以来，领导人里面最好的两个人。他们的头脑最清醒，最能干，是最能够按人民意愿做事的两位总书记。我当年参加党时，武汉没有党，我们自己成立一个临时支部，宣誓入党，那时候对共产党的好感到这个程度！没想到后来会在党内受了那么多罪，很多人比我还不如，命都没了。党内好不容易出了个胡耀邦，出了个赵紫阳，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两个人，这对党来说真得很不容易，对国家和人民是天大的好事。但是那些“元老”们先是把耀邦干掉了，“六四”后又把紫阳干掉了！

钱正英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钱正英在水电部做了一个自己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检讨，有人找了一份记录给我看，你看，就是这份，我唸几段给你听。

她检讨了些什么呢？她说反右时她错打了很多右派；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水电部定的李锐、张铁铮、季成龙、常流、陈牧天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案，她积极参与了；文革中她参与了打倒李葆华、刘澜波和其他的同志，对李葆华、刘澜波等同志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批判，其中最严重的是揭发和交待了刘澜波同志对江青的看法；水电部被迫害致死的有四十二人，在五七干校，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迫害很严重；总理逝世后，曾举办过总理的摄影展览，后来害怕了，下令撤销；“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开了声讨大会，部内进行追查，收缴了天安门的一些诗抄，北京市公安局来抓走了一位同志，没有抵制；在接待部外单位的会上，还表扬对天安门革命事件的镇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特别是在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上调子高，跟得紧，犯了很大的错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在批邓中办了十期学习班，开了八次批判会，不仅在部内，在部外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还把第十期学习班继续办完，引起群众公愤，影响极坏；这些都是错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领导不得力，群众不满意。

丁东：当时钱正英是几把手，是一把手吗？

李：一把手啊，文革中她基本没有受到冲击，从六八年以后一直当部长，打倒了李葆华、刘澜波，她就上去了。

丁东：她不是周恩来一手提拔的吗？文革中等于周恩来一直在用她呀，她怎么还反对纪念总理呢？

李：是。她检讨中还有：我的错误，在撤销、拆散机构的问题上，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是由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片面性，对科研重视不够，片面强调与实践结合，对勘测设计机构过去就主张和施工结合，因此，在改革体制机构中，就提出了许多错误的意见，做了错误的部署，拆散了电总（电力总局）、水总、水科院、北京水勘院、以及北京以外的兰

州、上海、长沙、中南勘查设计院；下放了大批干部；毁坏了科研设备；错误地批判了电力工业中的安全第一，大机组、大电厂、高坝、大水库等的正确管理制度、方针、政策和措施，还提出了一些不科学的错误的口号，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成都勘察设计院的同志抵制了我，我就要开除刘显辉的党籍，他说：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撤销勘察设计院，该院得以保留。在部内撤销科技司，这是我主持决定的。证明过去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在工作中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四届人大后（1975年），部里的工作有所转变，但因为自己觉悟不高，怕字当头，对过去的错误改得不坚决。七四年以后，全国已经搞得那样乱了，广大群众从实践中已经看出四人帮的问题，但自己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等等，都认为是毛主席的思想，仍然是努力学习领会，即使是遇到一些在实际中行不通的事，比如评法批儒、批判《水浒》，我在部里也搞了一下，群众都抵制，我也没有、也不敢往坏的方面去想。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自己在那样的精神枷锁下，跟得并不紧，总怕搞过头。因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和学大庆的会议上，把国务院的一个文件批为“条条专政”，并把罪名强加于小平同志，不仅造成电网管理上的思想混乱，而且对学大庆运动造成很大的影响。我现在认识到，我犯的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多年来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影响的结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思想搞得很乱，弄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把林彪、四人帮的错误思潮认为是毛主席的思想，努力向这个方面领会，努力紧跟，两个“凡是”的枷锁套得很紧，不但不敢说，也不敢想。

你看，这都是她自己说的，一条一条地看，这样的人还能用吗？

丁东：文革中在台上的人，“十二大”前后基本都被换下去了，就是她没事，后来还当了好几届中央委员，最后还当了政协副主席。她怎么能过关的呢？

李：有人喜欢她。那时候，我们那个十二大人事小组一致的意见、全体通过的呀：钱正英不能进中委，所有的人都讨厌她。但是书记处审查的时候，有人保了她。

丁东：钱正英后来还是当了中央委员。

李：书记处有人保她，你有什么办法？李伯宁是钱正英三峡工程的合作者，可是连他都骂：“这是个臭婊子啊。”

丁东：李伯宁跟她也合不来？

李；合不来，但是他们搞三峡是一致的。钱正英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她让李伯宁当三峡的筹备组长，把他抬得高高的。她的本事就在这里。

在中央部一级的干部里面，像钱正英这样一直红到底，文革中、文革后都没事的人，她是唯一的，所以是最臭的。后来她进政协，中共代表团全体不投她的票啊，李先念出来做工作，要大家投她的票。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李先念几个人那么喜欢她。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不倒翁。一九七九年我一回来，刘澜波就跟我讲：这个人是个婊子。很多人都跟我讲她，当然水电系统的人是讲得最厉害的。那有什么用呢？文革中各个部门都受到了破坏，但是没有像水电系统被破坏得那么厉害的。可是她的中央委员一直当到第十四届，政协副主席从第七届干到第九届，到八十岁才下来。

丁东：因为女干部少？

李：也不全是，李先念、王任重这些人非常喜欢她，这个人有她的一些本事，我搞不清楚。十二大选党代表，在北京选不上，把她弄到广西选的，广西谁也不知道她。

她坚决要干三峡的时候说："将来三峡出了问题，我坐牢。"可是一九九九年在水利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她又说：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又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对来自反面的意见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二〇一〇年四月，《亚洲周刊》刊发了篇题目为《追查中国旱灾祸根，前水利部长揭密》的文章。文中称前水利部长钱正英在晚年作出反思，说"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首先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现在钱正英和张光斗又提出要炸三门峡。还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吗？！用手里的权力，游戏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玩完了，看到要出问题了，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搞科学的人，大撒其谎，掩盖自己当年无视科学，打压反面意见的政客陋行。

钱正英是我们这个党用人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专干坏事、祸国殃民，还下不来，孽越造越大。这种用人制度不改变，钱正英这种人就绝不了。

李鹏

这个人实在不值一提，非要说，就讲几句。

李鹏是个烈士子弟，父亲叫李硕勋，一九三〇年在海南岛被国民党杀害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认他做养子，周恩来夫妇自己没有孩子，认了很多

烈士后代做孩子。李鹏是在延安子弟学校上的学，后来被送到苏联学习。我一九五四年去苏联访问时，他给我们做过翻译。除了他，他读书的那个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的留学生中还有林汉雄、贺毅、崔军等几个人（都是烈士或延安的干部子弟），都刚好要毕业了，就跟着我们代表团跑。他们那一批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生中间，罗西北的学习是最好的，李鹏不怎么样。罗西北早李鹏他们一年毕业，这时是代表团的翻译。李鹏那几个人，我后来都要到了水电系统，李鹏在丰满水电站，文化大革命时在北京供电局工作。我平反复出回到电力部后，李鹏被调到部里，没房子住，还来找过我，是我帮助他在隔壁的二十四号楼要到一个单元。

一九八一年刘澜波年龄到线，要退下来，想提李鹏当电力部部长，当时所有的副部长们都反对，说他文革期间在北京电管局当革委会主任是欠了债的。文革我基本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大家都反对，我也就附议了。但是澜波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报上去，有邓颖超关照，当然很快就批准了。我就对李鹏说：将来你就是总理了。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是烈士子弟，是目前政府部门中官当得最大的，又是总理的养子，党的一贯用人路线决定了一定会是你。

一九八三年我在中组部管“第三梯队”，全国人大第六届代表大会召开，政府换届，李鹏是入阁人选（副总理）。大会召开前，他坐不住了，跑到我家来探听消息。我说：你着什么急嘛？你是部级干部，烈士子弟，朝中有人，静候就是了。

现在他出版了两本日记，一本《众志辉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本《李鹏“六四”日记》，我说他是“集体抹黑”，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

江泽民

江泽民是谁介绍给我的呢？周建南。周建南和我都是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八十年代初，他当过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周小川是他的儿子），主任是谷牧。

以前讲过，我高中毕业，到北京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最难考，我根本不敢报，报考了清华，没有考上。家里打来电报，说武汉大学正在北京招生，让我赶紧报名，结果考取了。那时候考大学很难，四、五十个人取一个，几千人考，只有一、两百人能考上。周建南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一九三七年底就到了延安，后来又被派到重庆，一九四〇年左右又回到延安。他在延安给中央负责人讲自然科学，毛泽东都在内。周建南跟我关系很深，有两层：一层是他的夫人杨维哲和我是武汉大学校友，另一层是延安抢救运动，我俩曾被关在一起，都被打成特务，是在保安处认识的。周建南比我吃的苦还多一点。

日本投降以后，一九四六年，我到热河办报，周建南也到了承德，当承德发电厂的厂长，我们又有了来往。后来他去了东北，不久我也跟高岗去了哈尔滨，他在东北管电。建国后他到了一机部，管电机制造，我从湖南调到北京搞水电，需要发电机，跟周建南工作上来往很多，关系非常融洽。所以说，我跟周建南就是这么深的关系。

以前讲过了，一九八二年我到组织部后，中央决定我参加中共十二大人事筹备小组，筹备组有十几个人，余秋里负责，集体住在玉泉山。十二大强调中央委员会要补充进知识化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周建南就向我推荐了江泽民。我让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李志民到电子工业部考察了一个礼拜，他回来告诉我：这个人可以。江泽民就是那次进了中央委员会，当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我本人不认识江泽民，但是因为相信周建南，又迷信交通大学，所以对他有好感，并不知道，江泽民进交通大学其实不是考取的。他是怎么进的交通大学呢？详细情况是钟沛璋后来告诉我的。江泽民原来是汪精卫时代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学生，钟沛璋是那个大学的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江泽民在校时入了党，入党介绍人叫汪嘉猷，汪到我家里来过两次。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把这个大学取消了，在校的学生就按照所学专业被分配到其他大学，江泽民作为电机系的学生转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钟沛璋和汪嘉猷和我谈江泽民，说他在地下党支部里并不是积极分子。江泽民的家境比较好，从小弹钢琴，二胡、小提琴他大概都会一点儿，如果家里没有钱，是不可能学这些乐器的。他的生父是政治人物，在汪精卫那里搞宣传，还搞过电影，宣传日本人好什么的。解放以后，他把生父的情况隐瞒了，五十年代，潘汉年的问题出来以后，江泽民有点紧张。后来，他只提他的养父江上青。江上青在新四军工作过，是张爱萍的部下，张爱萍原来的夫人杨纯也领导过他，江上青是被国民党的卫兵杀掉的。江泽民就拉紧了跟张爱萍的关系，江上青的墓碑是张爱萍写的。可以顺便说一件事情。宋晓梦不是给我写了一本传记吗？先在香港出版，叫做《党内有个李锐》，后来又想在国内出版，书名改成《李锐其人》。当时江泽民对我已经非常讨厌，这本书因此很难出，我就让张爱萍题写了书名，结果出版了。

江泽民当了电子工业部长以后，时间不长，一九八三年的一天，突然到我家来了。他说，陈云把他找去了，问电子工业部的情况，陈元也在座。陈云问他情况的时候，两次谈到让陈元归队（陈元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当时，江泽民对党里面高层的事情完全没有经历，陈云也是他第一次单独见。陈元当时是北京西城区委书记，陈云讲让陈元归队，江泽民很紧张，他问我：陈云是不是要让陈元来当部长啊？我说：顶多当个副部长。江泽民说，像陈元这样的情况，部里有二、三十个，他不同意。我说：你就装傻，装着不知道陈云是什么意思。他要办这个事情必须经过组织部，我来帮你的忙好了。你不提出，我不办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我当时在组织部是有发言权的。有一次开会，耀邦跟我闲聊，说现在

上海市领导班子缺人。我说：江泽民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不久以后，江泽民就到上海当市长去了。周建南知道我推荐了江一下，可能告诉了他，所以江泽民上任之前，又到我家里来了，向我求教：到上海去要注意点什么？征求我的意见。我那个时候脑子也没多想，就说上海不仅经济是半边天，文化也是半边天，还向他介绍了王元化。王元化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在此前配上海班子的时候，由我推荐上来的。后来王元化告诉我，江泽民对他很重视。这是我和江泽民直接发生的第二次关系。

第三次是在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开座谈会，一大批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发了言，《世界经济导报》就把这个座谈会的发言写成了报导，公开了。那张报纸我好像还保留了一份。后来江泽民派了曾庆红和陈至立，把《世界经济导报》封掉了。四月廿九日早上，江泽民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谈了不下半个小时，向我诉苦，说上海有上百人口头对他提出抗议，质问为什么把《世界经济导报》封掉？他简直受不了了，向我求救，说北京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因为他看到我参加了座谈会，让我在北京帮他释放压力。

我那天的日记是这么记的："一早江泽民电话谈《世经导报》事件，说86学潮时，中央即有指示撤钦本立，芮江商量（还有鲍），不好办，只能拖。整顿很难，苏绍智文，季崇威、宦乡都讲导报是搞经济的。苏文事要检讨，钦不理，无法指挥。钦也解释。最近去美国，云里雾里，要同台湾合作，一直顶。当前上海日子难过，煤、粮极紧（粮卖0.16元，买进1元），煤有时只能维持几小时。18亿斤全高价，靠财政贴，受不了折腾。向谁请示，不当这个家算了。谈到政治局开会时耀邦得病情况，对耀邦评价。关于'出国'事，曾在干部大会辟谣。廿一日学生又闹，三点通告，上海不能再闹。也有游行，劝阻，警察学乖，难免有别有用心人。廿一晚，曾庆红、陈至立找钦，说送大样不送。北京座谈会，六页涉及许多名人。吴明瑜、童大林说有歪曲处，名人有言论自由，送到国外有何好处。胡心情不好，是否向外谈，怕引起动乱。几次保钦，爱护北京同志出发。市委要审查，谈到十一点，不能改，删一些、选一些，也不行。于是江泽民、汪道涵去。"我修养不好，拍了桌子。摆什么老资格，不要唯恐天下不乱。如此无组织、无纪律，不要仗'洋霸'。"江先走，汪谈到夜二点，钦允照办。北京有悼词，登一登。美国务院发言人遗憾，岂有此理。吴忠信儿子吴光灼（宋楚瑜同辈）在美国搞学潮，反越战，哥伦比亚大学罢课，封闭，乃私产。告到法庭，学生赔钱，封二月，父母领回学生。如上街，物价问题，牵连工人、即很麻烦。疏通工作，稳住学生。对学生讲，未经本人审阅。转告江，先是不要生气，如照办，江道歉。廿三日开人代会。结果全文未动。汪极生气：两面派，不可交之朋友。名誉董事长辞职。钦下午带两个副总编到市委，保证改版，到廿五日，改版大样不签字，钦本人躲到度假村去了，意以此抗议。张伟国用驻京办事处名义向市委发哀的美敦书。北京外国记者，还威胁要上街。于是只好停止工作，派工作组。严家

其，许良英向上海写信：捍卫新闻自由，遵守宪法，请律师。武汉来一英文电强烈抗议，说江武断，刚愎自用，无落款。张伟国调回。请我在北京疏通，还说过去同建南谈过要来看我。”

电话中我对他很客气，说我帮帮你好了。过了几天，他没有办法，自己跑到北京找赵紫阳。那时候不容易见到紫阳，他是找了一个关系见到的。我知道紫阳批评了他，话讲得很厉害，说：这个事情是你自己闯的祸，自己回去处理。所以，他把赵紫阳恨死了。紫阳去世前，我知道他的病情比较严重了，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说不能再软禁了，这样对紫阳是完全不对的。他根本不理。最近《炎黄春秋》登了田纪云等人回忆赵紫阳的文章，江办就通知，让《炎黄春秋》换人，足见此人心胸的狭窄。

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以后，就不认识我这个人了，碰了面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也去了，他们那几个站在中间，我们站在旁边。游行完了后，他走到两边跟大家见面，好几个军队将领和他打招呼，他从我面前走过，看到我理都不理。这种嘴脸，党内我见多了。

还有一件事情，十六大以后，南方报业集团的子报《21世纪环球报道》找我访谈，我跟他们谈了一件事，江泽民接班的时候，邓小平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会，邓小平对江讲：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我估计江泽民把这句话记在脑子里了，他很想当邓小平第二，很想我说了算。这个事情我是听萧克讲的，据说还有正式文件。《21世纪环球报道》登出这个访谈，不几天就被封掉了。后来我给胡锦涛写过一封信，抗议过这件事情。我说，你们干吗把这个报纸封掉啊？

邓小平南巡是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前，江泽民到党校去做报告，有一个“七一讲话”，反对和平演变，要把个体户搞得倾家荡产。邓小平反感得很厉害。他的“九二南巡”，就是想把江泽民换掉。但是其他三个老人（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都反对。陈云讲了一句话：江李体制不变。李先念也讲了一句话。李先念为什么对江泽民印象这么好呢？他住在上海时，江泽民对他们夫妇照顾得很好，所以对江泽民的印象就很好。薄一波讲：事不过三，你干掉了华国锋、干掉了胡耀邦、干掉了赵紫阳，再干就不象话了。所以邓小平就没换成江泽民。然后江泽民就提倡“闷声发大财”。现在贪污腐败搞得这么严重，都和他有直接关系。邓小平是半个毛泽东，但是他有功劳，一九九二年他不南巡的话，搞不好江泽民让我们跟朝鲜一样。

我的隔壁住了一个刘大姐，是刘（伯承）帅的侄女，她的爱人是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她告诉我，黄丽满在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长时是办公室副主任，对江泽民照顾得非常好。黄丽满后来到了深圳，江泽民去深圳时就问：哎呀，小黄在哪里啊？我要到她家里去吃饺子。当地就把黄丽满提上来当了副书记。黄丽满盯着于幼军，他俩是死对头。于幼军原来是深圳市委书记，到湖南是常务副省长，到山西当省长，调到北京要当文化部长，现在把他留党察看两年。不过还好，待遇没有变。于幼军在广东省委

当宣传部长的时候，他搞理论，我关于毛泽东的早年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早年毛泽东》，一本是《早年毛泽东读书生活》，他就建议我把两本合到一起，叫做《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给我出版。这个书印出来以后，于幼军请我去签名售书，他陪着我，我是那个时候认识于幼军的。于幼军这个事是共产党的悲剧，吴南生、林若都为他不平，朱镕基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宋平也安慰他。

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最近水电报的记者韩磊发现了一张照片，是一九八〇年我请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到中国来考察三峡，我和刘澜波一起主持开会的合影照片。江泽民坐在第一排的最边边上，那时他是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所以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美国代表团看完三峡，在会上的结论是：长江是世界上难得的黄金水道，根本不应该在它上边建大坝，明确地反对三峡。江泽民上台后却积极干三峡，就是要为自己树碑立传。

有一次报纸上有篇文章说，扬州人喜欢讲话，得了话痨，我就写了一首诗，收在《龙胆紫集》里面：

谚云得意便忘形，弹唱吹拉从不停。
可怕“话痨”难治也，惯于作秀显高明。

有一年我去广东，吴南生、任仲夷、还有我三对夫妇，参观吴南生熟悉的一个古董店，店主让我写字，我就写了三幅大字，两幅是写毛泽东的，一幅就是这首诗，写江泽民。我对这个人的结论就是这首诗。

胡锦涛

胡锦涛是什么人呢？清华学水利的，一九六五年毕业。刘家峡向中央机关要干部，他就去了。杜星垣跟我讲过，文革中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到刘家峡以后，找胡锦涛谈过话。杜星垣对胡锦涛讲：你不要跟着他们乱来。胡锦涛后来听了他的话。筹备十二大的时候我管人事，要每个省推荐两个年轻人进中委，甘肃冯纪新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陈光毅——当时是甘肃省计委副主任，另一个就是胡锦涛，当时是甘肃省建委的副主任。

一九八二年，胡锦涛到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来读书，那个时候我正在管这个事，我去中央党校找他谈过一次话。胡锦涛知道我，因为我管过水电。我一九八二年七月九日（星期五）的日记有一段：“上午到党校，找胡锦涛、杨泰芳谈。前者为清华66届，原在刘家峡，后调省，现任建委副主任，40岁。如在水电，一处长而已。印象不错，将情况归写耀邦。下午他要找中青班三十人座谈。”

那个培训班的班主任是我的二姐李英华，她在党校管这个班。这个班

的学员，二姐只给我推荐了一个人——朱厚泽，她并没有看中胡锦涛，但是我有点私心，想发展水电，胡锦涛是清华水利系毕业的，觉得他上来可能对水电有利。

十二大之后当选的五十五岁以下的中央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和老人们见了一次面，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在，耀邦当家，我当司仪。我一个一个介绍每个人多大年纪，简历，那次有李鹏、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胡是候补中央委员。这个活动报纸、电视台没有报导。

胡锦涛当了常委以后，到我家来看过我一次，是春节的例行拜访。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今年多大你还不知道啊？"我才想起来他在党校那个培训班，我跟他谈过话。胡锦涛上来，也是我们那个十二大班子人事小组考察的。

后来我跟他再也没有过直接的交往，就是寄东西给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反馈，给其他人的也是一样。只有朱镕基例外，给他寄东西，很快就会告诉我收到了。我干预最厉害的是三峡问题，三峡开工以后一年，我还给中央写过信，建议停工，三峡不得了，这是永远的麻烦。汪恕诚原来是电力部副部长，一九九八年后当了水利部长，他最担心的是现在三峡水库流下来的水不是混水，是清水，这个问题过去我们都没有注意，这个清水下来以后，把两岸堤防的基础破坏了，那个堤防几百公里长，非常麻烦，年年都要补修。后来朱镕基打电话给我，说是跟总书记江泽民说了，江让转告：顾全大局，以后不要再说反对的话了。

习近平

习近平原来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我到正定去看过他，和他谈过。那时候组织部想提拔他，这个事情习仲勋非常关心，专门找了高扬，高扬那时候是省委第一书记，让他照顾一下。没想到高扬的牛脾气比我还厉害，不买账，还在省委的常委会上把习仲勋关照他儿子的事提了出来。这当然使得习近平很难再在河北呆下去。后来组织部知道了，何载那时候是秘书长，和习仲勋又都是陕西人，就由他出面找了项南，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去了。项南安排他在厦门市当了副市长，然后从那里一步步地发展起来。

大概是二〇〇三年，还是0四年，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我和老伴儿还有秘书薛京三个人到浙江去，他请我吃饭。我跟他讲："你现在地位不同了，可以向上提点意见啊。"他说："我怎么能跟你比啊？你可以打擦边球，我不敢。"可见，他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他在浙江老干部中口碑很好，其他一般化，现在好像是要让习近平接班了。

人有了权以后是会变化的，这样的人我接触多了，前边讲了江泽民。

耀邦是非常不错的，坐到总书记的位置上，本质并没有变。习仲勋也很不错，在批判耀邦的生活会上，他事先并不知道，进去以后看到那个场面，拍了桌子，说：“你们不早通知我，这是要干什么？”他大概骂过一次李鹏，后来就长期住在珠海，不住在北京了。我只要到深圳，每次都去看他，他就和我谈。习仲勋是非常好的人，和我的关系也非常好。

三任中组部部长

最近的这三任组织部长中，贺国强是湖南人，当化工部副部长时到我家里来看望过我。他和钱宗仁是同班同乡的好朋友，我不是写过关于钱宗仁的那篇文章《请读＜胡杨泪＞——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的问题》吗？他说钱宗仁去世前，他和钱宗仁谈了四个小时。后来贺国强到重庆当市委书记，我和老伴儿到重庆时，他还请我们吃过饭。到是后来他到中央组织部当了部长，在一个部里，反而不理我了。

曾庆红对我最坏。我负责编撰《中共组织史资料》，搞清楚了一个最重要的材料，从打AB团起，共产党杀自己人，杀了十万，他的父亲曾山是执行者，是毛泽东的死党。《中共组织史资料》这么一个大工程，完成时我要开一个总结会，让电视台来，曾庆红不批。我给胡锦涛打电话问：“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情电视台都不能来？”胡锦涛说：“哎呀，中央内部有的同志有意见。”我就知道是曾庆红。

一九八三年我去安排上海班子的时候，曾庆红是石油部一个研究所的副处长，把他提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当了一个副职。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他来了，专门过来和我握手，我问：“你是哪一位啊？我记不得了。”他说：“我是曾庆红。”态度殷勤得很。你看，牵涉到他自己的利害关系时，就一百八十度了。

二〇〇七年，李源潮刚当中组部部长时，我正好因为心脏病住进了北京医院，他知道了，立即赶到医院病房看我。他跟我说：你的书我都看过，还嘱咐医生要认真治疗我的心脏病。这是跟前两任部长态度非常不同的。

我现在还是会时时地被中组部的老干局或者办公厅谈话，被告诉这篇文章不该写、那个讲话不合适，现在是老子被儿子、孙子管着了。我能够活到这个年龄，是过去做梦也没想到的。七十岁时，我作的自寿诗中有一句：“应借覆车追往事，仍须放胆写文章。”这两句诗就算是我的这个口述回忆的结束语吧。

1. 由余习广、段绍译主编，银河出版社出版的《李锐上书集》中收录的此信日期是5月6日。查李锐日记，此信日期应为5月26日。
2. 吴江，（1918年—），浙江诸暨人，曾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

任，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那本书”指《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该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 陈俊生，（1927年—），黑龙江桦南人，历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委。
4. 陆铿（1919年—2008年），记者、报人、学者，云南保山人，晚年曾采访胡耀邦，后来以谈话记录方式发表，其中提到胡耀邦在谈话中说，他和邓小平等现任领导人都会退下来。
5. 孙大光（1917年— 2005年），安徽寿县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温家宝是他推荐的。

李锐大事年表

1917	4月13日出生于北京。不久国会解散，全家迁回湖南，居平江老家，父亲李积芳赴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
1920	父亲李积芳返回湖南闲居，全家居长沙。
1922	父亲李积芳心脏病发作去世，小妹妹不久夭折。母亲时年32岁，拒绝祖母要求携子回平江老家居住的要求，退回路费，削发盟誓，独自在长沙养育三个子女。
1923	入长沙楚怡小学读书，与黄兴遗腹子黄乃同学，俩人成为终生好友。
1928	小学毕业入楚怡中学。
1929	转考入岳云中学。
1934	初夏，岳云中学毕业，进京会考，未考取清华，后在京报考武大，考取。秋季入武汉大学，冬，在《珞珈月刊》发表一生唯一小说《走》。
1935	12月在武汉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当选为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务干事，负责宣传工作。
1936	1月12日创办《救国报》，暑假回湖南长沙参加长沙救亡活动，与廖意林、唐荣前、邓克生创办三日刊《湘流》。冬，参加武汉市秘密学联领导工作，与懿训女中代表范元甄相识。
1937	2月在谢文耀家成立武大自发党支部，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5月中旬离校北上北平寻找党，除两个从反省院出来的人，自发临时支部的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期间与武大同学万国瑞（杨纯）同居。6月6日被捕，在警察局关押一周，交“保证书”后被释放。“七七”事变后，与文立徵、万国瑞随平津流亡同学会同学到天津乘船至烟台，转入济南，参加三

	路军抗日干部训练班。不久离开，转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与万国瑞失去联系。11月受同学会和山东省民先部委托去武汉募捐，因泰安已失守，按长江局指示回到徐州。
1938	1月到徐州，在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担任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总负责人，但未正式接上组织关系。3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并介绍从鲁北前线到后方寻找组织关系的文立徵入党。会后带领文立徵、郑琳、乔彬等十几人同返徐州。5月带领五战区青年救国会三、四十人进入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随部突围时被打散，只身到淮阴。后经苏北乘船至上海，绕道香港、广州，6月回到武汉，接上组织关系后，被中共长江局派往湖南，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并任省青委负责人，结识省机关报《观察日报》总编辑黎澍，成为终生好友。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在街上巧遇随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第三厅抗敌演剧九队到长沙参加大火善后工作的范元甄，后明确恋爱关系。
1939	7月25日代表湖南省青委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9月13日晚，与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的范元甄结婚。10月5日离重庆返回湖南交代工作，准备与范元甄同去延安。11月22日离湖南赴重庆，12月10日到达重庆，15日左右与胡乔木等人同车离开重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逗留几天，之后乘八路军卡车，于12月31日到达延安。
1940	被胡乔木留在在中央青委工作，搞青年运动史，后担任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41	9月被博古调到延安《解放日报》，任国内版编辑，写有一系列“辟栏”文章和社论，影响最大的一篇社论为《开展吴满有运动》。
1942	3月31日毛泽东召开《解放日报》改

	版座谈会，会后报纸改为以宣传中共为主。11月抢救运动开始。因报纸工作性质，报社内并未真正开展“抢救”。
1943	4月3日，因武大同学魏泽同承认自己是特务，咬出“李锐是上级”，而被捕，入延安保安处“监狱”。
1944	因小学同班好友赵炳烺随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参观，6月获释，回《解放日报》工作，因在保安处期间，妻子范元甄与邓力群发生关系，范认为与邓有真正感情，俩人离婚。
1945	6月与范元甄复婚，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二人同随杨家岭大队离延安赴热河办报，11月到达承德，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1946	7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11月经赤峰至林西继续办报。期间，7月26日长子范苗生于撤退途中，范元甄随家属队撤至齐齐哈尔。
1947	6月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报纸改为《群众日报》，任社长。10月高岗到赤峰巡视工作，与高岗数次长谈，替高岗书写分局会议报告。
1948	3月到东北探亲，调东北局任高岗政治秘书。10月调任陈云政治秘书，参加解放沈阳工作。
1949	2月初随陈云进入解放的北平，4月回到沈阳，5月离东北南下。经天津报到，调新建湖南省委办报。6月9日到达武汉，8月6日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
1950	12月调任省委宣传部长。8月长女李南央出生。
1951	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1952	10月，调北京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任局长。
1953	年初写报告给陈云，建议成立独立的部外总局。获陈云批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任总局局长。创办《水力发电》月刊，建造办公大楼、宿舍楼群，陆续成立勘探设计总院及各大区

	勘探设计院，争取到新安江、刘家峡、狮子滩、上犹江、以礼河等水电项目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	完成黄河流域开发规划。12月16日参加电力代表团，任副团长，赴苏联考察。
1955	3月24日从苏联回国。在苏期间收到中央发来征询“建设三峡”意见电报，刘澜波接受李锐建议，复电：“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向中央交付详细报告《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1955）》。7月30日燃料工业部解散，分为电力、煤炭、石油三个部。任电力部部长助理。
1956	6月《中国水利》发表林一山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建三峡解决长江洪水问题。9月组织《水力发电》专刊提出不同意见。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1957	4月13日在《人民日报》四版发表杂文《大鱼网主义》，反对建设三峡。总局在北海公园开办水电展览会，宣传水电。7月，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8	1月与林一山一起被招，参加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发生“御前辩论”。毛接受李锐意见，搁置“三峡”建设。2月水利、电力两部合并，任副部长，并兼职毛泽东秘书。3月陪同周恩来第一次考察三峡。10月，任团长，率中国水电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4月，幼女范茂出生。
1959	水电总局在北海公园建成装机容量为十千瓦的“少年先锋水电站”。7月参加“庐山会议”，8月返回水利电力部

	接受批斗，被定为“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成为“李锐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受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处分。
1960	4月23日，发配北大荒虎林县852农场兴华村劳改，几乎饿死。
1961	秋，获田家英、李富春援手，调虎林镇发电厂劳改。再次获李富春援手，11月20日返京，11月30日与范元甄再次离婚。
1962	1月11日-2月7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水利电力部准备为李锐恢复党籍，降局级使用，因范元甄揭发“反毛”言论，失去机会。
1963-65	1963年4月发配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改造，任水库职工文化教员。
1966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接受批斗，不再担任教员，参加劳动。
1967	11月11日被专机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未宣布被捕原因。
1968-74	秦城监狱单间监禁。
1975	5月30日出狱，未解释释放原因。请求见儿女，被范元甄拒绝。当日被送返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11月大姐李琬华、二姐李英华至磨子潭探望。
1976	2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出任党主席；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准备为平反上诉。
1977	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二姐援助下开始平反申述。
1978	5月15日收长女李南央来信。6月21日李南央在北京见到胡耀邦，被告知李锐申述已批转中组部李步新副部长处理。7月28日大姐李琬华、大姐夫唐家桢与与女儿南央至磨子潭探望。10月16日省委办公室致信省卫生局，通知李锐住院。23日离开磨子潭，24日入住合肥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病，遇安子文，允回京后立即帮忙解决问题。12月30日接中组部、水利电力部返京通知。

1979	1月4日乘火车返回北京，先从陕西返回北京的女儿南央，及张铁铮、林汉雄等老水电部下及延安友人林肖雄等车站接车，入住白广路水利电力部招待所。安子文欲调中央党校任教务部主任，婉拒；1月底在水利电力部复职，任副部长。1月20日-2月5日由女儿南央、女婿悌忠陪伴赴长沙省亲，见到母亲和大姐一家。2月水利、电力两部分开，刘澜波任电力部长，留电力部任常务副部长。5月随康世恩率领的中国能源考察团出访巴西、美国。7月搬入木樨地22号楼，10月与张玉珍结婚。
1980	母亲去世。7月，长办主任魏廷铮陪同邓小平游览三峡，说动邓建设三峡。陈云嘱立即写信中央，陈述三峡不可上马原因。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秦城八年狱中诗集《龙胆紫集》。
1981	恢复重整文革中被彻底破坏的水电机构。
1982	2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水利、电力两部再次合并，钱正英任部长，以年龄到线为由不予留任，3月6日正式从水电部退休，随即被陈云调入中组部，任青干局局长，并参加组建中共十二大班子小组。1982年9月由帅孟奇、章蕴提名，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起草1982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社论《起用一代新人》，1982年9月5日在中共十二大小组会上发言《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并在各省、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做了一系列有关干部“四化”，选拔中青年干部，组建“第三梯队”等问题的发言。
1983	11月16日-25日，任三人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4	9月，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母亲先后、分递“告状信”，陈云批示：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不适

合再在组织部工作。欲调至经济中心任顾问，本人坚持留在中组部。9月27日，乔石代表组织部结论：82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0月2日正式离休。

1985	4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三峡工程》，5月出版《起用一代新人》。
1987	1月16日耀邦下台，传邓力群将接任总书记一职。7月10日写信给赵紫阳、邓小平，揭发邓力群问题，反对邓力群担任总书记。邓小平批示：1.撤销（邓力群）一切职务；2.旧账不算；3.保留政治局委员候补资格。当晚胡启立电话告知，但隐去第三条。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选为中顾委委员。
1988	着手著作《庐山会议实录》。
1989	1月9日-2月20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赴美国讲学。访问了哈佛、西里斯克、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和斯坦福5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5月，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内部发行《庐山会议实录》。5月26日，与另三位中顾委文职委员：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六四”之后，四人在中顾委挨批，不予“党员登记”。
1990	8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是在党内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符合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因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9月长女李南央携女儿巴筱忙离国。
1991	读书、著述。
1992	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从此未有任何正式职务。
1993	3月19日-4月17日，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赴澳洲访问、座谈、讲

演。5月21日-7月1日，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参加“党——国”中国问题研讨会（遇苏绍智、王若水，前者流亡美国，后者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会前由女儿南央陪伴在加洲洛杉矶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分别作“三峡”和“毛泽东”主题报告（在洛杉矶见到流亡美国的许家屯、金尧如）。会后至波士顿接受美国制片人苏珊《中国革命》一片采访，并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中国问题”讲演。返德州女儿家小住数日之后，由女婿巴悌忠陪伴，参加明尼苏达“海峡两岸问题——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研讨会（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水许家屯、陆铿，台湾的吕秀莲和龙应台等也参会）。回国后被国安部反复询问与许家屯会面情况，从此再未被获准出境（包括香港）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97年申请探望女儿，参加外孙女的高中毕业典礼也遭拒批。

1997 中共十五大前，以《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为题，上书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

2002 中共十六大前上书江泽民和中常委，提出十项党内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议。

2007 中共十七大前上书胡锦涛和中常委《关于十七大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

2009 再次上书胡锦涛并中常委（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对胡锦涛“以人为本”的口号及温家宝决策过程实行“民主、透明、监督”的说法表示拥护，呼吁逐步有序地推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2011 自费出版《李锐文集》。

2012 11月中共十八大上作为列席代表，在分组会上发言，呼吁“宪政开张”。